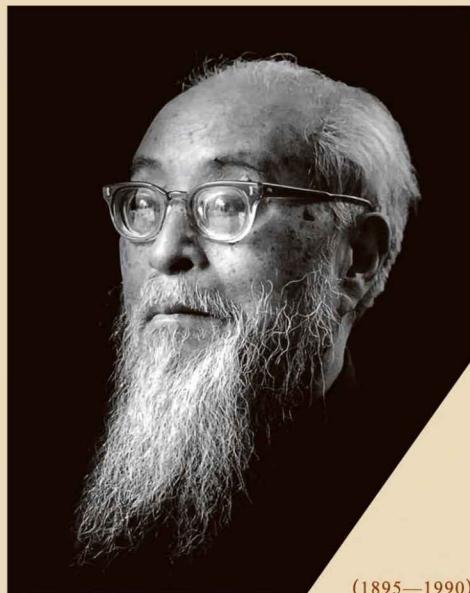


郭羅基 著



(1895—1990)

“梁效”顧問 馮友蘭

“梁效”顧問馮友蘭

郭羅基 著

美國華憶出版社

Copyright © 2020 by Remembering Publishing
Feng Youlan as Counselor to Liangxiao Writing Group
Guo Luoji
ISBN: 978-1-951135-38-6 (Paperback)
978-1-951135-39-3 (Ebooks)
LCCN: 2020 903378
Remembering Publishing, LLC
9600 S IH-35, C600
Austin, TX 78748
RememPub@gmail.com

書名：“梁效”顧問馮友蘭
著者：郭羅基
出版：美國華憶出版社 奧斯丁・德克薩斯州
版次：2020年3月第一版
字數：311千字

作品內容受國際知識產權公約保護，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郭羅基（1932—），孫女郭曳桐作

序 言

我本來打算寫兩本書，一本是《馮友蘭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興亡》。在構思提綱的時候，發現兩者的內容交集，寫起來重複必多，不如將兩者合一，以《“梁效”顧問馮友蘭》為題。這個題目是一箭三雕。本書的關鍵字是三個：馮友蘭、“梁效”、文化大革命。論說文化大革命中的馮友蘭，不能不涉及馮友蘭與“梁效”的關係；論說“梁效”，不能不涉及“梁效”與“四人幫”的關係；論說“四人幫”，不能不涉及“四人幫”與毛澤東的關係。所以，研究馮友蘭這個人物，可以窺知宏大歷史的一個側面、一個片段。馮友蘭是我的前輩，也是北大哲學系的同事，我對他有切近的觀察。從馮友蘭這一滴水也可以映照出文化大革命的海洋。

馮友蘭初為“反動學術權威”，後為“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階下囚翻做座上賓。他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典型人物。馮友蘭的發達是因為攀上了“梁效”。

現在的“80 後”“90 後”年輕人，恐怕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梁效”。

“梁效”是兩校大批判組的譚名，兩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是古今中外從未出現過的特殊的寫作班子，曾經獨霸文壇，呼風喚雨，控制思想，左右輿論。“梁效”的成員是一夥“四人幫”的御用文人。敘述“梁效”的興亡，首先是為了明真相、存史實；同時也是為了探究產生“梁效”的條件，以及如何消除這些條件，防止再生“梁效”。

我親身體驗到“梁效”的猖狂，終於又見證了“梁效”的滅亡。

我是有資格評論馮友蘭和“梁效”的。在文革的浪潮中，我就批了馮友蘭，批了“梁效”。我也有條件系統地評論馮友蘭和“梁

效”。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哲學系掌權，積累了揭批“梁效”和審查“梁效”的材料。但是，這本書的寫作和出版已經晚了。

文革中，1973年鄧小平復出以後，各方面大力整頓，扭轉亂局，使人們看到了希望。1975年下半年，形勢忽然逆轉。11月，從清華、北大開始，發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鄧小平的“整頓”戛然而止。“梁效”是急先鋒。我為中國的時局憂慮，心中十分憤慨。當時我正在課堂上講授列寧的《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我很不喜歡這本書，教學小組的教師們大多不願講這本書，推來推去，推到我頭上。我是教學小組組長，推不掉了。這本書是批唯心主義的，好在可以藉題發揮。果然，機會來了。我在批唯心主義時聯繫實際，批了馮友蘭的唯心主義。馮友蘭在“批林批孔”中風頭正健，但他的唯心主義是眾所周知的。馮友蘭是“梁效”的顧問，我就說馮友蘭把唯心主義帶進了“梁效”。其實不能這樣說。我是以馮友蘭為跳板，跳到“梁效”頭上。有一點困難，因為列寧批的是主觀唯心主義，馮友蘭的哲學是客觀唯心主義，聯繫起來不大貼切。工農兵學員是不難對付的，他們沒有從哲學上提出問題。而是從政治上提出問題，向領導檢舉揭發。哲學系工宣隊頭頭張某在全系大會上疾言厲色地說：“郭羅基，不批劉（冰），不批周（榮鑫），批起‘梁效’來了。我們要跟他辯論！”“梁效”是碰不得的。那時節“大批判”改稱“大辯論”了，我成了“大辯論”的對象。我被趕下了講壇，由黃枬森接替。我擔任的大學裏最小的官職——教學小組組長也被撤職了。

工農兵學員參與的“大辯論”是大吼大叫。我不說話，他們逼著我“表態”；我一說話，又“打態度”，指責我“極不老實”。反正我在歷次運動中總是態度不好的，我也不指望他們說我態度好。那種辯論是靠取消對方的發言權取勝的。我說：“我不願意跟你們辯論了，行不行？”工農兵學員說：“不行，就是不行！我們要跟你辯論到底！”那種辯論又是強加於人的。

遲群在一次辦公樓禮堂的幹部大會上氣勢洶洶地喊叫：“有人批‘梁效’，你是好漢站出來！”我早已被剝奪了參加會議的權利，不在場，故沒有人站出來，說明批“梁效”的不是好漢。

歷次運動，不管是什麼主題，對批判對象總是要從頭到腳、從古到今全面揭發，叫作“搞臭”戰術。最有效的“搞臭”材料是男女關係、貪污腐化等等。因為在我身上找不到這些材料，就有人挖空心思地提出：“他給兒子、女兒取名都包含反動思想，要他交代。”我給兒子取名郭聽雷，給女兒取名劉觀雲。按當時的標準，確是有點“反動思想”。兒子出生於 1967 年，正當文革的高潮，“聽雷”意為“於無聲處聽驚雷”，是詛咒文革的。1976 年，敲響“四人幫”喪鐘的四五運動中，有人寫了一個劇本，劇名就是《於無聲處聽驚雷》。女兒出生於 1971 年，當時我憑直覺感到政壇將有風雲變幻，果然三個月後發生了林彪葬身沙漠的“九一三”事件。“觀雲”的意思是“坐看風雲變幻”。有朋友調侃說我們家是“政治氣象臺”。這一切都不能說。挨整的人往往自證其罪，承認了就會戴上“思想反動”的帽子。我忽然急中生智：“給兒子、女兒取名是什麼意思？聽，‘五洲震盪風雷激’，所以兒子叫‘聽雷’；看，‘四海翻騰雲水怒’，所以女兒叫‘觀雲’。你們說，‘包含反動思想’嗎？”那兩句是毛的詩，誰敢說“包含反動思想”？全場都啞了。我心中暗自好笑。

“四人幫”利用清華、北大兩校搞事。從清華大學批劉冰點火，北京大學繼之而起，將“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火往上燒。批劉冰，提出“追風源”，追到教育部長周榮鑫，又從周榮鑫追到鄧小平。然後策劃“點名批鄧”，最後打倒鄧小平。

“點名批鄧”完全是陰謀。先是從清華開始，北大緊接，製造輿論，似乎“點名批鄧”是群眾的要求，向政治局施加壓力，作出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批鄧的決定。運動的名稱改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在清華、北大，“點名批鄧”先從小範圍暗中開始，逐步升級，層層擴大，從秘密到公開。

1976 年 1 月 27 日中午，周培源差他的大孫子到我家，說：“爺爺請你馬上去一趟，有急事。”還有周老手書一紙。我立即騎上車，跟他到周家。周老坐在客廳等我，說：“今天上午，黨委常委開擴大會，搞‘點名批鄧’，氣氛很緊張。我沒有發言，下午還要接著開，

怎麼表態？”周老是北大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常委。我說：“你怎麼表態都不得體。擁護批鄧吧，講點不痛不癢的話，是言不由衷；反對批鄧吧，立即成爲‘大辯論’的對象，又寡不敵眾。你還像上午一樣，不表態。不講話，叫人莫測高深。來一個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由於周老在會上一言不發，第二天，黨委派簡報組的兩個人，手持紙筆到周家，說：“你在會上沒有表態，可能時間不夠。你補一個表態，我們可以寫進簡報上送。”周老說：“我有話在會上就講了，會上不講就是無話可講。”那兩個人輪番威脅利誘：你表態，對你和家人如何有利；你不表態，對你和家人如何不利。周老依然一言不發。那兩個人猛抽煙，滿屋子烏煙瘴氣。僵持了一個小時，他倆只好告辭。

黨委常委開了7次擴大會議，一次比一次擴大，最後擴大到2000人。

3月4日，召開全校大會，進行“點名批鄧”。爾後，人人必須表態；誰不表態就同誰進行“大辯論”。我在與人談論中朗誦了南宋陳亮的詞，他在一片妥協苟安聲中沉痛地喊道：“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我說：“20世紀的中國人也應有一個半個恥於向權勢屈服的吧？”我從“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就是“大辯論”的對象，“點名批鄧”不表態，又罪加一等。本來是每天“辯論”一次，現在是每天“辯論”兩次。

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五號文件，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公開“批鄧”。在清華、北大，五號文件沒有向群眾傳達，因爲兩校的運動早已超過五號文件了，但特地向我一個人單獨傳達。那時我因情緒憤激，導致胃出血，住在醫院裏。哲學系工宣隊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我傳達，要我表態。我說：“知道了。”“沒有了？”“沒有了。”工宣隊警告：“對中央文件的態度，是個嚴重的問題，你要好好考慮。”工宣隊傳出去，郭羅基對“批鄧”的表態只有三個字“知道了”。一個“批鄧”積極分子對工宣隊說：“郭羅基講的‘知道了’這三個字是有來歷的，你們知道嗎？”“什麼來歷？”“過去皇上批奏摺就是用這三個字。”工宣隊恨恨地說：“郭羅基，這傢伙反動透頂！”

黨委書記王連龍在一次幹部會上點名：“北大批鄧不表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周培源，一個郭羅基。”言下有罪大惡極之意。很好，比一個半個還多了一點。北大就有兩個，別提“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了。即使在北大，恐怕也不止兩個，只是我們兩個比較引人注意罷了。大多數人的“批鄧”表態，不過是在壓力之下的逢場作戲，聽說有人居然敢於不表態，反而受到了鼓舞。

周培源是國際著名人士，不能把他怎麼樣。“批鄧”積極分子的火力集中到我身上。白天，接受“大辯論”；晚上，親朋好友登門勸說。那些日子，我覺得晚上比白天還要難熬。白天的“大辯論”不讓我講話，我或是橫眉冷對，或是閉目養神，省得動腦筋。晚上，面對親朋好友的勸說，既不能橫眉冷對，也不能閉目養神。他們都是一番好意，勸我：“表個態算了，這年頭誰不講假話。好漢不吃眼前虧。”我只好說：“我不是好漢，所以不怕吃眼前虧。”他們還說：“將來總有你講話的時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都是古訓，不好反駁。但人各有志，我不贊成他們的處世哲學，又不得不違拗他們的好意，內心很痛苦。

直到粉碎“四人幫”，我“靠邊站”已將近一年。沒有工作，工宣隊卻勒令我每天要到哲學系所在地 38 樓去“上班”。大學教師不是坐班制，本來是不用上班的。工宣隊把上班當作懲罰的手段。

1976 年 10 月 6 日，抓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10 月 10 日深夜查封了“梁效”。查封“梁效”時，我在現場。

粉碎“四人幫”，我得以翻身。哲學系的師生推舉我為“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掌了大權，人稱“哲學系臨時政府首腦”。

“梁效”是個神秘組織，粉碎“四人幫”以後才揭開內幕。我保存了一批審查“梁效”、審查北大“四人幫”幫派體系的內部文件，很有價值，應加以利用，不使湮滅。

至今有關“梁效”的書只出了一本——《“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作者是“梁效”中人范達人，自說自話。我這個當年“梁效”的反對派，是不是也應該寫一本書？

我想寫“梁效”，寫“梁效”顧問馮友蘭，久有此意。我的寫作將以親身經歷為基礎，儘量給出文字依據。但所有材料都留存在南京家中，我1992年出國後，20多年不准回國，無法獲取材料。我兒聽雷，特地從上海到南京，費了好大的功夫，將家中所有的書籍和材料編了一個索引。我根據索引，指定所需的書籍和材料，由家人陸續寄來。20世紀70年代的報刊文章，互聯網上搜索不到，小弟耀基、好友秦伯益又幫我複印、掃描，用電子郵件傳來。他們助成了我的寫作。我於2016年動筆，撰寫《“梁效”顧問馮友蘭》。正當完稿之際，2018年6月遭遇車禍，肋骨斷了4根，並傷及大腦。打開手稿，好像不是我寫的，故而寫作停頓。過了很長的時間，我忍著病痛，重操舊業，憑藉巨大的毅力，終於完稿，由此又耽擱了一年多。

我寫的是歷史，不是小說，更不是戲說，雖然有些情節看起來荒誕不經，因為當時的現實就是荒誕不經的。我也注意細節的描寫，歷史的真實往往就在細節之中。

為了說明“梁效”和馮友蘭活動的歷史背景，我對“批林批孔”“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這些重大的歷史事件詳加考證，梳理了來龍去脈，闡明內在的邏輯聯繫。這些敘述不見於正史。我的努力，為存信史。

揭示和記住荒誕的歷史，是為了避免荒誕的歷史重演；研究過去，是為了開創未來。

2019年11月

於美國奧馬哈

目 录

序 言	I
第一章 一生文章應帝王 1	
莊子的“應帝王”和馮友蘭的“應帝王”	3
“應帝王”和立“新統”	6
未成“帝王師”，淪為“帝王奴”	8
“中體西用”乃根本	11
第二章 靠“聰明的唯心主義”渡過文革劫難 14	
大號“反動學術權威”——“二馮”	14
馮友蘭會不會自殺?	18
馮友蘭說“自殺不是人”	19
馮友蘭為什麼不會自殺?	20
紅衛兵抄家	23
馮家門口貼了一張擋駕抄家的告示	25
第三章 檢討標兵 28	
第一段 抗戰時期	29
第二段 解放前後	32
第三段 抽象繼承	36
第四段 人性論	39
第五段 藉孔子的僵尸，向毛澤東思想反攻	41
第六段 近一兩年的錯誤言論	43
第七段 自我鑒定	44

第四章 表態高手	45
馮友蘭誓言“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	45
軍宣隊罵馮友蘭“笨蛋”	47
馮友蘭善於找題目表態	48
政治運動中更是積極表態	51
江青的關懷和馮友蘭的獻詩	52
抓住一切機會歌頌毛澤東	55
第五章 “當代孔子”向古代孔子宣戰	60
時來運去生感歎	61
群眾自發批极左	62
反左與反右的較量	65
《人民日報》批極左	66
毛澤東親自出馬做裁決	68
《人民日報》的“批邪”運動	72
反左傾的代表何以又成爲左傾的代表？	74
毛澤東自認一生做了兩件事	75
孤獨的晚年	78
“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	80
“批林批孔”的吼聲	85
毛澤東批評馮友蘭的不老實又需要他的不老實	88
馮友蘭的起義	91
毛主席欽點馮友蘭	95
毛主席對馮友蘭遲到的關懷	97
第六章 “批林批孔”大開張	103
奇特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103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怎樣炮製出來的？ ..	105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一份什麼樣的材料？ ..	108
江青放出“炮隊”	113

“一二五”大會露崢嶸	115
“三箭齊發”	118
批了郭沫若，又批梁漱溟	122
批了中國人，又批外國人	123
翻江青的土改老賬	124
“梁效”承蒙接見	125
鹿死誰手看兩家	126
江青派人到軍隊“放火燒荒”	128
“批林批孔”又成動亂	130
第七章 “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怪胎——“梁效”	133
一個奇特機構	134
一個神秘據點	138
“梁效”是誰領導的	140
“批林批孔”批“周公”	144
批了“周公”再批“周公”後	152
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尷尬	155
“批林批孔”演化為“儒法鬥爭”	157
“四人幫”對馮友蘭來說是後生小子	160
說《紅樓夢》、評《水滸》也是戰場	164
“梁效”式的大批判風行一時	171
“梁效”的特殊使命	174
第八章 “梁效”顧問叫誰“敢於作皇帝”？	176
江青自比武則天	176
女的要掌大權	179
顧問詠史頌女皇	180
又誇呂后了不起	184
“梁效”為江青效勞的多功能	187
小米粥裏有政治	193

幸臨“梁效”據點	195
“諂媚江青”何所求？	197
第九章 “梁效”的蕭條	206
鄧小平復出	206
全面整頓大見成效	208
毛提出理論問題	210
“四人幫”販賣私貨——反經驗主義	213
毛說“不要搞四人幫”	217
江青後院起火	224
“梁效”像斷了線的風箏	226
第十章 “梁效”的瘋狂	228
形勢逆轉	228
毛遠新這個小人物起了大作用	231
鄧小平自稱“桃花源中人”	234
“反擊右傾翻案風”從清華大學點火	236
北京大學繼之而起	239
“追風源”害死周榮鑫	240
“追風源”追到鄧小平	242
“點名批鄧”是陰謀	244
緊跟清華、北大的第三家	246
中國特色的悼念式抗議	252
北大的清查和馮友蘭的捧場	260
“批鄧”與“反周”	261
“梁效”發出“大進攻的信號”	266
“梁效”搶先點出最大的走資派	269
歪曲和篡改階級鬥爭學說	271
何謂“本質上的聯繫”？	272
從“批鄧”到“批一層人”	273

第十一章 “梁效”的覆滅	279
策劃“效忠信”	280
借外國人說中國事	283
“四人幫”的目標和手段	286
“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	292
製造警惕“右派上臺”的輿論	297
“梁效”論證“按既定方針辦”	299
什麼是“既定方針”？	302
發難的號角成了滅亡的喪鐘	303
中南海的懷仁堂之變	306
夜半“梁效”遭查封	309
第十二章 “梁效”的後事	314
“穆仁智審查黃世仁”	314
兩個“凡是”壓制對“四人幫”和“梁效”的揭發批判....	317
群眾要求對審查“梁效”的人進行審查	320
捂蓋子的方針和群眾的抗爭	321
從批判“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325
審查“梁效”的結果	327
“四人幫”的動員令竟是“梁效”擅自發出的	332
對人的處理	333
馮友蘭的“解脫”	334
“梁效”分子有一點悔悟嗎？	339
把“梁效”作為研究對象	342
附一 “梁效”最後成員39人及顧問的名單	344
附二 “梁效”的著作一覽	347
第十三章 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361
錢鍾書在美國究竟說了什麼？	362
馮鍾璞挑起事端	363

該罵不該罵？	367
迫害章廷謙的罪責在誰？	373
製造冤假錯案的“清理階級隊伍”	376
第十四章 道術多變遷，平生不老實	379
哲學史研究的開創之功	380
一種豈有此理的理學	384
“新理學”的矛盾	386
重寫中國哲學史	390
給自己做總結	394
高智商，低人格	396
參考文獻	404
馮友蘭本人的著作	404
馮友蘭親人、家人的有關著作	405
馮友蘭傳記	406
馮友蘭評論	407
馮友蘭哲學思想研討	410
馮友蘭與梁漱溟	413
馮友蘭與章廷謙	414
馮友蘭與錢鍾書	414
“梁效”	416
文件和資料	418
歷史背景	422
備查	423
作者小傳	424

第一章

一生文章應帝王

馮友蘭¹ 有一副自嘲聯：

終身教研兩依據
一生文章半檢查²

上聯“終身教研兩依據”，符合實際；下聯“一生文章半檢查”，不大確切。1949年（54歲）以前的大半生，馮友蘭從來沒有

¹ 馮友蘭，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農曆乙未年十月十八日）生於河南南陽唐河縣祁儀鎮，1990年11月26日逝於北京友誼醫院，享年95歲。馮家為祁儀鎮望族首富。祖父有田1500多畝，家中常開二三十人的飯席。馮父臺異連中秀才、舉人，殿試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第三甲第一百九十三名，即末名進士，授湖北崇陽縣知縣。馮友蘭初讀於族中私塾，背誦古文，練就童子功。少年時代，就讀於開封中州公學（今河南大學）中學班、武昌中華學校。1912年轉入上海中國公學大學預科班；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法科，入學後轉文科哲學門，學中國哲學，1918年畢業。1919年12月，考上公費赴美留學；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抗戰期間，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教授、文學院院長。1946年，赴美國任賓夕法尼亞大學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1952年後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印度德里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文學博士。歷任第二屆、第三屆和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和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文革中當上了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

² 馮友蘭致山西農民車恒茂信中語。見馮勤學《鴻雁傳誼六十年》一文，引自單純、曠昕主編的《解讀馮友蘭·學人紀念卷》（277頁，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作過檢查；1949年以後的小半生，確是經常作檢查。因此至多只能說“半生文章多檢查”。值得追問的是，前半生從來不作檢查的人何以到後半生經常作檢查？客觀上，環境變了；主觀上，馮友蘭的人生追求沒有變，經常檢查還是為了實現從來不作檢查的抱負。

馮友蘭自稱，他的全部著作都是“照著說”和“接著說”。寫《中國哲學史》是“照著說”，寫“貞元六書”³是“接著說”。照著古人的哲學去說，說完了，就接著說自己的哲學。“貞元六書”是馮友蘭接著程朱理學說，故曰“新理學”。“新理學”的體系是“通天人之際，達古今之變，明內聖外王之道”。“內聖外王”乃帝王南面之術。馮友蘭的這一套學問，必須而且只能“貨與帝王家”。“貞元六書”中的《新世訓》講新生活的方法論，最後一篇落腳到《應帝王》。馮友蘭的一生都在“應帝王”。如果不是時勢變易，他必將按家族的傳統、跟著父輩的腳印，循科舉而向帝王的殿堂攀登。“應帝王”是他人生的歷史起點，也是他思想的邏輯起點；不過前半生是應蔣帝王，後半生是應毛帝王。說他“一生文章應帝王”，倒是確切的。應了蔣帝王，再應毛帝王，總是不大自然。從來不作檢查到經常作檢查，實為以迎合、奉承、緊跟消除這種不自然。洞悉“應帝王”，才能理解馮友蘭的為人和為學；洞悉不同的“應帝王”，才能理解馮友蘭的不作檢查和常作檢查。

³ 所謂“貞元六書”是馮友蘭的“貞元之際所著書”。何謂“貞元”？馮友蘭自謂：“貞元者，紀時也。當我國家民族復興之際所謂貞下起元之時也。”（《新世訓·自序》，《三松堂全集》第4卷，369頁。）何謂“貞下起元”？還是不明白。“貞元”語出《周易》。“乾卦”的卦辭為“元亨利貞”。注《易》者謂此為春夏秋冬之序。所以“貞元之際”，直白地說就是冬春之際，“貞下起元”就是冬去春來。馮友蘭喻以抗戰時期的中國將冬去春來，而他的著作就是這個冬去春來時代的哲學。馮友蘭曾說，金岳霖的本事是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他自己的本事是把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大體如此，亦非盡然。“貞元之際”“貞下起元”“貞元六書”就是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以致他本人和別人需要一再作注。金岳霖是從簡單開始，進行邏輯推演，越說越複雜。馮友蘭的“貞元之際”不過是文字遊戲，沒有邏輯推演，完全是多餘的複雜。

莊子的“應帝王”和馮友蘭的“應帝王”

“應帝王”本是《莊子》內篇第七的篇名，莊子本人未有解釋何為“應帝王”，只是講了六則寓言。窺其意，主張隨任自然，無為而治。莊子身處戰國的亂世，以為世人太有為而多事是致亂之源，嚮往上古的自然狀態，繼承老子的思想，提倡無為。18世紀西方的啟蒙學者，也以人類的自然狀態作為推論的前提。看來，自然狀態是一個方便的假設。但可以引出不同的結論，啟蒙學者從自然狀態引出積極有為的結論，老莊從自然狀態引出消極無為的結論。莊子的“應帝王”命題包含著內在矛盾。如果真能實現無為而治，就不需要帝王了；當了帝王就要統治非帝王，不可能無為。莊子的主張雖是無為，他汲汲於向從平民到帝王的一切人推銷無為卻是有為；以有為促無為，這又是一個矛盾。古今中外的哲學，往往具有理論自身中的矛盾及理論和實踐的矛盾。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實踐的哲學”，馬克思主義者是實踐“實踐的哲學”，這就沒有矛盾了。

“應帝王”，郭象注：“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在莊子那裏，“應帝王”的含義是“應為帝王”“應然帝王”。而在別人看來，他是教人怎樣做帝王，為帝王出主意，因此“應帝王”的另一層含義是“應承帝王”“應對帝王”。莊子“應帝王”的內容是消極的，沒有一個帝王聽他的；但“應帝王”的命題後來卻轉化為積極的，應帝王之邀或響應帝王、呼應帝王以謀事。馮友蘭極為推崇董仲舒，他說：“董仲舒是一代大師，用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回答了漢武帝所提出的問題。可是像董仲舒這樣的大師，中國歷史上能有幾個？”

⁴ 董仲舒“用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回答了漢武帝所提出的問題”，就是“應帝王”的樣板。

馮友蘭在闡述新生活方法論的《新世訓》中歸結到“應帝王”，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響應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為之提供方法論，這就是“應承帝王”“應對帝王”；另一方面，又從一般人的生活方

⁴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62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法談到“首領”的生活方法，為“首領之道”做出幾點規定，這就是“應為帝王”“應然帝王”。舒蕪說：“馮友蘭先生抗戰期間也並不超然，他講‘應帝王’學術界皆知其意之所在。蔣介石對之優禮有加，常請吃飯。請他到中央訓練團講學，那可不是一般學者有資格去講的，因為學員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將。”⁵

有人回應馮友蘭的批評者，為“應帝王”辯護。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宗璞）⁶說：“最後《應帝王》一章講領導藝術，講社會的組織和管理。我就覺得CEO們都應該讀讀這篇文章。”她還說：“‘貞元六書’中《新原人》是講個人的道德修養與精神境界；《新事論》是講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之路；《新世訓》是它們中間的過渡。單從邏輯上講，它的結尾也自然是《應帝王》。”⁷什麼“邏輯”？沒有講清楚。那麼，為什麼不標為“領導藝術”或“管理藝術”？這就不懂馮友蘭的苦心了。標為“領導藝術”或“管理藝術”，就模糊了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是“應帝王”，不是“應CEO”，也不是“應部長、廳長、局長等領導層”。那麼，為什麼文中又不說“帝王”，而說“現代首領”了呢？說“現代首領”才有現實意義，說“帝王”別人還會以為是說給古人聽的呢。馮友蘭的“應帝王”是繼承了中國文人的傳統，說到“現代首領”是在傳統中別開生面。

有人引用余英時的論述：“余英時先生認為，馮友蘭思想的最深處始終有一種向‘帝王’進言的意識。這只要讀一讀他的《新世訓》中《應帝王》一章即可知。余英時講，馮友蘭不敢以柏拉圖的‘哲學

⁵ 舒蕪致謝泳信。見謝泳：《網絡時代我們如何讀書》，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⁶ 馮鍾璞（宗璞）1928年生於北京。抗戰爆發後，隨父去昆明，就讀於西南聯大附屬中學。1946年回北京，投考清華大學，未取，（1946年，有三個清華子弟報考清華落榜：清華建築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兒梁再冰，文學院長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校長梅貽琦的女兒梅祖芬。這三個人中有人與錄取分數線只差一分。清華的嚴謹校風及這三位清華首腦為人的清正作風，一時傳為美談。）入南開大學外文系。1948年，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後，任文藝刊物編輯。20世紀70年代，就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她的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說《紅豆》、長篇小說《野葫蘆引》和散文集《紫藤蘿瀑布》等。

⁷ 出自宗璞著《給古人少許公平》，馮友蘭研究所版權所有。

王’自任，他的中國背景使他只想做‘王者師’，或者至少要做政治領袖的高級顧問之類。縱觀馮友蘭的一生，我們不得不承認余英時的這一評價是大體公允的。……從迎合‘總裁’，到歌頌主席，乃至媚諂女皇，馮友蘭一生不脫‘應帝王’情結。”⁸ 余英時先生是不是看走了眼，怎麼沒有從《應帝王》中看到“領導藝術”、CEO必讀？

引述余英時是否有誤？且看他本人是怎樣說的：

我認為他（馮友蘭）的思想深處，始終離不開向“帝王”進言的意識，只要讀一讀《新世訓》中《應帝王》一章即可知。1949年他上書自效，卻得到“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的答覆，雖心中“有一點反感”，得到御賜則視為無上光榮。1957年招宴中南海，不幸未得機會與毛多說話。毛送客人出大門，人人都去了，只有他站在車門旁不捨得走，有所期待。衛士提醒毛，“還有一個客人”，毛轉頭招手告別。顯然使他失望。以後與毛有兩次“拉手”談話的親切場面，再加上劉少奇和周恩來也從旁湊興，誇獎一二語，他簡直喜不自勝，又寫詩，又寫對聯。我認為這都是向帝王進言的潛意識從中作祟。⁹

海外新儒家中的人物劉述先評馮友蘭，也說：

馮氏……的致命傷在於他有很強的“應帝王”的一面……這一方面的習性到大陸易手以後，乃發生極大的負面作用。

劉氏認為馮已不在當代新儒家之列，因為他早就否定了自己從前的觀點。¹⁰

馮友蘭的“應帝王”，在中國的學術界，不說是唯一的，也是很引人注意的。

⁸ 史飛翔：《余英時評馮友蘭猶在“功利境界”》，陽江新聞網，2013.01.06。

⁹ 陳致：《余英時訪談錄》，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¹⁰ 劉述先：《平心論馮友蘭》《當代》（臺北）“最富爭議的人物：馮友蘭”專輯，1989（4）。

“應帝王”和立“新統”

馮友蘭雖喝過洋墨水、戴過博士帽，但從外表到內心依然是傳統的中國文人。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博士學位的專業是“中國哲學”。

¹¹ 中國人到美國學中國哲學，不免滑稽。他的導師杜威，在中國哲學方面還不如他。除了拿學位的方便，也可見其對傳統的固守。

傳統的中國文人名曰“士”。士，至少有兩種：一種是與權勢對抗的士，極少數，“士可殺，不可辱”；另一種就是極大多數被毛澤東看透了的附在“皮”上之“毛”的士。“皮毛士”是官僚體制的後備軍，他們的最大抱負是為“帝王師”。馮友蘭在“三反”運動中自己交代：“開始學哲學時，就抱著要做‘帝王師’的思想。”余英時說馮友蘭想做“王者師”，沒錯。馮友蘭說：“像董仲舒這樣的大師，中國歷史上能有幾個？”他是想當“幾個”中的一個的。歷史上的“皮毛士”睥睨當世，自命清高，想當“帝王師”的，弄不好反為帝王所殺。馮友蘭的精明就在於欲為帝王師，必先師帝王。董仲舒之所以能“用他的整個哲學體系回答了漢武帝所提出的問題”，首先在於他摸透了漢武帝的心思。馮友蘭想必研究過“天人三策”。董仲舒的“策對”，無非是將漢武帝的“策問”中蘊涵的思想加以發揚光大，以“應帝王”。故，成功的“應帝王”，如董仲舒，即師帝王的帝王師。蔣介石的代表作《中國之命運》的內容，無非固守傳統，加點資本主義，即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獨立半殖民地的意識形態。馮友蘭的“應帝王”之術，就在於首先師蔣帝王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半獨立半殖民地意識形態，以“貞元六書”進行學術包裝，恣意發揮，叫賣於市，求為“帝王師”。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用馮友蘭的話來說，即“貞下起元之命運”；馮友蘭的“貞元六書”，用蔣介石的概念來說，即以哲學論證的“中國之命運”。馮友蘭曾在重慶

¹¹ 中國學人到了西方，一般都是專注於西學。例如，余英時說，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和讀博士學位時，“我當時想的是，我既然到國外來了，那又何必唸中國書呢。所以我想先多唸一些西方的書，至於怎樣和中國學問聯繫在一起，那可以等我回香港以後再慢慢消化”。（陳致：《余英時訪談錄》，125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和西安的集中營講課，西安集中營只許看兩本書，一本是《蔣介石言論集》，另一本就是馮友蘭的《新理學》。

馮友蘭有一副常常提起、自鳴得意的對聯：“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上聯表達了政治抱負，下聯表達了哲學抱負；兩者結合，就是為今上立“新統”。其中一個“輔”字，道盡馮友蘭的心志，表達了儒家的入世精神。

立思想上的“道統”，以維護、論證、引領政治上的“正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維繫幾千年歷史綿延的儒家學說是千年道統。時至 20 世紀，馮友蘭還說：“每一種社會，都有他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例如中國秦漢以後的孔子……。世界有許多的國家，都需要立一種哲學，以為‘道統’，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¹² 馮友蘭枉為美國留學生，你在美國看到、聽到過以一種哲學作為“道統”的嗎？美國流行實用主義，但實用主義絕非“道統”。立道統完全是中國特色。作為新儒家的馮友蘭，致力於將千年道統的老店新開張，故曰“新統”。接著千年道統立“新統”，就是在他自己“接著說”之後要別人“跟著說”。他的《新原道》的最後歸結為“新統”；所謂“新統”，馮友蘭自云：“它所講的，還是‘內聖外王之道’，而且是‘內聖外王之道’的最精純底要素。”¹³ 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看了以後說：“寫得倒是好，只是把事情說得太穿了。”就是說得太露骨了。

馮友蘭“應帝王”的全部事業就是皓首窮經製作內聖外王的“新統”。如果蔣介石的正統延續下去，馮友蘭很可能成為歷史上“幾個”董仲舒中的一個。不幸，蔣介石的正統斷裂，而馮友蘭又初心不改，因此就要應不同的帝王。

毛澤東既是領袖又是導師，既是政治權威又是理論權威，兼有“君”“師”的地位，集正統與道統於一身。他的正統來源於革命，恰如商湯“永革天命”，不需要繼承歷史上的正統。因此，也不能利

¹²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 4 卷，511 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¹³ 馮友蘭：《新原道》，第 1 版，123 頁，1944。

用歷史上爲正統服務的道統。馮友蘭是看清楚的，但立“新統”的癡心不改，故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將“新理學”貼上“馬列主義”的標籤，以期兜售“新統”。

在馮友蘭逝世以後的追悼會上，有一副輓聯，引用張載語，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歲”。說馮友蘭 95 歲的一生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完全不對。他是爲黨國立“新統”，先是爲國民黨的黨國，後來爲共產黨的黨國。

未成“帝王師”，淪爲“帝王奴”

馮友蘭應蔣帝王較爲得手。

1934 年，馮友蘭趁應邀出席在布拉格召開的“第八次國際哲學會議”之際，申請訪問蘇聯。回國後，他得出結論：封建社會“貴貴”，資本主義社會“尊富”，社會主義社會“尚賢”。¹⁴ 他出生於中國的封建社會，遊學於美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又到過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不能不進行對比，心中似乎有所觸動。他根據自己的見聞做了兩次演講。一次是漫談蘇聯；另一次是以“秦漢歷史哲學”爲題，論述“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社會存在”的觀點。這兩次演講引起了國民黨政府官方的注意。11 月 28 日，他被憲兵視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戴上手銬，押送保定行轅。全國譁然，人們紛紛提出抗議。連魯迅都慨歎：“安分守己如馮友蘭，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它了。”¹⁵ 迫於全國民主力量的聲勢，

¹⁴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77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¹⁵ 魯迅致楊霽雲。《魯迅書信集》，下卷，695 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魯迅說，對於“安分守己”的文人如馮友蘭，“且要被逮”，而“推知其它”，其他不“安分守己”的文人如何？那就是李公樸、聞一多，則被暗殺、吃槍子了。《余英時訪談錄》中有言：“1946 年，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李公樸、聞一多，當時出現了一副十分諷刺性的對聯：‘天下是老子打來，誰教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江山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一槍殺人，兩槍殺人’。”（83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現在那些沒有經歷過民國、少不更事的人鼓吹“回到民國”，你們先準備好，是願意享受“安分守己”的待遇。

馮被關押、審訊一天後，軍政部長何應欽發電報：“馮友蘭如無重大嫌疑，著即釋放。”從此馮友蘭嚇破了膽，投入國民黨的懷抱，次年當選為 1935 年召開的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1949 年以後，他又以此炫耀自己“戴過手銬”，還有“進步的一面”，據說還背上了“進步包袱”（見第三章）。

1945 年，他又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坐在蔣帝王身旁。蔣帝王口口聲聲稱他為“老師”，庶幾為“帝王師”矣。蔣介石請他吃飯，還說：“大會要選你為中央委員。”馮表示：“願為青年導師，當了中央委員對青年講話就不方便了。”他意在“思想上的‘太祖高皇帝’”，諱言“帝王師”，只說“青年導師”。



1963 年 11 月，毛主席接見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第四次（擴大）會議的成員。平時從未見到馮友蘭露出這樣燦爛的笑容。¹⁶

遇還是不“安分守己”的待遇？

¹⁶ 圖片採自《有哲學門以來——北京大學哲學系 1912—201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毛的背後是周揚，與馮並列的是劉大傑（文學史家）、周予同（歷史學家）。馮撰有對聯一副：“執手感關懷，三人並列文、史、哲；集會明任務，一筆齊掃帝、修、反。”

毛帝王不大好伺候，馮友蘭只好曲綫“應帝王”。世人不知，檢討、表態是在外部的壓力下，被動中爭取主動，乃曲綫“應帝王”的一種手段。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宗璞）說，她的父親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檢討最多的一個。她的父親是中國知識分子中主動地、積極地，因而也是適時地、頻繁地作檢討的多產作家。但她沒有說明為什麼。此舉果然有效，文革中，馮友蘭就靠檢討、表態改變了命運，在這眾人受難、國運幽憂的時期，卻是馮友蘭聲名顯赫的歲月；不過沒有當上“帝王師”，而是淪為“帝王奴”。

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將馮友蘭的一生劃為三個時期：1949年以前是確立自我的時期，1949年至1976年是喪失自我的時期，1977年以後是回歸自我的時期。其實，1949年至1976年的馮友蘭是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應帝王”，不是喪失自我，恰好是頑強地表現自我。有人評論：“同情馮氏的論者或不免將第二時期之馮友蘭說成不得已或被迫，因此，此一時期之馮友蘭，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假’的馮友蘭。其實，1949—76年是馮友蘭求生哲學與‘應帝王’哲學應用得最徹底的一段時期，他把哲學和歷史真正當做遊戲和工具。從這一角度而言，這一時期之馮友蘭，反成了最‘真’的馮友蘭。”¹⁷

還有人為馮友蘭進一步挖掘“應帝王”的思想根源。袁偉時指出：“馮先生的錯誤就思想根源而言，主要有三：一，國家主義，跳不出民族洞穴。二，迷信領袖。三，名利思想。這些應該引以為訓。”¹⁸不過，馮友蘭的“國家主義”不是爭取近代民族國家的利益，而是堅持王朝政治的正統。他的“迷信領袖”與同時代人有所不同，而是帝王崇拜在領袖身上的投射。他的“名利思想”也不是近代西方的個人主義，而是強烈的中國傳統的功名追求。

¹⁷ 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4月。

¹⁸ 袁偉時：《湯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和我的私信風波》，2013年6月3日發表在《騰訊·大家》。

“中體西用”乃根本

馮友蘭的爲人和爲學，與時代的關係，他自己在檢討中說，他的哲學體系“反映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思想。在清朝末年，有洋務派買辦官僚張之洞所提倡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蔣匪的《中國之命運》所講的就是這種思想，封建道德加資本主義工業化（實際是殖民地化）。我的那幾本書，也基本是發展中國固有的東西，即封建的東西，鼓吹資本主義工業化。”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馮友蘭的“新理學”以至一代新儒家，都是“中體西用”，這就說到根本之點了。

中國共產黨批判了蔣介石，也批判了馮友蘭、新儒家，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體西用”。“中體西用”是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主要障礙。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後何嘗不是“中體西用”？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爲體，馬克思的革命理論爲用。幾千年來，農民起義和封建王朝幾度輪迴，走到盡頭了。19世紀，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西用”基督教，建立“太平天國”，沒有成功。共產黨領導的農民起義“西用”馬克思主義，成功了。但奪取了全國政權，還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不過是家天下演變爲“黨天下”。農民起義成功了，馬克思主義失敗了。毛澤東自稱“馬克思加秦始皇”，即秦始皇爲體，馬克思爲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是“中體西用”，黨國體制不變，引進西方的資金和技術，爲我所用。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爲體，“社會主義”爲用。社會主義本是 INTERNATIONAL 的事業，標榜“中國特色”，否定了 INTERNATIONAL，就不是社會主義了。早先的“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的口號也是。社會主義是爲了救人類，不是爲了救國家。“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是以社會主義爲用，救中國之體。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傳入中國，一開始就傳歪了。外來的好東西，傳到中國就走樣、變調、失色，因爲遇到了“中體西用”。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摩擦，還是因爲“中體西用”。中國雖加入了WTO，仍然是黨國體制爲體，市場經濟爲用。

由於中國傳統的悠久，歷史慣性的強大，“中學”在迎合和吸收“西學”時，難以擺脫傳統、逃逸慣性。在一定時期內，免不了“中體西用”。最初，馮桂芬¹⁹ 在咸豐十一年（1861 年）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校邠廬抗議》）。後來，多人、多次提出“中學為本，西學為末”“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²⁰ 的《勸學篇》對“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做了系統論述，作為洋務派的指導思想。“中體西用”的最初提出，是在封閉、守舊的社會中為西學爭一席之地，具有進步意義。但在西學傳入之後，固守“中學為體”，就成為保守的了。鄭觀應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引張靖達的話說：“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步趨，常不相及。”中國學習西方“遺其體而求其用”，是買櫝還珠，所以總也學不像。鄭觀應評：“誠中的之論也。”總之，“中體西用”在事實上是一時難以避免的，但作為方針是錯誤的。如果把它作為一定時期的歷史描述就沒錯了；而方針正是要跨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步入世界文明大道。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體”“用”割裂。800 年前的朱熹

¹⁹ 馮桂芬（1809—1874 年），蘇州府吳縣木瀆鎮人，字林一，號景亭、晚號鄧尉山人。馮桂芬出身於富貴家庭。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一甲第二名進士（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是林則徐的門生。咸豐三年（1853 年），太平國於南京建都，馮桂芬奉命在南京附近的蘇州組織團練，與太平軍對抗。咸豐十年（1860 年），太平軍攻克蘇州，馮桂芬逃往上海，繼續參加由江浙官紳與英、法、美等國領事組成的全防局。同治元年（1862 年）以後參與李鴻章的淮軍，與太平軍對抗。晚年在金陵、上海、蘇州等地書院講學，從事著述。他提出“采西學、制洋器、籌國用、改科舉”的建議，為洋務運動的擁護者。著有《校邠廬抗議》《顯志堂集》。

²⁰ 張之洞（1837—1909 年），祖籍直隸南皮（今河北滄州南皮縣），生於貴州興義府。咸豐二年（1852 年）16 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 年）27 歲中一甲第三名進士（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他是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創業甚多。教育方面，他創辦了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兩江師範學堂（南京大學前身）、湖北農務學堂、湖北武昌蒙養院、湖北工藝學堂、慈恩學堂（南皮縣第一中學前身）、廣雅書院等。工業上創辦了漢陽鐵廠、大冶鐵礦、湖北槍炮廠等。著述收入《張文襄公全集》。

就知道：任何一物均有體用，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體必有用，用必附體。“中學爲體”是拒絕變體，“西學爲用”是用不入體。中國走向現代化、民主化，加入全球化，必須徹底拋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方針，正確的方針應是“體用結合，中西融合”。

19世紀中葉，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方針是“和洋折中”。在和文化（即日本文化）的基礎上吸收洋文化；以洋文化改造和文化。半個世紀之後，日本雖然在地理上依然是亞洲國家，但在文明上已步入歐美先進國家之列。中日歷史的對照，可使國人驚醒。

1894年的甲午戰爭，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歸結為：“一方代表西歐文明，一方要保護東亞的舊習，……是西歐的新文明與東亞舊文明的衝突。”²¹ 甲午戰爭的失敗是“東亞舊文明”的失敗，也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破產。雖然“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早已破產，但未經徹底清算，遺禍猶在。

²¹ 陸奧宗光：《蹇蹇錄：甲午戰爭外交秘錄》，徐靜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第二章

靠“聰明的唯心主義”渡過文革劫難

馮友蘭在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安然無恙。不管黨委統戰部怎樣動員，他既不鳴也不放。誰都知道他是老右派，本蛇就是不出洞，“陽謀”奈我何！他還嘲笑有些右派分子“想憑口舌之爭和共產黨輪流坐莊”。內部政治排隊，把他列為“中右”。即使戴不上右派帽子，也要讓他與“右”沾點邊。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一來，精明如馮友蘭也難逃一劫。因為章法變了，不是搞“大鳴大放”，而是看人頭上的“帽子”。“言論罪”轉為“身份罪”。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中，說話就有罪，到了 1966 年，不說話也有罪。按照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反右運動到文化大革命，在“繼續革命”的道路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只要你是學術權威，沒有不反動的；只要你是當權派，沒有不走資的。一律揪將出來，打倒在地，踏上一腳。其他頭上有帽的什麼“分子”，也在劫難逃。奇就奇在，正是在文革中，“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翻過身來，成為“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當上“梁效”顧問，又被欽點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馮友蘭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值得研究的一種典型人物。

大號“反動學術權威”——“二馮”

1966 年 5 月 25 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 7 人在大飯廳東牆貼了一份大字報，題目是《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引起支持者和反對者的激烈爭鬥，反對者佔上風。6 月

1日晚8時，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這份大字報。此舉被視為“偉大領袖毛主席點燃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這份大字報被毛澤東說成“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北大校園沸騰了。當晚，中共中央華北局、北京新市委宣佈：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的工作組，進駐北大，領導文化大革命。

6月2日以後的三個星期中，北大被批鬥的幹部和教師多達230人。哲學系的“二馮”——馮定¹、馮友蘭是北大全校大號的“反動學術權威”。

文革初期，哲學系尚能控制局面，沒有發生亂批亂鬥，只是建立了一個“老教師學習小組”，由青年教師王湘波負責。但每天校外有幾萬人湧入北大，²衝擊了正常秩序。各種載人的車輛，從北大南校門一直排到白石橋，綿延數公里。“到北大看大字報”，成為北京人生活中的重要節目。人們除了看大字報，還要到處尋找“黑幫”，因為在本單位沒有見識過“黑幫”。找到了“走資派”或“反動學術權威”就揪出來批鬥。所謂批鬥，無非是辱罵、起哄，尤其是一些青少

¹ 馮定（1902—1983年），浙江寧波人。1925年，馮定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回國。20世紀30年代脫黨，在上海以寫作為生。抗戰初期重新入黨，赴蘇北參加新四軍，長期從事宣傳教育工作。1947年出版了一本通俗哲學著作《平凡的真理》。1949年後，任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1952年，馮定以一篇文章聞名全國。當年3月24日，馮定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目也很長：《學習毛澤東思想來掌握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資產階級的思想進行鬥爭——讀〈毛澤東選集〉的一個體會》。他認為，資產階級仍然具有兩面性，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兩面性，不贊成立即消滅資產階級的主張。這篇文章被毛澤東看中，肯定觀點“基本正確”，修改了“有些缺點”，命《學習》雜志和《人民日報》先後轉載，題目改為《關於掌握中國資產階級的性格並和中國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進行鬥爭的問題》。在一批著名理論家否定資產階級的兩面性、犯左傾錯誤的時候，馮定被認為站在正確方面。華東局撤銷後，馮定到北京任馬列學院一分院副院長。馬列學院撤銷後，到北京大學任教授。文革前，他因著作《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具有讚同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某些觀點而作為“修正主義分子”遭到批判。

² 撤銷工作組以後的兩周內，來北大“串聯”的達71.8萬多人次，8月12日這一天，就有13.8萬多人次。9月2日，校刊《新北大》報道，從7月29日至8月28日，校外來北大“串聯”者，共約212.4萬人次。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650~65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常常進行人身侮辱，揪耳朵、打耳光。總理辦公室曾派人來看翦伯贊³，問他有什麼要求，他說：“別的要求沒有，只有一條，就是鬥我的時候，讓大人來鬥，別讓小孩來鬥。”

馮友蘭參加了“老教師學習小組”。這個小組的成員多數是中國哲學界的精英。1952年院系調整的時候，有一項莫名其妙的措施：只保留北大一個哲學系，其他大學的哲學系都撤銷，把有學問的人調到北大哲學系。這個小組的成員是：

中國哲學史教研室：馮友蘭（教授）、黃子通（教授）、張岱年（副教授）、朱伯昆（講師）（1956年後沒有評定職稱，當時的講師年紀都不小了，故列入“老教師”）；

西方哲學史教研室：任華（教授）、洪謙（教授）、熊偉（教授）、鄭昕（教授）、齊良驥（副教授）、張世英（副教授）、王太慶（講師）、張頤（教授，久病不出）；

邏輯學教研室：王憲鈞（教授）、李世繁（副教授）、晏成書（副教授）、吳允曾（講師）；

美學教研室：宗白華（教授）、鄧以蟄（教授）；

心理學專業：唐錢（教授）、沈迺璋（教授）、周先庚（教授）、沈履（教授）、桑燦南（副教授）、邵郊（講師）。

金岳霖（教授）和賀麟（教授）本來也是北大哲學系的，哲學研

³ 翦伯贊（1898—1968年），湖南常德桃源縣人。據他自己考證，湖南常德的翦姓為維吾爾族。翦伯贊早年參加五四運動、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他潛心研究中國的社會歷史問題，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5月，翦伯贊在南京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以黨外馬克思主義者的面目出現，1958年公開黨員身份。曾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院系調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長，以及中央民族學院教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翦伯贊不僅是著名學者，也是社會活動家，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屆、第二屆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文革前，他因持有統治階級對農民起義實行“讓步政策”的觀點而受到批判。文革中，為了坐實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劉少奇專案組副組長、北京衛戍區軍官巫中，拿著槍逼他寫揭發檢舉材料。他拒絕做偽證，以死抗爭。於1968年12月18日與夫人戴淑婉雙雙服安眠藥自殺。

究所成立時調去當研究員了。

文革前，北大黨委就很注意哲學系的老教師，校長、黨委書記陸平說：

哲學系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勢力是強大的，不僅有首屈一指的唯心主義大師馮友蘭，還有一些國內第一的資產階級哲學家。這些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根深蒂固的。⁴

馮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的教授。該教研室都是中青年教師，只有他一個老教師，但他一向被認為是“老幹部”，而不是“老教師”，故不在“老教師學習小組”中。他每天被校外閒人揪出來批鬥數場，導致厭世。

1957年1月，馮定調來北大。此前，他是馬列學院一分院副院長。1952年，中共中央成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學院。馬列學院一分院是為外國共產黨（主要是東南亞國家）培養幹部的機構。後來發現，脫離本國的實際，從書本上學習馬列主義，就像當年蘇聯為中國共產黨所培養的幹部那樣，大多成了教條主義者。

1956年，馬列學院一分院撤銷；二分院是培養國內幹部的，改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毛主席對馮定的安排有指示：“就當一個教授，不要當領導。”他主張，馮友蘭可以講他的唯心主義，讓馮定講唯物主義，兩家唱對臺戲。誰知課堂上的對臺戲沒有唱起來，馮定的講課並不吸引人。文革中“二馮”都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同唱一台戲，但有不同的唱法。馮友蘭唱唯心主義，默念心中的“理”，對外部世界閉目塞聽，若無其事，倒也自有一番淡定。馮定唱唯物主義，注視外部世界的現實，又看不到希望，就想了此一生。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是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但並非唯物主義全部都是真理，唯心主義全部都是謬誤；也不是唯物主義一定有用，唯心主義一定無用。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有“聰明的唯心主義”，也有“愚

⁴ 《北大哲學系黨員幹部整風學習會議簡報》第111期（1966年1月5日）所載陸平的發言。

蠢的唯物主義”。說對了，馮友蘭能夠渡過文革的劫難，靠的是“聰明的唯心主義”；而馮定不想活了，就是“愚蠢的唯物主義”。當然，更多的是“愚蠢的唯心主義”和“聰明的唯物主義”。

馮定曾服用大量安眠藥自殺，發現及時，經搶救，沒死。爾後把他藏在北大“校文革”所在地一院的樓上，保護起來，由青年教師彭燕韓看著。一來避開校外閒人的批鬥，二來防止他再度自殺。有一天，我在廁所突然遇見一個人，鬍子半尺長，仔細一看竟是馮定。四顧無人，我悄悄地問他：“你還好嗎？”他說：“我在這裏坐牢，度日如年！”我勸慰他：“外面很亂，你在這裏是安全的，耐心地待些日子吧。”說來奇怪，掛著“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牌子的地方，成了青龍白虎堂，誰也不敢衝擊。共產黨、人民政府的牌子都被砸爛了，“文化革命委員會”的牌子就顯神威了。紅衛兵明知馮定在樓上，沒人能把他揪出來。

哲學系本系沒有開過批鬥會。那個“老教師學習小組”，把他們聚在一起（有時在哲學系辦公室，有時在馮友蘭家的客廳）學習，避免了校外閒人的批鬥，客觀上起了一點保護作用。⁵

馮友蘭會不會自殺？

馮定自殺後，人們關注“二馮”的另一馮，馮友蘭會不會自殺？

哲學系心理專業⁶的教授沈迺璋⁷留學法國時，在巴黎的鬍子比

⁵ 互動百科“馮友蘭”條說：“1966 年‘文革’開始，馮被抄家關入牛棚。”敘事失實，文革開始馮友蘭沒有被關入“牛棚”。而且 1966 年還沒有“牛棚”，北大的“牛棚”是 1968 年 5 月才開張的。中國的百度百科、互動百科等網絡平臺缺乏嚴謹的學風，常常信口開河。

⁶ 自從 1879 年萊比錫大學教授馮特創立第一個心理實驗室以來，心理學就從哲學分化出來，成為實證科學。原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均設心理系，院系調整時把它們併入北大哲學系，作為哲學的一個專業，又倒退到 19 世紀的馮特以前。這是外行領導內行的“中國特色”的教育設計。20 世紀 80 年代，在改革開放中，為了與國際接軌，心理專業才脫離哲學系，獨立成系。

⁷ 沈迺璋，浙江吳興（今湖州）人，1911 年生。1932 年，沈迺璋畢業於燕京大

賽中得過三等獎，平時小心修剪，愛護有加。紅衛兵勒令：“把你的洋奴鬍子剃了！”馮友蘭也留有鬍子，他留的是魯迅所說的因地心引力向下垂直的中式鬍子。馮友蘭聞訊沈迺璋剃了心愛的洋鬍子，他也趕緊剃了從1939年留起的長鬍子。這兩個人，鬍子一剃，幾乎都認不出來了。

沈迺璋為原燕京大學心理系主任，院系調整前是燕京大學“罵人團”⁸的成員，肅反運動中免不了受衝擊，後來雖然“落實政策”，心靈的創傷難以平復。他說：“我臨死前要把親人叫到床前，對他們說：‘我終於擺脫了共產黨的統治！’”這本是家裏的私房話，不知怎麼被揭發了出來，這還了得！他被掛上“反共老手沈迺璋”的大牌子，勒令在校園裏自動遊街。游了一陣子，自殺了，並沒有把親人叫到床前。人們又擔心：馮友蘭學沈迺璋剃了鬍子，會不會學沈迺璋也去自殺？哲學系的同事叫王湘波：“快到馮家去看看。”

馮友蘭說“自殺不是人”

文革初期，北大自殺的人不是很多。人們有經驗，運動初期戴的帽子不一定牢靠，還要看運動後期怎樣落實政策。1968年8月，軍宣隊、工宣隊⁹進校後，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文革初期戴的帽子非但沒有抖落，反而有加高、加大之勢。一些人以為這就是“運動後期落實政策”，絕望了，紛紛自殺。每有

學心理系，同年入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心理系；1936年獲碩士學位後，赴法國巴黎大學研究進修；1938年回國，因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和漢奸政府服務而賦閒在家，後任輔仁大學講師；1945年任燕京大學教授、心理系主任；1952年任北京大學哲學系心理專業教授、心理學教研室主任；1959年，在心理學界200多人參加的討論會上，沈迺璋發言反對蘇聯學者認為心理現象具有階級性的觀點。文革中受衝擊，1966年10月6日服毒自殺。

⁸ 當時燕京大學有幾位教授常高談闊論、臧否人物，被人稱為“罵人團”。它的主要成員有聶崇岐、齊思和、陳芳芝（女）、沈迺璋，前三位都是歷史系教授。

⁹ 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名曰“宣傳隊”，實際上是軍管隊、專政隊。

人自殺，校園裏就刷一條大標語：“XXX 畏罪自殺，死有餘辜！”這樣的大標語有四十多條。¹⁰直到年底翦伯贊夫婦自殺，驚動了上面，派人來調查。除了已經自殺的，“牛棚”裏仍關著 800 多人，另外還有以“隔離審查”的名義單獨關禁閉的（本人也在單獨禁閉中）。總之，“階級敵人”占了當時在校人數的 10%以上，在教職員工中占了將近 40%，坐實“清理階級隊伍擴大化”。上面發話要糾偏。特別是 1968 年 10 月 31 日，毛主席在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點了馮友蘭、翦伯贊的名，說“這些人是有用的”。剛說完就死了一個。軍宣隊的負責人說，不能再讓馮友蘭自殺，否則對不住毛主席。哲學系軍宣隊陳某找馮友蘭談話，軍宣隊愚蠢，馮友蘭遲鈍，轉彎抹角談了半天不開竅，陳某急了：“直截了當說吧，你可不要自殺啊。”馮友蘭回答：“我決不自殺，自殺不是人！”¹¹陳某一聽，放心了，笑著調侃道：“你自殺就成鬼了，當然不是人啦！”馮友蘭從來沒有想到自殺，所以連冠冕堂皇的話都不會說。

馮友蘭為什麼不會自殺？

湯一介的回憶錄中寫道：“‘文化大革命’後，我問馮先生：‘當時幾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麼想的？’他說：‘當時我什麼也沒聽見，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是唐代高僧禪宗六祖惠能（638—713 年）的一個四句偈——郭]。我們相對大笑。”¹²

馮友蘭真是唯心主義到家了，他對於批鬥、抄家，什麼也沒看

¹⁰ 文革中，北大以各種方式被迫害致死的已知 63 人。見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難者和北京大學文革》，《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6 年 2 月號，總第 93 期。

¹¹ “……不是人”乃馮氏口頭禪。年輕時，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本日記為練習有恆之心之一端，此本日記若不記完，非人也。”見王仁宇：《“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 20 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光明日報》2016 年 1 月 19 日。

¹² 張弘（鳳凰網主筆）：《湯一介的懺悔錄：“文革”中參加“梁效”，我不能原諒自己》，據湯一介《我們三代人》一書編寫。

見，什麼也沒聽見。

1967年1月7日，馮友蘭因前列腺炎肥大，小便不通，往阜外醫院診治無效，轉協和醫院。因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得住院，15日發生尿中毒。對於自己身上的病痛，不能裝作什麼也沒看見，什麼也沒聽見了。老夫妻倆坐困愁城，幾經周折，才住進北京醫院。但第一次手術後醫院的造反派奪權，即令出院。馮友蘭挨批鬥時，手裏還提著尿瓶。經哲學系文革聯繫疏通，於2月底再進醫院做第二次手術。馮友蘭獲哲學系文革通知時動了感情，與老妻任載坤相對而泣。

1967年4月4日，在北京大學東操場召開萬人批鬥大會，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反動學術權威一鍋煮。批鬥的對象有陸定一（中宣部部長）、周揚（中宣部副部長）、蔣南翔（教育部長）、吳子牧（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部長）、宋碩（市委大學科學工作部副部長）、陸平（北大黨委書記、校長）、彭珮雲（北大黨委副書記）、翦伯贊（歷史系教授、北大副校長）、馮定（哲學系教授、北大黨委副書記）、馮友蘭（哲學系教授）、朱光潛（西語系教授）。這次大會我沒有參加。聽人說，陸定一、周揚等老幹部看起來都很痛苦，只有馮友蘭面無表情，好像在練馬步氣功。批鬥之後，他就做一套自創的健身運動，活絡筋骨，以矯駕“噴氣式”之僵直。人們見到他在院子裏做操，就知道他又被批鬥了一場。

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說她的父親“身上有仙氣，就是萬事想得開”。燕南園裏最想得開的兩個老頭，一個當然是57號的哲學家馮友蘭；還有一個就是66號的美學家朱光潛¹³。朱先生愛散步，經常可以看到一位叼著煙斗的駝背老人在校園裏緩緩踱步，就是他。他還有一樣怪脾氣，上門拜訪，不出5分鐘，他就把你晾在客廳，獨自上

¹³ 朱光潛（1897—1986年），字孟實，安徽桐城（今樅陽）人。當代中國著名美學家、文藝理論家、教育家、翻譯家。1922年，朱光潛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1925年留學英國，入愛丁堡大學，后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回國後，歷任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授。1946年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是哲學系和西語系的跨系教授，講授美學與西方文學。文革之後，他在香港講學時宣稱：“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是馬克思主義者。”一生著作譯述甚豐，留下30卷全集，計600萬字。

樓，回書房去也。在校園裏散步時同他聊天，卻不論時間長短，有時，以至于家人出來尋他，喊他回去吃晚飯。我就是常找他散步的機會和他討論問題。他曾贈我一副對聯：“持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文章。”想必這也是他本人的處世哲學。自從他當了“反動學術權威”，校園裏久不見他的身影。一次偶遇，我問：“現在你不散步了？”他說：“現在散步有了風險，說不定被人揪住，隨時批鬥一番。我現在找個僻靜的所在，改行日光浴了。”好心情，散步有風險，改行日光浴，照樣健身體！我含蓄地說：“您多保重！”他說：“你放心！毛主席說相信群眾、相信黨這是兩條基本原理，我再加一條：相信自己！”他曾公開宣稱：我不是共產黨員，但我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的想得開靠的就是“聰明的唯物主義”。

他們想不開的鄰居 64 號的歷史學家翦伯贊就自殺了，55 號的哲學家馮定自殺未遂。50 號的向達¹⁴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版本目錄學家，1957 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文革初期，在勞動改造中發病，無人搭救，淒然死去。他還沒有來得及選擇“想得開”或“想不開”，生命就結束了。

最想不開的要數中國近代物理學開山祖師的人物之一饒毓泰¹⁵，

¹⁴ 向達（1900—1966 年），土家族，湖南漵浦人。1924 年，向達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編輯；1930 年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研究領域為中西文化交流和敦煌學，出版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發表論文 70 餘篇。1935 年赴歐洲遊學，在英國、法國、德國的多家圖書館、博物館搜尋並抄錄流失海外的漢語文獻資料。1938 年攜帶數百萬字的資料回國，歷任浙江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1 年、1943 年兩次參加西北考察團，對敦煌千佛洞的管理提出建議，並發表研究論文多篇。親自踏勘漢代玉門關、陽關，確定故址。1949 年後，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兼北大圖書館館長，同時兼任《歷史研究》《考古學報》編委，被選為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7 年的“鳴放”中暢所欲言，結果被打成右派分子。

¹⁵ 饒毓泰（1891—1968 年），字樹人，江西臨川人。父為清朝舉人。戊戌變法後，饒毓泰受新思潮影響，捨科舉，習科學，滿懷科學救國的抱負。1913 年考取官費赴美留學；1917 年獲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學士學位，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就讀，1921 年獲碩士學位，1922 年獲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發表在 1922 年的美國《物理學評論》上，一舉成為當時世界物理學十大先聲人物之一。同年回國，應著名教育家張伯苓之邀，到南開大學任教，創建物理系，自任主

人們說不清他為什麼要自殺。據傳，有人說他“裏通外國”。文革中，這類嚇人的罪名多了去了，最後是落實不了的。主要是他的個性剛烈，不容玷污。有人說他像玻璃，通體透明，堅而易碎。在文革的特定條件下，優點變成了缺點，以致糟蹋了自己的生命。而任人貶損又不憚自我貶損、毫無尊嚴的人，缺點成了優點，反倒是“適者生存”。

這些想得開的和想不開的，都是一級教授。想不開的翦伯贊，是因為逼著他揭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他說“實在交代不出來”，寧可賠上自己和夫人的老命，不討好、不害人、不上鉤、不造假。想得開的馮友蘭，後來背叛自己的祖師爺孔夫子，新儒家忽然變臉，成為批孔反儒的幹將。他們為人的態度、人生的意義，豈可以“想得開”或“想不開”來區分？

1968 年 10 月，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著名科學家趙九章自殺。周總理聽到匯報後，立即命開列“重要科學家保護名單”，但事實上無法保護，饒毓泰就在“保護名單”上。爾後“重要科學家”自殺、被殺者仍時有所聞。

紅衛兵抄家

馮友蘭的家被紅衛兵抄了無數次，大多是校外中學的紅衛兵幹的。1966 年 8 月，抄家、揪鬥成風，明明是黑色恐怖，卻稱“紅八

任。他是中國近代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與葉企蓀、吳有訓、嚴濟慈並列，被稱為中國物理學界的“四大名旦”。南開培養的學生中，吳大猷、吳大任、郭永懷、江澤涵、陳省身等日後均成為著名科學家。1933 年，饒毓泰受聘於北京大學，任理學院院長。抗戰期間，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主任，與著名的物理學家吳有訓、葉企蓀、周培源、趙忠堯等一起，培養了許多優秀學生，如楊振寧、李政道、鄧稼先、黃昆、張守廉等。抗戰後，繼任北大物理學院院長兼物理系主任。194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52 年院系調整後，因年老力衰，辭去院、系領導職務。1955 年，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屆數學物理學部委員。曾任第二屆、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政協常委。1968 年 10 月 16 日夜，在軍宣隊進校後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在家裏上吊自殺。

月”。在 40 多天裏，北京大學被抄家的有 407 戶，其中教授 134 戶，副教授 59 戶。¹⁶ 北京市被抄家的達 33,600 多戶，被打死的有 1700 多人，所謂“五類分子”85000 多人被趕出北京。¹⁷

馮友蘭有個愛好：收藏中國古代兵器。他的先祖石泉公是清道光年间的武秀才，因而家中刀槍列陣，還有護院拳師，教年輕子弟舞槍弄棒。馮友蘭自幼年時就喜歡摩挲古代兵器，久居北京，收羅了一些古董，曾在清華大學舉辦過展覽。1949 年後，這些古董大多獻給博物館了。他曾捐獻 249 件明清時代兵器和一百多支箭。他說：“北京的軍事博物館內，在舊兵器那一部分中，有許多我能認出來是我收藏過的。”¹⁸ 馮友蘭的長子、美籍華人馮鍾遼，於 2015 年 91 歲高齡時，特地率一家三代八人，從舊金山到北京，參觀國家博物館中他父親捐獻的古代兵器。

馮家尚有秦代的刀劍、唐代的執拂等。《人民日報》曾發表一篇社論《向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紅衛兵上陣以來，所向披靡……各種變天賬、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不知哪來的一支紅衛兵隊伍，審問馮友蘭：“為什麼私藏殺人武器？這些殺人武器是從哪裏來的？做什麼用？”讓他跪在地上，向毛主席請罪。馮友蘭平時說話就口吃，西南聯大的學生嘲諷說：“馮先生上課，一句話在黑板上寫完了，口語還沒說完。”紅衛兵拍桌子、打板凳，氣氛緊張，馮支支吾吾，更是說不清，於是對老人動手動腳。這時，住在隔壁的文革中搬進馮家的物理系年輕女教師敲打板壁，嚷道：“午睡時間，不要吵醒我的小孩！”那邊廂靜了下來，救了馮友蘭的急。

哲學系負責“老教師學習小組”的年輕教師王湘波到馮友蘭家瞭解情況，只見一片狼藉，古玩全都沒了，連廚房裏的“六必居”（北京的老字號）的鹹菜也被抄走了。王湘波在垃圾堆裏發現一張單據，是英國銀行的存款（後來了解是馮友蘭的著作在英國翻譯出版的稿

¹⁶ 《北京大學紀事》，下冊，867 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¹⁷ 《歷史的審判》，202 頁，《解放日報》編輯部編印，1981 年 1 月。

¹⁸ 《馮友蘭自述》，73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費），紅衛兵盜賊不識英文，幸免了。他收起來，代為保存，日後歸還。王問馮家老太：“為什麼不打掃一下？”回答說：“反正還要來的。”這一時期，53%的教授中、80%的中層幹部均被抄家。¹⁹

據統計，1966年8月末至9月初，北京的紅衛兵就搶劫了33695戶家庭，²⁰斬獲黃金10.31萬兩、白銀34.52萬兩、現金5545.99萬元、珠寶首飾61.36萬件。²¹這些數字還不能說明搶劫的規模，這只是上交給中國銀行的數字，沒人知道紅衛兵給自己留下了多少。

抄家的紅衛兵收走了鑰匙，馮家的衣物拿不出來，入冬後馮友蘭挨批鬥時只好身披麻袋。

馮家門口貼了一張擋駕抄家的告示

馮友蘭接到紅衛兵的一紙通知，命他明天5點之前將所有的“壞書”交到38樓XXX號。他跑去一看，那是哲學系的學生宿舍。他對紅衛兵說：“我的書，除了馬恩列斯毛的著作，絕大部分都是封資修。要把兩個房間的書運來，缺乏勞動力，我們兩個老頭老太太搬不動呀。而且還需要交通工具，至少兩輛卡車。再說，書運到這裏，你們這個房間也裝不下呀。”紅衛兵一聽，說得有理，他們也沒有解決的辦法，就說：“這樣吧，我們去貼上封條，誰也不許動！”封條一貼，反而起了保護作用。馮友蘭本人反正不看書了，別人也不敢啟封。有的紅衛兵聽說古書值錢，但不知哪一部，動手翻找。馮友蘭對他們說，這是哲學系的紅衛兵查封的，你們要啟封，得跟他們商量。哲學系紅衛兵牌子很硬，這些人只好住手。馮友蘭家的藏書，經過文革，居然沒有多大損失，這不能不說是奇跡。

馮定家的藏書就慘了。他有一部《金瓶梅》，紅衛兵發生爭搶，

¹⁹ 《北京大學紀事》，下冊，653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²⁰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大事記：1965—1967》，26頁。

²¹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71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原注據《北京晚報》1987年2月23日報道。

一個人搶到上冊，另一個人搶到下冊，沒有搶到的人就宣佈：“抄家物資不能歸個人所有！”說得理直氣壯。那歸誰所有？根本沒有章法。馮定家還有許多“灰皮書”“黃皮書”也被一搶而空。文革前出過許多內部發行的書，大多是蘇聯和西方的著作。政治、哲學類著作，封面是灰色的，故曰“灰皮書”；文藝、小說類著作，封面是黃色的，故曰“黃皮書”。內部發行還要論級別。按我的級別，可以買到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沙夫的《人的哲學》等書。

馮定是行政六級的高幹，所有的“灰皮書”“黃皮書”都能買到。這些書，紅衛兵聞所未聞、見所未見，如獲至寶，後來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中跟著上山下鄉了。從老幹部、大知識分子家抄來的“灰皮書”“黃皮書”，都在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悄悄流傳，形成所謂“地下讀書運動”。公開的讀書，只能讀“紅寶書”，這些“灰皮書”“黃皮書”被視為壞書，只能悄悄地讀。好在窮鄉僻壤、天高皇帝遠的地方，沒人管。影響較大的“灰皮書”，有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以及布哈林、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影響較大的“黃皮書”，有愛倫堡的《人，歲月，生活》、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索爾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還有西方現代派的文學作品，如薩特的《厭惡》、加謬的《局外人》等。這些偷來、搶來的書，對於打開空洞的頭腦、轉變偏執的思想、造就“思考的一代”起了有益的作用。一個事件中的消極因素，在另一個事件中成了積極因素。

王湘波向哲學系負責人黨總支副書記、系文革副主任趙正義²²匯報，馮家搞得不能正常生活了，建議不能再讓紅衛兵去抄家了。在別的系，恐怕沒人敢講這樣的話，這不是同情“反動學術權威”嗎？當時北大黨委和各系黨總支都垮臺了，只有哲學系黨總支是“革命的”，依舊實行領導。也正因為哲學系黨總支是“革命的”，講話有點底氣。趙正義把哲學系的紅衛兵找來，要他們到馮友蘭家去把門。紅衛兵說：“那怎麼行，輪流值班要耗費多少人的時間？出一張告示

²² 總支書記、系文革主任聶元梓，現在是校文革主任，不管哲學系的事了。

算了。”所以在馮友蘭家門口貼了一張北大唯一的擋駕抄家的告示：

反動學術權威馮友蘭家已經被抄過多次了，希兄弟紅衛兵組織勿再入內。

署名是“哲學系紅衛兵”，但這一告示也不能完全擋住。林彪說“紅衛兵是天神天將”。他們無法無天，除了“紅司令”偉大領袖毛主席，誰的話也不聽，照樣“入內”。進去一看，書封了，值錢的東西沒了，這才悻悻而出。

哲學系的紅衛兵還對馮家人說：“以後只有我們系的紅衛兵來你們才開門，如果不是我們系的人，無論什麼人來，都不要理他們，他們無論怎樣打門，都不要開。”於是馮家老太就打發保姆清理屋子。

校外來的人，出於好奇，想看看教授家是什麼樣子。一天，馮家門外聚集了上百人，要求進去。因為哲學系的紅衛兵有話在先，馮家老太敢於不開門。有一個人隔著窗戶對老太說：“我保證維持秩序。我負責把他們組織起來，進去繞一圈就出來。”他果然把外面的人分成小組，每個小組指定人帶隊。老太開了門，他們按次序進門轉了一圈就出去。老太很感動，說：“你們真是毛主席的好……”好什麼？好幹部，好學生，都不合適，這群人本是烏合之眾，有了：“好群眾！”那些人說：“你現在相信群眾了吧？”我恰好從燕南園後門經過，聽到從馮家出來的人發表觀感：“乖乖，教授之家像仙人洞！”我就進去向馮家老太問個究竟。

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宗璞）在《向歷史訴說》一文中說到她的父親：“他在無比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自殺、不發瘋，也不沉默。”

²³ “在無比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多數人能做到“不自殺、不發瘋”，而宗璞特別提到“不沉默”。馮友蘭不甘於沉默，這是多數人不能做到的。作為一個打倒的對象，怎麼才能“不沉默”？那就是通過檢討來發聲。

²³ 宗璞、蔡仲德編：《解讀馮友蘭·親人回憶卷》，59-60 頁，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第三章

檢討標兵

馮友蘭通過檢討來發聲，變被動為主動。

1966年7月5日，馮友蘭在“老教師學習小組”會上做長篇發言，一連講了三個上午。有一個正式的題目，叫作《自我揭發，自我批判》。¹他事先寫成稿子，像宣讀論文一樣。他總是和別人不同，檢討也是像模像樣的。

他的發言稿有24000多字。當時統治北大的工作組命哲學系打印出來，達36頁之多，從哲學系拿去10份，說是“要上報”，“上報”到哪裏就不知道了。馮友蘭的檢討，不但是哲學系，而且是北大全校老教師中的獨一份。馮友蘭成了“檢討標兵”，這就是他“不沉默”所要達到的目的。

馮友蘭一開始就說他的檢討是“自覺”的，是“自我起義”：

自覺革命就是自我起義，自己對自己起義。能起義就開始站在革命這邊來。不然，就永遠是革命的對象。自我揭發，自我批判，就是

¹ 施京吾在《人文之殤：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中云：“1966年7月5日，他根據造反派要求，在哲學系作了長篇發言《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人民網；又見《馮友蘭誕辰120周年：文革之殤》。沒有人對馮友蘭提出“要求”，完全是他出於不甘沉默而主動採取的作為。好些有關馮友蘭的文章中的“‘文革’遭遇”，僅僅是作者的想象。在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編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中，1966年7月5日記載：“奉命開始在哲學系會上作長篇發言，……”（671頁）奉誰之命？這些都是為馮友蘭開脫之詞。

實行起義、實行跟自己的錯誤相決裂。我決定從抗戰時期起，至現在止，就我過去的錯誤言行，分段批判。

他按歷史程序分成七段來自我揭發、自我批判。這是馮友蘭所有的檢討中最為全面系統的一份，對於怎樣認識馮友蘭及研究馮友蘭怎樣認識自己，都是很重要的。而馮友蘭的《三松堂全集》沒有收入此文，《馮友蘭自述》根本沒有提到，蔡仲德編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提到了，但沒有內容。在特殊的條件下，他透露了一些內心的隱秘，而後來又極力掩蓋。在此，有必要向世人詳為介紹（小標題是原有的）；只需介紹，不必多加評論了。

第一段 抗戰時期

1944 年（後來出版的《馮友蘭自述》記為 1943 年），馮友蘭代表西南聯大國民黨區黨部起草了一封給蔣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實行憲政。信中有言：“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為殷鑒。”並言：“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拳拳之心，語帶感情。據說蔣介石看了也為之掉淚，回信說：“有如此忠實的黨員，有困難也可以克服，轉危為安。”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雷海宗² 對馮友蘭說：“即使你所寫的一切都失傳了，只要有這一篇文章就可以不朽。”馮友蘭頗自得。他說：

後來我到重慶，蔣匪對我說：“要改良政治。”又說：“共產黨

² 雷海宗（1902—1962 年），河北永清人。1927 年獲美國芝加哥大學學位，歷任中央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52 年，院系調整後，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馮友蘭稱之為“反動教授”。1957 年，雷海宗被打成右派分子。馮友蘭是按照 20 世紀 50 年代戴的帽子給 40 年代的雷海宗定性。1957 年的大鳴大放中，雷海宗說：“馬克思主義還停留在 1895 年。”1895 年是恩格斯逝世之年。他的意思是恩格斯逝世之後，馬克思主義沒有發展，所謂“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他的超越當世之論，過了多少年才為歷史所證實、被常人所理解。

的話，人們也不大相信了。但是我們主張政治解決。”

我還向蔣獻策，說要抵制馬克思主義最好是提倡正統哲學（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用蔣的“侍從室”的錢，在“中國哲學會”中設“中國哲學研究委員會”，與賀麟辦的“西方哲學編譯委員會”相輔而行，宣傳封建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

毛主席在 1945 年 6 月 11 日說：“現在中國正在開著兩個大會”，一個是共產黨的大會，一個是國民黨是大會。（《愚公移山》）我每讀到這裏，就覺得慚愧萬分。我在當時是出席國民黨的大會，並且是大會的主席團成員。在一個晚上，還同蔣匪並坐看戲。還參加主席團一次討論對共產黨政策的會議，虛偽地決定，共產黨問題政治解決。利用“政治解決”為幌子，實行反革命戰爭。

馮友蘭的自我批判說：

由這些事，可見我是蔣王朝的忠實謀士，在關鍵性的問題上替蔣匪出謀劃策，深得他的贊賞。大字報說我是蔣王朝的御用文人，御用哲學家，反共老手，反動政客，這都是真實的。

大字報上的這些帽子，尺寸不一定合適。其實馮友蘭本人也不見得心服，但他統統攬了下來，叫人摔不出新的帽子來了。

馮友蘭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批判自己的哲學。抗日時期，有“兩個中國之命運”之爭。他說，他的哲學是引向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蔣匪 1943 年所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講的就是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我在抗日戰爭時期所發表的六本書，自稱為“貞元之際所著書”，所講的也是黑暗的中國之命運，是妄圖把中國引向黑暗的路，引向老中國的前途。

馮友蘭的哲學叫“新理學”，是程朱理學的翻新。他的“貞元之際所著書”共 6 本，第一本就是表達他的哲學綱領的《新理學》（1939 年）。後五本依次為：《新事論》（又名《中國到自由之

路》，1940年5月），“事”相對於“理”，“事論”相對於“理學”，《新事論》是《新理學》的實際應用；《新世訓》（又名《生活方法新論》，1940年7月）論述處世術；《新原人》（1943年），在馮友蘭的哲學體系中有三大部分，《新理學》講自然、《新事論》講社會、《新原人》講人生；《新原道》（又名《中國哲學之精神》，1945年4月）論述中國哲學的發展，落腳到建立“新統”；《新知言》（1946年12月）論述哲學方法論。總而言之，他說：

這個體系是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哲學方面的反映，是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意識形態在哲學方面的集中表現。它最適合於作為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統治階級、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的欺騙人民的工具。

馮友蘭認為，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所講的，是“封建道德加資本主義工業化（實際上是殖民地化）”。這就是馮友蘭“師帝王”的根本所在。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說：“這是一本對中國人民的宣戰書，是發動內戰的思想準備與輿論準備。”也有人說：“這是準備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動員令。”均未得其精髓。馮友蘭說：“我的那幾本書，基本也是發展中國固有的東西，即封建的東西，結合資本主義工業化。”蔣介石的“中央訓練團”請他去講過兩次課。他說：“我講得比較細緻，因此欺騙性也就更大。”

對“貞元六書”中的《新原人》，馮友蘭說：“代表我在抗戰時期的反動哲學思想最後的發展。”反動何在？

近來關鋒同志認為我在抗戰時期的哲學思想，由《新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發展到《新原人》的主觀唯心主義。就政治方面說，《新原人》特別提倡所謂“樂天”“順天”。這就是叫被剝削、被壓迫的人安於所處的地位，叫殖民地的人民安於奴役屈辱的地位，不反抗，不鬥爭。這真是麻醉半封建、半殖民地人民的最毒的鴉片煙。去年，我在重慶參觀了中美合作所博物館。我的這些反動著作，就是蔣王朝在“文”的方面統治人民的“中美合作所”。

馮友蘭對這個階段做了一個小結：

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對於鼓吹和支持黑暗中國之命運的反動哲學，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很不徹底；對於其政治上的危害性，我還認識不夠，甚至拒絕認識。這些反動哲學思想，還長期潛伏在我的心中，遇有適當氣候，它就頑強地冒出來。這就是投降而沒有繳械，遇有機會，就把槍拿出來，進行反攻。

“投降而沒有繳械”，這個生動的比喻成了名言，其他老教授常常引用“馮先生說……”。

第二段 解放前後

解放前，國民黨敗局已定，馮友蘭回憶自己的思想，有三點比較突出：

一個是：“我是中國人，不管哪一黨派執政，只要能把中國搞好，我都擁護。”照現在看，這個思想是反動的。……

我還有個思想是：“中國好比有兩個兒子，大的是國民黨，二的是共產黨。大的把中國搞糟了，應該讓二的試一試。”這也是一個反動思想。……

還有一個思想是，我自以為對於社會主義有所瞭解。我所瞭解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蘇修的技術官僚、精神貴族統治的社會。我想，我是專家、學者。在舊社會，政治上專家、學者是附屬於帝王、資本家的，到社會主義社會，他們更升一級，豈不也好。

馮友蘭在檢討中給自己和別人扣了太多的“反動”帽子，為什麼是“反動”？沒有說理。

1948年12月中旬，陳雪屏³從南京到北平，約清華的一些教授

³ 陳雪屏本是北大教育系教授，後為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現在是“平津學術教

吃飯。席間宣佈，南京派了一架專機來接諸位先生，願走的可以同他一起出發。在座的人，包括馮友蘭在內，相顧無言。

14 日早上，西北方向炮聲大作。大家知道，解放軍已經到南口了。中午，解放軍就進到了清華北邊的清河鎮。學生們都登上宿舍的樓頂觀戰。下午，校長梅貽琦坐車進城，一去不復返了。⁴

北平和平解放時，馮友蘭留下來了。為什麼？他說：

我的階級出身以及我的歷史使我不可能對於革命事業有正確的認識，更不可能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有正確的認識。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

梅貽琦離去的次日，校務會議成員自動集合，商量應變事宜。因爲前校長羅家倫離開清華後，馮友蘭曾爲校務會議主席，教授們再次推舉他爲校務會議主席，以周培源⁵爲保衛委員會主任，率領校衛隊

育界知名人士搶救計畫”三人執行小組成員，另外兩人是傅斯年和蔣經國。

⁴ 在南苑機場等候了兩天的飛機，14 日載有胡適、陳寅恪、毛子水、錢思亮、英千里、張佛泉等人飛走了。梅貽琦是 12 月 21 日作爲第二批“搶救”的學人南飛的。

⁵ 周培源（1902—1993 年），江蘇宜興人。著名的流體力學家、理論物理學家，是中國近代力學和理論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1924 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26 年春獲芝加哥大學學士學位，同年底獲碩士學位。1928 年獲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同年秋，赴德國萊比錫大學，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納·海森堡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博士後研究。1929 年，赴瑞士蘇黎世高等工業學校，在諾貝爾獎獲得者沃爾夫岡·泡利教授領導下從事量子力學博士後研究。1929 年回國，被聘爲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36 年至 1937 年休假期間，赴美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事理論物理的研究，並參加愛因斯坦領導的廣義相對論討論班。1937 年回國。抗日戰爭爆發，周培源受校長梅貽琦之托，安排清華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和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40 年代，轉向湍流理論的研究。1943 年至 1946 年，周培源再次利用休假赴美，先是在加州理工學院從事湍流理論研究，後參加海軍軍工試驗站的魚雷空投入水的軍事科學研究。當局規定，參加軍事科學研究的必須是美國公民。周培源不願做美國公民，美方只得遷就他。1946 年，周培源去歐洲參加牛頓誕生 300 週年紀念會和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他還參加了在法國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應用力學大會，並被選爲國際理論與應用力學理事會理事。1947 年回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授，擔任教務長。1952 年院系調

維持治安。解放以後，校務會議改為校務委員會，馮友蘭被任命為主任委員。他表示願意服從人民政府，但也不罵臺灣。“君子絕交，不出惡聲。”他現在的檢討說：“其實，我對於共產黨是面降心不降。”語出吳偉業（號梅村）的“身降心不降”。吳為江蘇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詩人，系崇禎皇帝欽點的進士第二名——榜眼。因降清入仕，被譏為“江浙五不肖”之一。

正由於“面降心不降”，馮友蘭作為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處事多失當。1949年1月，國民黨的飛機轟炸清華，扔了12枚炸彈。好在沒有人員傷亡，也沒有多大財產損失。第二天，國民黨的報紙卻說，國軍轟炸北平的共軍炮兵陣地，損失慘重。黨中央、毛主席給清華發來慰問電，馮友蘭把它貼在佈告欄了事，群眾對此草率從事大為不滿。4月，校務委員會改組，由葉企蓀任主任委員。馮友蘭寫了一信，辭去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和文學院院長的職務，理由是能力不勝。一黨員幹部對他說：“你說的理由不對，應該是政治上的理由。”他又寫了一信，承認是政治上的理由。

馮友蘭雖承認因政治上的理由辭職，但心有不甘。因為他還有個“進步包袱”：

我在1934年到過蘇聯，自以為很同情社會主義。回來以後，作了幾次稱讚蘇聯的講演。蔣匪的憲兵第三團把我捕去，在保定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放了。我以為坐過監、帶過手銬，以為是左派了。不明真相的人也以為我是左派，比我更反動的人也說我是左派。蔣廷黻就說我是個Sincere Leftist（真誠的左派）。我覺得這個帽子戴著很舒服。

整後，在北京大學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力學專業，擔任教務長、副校長、校長。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數理化學部常委。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還擔任過中國力學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九三學社中央主席，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文革中，抵制陳伯達批判相對論。他說：“狹義相對論是駁不倒的；廣義相對論可以討論，但不是批判。”根據周總理的指示，撰文號召教育和科學界重視基本理論的研究。特別是在“批鄧”中，一批著名科學家被裹挾進去，周培源拒不表態。

其實，我在保定，他們叫我寫一篇在歐洲旅行的情況，實際上等於一種自白書。我寫了，這就是屈服。出來以後，清華教授會要為我這件事開會抗議。我怕事情鬧大，私下勸說停止了。事後，梅貽琦叫我同他到南京去了一趟，見了些當時教育部的人，實際上是去請罪。

經過回顧事件和清理思想，他得出一個結論：“我背著一個進步包袱，直到現在才覺得是清算了。”

他看到有人在報上表態，擁護共產黨，就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久回了一封親筆信。馮心中有抵觸：

主席說，我是犯過錯誤的人。我的進步包袱使我老想我也有進步的一面。主席說：“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我想：“我還能不實踐嗎？”主席說：“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想：“我有什麼不老實”，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主席的話，我只記住了一句，就是“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我就把思想改造一直拖下來，一拖就拖了十七年。

1951 年秋天，馮友蘭參加以丁西林、李一氓為正副團長的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和緬甸，他說：“這一次我受到的教育不小。”“有個印度人跟我說：中國進步這樣快，印度一萬年也趕不上。”

1953 年，印度德里大學代表團訪問北大。馮友蘭記下了一位哲學教授在臨走上火車時的感慨：

他初來的時候，發現中國的青年有一股熱情和毅力是印度青年所沒有的，他不知道是由於什麼原故。現在他知道了，這是經過一個革命和沒有經過一個革命的區別。他這話是說對了。

馮友蘭確立了一個檢驗自己解放以後思想的“試金石”。

毛主席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現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這兩句話具有無邊深遠的涵義。對於這兩

句話的瞭解的深度是考驗我們的政治覺悟、階級覺悟以及理論水平的試金石。

馮友蘭頌揚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無邊深遠”等說法，都是林彪的語言。馮友蘭對這個階段做了一個小結：

由於和國民黨對比，又和印度對比，我逐漸認識以上所引毛主席的第一句話的意義。至於第二句話的意義，一直不認識或拒絕認識。以後幾次“學術辯論”都是這種不認識的結果。

認識了第一句話的意義，即政治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對第二句話不認識或拒絕認識，即思想上不能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

第三段 抽象繼承

1953年以後，馮友蘭解放以前的著作受到批判，他也做了一些自我批判。他自認為並不徹底。之所以不徹底，“主要的是由於沒有突出政治，把批判只作為‘純學術討論’”。

我在1934年被捕後，往南京去了一趟。有個人對我埋怨國民黨，說：“人家替你們寫了一部中國哲學史，你們還逮捕人家。”我聽了很不高興。我當時自以為，我寫哲學史是純學術，為學術而學術。其實這個人說的是客觀事實。至於由《中國哲學史》發展出來的“新理學”，那是更明顯的為蔣王朝服務的。可是我最不願意別人這樣說。

蔣匪拉攏我是他的事，接受他的拉攏是我的罪。他拉攏我是因為我的反動哲學能為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我接受他的拉攏是因為我的反動哲學思想本來是為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所謂“純學術研究”，完全是欺人之談。

他說到解放以後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記住一些詞句。自我批判也用上了這些詞句，沒有解決根本問題。由於根本問

題沒有解決，遇到適當的氣候必然要冒出來。

這個適當氣候，在 1956 年果然來了，那就是匈牙利事件。1956 年黨宣布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我覺得大概是鑑於匈牙利事件，對於思想改造要放鬆一點，多搞些資產階級自由化，開放唯心主義，當然（對）新理學也開放了，心裏覺得很輕鬆。對於毛主席所說的“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教導，完全忘記了。

1957 年，北大召開了規模較大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我就趁這個機會放出了一顆大毒草《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又發表一篇《再論中國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提出了同志們所稱為的抽象繼承法。

北大召開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是哲學界的盛事，許多著名學者都參加了。馮友蘭在會上提出抽象繼承法，是在 1957 年整風反右之前的 1 月 8 日，整風反右中他就沉默了。他對抽象繼承法分三點進行自我批判。

第一，為什麼要強調繼承？馮友蘭認為，無產階級的基本精神是批判舊世界，批判一切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可是我講歷史首先著重的是繼承，唯恐歷史上有什麼東西失傳了，這個立場就是與無產階級針鋒相對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他們一方面不願意看見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文化被消滅，竭力為它們找出路；一方面也看不起無產階級，認為他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非向剝削階級學習不可。

第二，為什麼要抽象？馮友蘭說：

抽象繼承法特別看重抽象，實際上是以談哲學遺產繼承形式使“新理學”的主要思想復活，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反攻倒算。

抽象繼承法認為一個思想的階級性不是它的本質，一個思想有其

抽象的超階級意義，從古到今一直傳下來。在不同的時期中表現為不同的階級形式，這些形式是可變的，但抽象的本質是不變的。這正是毛主席所批判的，董仲舒的“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這個“道”就是“新理學”所說的“理”，抽象繼承法通過繼承問題重新肯定“理”的存在。這是直接向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反攻倒算。

到文革時他才承認，抽象繼承法是構造“新理學”的方法論，經過不斷地抽象，才能造出萬事不變的“理”來。

第三，抽象繼承法的危害性。馮友蘭說：

抽象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存在的。主張抽象繼承的人，講的是抽象的東西，可是等到舉實際的事例，教人學習的時候，就還是具體的東西。

他批評吳晗也是以抽象繼承法講道德繼承的，並揭露《海瑞罷官》宣揚封建道德抽象繼承的欺騙性。馮友蘭對抽象繼承法的批判：

我所講的抽象繼承也是要使封建思想、封建文化登臺，而又是用一種資產階級哲學方式表現出來的。這就為資本主義復辟作思想上、輿論上的準備。

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是他自己及其他新儒家的典型手法，藉助資產階級哲學方法論的新花樣，推銷中國傳統的舊思想、舊文化。五四運動以後，一邊是“全盤西化”，一邊是“堅守國粹”，形成兩個極端。新儒家在兩者之間，他們也常常談論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但認為中國古已有之，就是將儒家的一些概念抽象化，然後與現代概念對接。

馮友蘭在 20 世紀 80 年代重新申明：《中國哲學遺產底繼承問題》“這篇文章的有些提法，是很不妥當，但是其基本的主張，我現在認為還是可以成立的”（《三松堂自序》）。他又推翻了自己的批判。1982 年訪美之際，《中國時報》刊出採訪記《與馮友蘭談他的哲學觀》。文中說，馮友蘭 1957 年提出“抽象繼承法”之後，“挨了 25

年的罵，馮先生有沒有改變自己的觀點呢？‘沒有’，馮先生說：‘我仍然堅持凡哲學命題都要先經抽象，然後才能繼承。’”他是反復無常的，每次反復，他都能講出道理來。

第四段 人性論

1951 年訪問印度以後，馮友蘭自認爲逐漸認識了毛主席所說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但不認識第二句“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認爲，不認識第二句，也就不能真正認識第一句，由於思想上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以後便一再冒出來。不過他善於選擇時機。

1957 年，他看出右派分子想憑口舌之爭跟共產黨“輪流坐莊”是不可能的。他沒有參與鳴放，民盟開會批判章羅同盟也沒有發言。教研室裏批判張岱年的右派言論，馮友蘭輕描淡寫地說“是他很少到外面參觀的結果”，有時間就搞業務，忙於他的“名山事業”。他自己承認：“在反右鬥爭中，我是蒙混過關的。”

1958 年，討論教育改革，他冒出來了，發表反對意見。他將意見寫成文章，題爲《樹立對立面》，登在《光明日報》上。現在他說：“竟然要同黨的方針政策對立，這猖狂到何等地步！”他是有算計的，1957 年他就不“猖狂”，沒有自動充當“對立面”。《樹立對立面》受到批評，他又縮回去，立即發表《取消對立面》，但他承認：“實際並沒有取消”。

1958—1959 年，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和“樹立對立面”不斷遭批評。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之際，馮友蘭出版了一本題爲《四十年的回顧》的小冊子。前面有一首題詩：

奮筆當時信有由，
根源一一細搜求。
不堪往事重回顧，
四十年間作逆流。

馮友蘭常常以“對立面”“逆流”的姿態，以“回顧”“檢查”的口吻，一次又一次頑強地冒出他的“新理學”。他說：

我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遇見適當的氣候就又冒出來。這個適當的氣候，就是 1960 年以後的困難時期以及由此而起的大反復和復古思潮。

1960 年批判巴人⁶ 的人性論時，馮友蘭在教研室的會議上講確有抽象的人性，大唱反調。

我的理由大概是這樣說的：衡量一個言論是否是真理，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是否與客觀實際相符合。衡量一個行為是惡是善以什麼為標準呢？有的同志說，凡是符合歷史進步的行動就是善的行為。我說這不解決問題，還得有個標準。什麼是進步？什麼是反動？

馮友蘭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找到一些談論人性的話，“認為行為善惡的標準就是人性”。他自我批判道：

這樣一來，抽象的人性就成了離開社會各種制度以及其中具體的人，獨立存在、永恒不變的東西。這豈不又成了新理學所講的“人之所以為人之理”，跟董仲舒所講的“天不變道也不變”的“道”又是一類的東西了。

凡是講抽象人性的人，若果一談到他所說的人性的內容，他所談的其實就是他的階級的道德。孟子談性善，表面上看，他是談抽象人性，可是其內容就是封建道德，仁、義、禮、智等。我所談的抽象人性，若談到其內容，必然也是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一套。

20 世紀 60 年代的中國，一概否定人性、人道、人權，對人性論的批判是不正確的；但作為批判對象的人性論，其說不一，並非都是正確的。馮友蘭的人性論就是和“新理學”、抽象繼承法一脉相通

⁶ 巴人（1901—1972 年），原名王任叔，作家，曾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在康生的指使下，1960 年起，從文藝界開始，批判巴人作品中的人性論，以後擴大到思想界各個領域。

的。他承認：“這又是新理學的反攻倒算。不過這次反攻倒算，多帶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偽裝，利用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的一些詞句反對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對人性的論述也是不正確的，如果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偽裝”，而是確實以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來反對它，並非錯誤。

第五段 藉孔子的僵尸，向毛澤東思想反攻

1958 年，馮友蘭在哲學系講授中國哲學史課程。其中《孔子》一章，1959 年在教學改革中特別受到批評。馮友蘭說：“當時我心裏想，我的講法是根據歷史事實，你們的講法是根據教條，不肯接受意見。”

1960 年以後的困難時期，尊孔思想活躍，山東還開了孔子討論會。第一次孔子討論會，馮友蘭沒有參加，寄去了一篇論文，題目為《論孔子》，內容就是中國哲學史課程中《孔子》一章。會後，刊登在 7 月 22 日和 7 月 29 日的《光明日報》哲學副刊上，雖經批評，基本觀點堅持不改。8 月 26 日，《光明日報》哲學副刊發表教改中學生批評馮友蘭講《孔子》的文章。第二次孔子討論會于 1962 年 11 月舉行，馮友蘭參加了。他提交了兩篇論文，一篇是《再論孔子》，一篇是《關於孔子討論中的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並在會上做系統發言。《再論孔子》即《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孔子》一章。他承認，《中國哲學史新編》“比講課中更加吹捧了”，把以前《新原人》中講孔子的修養境界的部分也抄進去了。他在檢討中說：“這就是以研究中國哲學史為名，企圖使新理學復活的一個明顯的例子。”

他對《孔子》一章的自我批判是：

一，孔子是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祖師爺”。兩千年來，封建統治階級都用孔子的思想統治人民。對於孔子，應該是暴露，而不是歌頌。我講孔子，基本上是歌頌。五四以來，進步的思想家，打倒孔家店，作了許多暴露工作。我講孔子是企圖為他辯護，修復已經被打倒

的孔家店。

二，我講孔子，特別宣揚他所講的仁就是“愛人”，這就是宣揚“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人類之愛”。

三，過去一切統治階級所講的“人類之愛”都是欺騙。我卻說，孔子所講的仁，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欺騙。

四，我在講孔子一章以及後來的辯論文章中，著重講在春秋時期，奴隸以外的其他各階級的“共同利益”。

五，毛主席說，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是不存在的。我卻說，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治統”與“道統”是並行的。

馮友蘭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論述。他說：“我‘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想，像《德意志意識形態》這一類的書哲學味重，你們又不通外文，很難看懂。這在表面上是對當時批判我的人說的，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思想說的。”

馮友蘭說，這個時候吹捧孔子，是跟當時的復古主義逆流相適應的，“在我的靈魂深處，其反動的意義，還不止此”。

“新理學”一套反動哲學，是把中國封建階級的舊文化、舊思想、舊風俗、舊習慣的毒素都集中起來，加以提煉，取其中最毒的毒素，用資產階級哲學方式，組織起來。當時地主階級中有人稱之為“新論語”。我聽見很高興。我想，我的著作是“新論語”，我就是新孔子了。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後來我所說的“抽象繼承”，就是這個“提煉”思想的掩護。“抽象繼承法”就是妄圖證明“一個哲學可以為不同的階級服務”。具體地說，就是我的“新理學”的“新統”也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

馮友蘭認為“治統”和“道統”是並行的，“治統”雖經朝代變遷，孔子的“道統”是不變的。他的“新理學”是新的“道統”，故曰“新統”。《新原道》的最後一章就是“新統”。馮友蘭說：“這個題目暴露了我當時的狂妄。”中國的千年“道統”，在他身上成為“新統”，當初欲為國民黨的“治統”提供“新統”，後來又說也可以為共產黨的“治統”服務。“服務”，說得好聽，其實就是為共產

黨的“治統”提供“新統”。兩者都是爲了“應帝王”。

照我所說的抽象繼承法，孔子的“道統”不是也可以“抽象繼承”下來了嗎？我不是自以爲“新理學”是繼承孔子的“新統”嗎？就是說，在共產黨的“治統”之下，“新理學”的“新統”也可以存在。即使共產黨的“治統”有所變化，而新理學的“新統”則是可以永世長存嗎？我發現我的靈魂深處竟是這樣的反動。我的思想若不徹底改造，我不知道更要墮落到什麼地步。

我本來以爲，在帝國主義面前我還是愛國的。這是一種假像。我原來的一套反動哲學思想本來是爲大地主、買辦資產階級服務的。買辦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我是走狗的走狗。解放以後我還堅持這套東西，這是賣國。我不僅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也是祖國的罪人。

他說，孔子爲封建統治階級欺騙勞動人民，騙了兩千年。

而我還要繼承他的衣鉢，在社會主義社會的光天化日之下繼續欺騙人民。

萬萬不能允許這樣的欺騙，一定要把我這樣的騙子手打倒、打爛、打碎。我也要把自己打倒、打爛、打碎。

第六段 近一兩年的錯誤言論

馮友蘭列舉了 1964 年後的錯誤言論，主要是：在民盟的會議上，有人提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必然要經過暴力革命，和平過渡是不可能的。但是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竟然可以通過和平演變，使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什麼道理？馮友蘭給予解釋：

農民有兩面性，一面是勞動者，一面又是小私有者。黨領導農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完全符合農民的利益的。但是農民的私有思想一時不能完全消滅，所以容易走回頭路。

他接著自我批判：“這完全是對農民的污衊。”“蘇聯所發生的和平演變，主要就是沒有經過‘文化大革命’。”

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與越南進行和談。他認為，這是用階級調和的辦法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由此引申：

我想，中國哲學史中，統治階級的哲學家都是主張階級調和的。

他接著自我批判：

階級調和論是有的，階級調和是不可能有的。孔子、孟子所講的仁和仁政，以及近來人們所講的合二而一都是階級調和論。統治階級越講階級調和，階級矛盾就越加深。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的矛盾，哪裏有可能調和？

第七段 自我鑒定

他重新強調前面六段的結論，最後說：

像我這樣的人，在一般的形勢下，竟是被迫還不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革命革到自己頭上，這才有所覺悟。黨對我採取團結、批評、教育的政策，真是無微不至。可是我不改造，就是不接受黨的政策，以至同無產階級的人民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我辜負了黨對我的教育。辜負了毛主席對我的期望。我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對不起全國人民。我願意接受黨和國家給我的任何嚴重處分，願意接受人民對我的任何嚴厲批評。我決定重新作人，……。

馮友蘭自我貶損，自毀形容，獻媚權勢，迎合潮流。為馮友蘭辯護的人，都輕鬆地說，他的檢討是被迫的。雖然是形勢逼人，但在同樣的形勢下，馮友蘭的表現與別人不同，在哲學系“老教師學習小組”中沒有第二人。他是被動中有主動。

第四章

表態高手

中國社會流行“表態”。表態，就是擁護權威，以示臣服。馮友蘭不僅善於檢討，也精於表態。檢討是對自己的，表態是對別人的。有時，馮友蘭很巧妙地將檢討與表態融為一體。

馮友蘭誓言“生為中國人，死為中國鬼”

1967年2月初，馮友蘭向哲學系文革副主任趙正義交出一張紙條，是從他家後面的窗戶縫裏塞進來的，上面寫著：

馬思聰¹已經出走香港，即將去美國。如果你也有此願望，我們

¹ 馬思聰（1912—1987年），廣東海豐人，作曲家、小提琴家、音樂教育家。早年赴法國求學，入巴黎音樂學院，主修小提琴。1932年回國。他用西洋音樂手法，抒發中國感情，創作了《搖籃曲》《綏遠組曲》《西藏音詩》《牧歌》《新疆狂想曲》《塞外舞曲》等多部著名音樂作品，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稱作中國20世紀的經典音樂之一。1949年12月，被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的首任院長。文革中遭批鬥、凌辱。迫害他的紅衛兵，恐怕大多是唱著他作曲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成長的。1967年1月逃亡後，康生和謝富治指示成立“馬思聰專案組”（又名“002號專案組”），調查馬思聰的逃亡，株連馬家和太太王家的親屬數十人，家破人亡，連馬家的廚師賈俊山也被判了刑。1968年，馬思聰被定為“叛國投敵分子”，1985年得以平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訪問中國後，在美國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他在會見周恩來時，周向他問起居住在費城的馬思聰近況。周說：“我生平有兩件事深感遺憾，其中之一就是馬思聰五十多歲離鄉背井到國外去。我很難過。”1987年5月20日，因心臟手術失敗，馬思聰逝於美國。

可以幫助你。明天晚上到這裏來取你的回話。

馮友蘭戰戰兢兢地說：“我生爲中國人，死爲中國鬼，決不去美國。”還說：“我的大兒子馮鍾遼在美國，我多次勸他回國，我自己當然不會再去。”

趙正義問：“你的大兒子怎麼去美國的？”

馮友蘭過分敏感：“我的大兒子去美國跟我沒有關係。”

趙正義說：“我沒有說跟你有關係，只不過隨便問問。”

馮友蘭做了解釋：抗戰時期，馮鍾遼在西南聯大學習。當時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他和西南聯大的許多同學一起報名參了軍，被分配在緬甸遠征軍當翻譯官。遠征軍回國後，送他去美國進修。不久，抗戰勝利了，他留在美國繼續上大學。

馮友蘭是老謀深算的。他大概以爲那紙條是紅衛兵對他的試探，一個勁地表態，獻忠心。

北大校文革的保衛組和北京市公安局在馮家四周隱秘處布防，準備抓特務。守了一夜，沒見到特務的人影。幹這種事情的人，不會沒有一點機警，可能一直注視著馮友蘭，知道他到哲學系辦公室報告去了。

1967年1月，毛主席號召向走資派奪權，引發全面內戰，動亂升級。造反派忙於打內戰，疏於監管，一些“黑幫分子”跳出“牛棚”，趁機逃亡。

那個時期，冒死偷渡，時有所聞。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高曼君所生，與陳延年、陳喬年爲同父異母兄妹），被打成“牛鬼蛇神”，因不堪凌辱，冒死投向怒海。她把自己綁在一個汽油桶上，泅水漂流，10小時後到達香港。到了香港還怕廣州的紅衛兵來追殺，沒來

費城，享年75歲。2007年12月10日，按照本人生前願望，馬思聰和夫人王慕理的骨灰由親人護送返回中國廣州，魂歸故里。其實早在1948年，美國駐中國大使司徒雷登曾邀馬思聰赴美，遭拒絕；文革中，馮思聰冒死逃亡，還是去了美國。生前去美國，死後又回中國，他的一輩子，用生命和熱血演奏了《思鄉曲》。

得及與胞弟陳鶴年一見，又匆匆去了加拿大。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關愚謙，盜用日本友好人士西園寺一晃的護照和簽證，乘國際航班離開了中國。只有極少數幸運兒能夠逃出生天，多數人被抓住，以“偷越國境”“叛國投敵”的罪名判處死刑。投奔蘇聯和朝鮮的，即使出了國境也沒有找到生路。北大西語系學生顧文選，當了右派又成反革命，刑滿釋放後留場就業，等於終身監禁。文革中逃跑，越境去了蘇聯，但被遣送回國，1970年判處死刑。

軍宣隊罵馮友蘭 “笨蛋”

1968年8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後，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教職員工集中住到學生宿舍，不准回家。哲學系所有的教師都住在38樓。馮友蘭、王憲鈞、湯一介和我同住一室。²湯一介和我是中青年，睡上鋪；馮友蘭、王憲鈞是老年，睡下鋪，免得爬上爬下。

我們每天都要“早請示”，每次“早請示”都會玩出一些花樣來。有一天“早請示”，由紅衛兵監督，讓有問題的人排成一行，自報“頭銜”。輪到馮友蘭，他自報：“我叫馮友蘭，是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說：“不對，你這是避重就輕，你是反動學閥，重報！”馮便改口：“我，我，我是反動學閥。”接著是洪謙。他怕被說成避重就輕，徑直就報“反動學閥”。紅衛兵又說：“不對，你還不夠資格，你就是反動學術權威。”洪謙連忙改口。馮定自報“反動學術權威”，紅衛兵又說：“不對，你還想往反動學術權威裏鑽？你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還有一天“早請示”，最後喊“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按節拍揮小紅書。馮友蘭不合節拍，亂揮一氣。軍宣隊

² 施京吾在《人文之殤：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遭遇》中云：“他於8月底9月初被工宣隊誑騙出去，對他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這說明對馮友蘭的批判升級了。”引自人民網。還是這個施京吾，前面說文革初期馮友蘭被關入“牛棚”，這裏又說1968年對馮友蘭“實施隔離審查，開始了勞動改造”。完全是瞎說。

的陳某發現了，把馮友蘭從隊列中叫出來，厲聲斥責：“馮友蘭，笨蛋，揮小紅書都不會！看我是怎麼揮的。”陳要馮再來一遍，馮揮得還是不合節拍。陳說：“回去多練練，你們房間的人負責教會他。”當時馮已年逾古稀，軍宣隊如此粗暴對待老人，我們都看不過去。回到房間，湯一介和我對他好生安慰，誰知他本人卻若無其事，開起會來，又帶頭發言，誠懇表態，說：“亂揮小紅書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不恭敬，罪該萬死。”王憲鈞悄悄地對我說：“馮先生是爐火純青了，我做不到。”

馮友蘭善於找題目表態

節日、生日、紀念日等都成為馮友蘭表態的機會。

1969年8月，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北大一周年，馮友蘭賦詩表態，登在《新北大》校刊上。沒有別人表這個態。

千載文壇歸正主，一年戰鬥樹新風。
白頭深痛多前罪，也在工軍化雨中。

哲學系革命委員會成立，馮友蘭又賦詩表態：

其一

鑼鼓聲喧喜溢洋，新功燦爛繼前光。
主席當年親題記，大字報中第一張。

其二

交織心中愧喜情，昨非今是嚴分明。
像章光彩盈懷抱，照我陽關道上行。

這一年，馮友蘭寫了許多表態文章，主要的有：《一丘之貉——從路線鬥爭的歷史批判我和劉少奇的互相呼應互相支援》《狼狽爲奸——從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鬥爭批判我和蔣介石的狼狽爲奸》《以改造的決心和實際行動迎接九大的召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到的教

育和所得的收穫》《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向偉大領袖毛主席請罪》《政治簡歷——解放前我同國民黨、蔣介石的關係》《向孔家店反戈一擊，兼批劉少奇的黑六論》《批判我的教育思想》《所謂“教授治校”的反動本質》等。

1968年進校的4587部隊軍宣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爾後1969年8341部隊的軍宣隊進校。1970年3月，8341部隊的軍宣隊總結“大聯合”“清理階級隊伍”“整黨”三個經驗，由毛主席批發（北大作為“六廠二校”之一，據云是“毛主席親自抓的點”）。馮友蘭賦詩表態：

歡呼偉大領袖毛主席親批北大總結經驗

其一

萬類欣欣齊向榮，春風和煦近清明。
燕園更有紅光照，主席親批樹典型。

其二

北大原為老大難，工軍領導換新天。
一切歸功毛主席，精神威力大無窮。

其三

三千桃李出燕園，革命路途寬又寬。
“分配”又贏新勝利，“總結”定有第四篇。

1970年5月，馮友蘭為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作詞一首，調寄《西江月》：

東方紅曲嘹亮，真是響徹雲霄。
嫦娥吳剛喜相招，細賞革命音調。
環顧亞非拉美，燎原烈火遍燒。
億萬人民把首翹，共仰紅星高照。

這一年，馮友蘭又寫了幾篇表態文章，計有：《駁劉少奇的修正

主義唯生產力論，兼批我所放的大毒草〈新事論〉》《學習〈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的體會和收穫》《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收穫》。“文化大革命中的收穫”有三：第一，“認識自身過去的罪行之嚴重性”；第二，“開始懂得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真理”；第三，“覺得這毛澤東的偉大時代，作為一個學哲學的人，有廣闊的天地，極其光榮的任務，極其光明的前途”。

1971 年是中國共產黨誕生 50 週年，如此重大的節日，少不了馮友蘭的詩興，而且是一再表態：

敬賀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
調寄浣溪沙，師毛主席《卜算子·詠梅》詞意。

飛雪堅冰正歲寒，陽春浩蕩到人間，東風吹徹五十年。
五十年來催花發，千紅萬紫遍宇寰，叢中梅子笑開顏。

詠梅
調寄卜算子，師毛主席詠梅詞意，再賀中國共產黨誕生五十週年
發在眾花先，喚起群芳悟。戰勝嚴冬雪與冰，開闢芳菲路。
開路接春天，又把春留住。大地蒼茫有沉浮，長是春爲主。

1971 年，馮友蘭又寫了表態文章多篇，主要的有：《我在 1970 年中的思想轉變》《對於中國哲學史中的先驗論的批判和對於我自己的先驗論的自我批判》《關於突出政治的一點體會》《堅持突出無產階級政治，徹底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對於我過去的反動哲學體系的自我批判》等。

1974 年，馮友蘭趁國慶表態，發表《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五週年》，刊於 9 月 29 日的《光明日報》。并作詩一首，向國慶獻禮：

故國四千載，新邦廿五年。
奇花開古樹，異彩耀今天。

友盈三世界，義反兩霸權。
批林批孔後，飛騎更著鞭。

12月初，於79歲生日，馮友蘭作詩自壽，又成為對“批孔”的表態：

水擊三千里，人生二百年。
尚未及半數，不為晚著鞭。
尊儒風未息，批孔戰方酣。
願奮一支筆，奔走在馬前。

政治運動中更是積極表態

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興起。10月，馮友蘭及時表態，寫成《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復古和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兩文，發表於《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4期。12月3日和4日，《光明日報》轉載，加編者按：馮友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這是一個進步，值得歡迎”；《北京日報》等全國其他報刊亦相繼轉載。馮友蘭在前一篇文章中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一向保護‘孔家店’的。在解放前這是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國民黨反動派服務的。在解放以後，這是為劉少奇一類騙子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服務的。”“文化大革命提高了我對孔子的認識。我現在對於孔子的批判也是對於我自己過去保護‘孔家店’的思想和行動的自我批判。”

這一表態是馮友蘭命運的轉折，由此開始成為“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梁效”的顧問。

他又連續寫了兩篇“批林批孔”的表態文章：《“克己復禮”是復古主義路線的核心》《從孔子的文藝觀批判儒家思想的保守主義、復古主義和中庸之道》。

1975年2月，馮友蘭發表《參加批林批孔一年來的思想收穫》，

刊於 2 月 4 日的《光明日報》，一再表態要做“馬前卒”。文中說：“去年我的兩篇批孔的文章發表以後，我接到很多群眾來信……在這種激動的心情下，我寫了《詠史廿五首》，其中最後一首說：‘我原是一尊儒者，喜隨工農步後塵。昨非今是能回首，深謝耆年帶路人。’歸根到底這都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隨著批林批孔運動進一步普及深入地開展，我這‘喜隨工農步後塵’的心情體會越來越深。在 1974 年初冬我按捺不住這種興奮的心情，又作了一首詩，題為《言志》：‘水擊三千里，人生二百年。尚未及半數，不為晚著鞭。尊儒風未息，批孔戰猶酣。願奮一枝筆，奔走在馬前。’我要用我的一枝筆，參加戰鬥，跟隨工農主力軍做一個馬前卒，效一點奔走之勞。”

1976 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他以《孔老二的“撥”和走資派的“扭”》為題，說鄧小平的“整頓”就是孔老二的“撥亂世，反諸正”，搞復辟。在一次會上，他又說鄧小平“是亦步亦趨地踩著孔老二的腳印走，是地地道道的復辟狂”。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以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發生的抗議運動遭到鎮壓後，馮友蘭寫了一首長詩，題為《天安門廣場幾個蒼蠅碰壁》，稱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是“碰壁蒼蠅”“害人之蟲”，他們要使“神州再沉淪”“國家變色顏”“中華隨逆流”，最後讚歎：“害人之蟲誓掃盡，捉鱉那怕下五洋。碰壁蒼蠅大驚慌，搗亂失敗至滅亡。”³ 9 月 1 日，馮發表《批鄧必須批孔》，刊於《人民日報》。

江青的關懷和馮友蘭的獻詩

早在 1973 年 8 月中，謝靜宜就轉達江青對馮友蘭的問候。同年 10 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即“梁效”）成立時，

³ 王永江、陳啟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 年第 4 期。原詩找不到了。

江青點名要馮友蘭參加，也有人說是毛主席欽點的。兩者可能同爲真。在成立的會議上，謝靜宜拿了一本趙紀彬的《孔子誅少正卯考》交給馮友蘭，說：“江青同志要你看看，不久還要找你談談。”

1974年6月12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批林批孔座談會，出席者爲北大、清華和中央黨校的大批判班子。主持人江青與每個人握手時，特地對馮友蘭說：“本來想去看你，因爲窮忙，沒有去。”會後，謝靜宜通知馮友蘭赴外地開會，地點和內容均保密。他與“梁效”的人一起坐上火車，到站一看是天津。第二天一早，宣布三項規定：第一不准寫信，第二不准打電話，第三不准上街。搞得極端神秘。江青來，講了兩個鐘頭。下午，馮友蘭因左腿丹毒復發，住進醫院。他在醫院裏也沒耽誤表態，躺在病床上作詠史詩18首，回後京又續作7首。共25首，發表于9月14日的《光明日報》。其中，第11首云：“則天敢於作皇帝，瓦古反儒女英雄。”特別引人注意。

1974年7月，馮友蘭出席法家著作註釋工作會議，獲江青所贈李贊的《四書評》綫裝本一部。

1976年唐山地震後，8月4日晚，江青在遲群的陪同下到北大。在黨委所在的四院前，下車伊始，江青對圍觀的人群說：“同志們，你們生活得好嗎？過得好嗎？”接著又說：“你們‘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走在前頭，抗震救災也要走在前頭。”本來，遲群說：“東震西震，不能妨礙‘批鄧’。”“唐山是960萬平方公里中的100平方公里，是8億人口中的100萬人口，要擺正‘批鄧’與抗震的關係，用90%的力量搞‘批鄧’。”北大地球物理系的師生在地震發生的當天，就開赴唐山，以專業知識開展宏觀考察，抗震救災。遲群橫加指責：“你們怎麼可以隨便去？”華國鋒去了唐山，“四人幫”爲了搶抗震救災的旗幟，腔調變了，遲群也跟著變，第二天就討論派北大師生1200人去唐山。

江青說，她來北大的目的是要看看幾位老先生，頭一個就是馮友蘭。從四院到馮友蘭家，不過200多米，江青的隨從說：“不行，走

的路太多了。”於是驅車前往。在馮友蘭的抗震棚，還有魏建功⁴在場。江青說：“我來看看你們這些老先生。你們不要驚慌，老年人要帶這個頭，抗震要有長期的準備，至少一個月。”有人問：“毛主席身體好嗎？”江青說：“主席身體很好！”這時離毛去世只有一個多月，報紙上說他“神采奕奕”，實際上氣息奄奄。江青還說：“我一定轉達大家對主席的問候。”這又是謊言。其實，她已經多時見不到毛了。她見毛還要通過秘書張玉鳳提出請求，毛報以“還是不見為好”。

江青走後馮友蘭獻詩云：

無數英雄戰地天，紅旗高舉到前沿。
主席關懷如旭日，萬眾歡呼勝夜寒。

馮家四代人都激動起來了。馮友蘭意猶未盡，又作一首：

⁴ 魏建功（1901—1980 年），江蘇如皋人，字天行，別號山鬼。1919 年考入北京大學，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學習期間，是著名文字學家錢玄同的得意門生。1925 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後為講師、副教授、教授。1935 年，出版《古音系研究》，這是魏建功的代表作。40 年代，任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1945 年，臺灣光復後，被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借調去臺灣推行國語，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兼任臺灣大學特約教授。臺灣同胞特別是青少年，由於深受日本奴化教育的影響，大多不能講國語。魏建功和諸多專家的努力工作，在臺灣推行國語卓有成效。（此處“國語”指漢語，而且僅指漢語。這是一個大漢族主義的概念。中國除漢族以外還有許多兄弟民族，漢語以外的多民族語言都是中國的國語。藏語、維吾爾語等等難道不是國語而是外語？僅以漢語為“國語”，或以漢語等同於“中文”，這些概念都是不準確的。1949 年以後，“推行國語”的口號改為“推廣普通話”，才是準確的。北大中文系的全稱是“漢語言文學系”，這就對了；簡稱“中文系”，這又錯了。）1948 年，回北大任教。1950 年，魏建功組建新華辭書社，兼任社長，並主持《新華字典》的編纂。1953 年，《新華字典》發行，成為適合於廣大群眾需要、深受歡迎的工具書。1952 年，受聘於政務院文教委員會下設的文字改革研究會，為 12 名委員之一，投入漢字簡化方案的制定，為文字改革做出重要貢獻。1955 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59 年，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創辦古典文獻專業，60 年代任北京大學副校長。文革中，魏建功被人揭發“反魯迅”“與陳獨秀關係密切”，受到衝擊。1973 年 10 月，被吸納加入“梁效”，前罪盡消。

四世同堂不尋常，況又同謝黨中央。
愚公當日移山業，也是全家戰太行。

他把江青的看望當“主席關懷”，喻之“旭日”；再謝“黨中央”，江青又等於“黨中央”了。

1976年8月25日，奉江青之命，北大在東操場放映電影《歡騰的小涼河》。這是當年拍攝的一部新片，其中把鄧小平的一些言論當作走資派的臺詞來批判。放映前，黨委書記王連龍發表講話，“感謝江青同志對北大師生的關心”。江青還特地關照北大黨委通知馮友蘭去看電影。馮友蘭已經是81歲高齡的老人，他怕看露天電影會受風寒，沒有去。第二天江青到清華，派人接來馮友蘭，關心地問他：“我推薦的電影，昨天你看了沒有？”馮說沒有。江青說：“預報昨夜有地震，讓你看電影是爲了避震，沒有明說。”

抓住一切機會歌頌毛澤東

196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談到馮友蘭、翦伯贊。翦伯贊沒有聽到傳達，自殺了。軍宣隊趕緊向馮友蘭傳達，他記下了：“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⁵馮聽了軍宣隊的傳達，立即寫一首《蝶戀花·敬祝偉大領

⁵ 這一段話，引自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157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但關於毛對馮及唯心主義的評論，諸書引述互異。百度百科的“馮友蘭”詞條中記載，1968年10月18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上說：“北京大學有一個馮友蘭，是講唯心主義哲學的。我們只懂得唯物主義，不懂得唯心主義，如果要想知道一點唯心主義，還得去找他。翦伯贊是講帝王將相的，我們要想知道一點帝王將相的事，也得去找他。這些人是有用的，對於知識分子，要尊重他們的人格。”還有另一種記載：“馮友蘭你不叫他搞唯心主義一套，我看也難。還有一個翦伯贊，北大教授，歷史學家，資產階級歷史權威嘛。你不要他搞帝王將相也難。對這些人不要搞不尊重他人格的辦法。如薪水每月只給24元，最多的給40元，不要扣得太苦了。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問一問他們。”[《在中共八屆擴大

袖毛主席萬壽無疆》呈上：

紅日當空耀奇彩，照遍全球，開創新时代。
五洲萬國祝壽愷，長領革命向前邁。
辜負期望十九載，反動路綫，罪行深如海。
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隨正路永不怠。

軍宣隊爲了上報馮友蘭的表現，開了一次批判會，讓他表態。最後，軍宣隊問：“觸及你的靈魂了嗎？”

馮答：“觸及了。”

又問：“深刻嗎？”

“深刻，深刻！”

像演戲對臺詞。

此後馮友蘭感恩戴德、阿諛奉承之作不斷。

壽星明（沁園春）

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

（1968年12月）

日出韶山，雲起井岡，風行延安。
如雄雞一唱，聲徹大地，睡獅猛醒，威震人寰。
發展馬恩，繼承列寧，史無前例奪文權。

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8年10月30日），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0卷，314~315頁，香港，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此處斷句不對，應是：“這些人用處不多了，還有吳晗。可能還有某些用處，……。”《毛澤東傳》的記載應該比較準確，但未引原話：“10月31日，毛澤東在全會（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閉幕式上講話。他着重講了三個問題：……第二，對於一些學者，所謂學術權威，不要做過分了。馮友蘭、翦伯贊，還有吳晗，也還有某種用處。你如果要問唯心主義，要問帝王將相，還得請教他”（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53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但《毛泽东文集》第8卷、《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的1968年部分，均沒有在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式上的講話，有關八屆十二中全會的篇目中也沒有講到馮友蘭、翦伯贊的段落。

論貢獻，問千年萬國，幾人並肩？
世界革命當前。杖指揮從容談笑間。
看亞非英雄，前赴後繼，美蘇紙虎，外強中乾。
彼盡凶頑，我有正義，勝負已分在戰先。
願領袖，如方中紅日，永遠經天。

1970年12月，馮友蘭為毛澤東77歲壽辰獻詩一首，請軍、工宣傳隊轉呈。

今日成功大，當年預見先。
精神變物質，舊國換新天。
壽考南山並，威望北斗懸。
帝修臨末路，世界有延安。

馮友蘭在頌毛的同時，不忘克己，什麼“罪行深如海”“深痛多前罪”，脫口而出。

毛澤東78歲壽辰之際，馮友蘭又賦《韶山頌》33首。最後一首寫道：

曾以宏詞作天問，又以革命作天對。
曠世風流問對人，萬歲萬歲萬萬歲。

更無才情賦新章，標語口號湊成詩。正巧，翦伯贊自殺後，在他上衣的口袋裏發現一張紙條，寫的也是“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同樣喊“萬歲萬歲萬萬歲”，表態不同：一個是邀寵，一個是決絕。

毛澤東看了馮友蘭的詩和信，滿心歡喜，1971年6月5日托謝靜宜向他表示感謝並致以問候。馮激動不已，再作詩，又托謝靜宜轉呈：

感事（七絕一首，1971年）

1971年6月5日，毛主席派人來云：“你給他的詩，他看了，謝謝你。向你問候。”不勝感激，賦此回呈毛主席。

善救物者無棄物， 善救人者無棄人。
爲有東風勤著力， 枯株也要成綠蔭。

1976年6月8日，馮友蘭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新的生命，新的力量》，作爲“文化大革命贊”。文中說：“毛澤東思想是革命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強大的武器，是中國人民的傳家之寶。”寫頌詩一首：

革命烘爐火正紅， 燒除舊事布新風。
鬥爭武器無窮數， 都在韶山四卷中。

1976年9月9日下午，聽到毛澤東逝世的廣播後，馮友蘭的第一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上了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當日賦詩一首：

神州悲痛極， 壘兆失尊親。
一手振華夏， 百年扶昆侖。
不忘春風教， 長懷化雨恩。
猶存宏文在， 燦爛照征塵。

9月11日，馮友蘭發表《長懷化雨恩》，刊於《新北大》校刊；9月17日，又刊於《人民日報》。9月18日，參加天安門前的毛澤東追悼大會，當場賦詩一首：

紀念碑前花如林， 無聲哀於動地音。
城樓華表依然在， 不見當年帶路人。

9月28日，馮友蘭發表《再紀化雨恩》，刊於《光明日報》。文中說：“毛主席從來對於我的思想改造的每一進步，哲學史研究工作中的每一進展，都極爲關心，並給我以熱情的鼓勵。我要化悲痛爲力量，繼續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續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繼續修改和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

馮友蘭在文革中創作的表態詩有近百首之多。馮友蘭的辯護人常

說他的檢討、表態是被迫的。看，這類言為心聲的詩詞，是被誰所迫？

馮友蘭自述：“我們這一門有一種作詩的家風。”他的祖父、伯父、父親、姑母均有詩集行世。馮友蘭承襲家風，也喜歡作詩。他知道：“有些人學問很大，可以下筆千言，但寫出來的詩不是詩，儘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寫出來，但就不是詩。”

⁶ 馮友蘭急於表態，作詩連“完全符合格律”都做不到，按他自己的標準，這難道“是詩”嗎？

⁶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4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第五章

“當代孔子”向古代孔子宣戰

要看懂馮友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前後沉浮，以及加入“梁效”之後的飛黃騰達，必須理解偉大領袖毛主席關於“批林批孔”的戰略步驟，以及馮友蘭和“梁效”如何滿足這種戰略步驟的需要。“批林批孔”正是馮友蘭和“梁效”的用武之地。馮友蘭時來運轉是在 1973 年。在文革前期，他作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的“反動學術權威”，戲劇性地搖身一變，成了後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權威。毛澤東掀起“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這叫作英雄造時勢；馮友蘭和“梁效”在“批林批孔”的滔天大浪中弄潮兒向濤頭立，這又是時勢造英雄。馮友蘭說過：“‘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本互為因果也。”他是看透了。不過，人為造出來的時勢，非天下大勢，乃倏忽行時之勢；由倏忽行時之勢造出來的英雄，亦非天下英雄也。

1971 年的“九一三”事件是文革的分水嶺，前後恰好大致都是 5 年。前期的主題是打倒“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後期的主題是批判“叛徒、賣國賊”林彪。批倒批臭劉少奇的時候，拉來一個外國人赫魯曉夫做陪練；批倒批臭林彪的時候，又拉來一個古人孔子做陪練。前期，文革沖天而起，高歌猛進；後期，文革盤桓迴旋，不知所終。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來說，卻是前後一以貫之。¹ 10 年之中，有一半的時間是用來為文革辯護，防止被人所否定。這就是“批林批

¹ 恰如我逝去的朋友張顯揚所說：“毛澤東為什麼發動文化大革命？生前怕‘篡權’，死後怕‘鞭尸’。”見《開放》2005 年 5 月號。這是就毛澤東本人的動機而言，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起來、延續下去，還有其他許多條件。

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任務。

時來運去生感歎

1971 年，林彪覆滅後，中國的時局面臨一個轉折點。轉折，可能從壞轉向好，也可能從壞轉向更壞。不幸，前一種可能錯過了，後一種可能成為現實。

打倒了“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林彪被尊為“偉大舵手”毛主席的“偉大助手”。據說，歷史上有三個“偉大助手”：恩格斯是馬克思的“偉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寧的“偉大助手”，第三個“偉大助手”就是林彪。這是林彪的歷史地位，現實身份呢？1969 年，把林彪作為法定接班人載入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確立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一個老朽和一個病夫聯手的毛林體制。這個結果被認為是文革的“偉大勝利”。“九一三”事件產生了巨大的震撼。

1971 年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聽傳達的人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在外交部發生一個笑話，當場有人站起來對宣讀文件的主持人說：“你唸錯了，是耿飈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的背叛和滅亡，標誌著“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在理論上的破產，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實踐上的失敗。但是中共中央的文件把破產和失敗說成了“勝利”。

1971 年 12 月 11 日發出的《粉碎林陳反動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的前言中說：“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繼揭露以劉少奇為頭子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揭露了陰謀反革命政變的林彪、陳伯達反動集團，除了這一害。……這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和全國人民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種自欺欺人的說辭反而促成千百萬人的思考，走向醒悟。

不是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嗎？怎麼沒有“洞察”身邊

的“親密戰友”呢？偉大領袖的神聖形象遭到懷疑。毛澤東本人也幾乎陷入精神崩潰，經常發脾氣、摔東西，大病一場，從此一蹶不振。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在他的回憶錄中說：“主席在林彪事件後變化較大，狂躁、發怒、猜疑、恐懼，常問我、問張玉鳳，要我們放開講、要講真話、講心裏話。我和張玉鳳還是千篇一律告訴主席，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無限熱愛、無限忠於您老人家。主席聽了有時會哈哈大笑說：‘我還不如小學生’；有時會擺擺手說：‘又是一通屁話。走！走！走！’”² 毛常常在藏書上反復抄寫兩句古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³ 以林彪事件為分界，毛切身感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時來”“運去”。

林彪事件損害了毛的健康。1971年10月8日，他在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時說：“我……已經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⁴ 但報紙上還是說他“神采奕奕”，這是報道毛主席的專用詞彙。

過了好幾個月，毛緩過氣來了，才著手收拾敗局。

群眾自發批极左

1970年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後，開始批判投靠林彪的陳伯達，開展“批陳整風”運動。批陳伯達本是敲山震虎，指向背後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後，順理成章，“批陳整風”運動拓展為“批林整風”運動。林彪的敗亡，引發人們大量宣洩對文革的懷疑和

² 出自《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初稿。1996年9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張耀祠回憶毛澤東》時，將“有損領袖形象”的內容刪除，留作檔案資料。見文學城。

³ “據整理過毛澤東圖書的中直老幹部管理局副局長徐中遠說，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過的書上反復抄寫這兩句古詩。”（閻長貴：《戚本禹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2008年12月，鳳凰歷史，2016/04/22-23）這兩句古詩出自唐人羅隱的七律《籌筆驛》。

⁴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1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不滿，故“批林”的同時，還要強調“整風”。“批林整風”的“整風”和“批陳整風”的“整風”不一樣，後者是整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跟著陳伯達起哄的人；而前者是整對文革懷疑和不滿的人，防止矛頭向上，穩住局面。“批林整風”運動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這一爭論又演變為“批林批孔”運動。

在毛澤東不理事的幾個月裏，群眾自發地起來批林彪的極左。批著批著，就批到文革了。王洪文說：“批極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⁵ 一點不錯，因為文革就是極左思潮的產物。黨史記載：“有一些地區和部門不是根據文件所定的調子，而是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判斷，明確地提出要‘認真批判林彪煽動極左思潮的罪行’‘當前主要是克服極左思潮的干擾’。在周恩來的領導和支持下，這種真正反映群眾意願的呼聲使‘批林整風’運動突破了原定的框框。”⁶ 批林彪的極左，必然會批到以極左為指導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林彪的言論，本來就是附和毛澤東、激化毛澤東思想的。

周恩來支持群眾的願望，在實際工作中從各方面大力糾“左”，也就是糾文革之偏；“九一三”事件之後的 1972 年，逢會必講，批極左。3 月 9 日，周恩來在全國出口商品生產工作會議上說，受極左思潮影響，手工業很多人改行了。4 月 9 日，在廣州觀看部隊文藝演出後，發表談話說：“看來你們的極左思潮還沒有肅清。”“你們的歌越唱越快，越唱越尖，越唱越高。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相結合。”“極左思潮不肅清，破壞藝術質量的提高。”⁷

直到到 1972 年秋，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公安工作會議、出版工作會議、科學工作會議、衛生工作會議等多種場合，提出批判極

⁵ 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決山西問題的會議上的插話，1974 年 3 月 18 日。轉引自《周恩來傳》（2019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⁶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853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⁷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3 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815 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左思潮，批判無政府主義。

教育戰線是文革的突破口，因為教育戰線上極左思潮的氾濫由來已久。教育問題上極左的表現之一是高喊“開門辦學”“任務帶動學科”之類的口號，輕視、忽視以至于無視基礎理論的教學。1972年7月14日，周恩來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時，楊指出中國教育和科學的嚴重問題是削弱了基礎理論的研究。周恩來當場對陪同接見的物理學家、北京大學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說：“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辦好，提高基礎理論水平，這是我交給你的任務。有什麼障礙要掃除，有什麼釘子要拔掉！”7月20日，周培源給周恩來寫了一信，分析我國基礎科學落後的原因，認為“要使我國基礎科學趕上去，關鍵在於領導”，建議“是否可以讓中國科學院統一領導全國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包括綜合性大學的理論研究工作”。周恩來於7月23日給國務院科教組和中國科學院負責人指示：“把周培源同志來信和我的批評及對你們批件的意見都退給你們，好作根據。在科教組和科學院好好議一下，並要認真實施，不要如浮雲一樣，過去就忘了。”⁸

周培源應《人民日報》之約，寫了一篇《對綜合大學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他對“教育革命”中的“理向工靠”“理工不分”⁹“以校辦工廠代替實驗”“按產品劃分專業”等削弱和取消理科的極左做法提出了不同意見。張春橋、姚文元以征求意见為名，召開座談會，進行詰難；最後，阻撓《人民日報》發表。10月6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此文。張春橋說：“周培源有後臺。不管他的後臺多大，就是要批！”上海《文匯報》在他的指使下，連續發了《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否妥當？》《馬克思主義是最基礎的理論》《打什麼理

⁸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周恩來教育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

⁹ 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嘲笑知識分子“教理工科的不會開機器和修機器”。這是典型的“理工不分”的論調。應該嘲笑的是姚文元自己，他連理科和工科是幹什麼的都不知道。理科根本不教“開機器和修機器”，工科教的也不全都是“開機器和修機器”。

論基礎？》等文，進行攻擊。¹⁰ 總理周恩來交給周培源任務的同時沒有交給他權力，周培源關於辦好大學理科的意見在北大行不通。北大黨委副書記、軍宣隊負責人郭忠林說：“什麼有釘子要拔掉，還不是拔掉我們！”真是不打自招。周培源有權力把他們“拔掉”嗎？沒有，而且他們還反攻過來。郭忠林在物理系的大會上居然批判有人“利用加強基礎理論來復舊”，是“上下呼應”。¹¹ 但廣大教師聽到周恩來的指示，看到周培源為貫徹周恩來的指示所寫的文章，無不歡欣鼓舞，不僅理科，就連文科的教師也在暗地裏下功夫，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抵制極左思潮。

反左與反右的較量

1972年下半年，看來周恩來想進一步推進批極左。8月1日、2日，他在人民大會堂連續兩天向外使節和外事、宣傳單位負責人做長篇報告，系統闡述對國際形勢、內外政策、“批林整風”等問題的看法，主題就是批極左思潮，並批評外交部、人民日報社、新華社，說：“你們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極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國也有極左思潮，在我們鼻子下面就有嘛！”“各單位的極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縱起來的，就是空洞、極端、形式主義、空喊無產階級政治掛帥。”“關於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好好做工作，還要犯錯誤。”¹²周恩來的講話在人民日報社傳達後，眾人興奮，正準備批極左，8月8日，張春橋、姚文元來到人民日報社，與軍宣隊和幾個負責人談話。張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林彪利用批劉，搞出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

¹⁰ 引自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858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¹¹ 《郭忠林罪行綜合材料》，郭忠林專案組，1978年10月。

¹² 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202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周恩來接見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同志談話紀要，1971年8月1、2日。（誤，應為1972年。）

此，在批林的時候，不要過頭，不要重犯過去批劉時的錯誤。”他還反對批林彪的“精神萬能論”和“唯意志論”。¹³張、姚的態度與周恩來顯然不一致。

9月底，周恩來主持起草“兩報一刊”¹⁴國慶社論，其中有繼續“批判極左思潮”的提法。主管宣傳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竟敢刪去兩處“批判極左思潮”的字樣。

在一個時期中，周恩來主導批極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主導批極右。群眾對批極右很反感，有人說：“放著極左不批，而去批極右，就會越批越‘左’。”¹⁵批極左，得到群眾擁護，國內形勢明顯好轉；但江青一夥極為不滿。無論如何，“1972年屬於周恩來，而不屬於江青的激進派”¹⁶，這是外國觀察家的評論。

《人民日報》批極左

反左還是反右？在中國是政治風向標。反右意味著“繃緊階級鬥爭的弦”，搞“大批判”、整人；反左意味著“落實政策”，糾正冤案，寬鬆。《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許多人站在周恩來一邊，不贊成張、姚的說法。

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王若水¹⁷趁張、姚不在北京，于1972年10

¹³ 王若水：《從批‘左’到批右的轉折——回憶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針上的分歧》；又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614頁，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¹⁴ 這是文化大革命中權威的發佈信息方式。“兩報”是《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一刊”是《紅旗》雜誌。

¹⁵ 國務院科教組就科教領域“批林整風”的形勢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報告中列舉的反面看法，見《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357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¹⁶ Laszlo Landan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rxism, 1971-1985: A Self-Portrait*,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8, p. 355

¹⁷ 王若水（1926—2002年），祖籍江西，生於上海，童年在湖南度過，抗戰時期避難蜀中。1946年，王若水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投身學生運動。1948年5月，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11月國民黨大逮捕時，轉移到冀中解放

月 14 日編發了一整版批判極左思潮、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黑龍江革委會寫作組以“龍研”的名義發表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這一動向受到輿論重視。法新社當天就發了電訊，進行報道，說文章“批評紅衛兵，為老幹部講話”。11月 4 日，張、姚所控制的上海《文匯報》，在內部刊物《文匯情況》第 312 期發表工人座談會的“反應”，說《人民日報》批極左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到群眾頭上了”。11月 6 日，又公開發表評論說：“要反對劉少奇一類騙子（指林彪）所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過了幾天，又有一篇文章說：劉少奇一類騙子一貫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搞了一點形左實右的東西。11月 24 日，《文匯情況》第 335 期再次批評《人民日報》，還說全國有 9 家省市級報紙轉載了，8 家報紙雖未轉載，也發了批無政府主義的文章，意思是流毒全國。這是自 1965 年批判《海瑞罷官》以來，《文匯報》又一次與《人民日報》唱對臺戲。

姚文元將《文匯情況》轉給人民日報社，要求討論，還說“同意

區。1949 年春，隨大軍回北京，在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 年底，根據本人要求，調往人民日報社理論部，曾奉命批判胡適、梁漱溟。1957 年，毛澤東在批評鄧拓“死人辦報”的同時，表揚了王若水起草的關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社論。60 年代，在“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爭論中，王若水和艾思奇為一方，反對楊獻珍的“否定思維和存在同一性”的觀點。文革中，王若水因主張批林彪的極左，反對張春橋、姚文元批極右，受到批判、撤職的處置，下放北京郊區大興縣紅星公社團河南隊勞動改造。粉碎“四人幫”以後回到人民日報社，被任命為副總編輯。曾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70 年代，王若水在思想解放運動中活躍一時。理論務虛會上的長篇發言《“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廣為流傳。1983 年 3 月 16 日，在紀念馬克思逝世 100 週年學術報告會上，周揚發表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演講，王若水曾參與起草。事後，王又將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周揚演講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此舉遭胡喬木、鄧力群的批評，爾後被免職。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被鄧力群點名，與周揚、胡績偉、李洪林、郭羅基、阮銘一起，成為六個重點對象之一。1987 年的反自由化運動中，王若水與吳祖光被中紀委勒令“勸退”，王本人勸而不退，改為“除名”（中共的黨章上並沒有“除名”的處置）。他出版的《為人道主義辯護》《智慧的痛苦》反而成了暢銷書。離休後，他多次到美國和瑞典訪問，2002 年逝於波士頓。逝世後出版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

不同意都可以”；問他本人的態度，他推託說那幾篇文章還沒有看——夠狡猾的。《人民日報》的人當然不會輕易上鉤，理論部首先拒絕討論。胡績偉¹⁸ 說：“怎麼討論啊？你說同意吧，它是錯的；你說不同意吧，它是工人意見。對工人意見，我們怎麼好去反駁？”姚文元說“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實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¹⁹

當時全國的報刊和地方黨委的調子也很混亂，有的批極左，有的批極右。王若水一不做二不休，12月5日寫信給毛澤東，談“批林”的方針問題，希望統一於批極左。

毛澤東親自出馬做裁決

王若水不知道，在他寫信之前，戰鬥已經開始了。

1972年11月28日，中聯部和外交部根據周恩來講話的精神，提出《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認為“林彪反黨集團煽動的極左思潮在一些單位和地方還沒有得到徹底批判和肅清”，擬召開全國外事會議討論。11月30日，周批“擬同意”，將報告送毛及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12月1日，張春橋閱後對批極左思潮提出異議：“當前的主要問題是否仍然是極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極左和無政府主

¹⁸ 胡績偉（1916—2012年），原名胡德恕，四川威遠人。1936年在四川大學經濟系學習時，參加成都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1939年赴延安。1940年後，任《邊區群眾報》主編，《群眾日報》總編輯、副社長。1949年，任新華社西北分社、西北人民廣播電臺總編輯。1952年調入人民日報社，先後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與周揚、王若水、李洪林、郭羅基、阮銘一起，成為六個重點批判對象之一，辭去人民日報社長職務。後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委員、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副主任。期間曾積極推動制定《新聞法》，沒有結果。1989年，在天安門事件中，贊同趙紫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反對出兵鎮壓，建議召開人大常委會特別會議，因而被撤銷一切職務，受留黨察看兩年處分。胡績偉是當代中國自由化特別是爭取新聞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主張“新聞的人民性”“人民性高於黨性”，為此冒犯意識形態總管胡喬木，長期與之發生爭論。

¹⁹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616~617頁，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義？我正在考慮。”12月2日，江青批道：“我個人認為應批林彪賣國賊的極右。同時批判他在某些問題上形左實右。在批判林彪叛徒的同時應著重講一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²⁰

王若水的信，對上層的鬥爭起了催化的作用，結果即將揭曉。信的內容主要是：

總理在8月1日的講話中，說到極左思潮還沒有批透，並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還會來。”這個指示很重要。

在總理講話一周之後，8月8日，春橋、文元同志對報社領導小組講話。在談到宣傳上批“左”的問題時，春橋同志說：“林彪的一套，是在我們批判劉少奇的過程中搞出來的。……由於林彪利用批判劉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實右和過了頭的東西，流毒很廣。因此，批林要動腦筋，劃清界限，不要過頭，不要重複過去批劉的錯誤。”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到底批“左”過了頭，還是沒有批透？

我覺得總理的指示是正確的。對春橋、文元同志的講話，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剛剛開始，就提出不要過頭，這是給批“左”潑了冷水。

這些天，我反復思索了這個問題。我想，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就表現形式來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是“左”。當前實際工作中的主要干擾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極左思潮。……我認為批極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匯報的觀點是不是有什麼“來頭”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匯報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反過來說，如果是中央精神，為什麼人民日報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匯報的觀點是來自主席，希望得到您的指示。²¹

²⁰ 周恩來、張春橋、江青對中聯部、外交部《關於召開外事會議的請示報告》的批示，1972年11月30日，12月1日、2日。轉引自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202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²¹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572~575頁，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又見《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178~180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最後的幾句話是很雄辯的，看偉大領袖怎麼“指示”。

王若水在信中還引了張春橋、姚文元的話，表示不同意見。批林彪的極左，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一點上，王若水沒有任何辯解。

毛澤東收到信的第二天，約見江青。江青要見他，他不見；需要江青的時候，召之即來。毛對江是愛恨交加。謝靜宜曾告訴吳德：“毛主席說，江青是個大女流氓，有野心。”²² 謴她“女流氓”不過癮，還要加個“大”字。相處幾十年，毛不會不知道她的惡。但江青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使喚起來得心應手，有事還真少不了她。

王若水的信揭示了周恩來與張、姚的意見分歧，毛的意思大概是讓江青出面仲裁。他要江將王若水的信轉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並由他們一起找寫信人談一次話。怎麼談？他不說。江青說了。她向周恩來提出：“我們先談一下，統一一下認識。”三個主張批極右，一個主張批極左，怎樣“統一認識”？可想而知。

王若水的信件導致毛澤東親自出馬，對批極左還是批極右做出裁決。12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處對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發表談話：²³

²²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96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²³ 據《周恩來傳》下冊，毛澤東的談話對象是張春橋、姚文元，2026頁：“12月17日，毛澤東在同張春橋、姚文元的談話中，明確表示不同意那封來信中的觀點，主張對極左思潮應當‘少批一點’，當前主要應該批林彪的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的‘極右’。”而《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中說談話對象還有周恩來等，第1648頁：“1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在住處召集小範圍的會議，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參加。毛澤東在會上說：那封信我看不對，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關於林彪路線的實質，他認為：‘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毛澤東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記錄，1972年12月17日。）”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說：“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在大陸從事周恩來和文革史研究多年，出國前是大陸官方《周恩來年譜》《周恩來傳》《毛澤東傳》文革部分的執筆人。”（9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據此，《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的文革部分，都是高文謙執筆的。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的說法，何以有此出入？再一細究，《周恩來傳》下冊的《七十、批判極左思潮》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節的作

批極左，還是批極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不很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桌子的哲學……（年邁昏庸，語不成句。）²⁴ 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

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²⁵

左傾或右傾，極左或極右，是共產黨內對抗正確路線的錯誤路線，是自上而下貫徹的傾向性錯誤。“陰謀詭計，叛黨叛國”等不是自上而下貫徹的傾向性問題，不是路線問題。毛澤東把一切壞事說成右，極端的壞事就是極右。他的思維能力大大的退化，厘不清頭緒了。除了衰老的自然因素，主要的還是站在為自己的錯誤辯護的立場，不可能面向真理了。中國的命運卻就捏在這個思維能力退化、厘不清頭緒的老人手裏。

由於 50 年代以後毛澤東和共產黨幾十年一貫左傾，只能反右，

者是安建設（2159 頁），《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的《四十、十大前後》一章及其他文化大革命章節的作者也是安建設（1797 頁），均非高文謙。但同一個人對同一件事持有不同的說法，質疑依然存在。《周恩來傳》和《毛澤東傳》是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權威性著作，不應有此瑕疵。高文謙在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來》，才是他自己的說法：“12月17日，在政治局開會後的第二天，毛便把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人找來。名為‘談話’，實際上是讓兩種意見對簿公堂。但是由於周恩來早已不再吭聲，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也不敢在毛澤東面前造次，因此這次談話實際上成了毛一人唱的獨腳戲。根據張、姚二人整理的談話記錄，毛在這次談話中圍繞國內形勢和批林的問題談了他的看法，開門見山地點出‘批極左，還是反極右’的問題，明確表示：極左思潮少批一點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並斷言林彪路線的實質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張春橋、姚文元整理的毛澤東關於要批林彪極右實質的談話記錄，1972 年 12 月 17 日。）”（392 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據以上幾處敘述分析，談話對象應有周恩來，談話記錄是張春橋、姚文元整理的。但三個版本對毛的談話的引述都過於簡單。

²⁴ 王若水參與過“思維和存在的同一性問題”的哲學論戰，他與艾思奇為一方，楊獻珍等為另一方。但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他沒有參與。

²⁵ 《王若水上毛澤東書》附（一），引自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184 頁，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文集》及《毛澤東全集》均不見此談話。

不能反左。批左是高壓綫，碰不得的，連王若水也說：“劉少奇和林彪的實質都是極右。但就表現形式來說，劉少奇有右的表現也有‘左’的表現，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現也有右的表現，主要是‘左’。”事後王若水承認：“這封信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其中就有‘左’的影響，儘管我主張批左”。²⁶ 錯誤路線的“實質都是極右”，不能說極左；林彪的極左只是“表現形式”。這就是毛澤東創造的“形左實右”概念，而“批林整風”連“形左”都不能說了。

《人民日報》的“批邪”運動

一時盛傳，毛主席說《桌子的哲學》²⁷ 的作者王若水“不很高明”。王若水真正“不很高明”的地方，在於沒有看出張、姚的背後就是毛，還給他寫信，自投羅網了。“不很高明”抵得上什麼罪名？1972年12月19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拿雞毛當令箭，當著周恩來的面，在人民大會堂把王若水批了五個半小時（還有人民日報社的負責人魯瑛²⁸、吳冷西²⁹在場）。周恩來主持會議，講話很多，但較

²⁶ 同上，181頁。

²⁷ 《桌子的哲學》是1963年王若水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有關認識論的通俗哲學文章，影響很大。傳說受到毛主席的表揚。

²⁸ 魯瑛（1927—2007年），是上海《解放日報》黨委辦公室主任，並非編輯人員。1966年6月初，文革爆發時被調到北京，作為以陳伯達為首的中央工作組的成員，進駐人民日報社。工作組奪了總編輯吳冷西的權。工作組的成員相繼離開，魯瑛留下來成了實際負責人。1974年，張春橋、姚文元把他扶上人民日報社總編輯的位置。此人文化水平不高，知識貧乏，出盡洋相，人稱“草包總編”。讀報唸到“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游弋”，唸成“游戈”；說到志願軍炸坦克“履帶”，他唸成“覆帶”；更可笑的是把洛杉磯唸成“洛彬磯”，把墨西哥唸成“黑西哥”。他的講話常引起哄堂大笑。魯瑛把一些文句不通的稿子送周恩來審閱，周一面修改、一面搖頭，說：“你們以後不要讓我當小學教員好不好？”張春橋知道魯瑛“弱得很”，但又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對魯瑛同志要支持”。粉碎“四人幫”以後，魯瑛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

²⁹ 吳冷西（1919—2002年），廣東新會人。1937年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次年加入中共，歷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1946年進入新華社，負責國際部的工作。1949

爲凌亂。他既要貫徹毛的批極右的指示，又要爲自己講過的批極左打圓場；他既要批評王若水，又要保護王若水。他是一個難演的角色。江青說：“《人民日報》這篇文章，鬼標題可長了。我也勉強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門）這不是對著林彪，是對著群眾。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了。至於他某一個時間、某些事情上，利用極左思潮，實質上也是極右。”“林彪的路線，右到叛國”以前，你們揭露過他的極右路線嗎？張春橋說“天下大亂”“紅衛兵造反”“停止黨的組織生活”，這些都是毛主席號召的，是毛主席決定的，不是無政府主義。按照這種邏輯，凡是毛主席號召的、毛主席決定的，就不是問題、不是錯誤。極左也是毛主席號召的、毛主席決定的；林彪的極左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擁護毛主席的決定，所以不能批。張春橋洩露了不能批林彪的極左的秘密。姚文元說：“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哪裏去了？”王若水說：“這句話意味深長，使我一驚。”姚文元號稱“金棍子”，名不虛傳。張春橋的結論是：人民日報有“一股邪氣，一股勢力”，要“把邪氣壓下去”。江青說：“要從這篇文章入手，從這個版入手，從理論部入手。”³⁰

張、姚在人民日報社的走卒魯瑛回去就發動“批邪”運動，從1972年底到1974年底，整整批了兩年。胡績偉（當時是理論部黨支部書記）、王若水成了“人民日報反動勢力的代表人物”。最後做出處理：胡績偉發配外地，王若水下放到北京郊區大興縣紅星公社團河南隊勞動改造。

至於周恩來，批極左，口頭上不說了，行動上照做。國家計委起草了一個《關於堅持統一計劃，加強經濟管理的規定》，1973年2月

年任新華社總編，1951年任新華社社長。1957年取代鄧拓兼任人民日報社總編輯。1964年，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長。文革初期靠邊站，1972年恢復工作，爲人民日報社的負責人之一。1976年10月，新成立的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汪東興任辦公室主任，吳冷西與李鑫、胡繩、熊復同爲副主任。這個辦公室是“凡是”派的據點，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理論務虛會上遭到批評、清算。未幾，“凡是”派又得到重用。1980年，吳冷西被任命爲廣東省委書記，1982年調任國務院廣電部部長。

³⁰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下冊，623~637頁，香港，明報出版社，2003。

26 日，周恩來指示：

1969 年以後，在經濟管理上瞎指揮盛行。南昌把飛機廠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鎮的陶瓷窯也給炸了。林彪一夥的破壞一直到“九一三”。1973 年，惡果逐步暴露出來了。應把九大以來林彪一夥破壞經濟計劃的情況編個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壞性後果消除掉。³¹

反左傾的代表何以又成爲左傾的代表？

“批林”是批極左還是批極右？經毛澤東裁決，與王若水和很多人的願望相反，統一於批極右，誰還敢言批極左？從此風向變了。1973 年 1 月，北京市召開的“批林整風”座談會上，強調“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口批‘極左’思潮，否定文化大革命湧現出來的新生物，否定革命的群眾運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³²，誰批極左思潮就成了“別有用心的人”。1973 年 10 月，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北大發動“反右傾回潮運動”，把 1972 年的批極左說成“右傾回潮”，上揪“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代表人物”，下掃“資產階級復辟勢力的社會基礎”。遲群在會議上說：“我們要警惕，有些人現在批極左，是在批文化大革命，批社會主義。”清華、北大有一批教師被軍宣隊打成“內定右派”，本人也在其中。這個運動搞了三個月，後來就叫“三個月運動”。幸而“三個月運動”沒向全國推廣。

毛澤東故技重演。1959 年的廬山會議，本應反左，爲了打倒彭德懷，毛澤東強扭爲反右。大躍進的狂熱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導致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從 1971 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到 1972 年，由於批極左，文革得以暫時喘息。1972 年的“批林”，

³¹ 《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引自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3 卷（下），895 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³² 龐松：《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三），316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本應繼續批極左，毛澤東強扭爲批極右。1973 年以後，又高歌“向左進行曲”，一路狂奔，導致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多次發生左傾路線，冒險盲動，幾乎全軍覆沒。毛澤東是反左傾的代表，在危難中挽救了共產黨，因而取得領導權。1972 年底，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重提毛與王明左傾機會主義鬥爭的歷史，說毛寫了 10 篇文章，現存 9 篇，批左批得很透，總有一天要把這 9 篇文章印出來。1949 年奪取政權後，毛澤東自己却跌入左傾的深淵而不能自拔。從 1953 年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起，他就走上了左傾的道路，在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地方和時間決意搞社會主義。爲了維護這條左傾路線就不斷反右，經 1957 年的反右派運動、1959 年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以後愈來愈左，至文革而達於極左。林彪從反劉少奇的右起家，獨佔了“毛主席的親密戰友”的位置。林彪覆滅後，毛澤東、“四人幫”反林彪的極右。“四人幫”覆滅後，華國鋒如法炮製，又反“四人幫”的極右。幾十年來，共產黨因不斷反右而左傾路線一路延伸，愈陷愈深。

毛澤東作爲反左傾的代表何以又成了左傾的代表？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爲毛澤東代表左傾，故他諱言“左”，一貫反右；實在說不過去，也要說“形左實右”，左的東西實質還是右。夫復何言！

批極左或批極右，是保衛文革的攻防戰。唯恐文革遭否定，這是毛澤東的心病。

毛澤東自認一生做了兩件事

1972 年見了尼克松之後，直到逝世前不久，毛澤東與身邊的人及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談到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海島上去了，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後一件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

聽到他談話的護士長吳旭君問：“你做了那麼多的事，怎麼只有

兩件？”³³ 這是一般人都會發問的。《毛澤東傳》的作者妄評：“他把‘文化大革命’列為自己一生當中做的兩件大事之一，顯然是不適當的，也不符合實際。”³⁴ 怎麼“不適當”？非常適當；怎麼“不符合實際”？完全符合實際。1949 年以前，28 年的奮鬥做了多少事，可以歸結為奪取政權這一件事。把蔣介石趕到海島上去了，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應該說是兩件事吧？他說是一件事，就是幹暴力革命這一件事。1949 年以後做了多少事，可以說是幹社會主義這一件事。毛式社會主義，經一系列歷史事件的聯動，引向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僅是毛一生所做的兩件事中的一件，而且是事業的頂點。1937 年，毛澤東把中國革命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部分，比作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一生做了兩件事與文章的上、下篇，完全是一個意思。也可以說，前一件事，即文章的上篇，是奪取政權；後一件事，即文章的下篇，是運用政權。毛澤東沒有提到這兩件事、文章的上下篇的相關性。為什麼“持異議不多”的暴力革命奪取的政權，在運用政權時做出來的事情會“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是更為深刻的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否足以代表“下篇”？這是毛澤東自己清楚而許多人迷糊的地方。

1953 年，斯大林逝世，毛澤東雄心勃發。他拋棄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劉少奇堅持他的新民主主義，反而被他指責為右傾。6 月 15 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即席發言，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要求在 10 年到 15 年或更長的時間內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還說：“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過渡，最後全部過渡完。”結果，不到 3 年，1956 年 1 月，中國就宣佈進入社會主義了。按毛澤東自己的標準，也是“走得太快，左了”。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前工業化社會，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均無向社會

³³ 訪吳旭君談話記錄，2002 年 1 月 18 日。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45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³⁴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82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主義過渡的條件。³⁵ 毛澤東的空想性的主觀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有所不同。聖西門、傅立葉、歐文他們推行空想社會主義的手段是說服和示範，說服不了，示範失敗，只好散夥。毛澤東運用政權的力量，強制推行空想性的主觀社會主義，企圖用鞭子把人民趕入天堂，不服就壓，因而造成災難，結果下了地獄。

為了製造社會主義的吸引力，毛澤東又拿根本不存在的“資本主義復辟”來嚇唬人。在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的地方“反資本主義復辟”，只能倒退到前資本主義，復辟封建主義。

超越社會發展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引起激烈的社會矛盾。毛澤東又發動一場一場的運動來對付矛盾，維護主觀社會主義。從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機會主義到文化大革命，幾十年來中國人民所遭受的厄運，根源就在於 1953 年的“向社會主義過渡”。如果文化大革命遭否定，就會發生連鎖反應，一路翻案翻過去。被打倒的劉少奇、彭德懷和一大批老傢伙固然會站起來；彭德懷站起來，大躍進就倒下去了；大躍進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好”“右派分子想要反也反不了”，大躍進一倒，反右派也靠不住了；反右派是所謂的“政治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了維護 1956 年宣佈的“進入社會主義”。由此一直要翻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的提出。毛澤東自感“上帝給我下了請帖”（與基辛格語），來日無多，要對一生做總結，盤點自己的政治遺產了。他深為憂慮，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他幹社會主義這一件事，終將毀了一世英名。

毛澤東極力維護文革，理由是什麼？

針對社會上流傳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的說法，毛主席在 3 月 25 日（1973 年）政治局會議上批駁道：怎麼能這樣說呢？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集團揪出來了嘛，又把林彪集團揪出來了嘛，這是個偉大勝利。如果不是這場大革命，劉、林他們怎麼能發現？怎麼能打倒？³⁶

³⁵ 見郭羅基《歷史的漩渦——1957》中“禍起總路線”一節（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³⁶ 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傳達毛主席講話記錄，1973 年 5 月 26 日。轉引自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54 頁，北京，

他說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不是發動了文革，才揪出“劉少奇集團”，而是蓄意打倒劉少奇，才發動文革。不是在文革中揪出“林彪集團”，而是文革首先製造了“林彪集團”；“林彪集團”也不是文革揪出來的，而是自我爆炸的。林彪覆滅之前一直是文革的副統帥。理由不能成立，因為它不合乎事實，不合乎邏輯。文革是無法維護的。

孤獨的晚年

毛澤東的最後幾年，發動“批林批孔”運動，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運動連運動，運動套運動，都是為了維護無法維護的文化大革命，即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的後一件事。以後一個運動維護前一個運動，為了掩蓋舊的錯誤又製造新的錯誤，陷入泥潭，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可憐的“偉大領袖”，在泥潭裏苦苦掙扎，至死方休。1976年6月15日，毛澤東病重之際，召見華國鋒、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王海容³⁷等人（有的版本提到還有汪東興、毛遠新），又說一生幹了兩件事：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了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³⁷ 王海容（1938—2017年），湖南長沙人。毛澤東的表兄王季範之孫女。1964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俄語系，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英語一年。1965年11月入外交部工作，人稱外交部的“五朵金花”之一。1971年7月任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森訪華等重要外事活動；1972年5月任外交部部長助理；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長。在毛遠新當“聯絡員”之前，她和唐聞生是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橋樑”。粉碎“四人幫”後接受審查。1984年4月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

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³⁸

這是毛澤東對自己的“蓋棺定論”，語多唏噓。“與天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到了“運去英雄不自由”的下世光景，無奈慨歎“只有天知道”了。此後，毛再也發不出“最高指示”了，這才是“臨終囑咐”。

毛澤東對“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的文化大革命憂心忡忡。他的政治遺產還是託付給以“四人幫”為骨幹的一批人。幾十年中，患難與共、生死之交的老戰友都不見了。他把一大批人打倒了，自己也孤立了。俄國著名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澤東傳》的最後一章，題目就是“孤獨”。

³⁸ 馬齊彬，陳文斌等：《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402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1；《和部分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6年6月15日），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2卷，150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又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8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毛澤東傳》所據的是1977年3月22日的《葉劍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記錄》。但葉並非親歷者，他沒有提供出處。范碩在《葉劍英在1976》中記載了這段話。“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之後，還有一句：“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179~180頁，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0。）范碩的這個版本，最早出現在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600~601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只是把“紫金城”改為“紫禁城”。始作俑者王年一未註明出處。《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文革部分的編者是王年一。他自然把《大動亂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的話寫了進去，但刪去“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金城”一句。亞歷山大·潘佐夫所著的《毛澤東傳》（下）（89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轉引了《毛澤東傳》中的這一段話，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之後，又多了一句：“我們佔領了北京，拿下了金鑾殿。”未注出處，也不見於其他版本。余汝信、曾鳴在《毛澤東“政治遺囑”之疑》（《領導者》2014年6月號）中對王年一及其後引用的毛澤東的這段話，提出強有力的質疑，但還未達到證偽的程度。毛澤東“一生做了兩件事”的談話有多次，即使6月15日這一次證偽了，也不等於全都證偽。

1976 年，毛在黃昏歲月中度過最後一個春節。他的身邊人張玉鳳描述：

這是一個寒冷的冬夜，天上有幾顆暗淡的星星。毛主席的住處籠罩在黑暗之中。沒有客人，也沒有親人。……年夜飯是我一勺一勺喂的。此時的毛澤東不僅失去了“衣來伸手”之力，就是“飯來張口”也十分困難了。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他的最後一次年夜飯。³⁹

毛的晚景何其淒涼！

“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

毛澤東當然明白，批極左就是批文革，批文革就是否定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的後一件事，即幹社會主義這件事。他也一定知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批極右沒有什麼說服力。林彪明明是極左，怎麼會是“極右”？批起來理不直、氣不壯。經過一年多的試探和醞釀，毛澤東把林彪和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掛上鉤，說林彪和孔子一樣，都要恢復舊秩序、舊傳統、舊制度。這還不是極右？大策略家毛澤東將“批林”從批極左扭到批極右，辦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實林彪的極右。於是，“批林整風”運動轉為“批林批孔”運動。

毛澤東是一貫反對孔夫子的嗎？為了現實鬥爭的需要，他顧不得以往講過什麼了。毛雖經五四運動的洗禮，但他的主張與“打倒孔家店”一派不同。早在 1938 年，他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⁴⁰ 這是被人們一再引用的毛的名言。次年，毛在給張聞天的信中評陳伯達的《孔子的哲學思想》，

³⁹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載《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⁴⁰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534 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說：“孔子的體系是觀念論；但作為片面真理則是對的，一切觀念論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樣。觀念論哲學有一個長處，就是強調主觀能動性，孔子正是這樣。我們對孔子的這方面的長處應該說到。”⁴¹ 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演講中，甚至將“孔夫子的孔夫子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並列，三個主義，都是褒義。⁴² 他還諄諄教導幹部們要學孔夫子的“每事問”“不恥下問”。他連給兩個女兒取名李訥、李敏也是典出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論語·里仁》）30年代，為了“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要繼承孔夫子；70年代，同樣為了“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又要批判孔夫子了。所以，毛的“批孔”也是批他自己；毛發動的“批林批孔”運動是以否定自己為代價的。

誠如毛自己所說，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是歷史學的研究任務，批判林彪是政治任務，將兩者糅合在一起，對歷史上思想文化的評論就變成了現實政治問題。“批孔”為“批林”服務是為了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肯定林彪的“極右實質”，本來就不是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後，有資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來。故“批林批孔”實際上是“批周公”。

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舉法家。在毛澤東的親自推動下，批判“尊儒反法”甚囂塵上，將中國從古到今的全部歷史及政治史、思想史、哲學史一律扭曲為儒法鬥爭史。

197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工作會議，黨、政、軍負責人246人參加。會議的內容之一是討論“批林整風”。由於“批林整風”從批極左強扭到批極右，會議除了關於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的空洞表態之外，討論毫無生氣。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毛號召大家學一點歷史，還說到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有尊孔思想，要批判。這是在中央的會議上首次提出“批孔”和“批尊

⁴¹ 《關於〈孔子的哲學思想〉一文給張聞天的信》，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二卷（160~161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3）。

⁴² 《在延安在職幹部教育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引自《毛澤東文集》第二卷（18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孔”。隨後傳出毛的一首順口溜式的五言詩《五絕・呈郭老》：

郭老從柳退，
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
崇拜孔二先。⁴³

起初，民間對流傳的這首詩莫名其妙，把郭沫若與柳宗元比什麼呀？毛澤東善用迂迴戰術，行動之初渾不察，一步一步，他的戰略意圖才暴露出來，等到完成了包圍，人們才恍然大悟。1973年7月4日，毛澤東約談王洪文、張春橋，二人是負責起草中共十大的政治報告和修改黨章報告的。毛沒有談兩個報告，而是大談外交部的內部刊物《新情況》上的文章，批評外交部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有幾句話是針對周恩來的：

結論是四句話：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此調不改動，勢必出修正。

將來搞修正主義，莫說我事先沒講。⁴⁴

周恩來對付毛澤東的辦法就是“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不料被他看穿，只得檢討。

毛又說到另一個重大問題：

郭老（沫若）在《十批判書》裏頭自稱是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是尊孔，而且還反法。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我贊成郭老的歷史

⁴³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380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江青在1月25日大會上唸過此詩。《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說，他當面問過毛，毛說：“我沒有寫這樣的詩。不知道是從何而來。郭老是從舊時代過來的人，也不至於此。”（14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張耀祠此說沒有旁證。所說“也不至於此”與事實不符，後來的《讀〈封建論〉呈郭老》是與此詩相呼應的。

⁴⁴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390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爲界，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⁴⁵

毛澤東反對儒家的人本主義，擁護秦始皇的君本主義，即皇權主義。郭沫若自稱是人本主義，就是和孔夫子一樣。原來從郭老“崇拜孔二先”，引出郭老尊孔，而且還反法。郭老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一樣嗎？郭沫若當年可是激烈反對國民黨的。從國民黨又說到“林彪也是啊”，林彪和國民黨一樣嗎？林彪可是與國民黨打了幾十年的仗的。毛澤東總是把他的政敵推向國民黨。1959 年的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他就說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毛從批評郭老“崇拜孔二先”開始，兜了一個圈子，落實到林彪頭上。但從郭沫若到國民黨，再到林彪，論證完全是武斷的。

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澤東接見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又批郭沫若，說：“他在《十批判書》裏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⁴⁶ 當然是希望楊向海外擴散。

同一天，周恩來對楊振寧說：“秦始皇代表統治階級，不可以捧上天。”⁴⁷

8 月 5 日，毛澤東向江青講述中國歷史上儒法鬥爭的情況，顯然是一種授意。他指著郭沫若的《十批判書》說：這是供批判用的。當場念了一首近作《讀〈封建論〉呈郭老》，以供傳播：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雖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⁴⁵ 同上，393 頁。

⁴⁶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900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⁴⁷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607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他還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⁴⁸

唐人柳宗元，字子厚，著《封建論》，反對周朝的封建制⁴⁹、維護秦朝的郡縣制。封建制與郡縣制之爭，在 20 世紀已經沒有現實意義，疑毛澤東讀章士釗《柳文指要》書稿信手拈來。莫非寄意反對復古、反對倒退？毛澤東一貫皮裏陽秋，叫人費思量、摸不透。無論如何，柳宗元的《封建論》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沒有什麼關係。

郭沫若 1945 年出版的《十批判書》是抗日時期寫作的評論先秦人物和思想的十篇文章的結集。當時郭沫若罵秦始皇是影射蔣介石，毛澤東並沒有“勸君少罵秦始皇”，而且唯恐罵得少，希望“大罵”，因為他是陳勝、吳廣。1949 年，陳勝、吳廣翻身了，毛澤東有了秦始皇的自我意識，自認為他的“焚坑事業”超過秦始皇百倍。所以罵秦始皇就是罵毛澤東，豈止“少罵”而已！經過批評“尊儒反法”的鋪墊，毛澤東亮出了心曲。1973 年 9 月 23 日，他在會見埃及

⁴⁸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 51 卷，412 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⁴⁹ 封建制的原意是分封建邦制，分封諸侯，建立邦國，藩屏天子，以天子為共主。近代西學東漸後，中國人將歐洲前資本主義的中世紀社會形態 Feudal System, Feudalism 譯作封建制、封建主義。Feudal, Feudalism 的詞根 *feud* 是采邑，取其表面相似之處譯作“封建”，其實歐洲中世紀的社會形態與中國周朝的社會形態大不相同。“封建”一詞，翻譯雖不確切，但在流傳中已經具有與“分封建邦”不同的含義，成為同一詞語表達的具有不同內涵的不同概念。一個概念是作為政權形式的封建，封建制與郡縣制相對；一個概念是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封建制與奴隸制、資本主義制有別。“反帝反封建”的“反封建”，當然不是反對“分封建邦”。有人說：“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但并不是所谓‘封建制度’。……”（見何新的《中国古代史有待重新審視》）還有人說：“究竟是誰‘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訴讀者：——‘封建主義’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國主義’就是帝王制，是被孫中山推翻的；——‘官僚資本主義’？根本不存在！……”（見易中天的《重寫中華文明史》）這些自作聰明的人，以為有了重大發現，還要“正本清源地告訴讀者”，只不過犯了一個簡單的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混淆了作為政權形式的封建與作為社會形態的封建。

副總統侯賽因·沙菲時，話題轉到秦始皇。他說：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⁵⁰

毛澤東批判“尊儒反法”的人格化，落實到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秦始皇和孔夫子不是同時代人，也沒有共同的爭論命題，一個是政治人物，一個是文化人物，把他們作為歷史上的對立面，實在是牽強附會的。

毛澤東和後來的鄧小平，都喜歡在接見外國人時恣意發揮，也不管人家愛聽不愛聽。侯賽因·沙菲會對秦始皇感興趣嗎？實際上他們是說給中國人聽的。

毛可以自稱“我也是秦始皇”，但“林彪罵我是秦始皇”就不行。1976年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的群眾，有人影射毛是秦始皇更不行，被定性為“反革命”。

但是，1949年以後，郭沫若並沒有罵秦始皇呀！這是毛澤東的慣技，叫作“樹立對立面”。1957年批“章羅同盟”，明明章伯鈞和羅隆基一向不和，毛澤東“拉郎配”，硬說他們兩個是“同盟”，不是同盟也是“同盟”。“批林批孔”也需要樹立一個“尊儒反法”的活生生的對立面，叫得響的就是郭沫若了。

“批林批孔”的吼聲

“批林批孔”“評法批儒”，由上而下，製造輿論。

⁵⁰ 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901頁的引文，刪去了“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兩句，而且不打刪節號。既然“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稱“我”是秦始皇是捧我，怎麼成了“罵我”？這兩句話是矛盾的，刪去了為毛澤東遮醜。

第一個站出來響應“批孔”號召的是南方的楊榮國⁵¹，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楊榮國的《孔子——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楊榮國並非投機客，他是一貫反孔的。這篇文章是人民日報社理論部的約稿。8月3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的內刊《情況匯報》第2253期上看到此文，批了四個字：楊文頗好。經毛澤東批准8月7日公開發表，⁵²電臺紛紛廣播。8月1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楊榮國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反對唯心論先驗論的鬥爭》。楊榮國一時成了“批孔反儒”的明星。

9月4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亮相（後以“梁效”行時），在《北京日報》發表《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一出场就口吐火药味：“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為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精神武器”；他們“大肆宣揚‘孔孟之道’，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瞄準“黨內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除了劉少奇、林彪，當然還有別人。

9月15日，上海的《學習與批判》⁵³創刊號發表“石侖”⁵⁴的《論尊儒反法》（經姚文元修改），說：“徹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識別那些搞資本主義復辟的陰謀家、野心家是怎樣利用古代反動派向無產階級進攻的。”“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也是黨內路線鬥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儒法鬥爭成了黨內的路線

⁵¹ 楊榮國（1907—1978年），湖南長沙人，早年畢業於上海群治大學。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致力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1946年7月，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在獄中繼續研究，後來出版了代表作《中國古代思想史》。1949年任湖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歷史系主任；院系調整後，入中山大學，任歷史系主任。1956年公開黨員身份，當選為中山大學黨委委員、常委。院系調整時，全國調整到只有一個哲學系，屬北京大學，其他大學的哲學系都被撤銷。1960年，中山大學恢復哲學系，楊榮國任主任。

⁵²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901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⁵³ 名義上是“復旦大學學報”，它的編輯部設在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內，實際上是該寫作組的機關刊物。

⁵⁴ 張春橋、姚文元控制的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化名之一，見以下“羅思鼎”注。

鬥爭。10月1日，《紅旗》雜誌第10期轉載此文。

9月27日，“唐曉文”⁵⁵在《人民日報》發表《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嗎？》，《紅旗》雜誌1973年第12期又加以轉載。文章顯然不限於議論教育問題，說：“地主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劉少奇、林彪一向是‘孔孟之道’的狂熱鼓吹者。全國解放以後，他們又繼承了尊孔的反動逆流。……建國以來階級鬥爭的事實表明，尊孔和反孔的鬥爭是復辟和反復辟鬥爭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

9月28日，《人民日報》轉載《遼寧日報》的《“焚書坑儒”辨》（施丁），認為“焚書坑儒”是反復辟的進步措施。古為今用，為文革中的“焚書坑儒”唱讚歌。

11月1日，《紅旗》雜誌第11期發表“羅思鼎”⁵⁶的《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鬥爭——兼論儒法鬥爭的社會基礎》（是姚文元從北京打電話到上海向朱永嘉佈置的任務，成文後又經姚文元修改）。文章在歌頌秦始皇的同時，藉批宰相、反復辟影射周恩來。文中大批呂不韋的“折中主義”，將古代歷史現代化。文章還點了戰國末期一批宰相的名。江青唯恐別人不明白，點撥道：“這篇文章的好處，是批呂不韋，呂是個宰相。”⁵⁷《紅旗》雜誌同期發表《右傾

⁵⁵ 由康生控制的、以趙紀彬為顧問的中共中央黨校寫作組的化名，首見於1972年的《紅旗》雜誌，主要成員有武葆華、張載倫、楊福雲、黃允升等，還用過“湯嘯”“辛風”“學澤”“唐拓”等化名。從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唐曉文”發表了50多篇文章。江青對“唐曉文”視同“梁效”。1973年6月的天津之行，江青說：“我帶的不止是兩校，是三校，還有黨校。”

⁵⁶ “螺絲釘”的諧音，取義於雷鋒的“做一顆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原為20世紀60年代朱永嘉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與幾個青年教師共用的筆名，朱成為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的負責人以後沿用之。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是1971年7月正式成立的，由張春橋、姚文元在北京遙控。所屬各寫作小組還用過“丁學雷”（駐地是丁家花園，意為在丁家花園學雷鋒），“石一歌”（包括余秋雨等11人），“康立”“石侖”“史鋒”等眾多化名。從1973年9月到1976年10月，在三年多的時間裏，發表了156篇文章。他們除了在中央報刊上發表文章，還直接控制《學習與批判》（復旦大學學報）、《朝霞》《教育實踐》等刊物。

⁵⁷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中發[1977]37號，1977年9月23日。

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從林彪推而廣之，“黨內歷次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頭子，也都是尊孔的”。

11月16日，《學習與批判》（上海）第3期發表《資產階級和儒法鬥爭》，第一次提出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荒謬觀點，說：“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儒法鬥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新的內容和形式繼續進行著。”也是揪“現代大儒”的先聲。

“批孔反儒”，漸成氣氛。這首兒歌反映了時代氣氛：“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嘴上講仁義，肚裏藏詭計。鼓吹克己復禮，一心想復辟。紅小兵齊上陣，口誅筆伐狠狠批。”

著名電影導演謝晉在《訪美觀感》中記載了一則幽默：“在紐約唐人街的入口處，迎著我的是一尊高大的聳立的孔子銅像，我仔細一看，下面基石上刻有造像的日期，正是國內‘批林批孔’荒唐、瘋狂的年月。華僑請夫子來紐約避難，倒也很幽默。”⁵⁸

孔夫子避難去了。“當代孔子”馮友蘭坐不住了。

毛澤東批評馮友蘭的不老實又需要他的不老實

1957年，在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鳴放會上，張岱年⁵⁹（張夫人馮纓蘭是馮友蘭的堂妹）副教授當著馮友蘭的面稱呼“馮先生是當代孔子”。馮先生笑納之，但不置一詞。結果，吹捧“當代孔子”的張岱年被劃為右派分子，而“當代孔子”馮先生本人倒沒事。抗日時期，馮友蘭還以“新孔子”自居。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當代孔子”賣力地批判古代孔子來了，“新孔子”無情地反對老孔

⁵⁸ 《文匯報》，1985年8月28日。

⁵⁹ 張岱年（1909—2004年），字季同，河北獻縣人。胞兄張申府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介紹周恩來入黨。張岱年本人於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同年應聘為清華大學哲學系助教。1936年寫成的《中國哲學大綱》是他的代表作。抗戰期間，清華南遷，他滯留北平，閉門著書。1946年回清華。1952年院系調整後，在北京大學哲學系為副教授、教授。70年代，中國哲學史研究會成立，被推舉為會長。

子來了。

馮友蘭命運的轉變，就在於他善於檢討、精於表態。50 年代初期的思想改造運動之後，特別是在文革中，知識分子隨大流做檢討、表態是習以為常的。但馮友蘭與眾不同，他的檢討、表態非但主動、積極，而且是有所圖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五天，1949 年 10 月 5 日，馮友蘭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這是他平生第一次檢討，也是從蔣帝王轉向毛帝王的投名狀。信中歌頌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還表明自己的心迹，希望毛主席支持他重寫 20 年前的《中國哲學史》。

毛主席：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為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為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係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為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分力量，並且在對日抗戰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復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說，都於革命有阻礙。各方面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我願意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努力工作慶賀新中國的誕生。你們對於中國的改造，不但使中國的將來已經決定，並且使中國的過去，也需要重新解釋。我計畫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

過，作為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馮友蘭
1949年10月5日⁶⁰

毛帝王很不客氣，10月13日回信說：

友蘭先生：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此覆。敬頌教祺！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⁶¹

馮友蘭對毛的答復內心很不滿意。“主席說：‘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我想：‘我有什麼不老實’，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

毛早就知道馮友蘭並非“採取老實態度”的人，現在他就需要這樣的人。

毛澤東創造了“批林批孔”的時勢，馮友蘭順勢推舟；毛澤東利用了馮友蘭，馮友蘭俘獲了毛澤東。

⁶⁰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4卷，636頁。

⁶¹ 《毛澤東書信選集》，3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5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收信人馮友蘭收入《三松堂全集》，見第14卷637頁。

馮友蘭的起義

《馮友蘭自述》中說：

1973年，批林運動轉向批林批孔運動，批孔還要批尊孔。當時我心裏又緊張起來，覺得自己又要成為“衆矢之的”了，後來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衆的對立面呢？要相信黨，相信群衆嘛。我和群衆一同批孔批尊孔，這不就沒有問題了嗎？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我寫了兩篇發言稿。

可見，馮友蘭的轉變並非被迫，而是迎合。說變就變。這兩篇發言稿的題目是《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4期。這是馮友蘭所有檢討、表態中最為見效的；而且他自己知道見效了。

在一次會議上，北大匯報批林批孔運動的情況，說到我那兩篇文章，毛澤東一聽說，馬上就要看。謝靜宜馬上回家找著這兩篇文章，回到會場交給毛澤東。據說毛澤東當場就看，並且拿著筆，修改了幾個字，甚至還改了幾個標點符號。後來就發表了。⁶²

看來毛澤東對馮友蘭的轉變頗感意外，否則在授意《人民日報》動員楊榮國寫反孔文章的同時，也會讓馮友蘭有所表示。得此馮友蘭的降書，毛喜出望外，命《光明日報》立即轉載。《光明日報》加了“編者按”，於1973年12月3日、4日兩天連續刊登。按語中說：

他的文章中，在批判孔子反動思想的同時，也對他自己過去的尊孔思想，以及他宣揚的對中國哲學遺產的“抽象繼承法”，有所批判。這是一個進步，值得歡迎。

⁶²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50~15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於是，馮友蘭就成為“值得歡迎”的人物。按語還利用馮友蘭這個標兵對“廣大知識分子”發出號召：

從馮友蘭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進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整風運動中取得的，也是在積極參加批孔鬥爭中取得的。我們歡迎廣大知識分子，包括過去受孔子思想毒害較深的人，積極投入當前的批孔鬥爭，在鬥爭中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進行自我教育，在鬥爭中提高路綫覺悟，改造世界觀，努力跟上社會主義的步伐。

《北京日報》將轉載《光明日報》刊發的馮文，希望作者將兩篇合一，一次性發表。馮友蘭整理了一個新稿。結果見報時還是《光明日報》的格式，“編者按”也照抄不誤。《北京日報》的編輯，手拿大樣，向馮友蘭登門解釋：“我們原來是用你新寫的稿子，你看已經打成大樣了，可是上邊說不行，叫我們必須按照《光明日報》的原樣轉載，不能變動。”⁶³可見，《光明日報》的“編者按”有來頭，不得擅改。馮友蘭的女兒馮鍾璞卻說：“1973年批林批孔時，父親在哲學系例行的政治學習會上發言（要知道，學習會是人人都必須參加的），《對於孔子的批判和對於我過去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又在北大老教師批林批孔會上作《復古與反復古是兩條路綫的鬥爭》的學習發言，這都是例行的小組發言，被全國各大報轉載，父親並不知情。”⁶⁴明明是馮友蘭本人交給《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被全國各大報轉載”，怎麼能說“並不知情”？《光明日報》轉載時經毛主席修改，《北京日報》轉載時上邊說“不能變動”，這些都寫在他的自述裏，怎麼能說“並不知情”？

馮友蘭對孔子的批判采用取巧的辦法，只是挑幾個有興趣的問題講一講。他說：

⁶³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5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⁶⁴ 宗璞：《馮友蘭之女撰文洗冤：父親從未寫詩吹捧江青》，人民網-文史頻道。

我不準備對孔子的政治態度以及思想的各方面（作）全面的批判，僅舉幾條我所想到的證據，以爲同志們所舉證據的一點補充。

他只是爲別人補充幾條反孔的“證據”，並沒有提供他自己何以從尊孔轉向反孔的證據。當然，檢討、表態是必不可少的：

1957 年的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以及 1962 年的紀念孔子的濟南會議，都是當時修正主義路線的復古潮流的一種表現。在中國哲學史討論會中，我宣揚“抽象繼承法”，以反抗階級分析法。在濟南會議中，我散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中關於孔子的論點，說孔子是當時封建地主階級的思想代表，他講的“仁”有“普遍性形式”，在當時有進步意義。這都是加強了對孔子的“神化”，爲修正主義路線服務。

馮友蘭的文章寫得很生動，能吸引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批孔”的現實意義：

在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孔子成爲封建思想的“祖師爺”。後來袁世凱、蔣介石、劉少奇、林彪一夥，都繼續尊奉孔子。因爲他們都主張剝削有理，壓迫有理，造反無理。

馮友蘭把近代史上鼎鼎有名的惡人、壞人說成與 2500 多年前的孔子一脈相承，加強了“批林批孔”的氣勢。

楊榮國的批孔是下了功夫的，採用全景式的掃描。但不免有點書生氣，就孔子批孔子，不關劉少奇、林彪的事。楊榮國沒有馮友蘭那份政治敏感，結果吃力不討好。馮友蘭還有一段動情的表態：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縱深發展。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內，正經歷一場新的革命。毛主席親自領導，指示方向。我年近八十，在過去搞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現在還能看見這個偉大的革命，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見，而且還能參加，這是更大的幸福。我決心照著毛主席的指示，……。

馮友蘭的檢討、表態都是有所求的，不像楊榮國，“批孔”就是“批孔”，心無旁騖⁶⁵。馮在請纓，要求參加“批林批孔”，以追求“更大的幸福”。從尊孔到反孔，實現了文革初期所誓言的“起義”。

馮友蘭後來居上，風頭蓋過楊榮國，成了當紅的“批林批孔”明星。另一個“批林批孔”明星是華中的年輕人馮天瑜（1942—），與楊榮國、馮友蘭南北兩個老頭遙相呼應。常有人說馮天瑜是“梁效”的成員，可見風頭之健。其實不是，他根本不是北大或清華的教師，而是華中師範學院的教師，後來是武漢大學教授。

馮友蘭還寫了7萬餘字的《論孔丘》。毛澤東特地介紹：“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況，可以讀馮友蘭的《論孔丘》，馮天瑜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馮天瑜的書比馮友蘭的好。”⁶⁶

馮友蘭如果“採取老實態度”，就繼續做他幾十年來扮演的“當代孔子”“新孔子”；忽然變臉，以“當代孔子”討伐古代孔子、以“新孔子”反對老孔子，就不是老實態度了。但他這樣一來，撈取了“暮登天子堂”的入場卷。一個人難道不可以改變觀點嗎？可以的。事實證明，馮友蘭並沒有改變觀點，而是隨機應變。他早就說了：“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裏尋。”（《贈王浩詩》，1972年）馮友蘭的“道術多變遷”，不是出於自己的內心，其緣故要到外部的“興亡事裏”去尋。楊榮國本來就是反孔的，由他來當批孔的帶頭人，不稀奇。而馮友蘭作為“當代孔子”起來批判古代孔子，這才真正是“值得歡迎”的。

⁶⁵ 後來楊榮國在各地做報告，也不得不談林彪了：“這次，我在北京參觀了林賊的黑窩子，……他大肆宣揚孔孟之道，把孔子、孟子的言論都貼在牆上。對孔子談孝的地方一大段、一大段摘抄下來。可見他要搞法西斯政變，就要宣揚孔孟之道，一旦政變成功，就要大肆販賣孔孟哲學，所以我們要認識批孔重大意義和深遠意義。”（《批判孔子報告》，2頁，中共保定地委宣傳部，1974年。轉引自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371頁，香港，星克爾出版，2009。）

⁶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90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毛主席欽點馮友蘭

林彪葬身沙漠之後，江青以林彪專案組的名義，派遲群、謝靜宜⁶⁷進駐林彪的故居⁶⁸，企圖在他的深宮裏搜出密謀的證據。密謀的證據沒有找到，卻發現林彪頗為重視修身養性。謝靜宜向毛澤東報告，按批劉少奇的標準，說林彪在家裏搞“黑修養”。⁶⁹毛不以為然，這

⁶⁷ 1969年3月，毛澤東派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進駐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新華印刷廠、北京北郊木材廠、北京針織總廠、北郊二七機車車輛廠、北京南口機車車輛廠、北京化工三廠。從此“六廠二校”號稱“偉大領袖毛主席抓的點”。北大、清華“二校”及大批判組，實際由遲群、謝靜宜控制。遲群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謝靜宜任副書記；二人同時又都是北大黨委常委。遲群（1932—1983年），山東乳山人，初中文化程度，8341部隊政治部宣傳科副科長，上尉軍銜。他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鬥死了教育部長周榮鑫，取而代之。1976年10月6日，與“四人幫”同時被逮捕；1983年，被判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同年死於癌症。謝靜宜（1935—2016年），河南商丘人。1953年畢業於中央軍委的長春機要學校（相當於中專）。1959年任毛澤東的機要員。文革中，官至北京市委書記、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因為她可與毛澤東近身，是通天人物，她的實權遠遠超過公開職務。1976年10月6日，謝靜宜與“四人幫”同時被逮捕，法院宣佈“因坦白認罪較好，免予起訴”。時人合稱“遲謝”，兩人的罪行差不多，何以同罪不同罰？以至于官方指定的辯護律師為遲群辯護時都表示不服：“我認為謝靜宜在遲群的整個犯罪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圖，‘四人幫’都是通過謝靜宜轉達給遲群的。如‘3·26’圍攻誣陷鄧小平，就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傳達的，去河南馬振扶公社中學，也是江青通過謝靜宜向遲群佈置的。”李志綏的回憶錄裏有這麼一段：“到1971年8月時，毛對林彪的不信任達到極點。清華大學革委會副主任謝靜宜的丈夫小蘇（蘇延勳）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通過謝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包括‘聯合艦隊’‘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小蘇要毛注意。毛決心南巡，乘南巡的機會和大軍區的領導人及省的領導人打招呼。”（《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512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也許算作謝靜宜的立功表現？但法庭沒有宣佈。不僅如此，謝靜宜後來還發表、出版了《在毛主席身邊》《毛主席給予我們的教育、理解和關懷》《跟隨毛主席在外地視察》《在外地視察的毛主席》等著作，好像沒事人一樣。不知何故？

⁶⁸ 地址是北京市西皇城根北街毛家灣1號。20世紀50年代，此地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的府邸。林彪當上國防部長後遷來，大肆翻修擴建，佔地面積達1.9萬多平方米，建築面積1.1萬多平方米。

⁶⁹ 這是我當時聽北大軍宣隊的人講的，符合謝靜宜的水平。後來她卻改口說，向毛主席報告“林彪有孔孟之道的言論”，顯得有毛主席的水平了。

叫“尊孔”。他善於抓住戰機，決定將林與孔捆綁在一起批。但三言兩語不足為憑，毛要她搞個材料。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找了錢偉長、陶葆楷、史國衡等幾位教授（土八路以為，是教授什麼學問都有了，哪知錢偉長等根本不懂孔夫子），搞了一個材料，只有兩三頁紙。毛看了不滿意，他說：“清華是理工科，你們要找北大文科的教師。”還指名讓馮友蘭參加。後來搞出來的材料他滿意了，說：“你看，還是得找北大的。”果然，對馮友蘭來說，“更大的幸福”來到了！

馮友蘭以檢討、表態俘獲了毛澤東。檢討、表態能俘獲人？是的。這方面的大師當推鄧小平。林彪靠“高舉”“緊跟”擠到毛主席的身邊。“九一三”事件以後，毛知道上當了，他把林恨恨地叫作“政治騙子”。毛對斯諾說：“什麼四個‘偉大’（林彪給毛澤東上貢的四個頭銜：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所以，這一套不靈了。鄧小平就來另一套。他的哲學是“貓論”，為人原則、扮演什麼角色，也是“不管白貓、黑貓”，時而“白貓”時而“黑貓”。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檢討劉鄧路線，因檢討得好，獲與劉少奇“區別對待”。他還當面吹捧林彪：“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作為毛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對我國對世界都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夠肉麻的！

1972年8月，他在江西流放地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後，給毛澤東寫信，表示對林彪“十分氣憤”，同時也表示對自己的錯誤“永不翻案”，希望安排工作。一句“永不翻案”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返京復出。“白貓”逮住了大耗子。但鄧小平畢竟不是毛澤東的對手，毛發覺“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又把鄧再次打倒。粉碎“四人幫”以後，鄧小平梅開二度，也是源於向華國鋒的檢討。他說：“全心全意擁護華主席為黨和國家的領袖”，“可以保證中國至少有15年到20年的穩定時期平安而勝利地踏入第21世紀”。鄧小平再次復出，恢復“三副一總”（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黑貓”又逮住了大耗子。結果，華國鋒的“英明

領袖”當了不到 4 年，就被鄧小平趕下了臺。

毛主席對馮友蘭遲到的關懷

北大校園裏盛傳“毛主席派李訥登門拜訪馮友蘭來了”。傳說不實，但可見眾人眼裏毛主席對馮友蘭何其關懷。事實是，毛主席派謝靜宜問候馮友蘭。還問：“馮友蘭有沒有足夠的地方放書？”謝靜宜立即向北大的軍宣隊傳達。

1957 年，馮友蘭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我住的房子太小，書擺不開，有時候明知道自己有那本書，可是還得跑圖書館。”大概毛主席看到了，可能還記住了，所以 10 多年後，需要馮友蘭的時候，特此垂詢。毛不知道，1957 年提出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文革中又出了新問題。

1957 年的時候，馮友蘭住在燕南園 54 號。燕南園（還有燕東園）是原燕京大學和今北京大學的教授住宅小區，從 50 號到 66 號，均為一幢一幢中西合璧的院落，園中有圓明園總管所立的兩通高大的“花匠碑”⁷⁰，環境優雅，古意盎然。園中住的都是當代的知識精英。有的大學生誓言“奮鬥二十年，住進燕南園”，作為人生抱負。

馮友蘭嫌房子太小。北大的校長、副校長佔了燕南園的幾套大房子。63 號是校長馬寅初⁷¹ 的住宅。他在城內東總布胡同 32 號有一幢

⁷⁰ 司徒雷登建燕京大學時，從圓明園廢墟移來。同時移來的還有西校門門口的一對石獅子、辦公樓門口的一對石麒麟、辦公樓前草坪上的一對華表（另一對華表被移至文津街北京圖書館。操作人員沒有學問，搞錯了，這兩處華表都不成對，但外行看不出來）、未名湖島亭的石橋、湖邊的石魚，均為精美的藝術品。1860 年，英法聯軍在圓明園放了一把火，但圓明園是徹底毀於中國人自己之手。幾十年中，附近農民蓋房子、壘豬圈都到圓明園去就地取材。張作霖還拉走三車皮石材到東北為自己造陵墓。

⁷¹ 馬寅初（1882—1982 年），浙江嵊縣（今嵊州市）人。早年留學美國，在哥倫比亞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1915 年回國，曾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教務長。20 世紀 40 年代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因痛斥國民黨的腐敗，矛頭直指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1940 年被捕，羈押在貴州息烽、江西上饒。1942 年出獄，仍被軟禁在重慶歌樂山。1946 年，李公樸、聞

花園洋房，住在北大的日子不多。燕南園 57 號是副校長、黨委書記江隆基⁷² 的住宅。58 號是副校長湯用彤⁷³ 的住宅。湯用彤去世後，

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後，馬寅初拍案而起，在赴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演講聲援民主運動前，寫下了遺囑。演講中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罪行，並說：“在場的一定有國民黨特務，你們來吧，朝我胸膛開槍吧。”他是一位英勇的民主鬥士。1949 年後任浙江大學校長，在全國率先建立“政治課委員會”。同時，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央人民政府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51 年 4 月，任北京大學校長，向中共中央建議開展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9 月以後，思想改造運動開始。1958 年，針對大躍進的狂熱，馬寅初主張國民經濟必須綜合平衡，提出“團團轉”理論。他還主張，計劃經濟必須實行計劃生育，提出“新人口論”。1959 年，在康生的指使下，北京大學對他的“團團轉”理論和“新人口論”進行批判，並擴大到全國範圍的聲討。馬寅初在《新建設》上發表文章，公開表示：“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到戰死為止，絕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因為我對我的理論有相當的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只能拒絕檢討。”他又是一位無畏的真理衛士。1960 年 1 月，馬寅初被迫辭去北京大學校長職務。20 年後，在平反冤假錯案時期，推翻了對他的批判。1979 年 9 月 14 日，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宣布為馬寅初徹底平反，恢復名譽。教育部任命他為北京大學名譽校長。他幸而高壽，多年沉冤，一朝湔雪。但他對往事已一概忘卻。1980 年，我代表周培源校長去看望他。他問我：“你從哪裏來？”我說：“從北京大學來。”他說：“北京大學，兄弟去過。”他的第一人稱不說“我”，總是說“兄弟”。他當過北京大學校長自己都不記得了。1982 年，“計劃生育”被定為“國策”，宣告馬寅初的勝利。

⁷² 江隆基（1905—1966 年），字盤安，又名泮庵，生於陝西省西鄉縣豐東鄉白楊溝村。1925 年入北京大學。1927 年 6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1929 年 9 月留學日本，入明治大學，同年，因抗議日軍的侵華罪行被日本當局驅逐回國。1930 年任中國社會科學聯合會執行委員。1931 年留學德國，入柏林大學經濟系，任旅德旅歐華僑反帝大同盟書記。1936 年回國，在北京、上海等地從事地下革命活動，兩次被捕。1938 年後歷任陝北公學副教務長、華北聯合大學教務長、延安大學副校長，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副廳長。1950 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1952 年 10 月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是實際上的第一把手。反右運動中，江隆基被指責為“右傾”，經兩個多月的批判後，1959 年 1 月，調任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文革中，他被甘肅省委拋出來。1966 年 6 月 25 日上午，中共甘肅省委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宣佈“撤銷江隆基的黨內外一切職務”；當天下午，江隆基被學生毆打致死。1978 年 4 月，在胡耀邦的督促下，中共甘肅省委為其徹底平反昭雪，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⁷³ 湯用彤（1893—1964 年），字錫予，湖北黃梅人。1916 年，畢業於清華學校。1918 年，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1922 年回國，任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7 年改稱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1925 年任系主任。1926 年轉

由他的兒子湯一介繼承。文革初期，湯一介被打成“黑幫”。他家與馮友蘭家毗連，校外來人揪鬥馮友蘭時，常常把他拉出來陪鬥，因此他自願搬到中關園的平民區避風。

江隆基看到馮友蘭的牢騷後，非但沒有把他打成右派，而且主動提出兩家住宅對調，江隆基一家搬到 54 號，馮友蘭一家搬到 57 號，實際上江家的常住人口比馮家還要多。江隆基是一位懂得教育、愛護知識分子的共產黨領導人。1957 年 6 月 8 日，《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出反右派的信號彈以後，直到 9 月初新學期開學，北大的右派分子只抓了 50 多人，按當時的說法，都是“自己跳出來”的。江隆基被彭真指責為右傾，派陸平⁷⁴ 到北大來糾偏。到 1957 年

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27 年，又回中央大學（1949 年後更名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 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8 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1945 年，任西南聯大文學院代理院長。1946 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8 年 12 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湯用彤被南京政府列入“搶救”南下的名單，他堅守不去。胡適到南京後，寫信勸說，並送機票兩張，湯用彤依然不為所動。1949 年 1 月，兵荒馬亂之際，湯用彤被推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1951 年 10 月以後任北京大學副校長。1955 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湯用彤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受到學界的推崇，代表作為《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

⁷⁴ 陸平（1914—2002 年），原名劉志賢，又名盧荻，吉林長春人。1933 年，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1934—1937 年在北京大學教育系學習，任北京大學學生會執委、北平市學聯執委，積極投入“一二九”學生運動。抗日時期，擔任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全國總隊部組織部長、華北隊部隊長，中共中央北方局晉察冀分局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共冀察熱遼區黨委秘書長等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察冀軍區政治部主任、華北野戰軍三縱隊政治部主任等職。1949 年後，任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常委、青工部長，鐵道部政治部主任兼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鐵道工委書記。1952 年 12 月任哈爾濱鐵路管理局（原中長鐵路管轄範圍）局長兼黨委書記。1954 年任鐵道部副部長。1957 年 10 月 18 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10 月 26 日被任命為北大黨委第一書記。馬寅初“辭職”後，1960 年 3 月，陸平任校長。1966 年 6 月 1 日，毛澤東批發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 7 人的大字報，北大黨委成了“黑幫”；6 月 4 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北京新市委決定，撤銷陸平的一切職務。1975 年 7 月，陸平重新工作，任第七機械工業部（後改為航天部）副部長、部黨組副書記。1983 年 6 月後歷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教育文化委

底，又抓了右派分子 500 多人，都是“深挖”出來的。1958 年 1 月，根據彭真的指示，還要“補課”，再抓 100 餘人。最後公佈的右派分子總數是 699 人，多出 14 倍。（1980 年，為右派分子改正時，處理了 716 人。實際尚不止此數。當時找不到人、又無家屬申訴的，屬於“不需要處理”一類。還有“內定右派”“實質右派”“漏網右派”，實際上享受了右派待遇，而又無帽可摘、無反可平。右派總人數應在 800~900 人之間。按當時的在校人數，比例超過 10%。）北大走上了左傾的道路。實事求是地說，陸平是個能幹人，做起報告來比江隆基吸引人。但在左傾的潮流下，越能幹越“左”。周培源對他的評價是“三亂”：“亂說，亂批，亂搞。”

馮友蘭在城內也有一所大房子，地址是什剎海旁的白米斜街 11 號。此處原是晚清重臣張之洞的府邸。20 世紀 40 年代，張之洞的後人售予馮友蘭。馮自居後院，將前院出租，租客都是文化人，出人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周培源一家住燕南園 56 號。後來雖然當了校長，並沒有搬進大房子。

文革前，北大教授的住所比較寬敞，而年輕教師結婚多年依然住集體宿舍。文革中，教授們有的自願、有的被迫讓出一兩間，讓年輕教師搬進去住。也有年輕教師和職工破門而入擅自佔領的。馮友蘭家最多時入住了 6 對年輕夫婦，可見房間之多。毛主席發話後，馮家倒沒有什麼表示，可恨的是北大軍宣隊的頭頭，限時限刻命他們立即搬出。

毛主席還有指示：要北大領導為馮友蘭配備一名助手，幫他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寫作。1949 年，馮友蘭給毛主席寫信後，心中不滿：“……更使我失望的是，主席沒有回答我重新寫中國哲學史的問題。”好了，20 多年後表達遲到的關懷。軍宣隊忙亂一陣，毫無頭緒。因為他們既沒有學問，又不認識有學問的人，只好請眾人提名單。湯一介推薦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孫長江。文革中，人民大

員會副主任。

學被撤銷，一部分人轉來北大，一部分人在家賦閑。孫正是賦閑者。軍宣隊向從人大轉來北大的教師李德良、秦錫瑜⁷⁵ 徵求意見，問：“孫長江這個人怎麼樣？”他們回答說：他是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就是人民大學的郭羅基，郭羅基就是北京大學的孫長江。軍宣隊一聽就明白了，別的不用說了。此議告吹。

文革前，北大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一位年輕教師，名莊印，曾為馮友蘭的助手。馮交給莊印的任務是找馬、恩、列、斯、毛的語錄，貼在他的書稿的相應段落。馮友蘭自詡，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是“寫我自己在現有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上對於中國哲學和文化的理解和體會”。他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是莊印從書堆裏找出來、貼上去的。文革中，莊印跟著遲群發達去了，當上了遲的秘書。他有先天性心臟病，太賣命，不到 40 歲就死了。馮友蘭很痛惜，他早就想找一個莊印的接班人。孫長江如果是“郭羅基式的人物”，我想，他決不會擔當莊印的任務，幫馮友蘭塗脂抹粉，把他打扮成“馬克思主義水平上”的哲學家。後來，孫長江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修改定稿者。此時，孫長江和郭羅基互不相識；粉碎“四人幫”後，彼此都“但願一識韓荊州”。“郭羅基式的人物”孫長江和“孫長江式的人物”郭羅基成為至交。

軍宣隊沒有為馮友蘭找到合適的助手，馮友蘭自己找了一個，他是 1949 年畢業的老清華哲學系的學生涂又光⁷⁶。涂又光比莊印有學問，成就了馮友蘭晚年的著述。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說：“余亦屆耄耋，耳目喪失其聰明，為書幾不成字。除了四、五、六章外，

⁷⁵ 李是哲學系革委會副主任，秦是哲學系黨總支副書記。原北大哲學系的矛盾複雜，但矛盾雙方都有反黨委的前科，故軍宣隊一律不用，重用這兩個外來和尚。工農兵學員給李德良取了一個外號，叫作“湯司令”。我不解其意，詢之。他們反問：“你看過電影《地道戰》沒有？”“看過呀。”“那裏面是不是有個湯司令？”我恍然大悟。那個湯司令是偽軍司令，給老百姓訓話，講一句就回頭看看皇軍的臉色。李德良在全系大會上講話，講一句就回頭看看軍宣隊、工宣隊的臉色，活脫脫一個“湯司令”。

⁷⁶ 涂又光（1927—2012 年），河南光山人，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教授，在先秦哲學和中國教育史研究方面頗多成就，著有《楚國哲學史》《中國高等教育史論》等。

皆余所口述，原清華大學哲學系涂生又光筆受之，於書之完成，其功宏矣，書此志謝。”⁷⁷ 寫下這番話是 1981 年 11 月。從 1981 年到 1990 年逝世，馮友蘭幾乎耳聾眼瞎。他自己說，著書是靠“反芻”，閉著眼睛咀嚼以往學過的東西。所謂“口述”，馮友蘭不過說個寫作意圖，寫作意圖也只是大概。查閱資料，書寫成文，都是涂又光的事。得初稿，涂又光反過來“口述”給他聽。實際上，涂又光不是“筆受之”，而是合作者。涂還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英語）譯成漢語，譯文較趙復三的譯本為優，是經馮友蘭本人認可的。馮友蘭去世後，涂又光將馮友蘭的著作編纂成《三松堂全集》，共 14 卷。馮友蘭本人和馮友蘭家人，對涂又光的貢獻均估量不足，而涂又光則人不知而不懼。

⁷⁷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2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第六章

“批林批孔”大開張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人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為自己效勞，借用他們的名字，穿上他們的服裝，運用借來的語言，演出歷史的新場面。¹ 馬克思說的是 19 世紀 60 年代的法國，卻對於 100 多年後的中國更為貼切。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革命，還是沒有擺脫先輩傳統的夢魘。毛澤東穿上了秦始皇的服裝，借用法家的語言，演出“批林批孔”的歷史新場面。

奇特的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1974 年元旦，“兩報一刊”社論《元旦獻詞》指出：“黨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討論，埋頭於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什麼是大事？“要繼續深入搞好批林整風，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就從“批林整風”過渡到“批林批孔”。“批林批孔”就是本年度的大事。這些斷語都是沒有論證的。為什麼“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明顯的是，發出威脅：誰不抓“批林批孔”這一件大事，就是“要搞修正主義”。“大事不討論……勢必出修正。”本來是針對周恩來的。12 月 24 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姚文元起

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669 頁，2012。

草的這篇社論時，會議還是周恩來主持的。他隱忍不發，另有一功。

1973年，討論準備召開中共十大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據毛澤東關於“批孔”的詩和談話，主張將“批孔”、批“尊孔”寫進十大的政治報告。主持會議的周恩來當場拒絕，但話說得很委婉，以這個問題“還需要消化一段時間”為理由。故十大的政治報告提出的今後任務，第一條就是搞好“批林整風”，通篇沒有“批孔”的字樣。耿飈在中共中央聯絡部的會議上透露：總理看到《光明日報》送審的一次清樣說：“看來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還沒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²周恩來在抵制“批孔”。為什麼？他沒有透露，只做不說。接下來“批林批孔”大戲開場了！

不是說“中央還沒有正式文件”嗎？馬上給你來一個。1月12日，王洪文、江青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報給毛主席，要求轉發全國，開展“批林批孔”運動，信中說：“我們看了北大、清華彙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覺得這份材料對當前繼續深入批林批孔會有很大幫助。”還說“各地也迫切需要這種簡明扼要的材料”。實際上，各地全然不知毛已暗中決定要搞“批林批孔”，根本談不上什麼“迫切需要”。毛批示“同意轉發”。這個材料本來就是毛授意搞的，而且他早已審閱修改過，毛與江在演夫妻二人轉，拉上一個王洪文做配角。宋柏年公開發表的文章中說：“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開始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幾經反覆修改，定稿後直接送毛主席審閱。毛主席對材料內容、先後次序、按語等作了調整。”³據謝靜宜說：“《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編好之後送給了毛主席，主席逐字逐句仔細審閱並指示我通過北京市委組織系統報到中央。”⁴毛要掩飾自己的真實角色。先是授意北京市委上

²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5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³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⁴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40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報，實際上此事與北京市委毫無關係。後改由江青、王洪文上報。除了毛澤東自己，誰能改變他的授意？

1月18日，《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197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發出。中共中央的通知中，把王洪文、江青信中的那句話改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選編的這個材料，對於繼續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會有很大幫助。”毛念念不忘的是藉批孔來“批判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中共中央通知還摘引《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前言中的一段話，加以強調：“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叛徒、賣國賊林彪，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歷代行將滅亡的反動派一樣，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為陰謀篡黨奪權、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武器。”一個什麼“材料”，作為中共中央的文件，而且是一年開門紅的“一號文件”，前所未有的。

過了兩天，1月20日，中共中央又發出《補充通知》，在傳達、學習、討論中共中央1974年一號文件時，對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增加一批學習文件和文章，分三個單元：第一單元是毛澤東著作，有《我的一點意見》《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等；第二單元是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鬥爭》（材料之一、之二、之三）；第三單元是重要文章，除了“梁效”“羅思鼎”“唐曉文”的文章，也有楊榮國的文章，還有馮友蘭的文章。馮友蘭的文章居然列入中共中央文件，規定為必讀。

中共中央的這兩個《通知》，將半年以前中共十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的頭號政治任務“批林整風”運動輕易地改為“批林批孔”運動，推向全國。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怎樣炮製出來的？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遲群、謝靜宜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糾集一夥人炮製出來的。

1973年10月，遲群和謝靜宜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一個秘密

會議，由北大和清華的各 6 名教師參加，組成一個“批林批孔研究組”，北大有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⁵、湯一介、范達人、徐琳，清華有王世敏、史國衡、王朝文等。因為搞出《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後來也叫“材料組”。參加者不得為外人道，連本人所在的黨組織也不得與聞。研究組成員都認為，原清華大學錢偉長等人搞的材料不足以證明林彪尊孔，於是二進宮，到林家大院中苦苦搜索。凡是林彪、葉群留有的字跡都抄錄下來。在林彪的臥室牆上掛的和在一個瓷缸裏找到的林彪書寫的條幅：“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研究組認為：“這就是林彪尊孔的鐵證！”林彪的“克己復禮”是什麼意思？本人沒有解釋。研究組判定：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這一斷語的前件與後件是矛盾的。如果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只能復辟“三代”，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如果林彪“妄圖復辟資本主義”，不可能“效法孔子”，因為孔子的時代還沒有資本主義。這裏，“梁效”運用了他們的顧問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復辟什麼？把復辟的內容抽象掉，只要斷定林彪搞復辟，就是“孔孟之道”。那麼，林彪搞復辟有事實、有證據嗎？沒有，什麼都沒有。

林彪在進黃埔軍校之前，是一個初中生，他的文化修養還不足以通讀古籍。在戎馬倥偬的年代，他征戰在前線，無書可讀，不像毛澤

⁵ 周一良（1913—2001 年），祖籍安徽東至，出生於山東青島。父親周叔弢是民族資本家，也是文物古籍收藏家。周一良幼年時，家中聘請塾師，教授古文經典。他沒有上過小學、中學，1930 年，直接入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科；1932 年，轉入燕京大學歷史系；1935 年，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肄業。1936 年，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39 年到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院遠東語文系，主修日本語言文學，並學梵文；1944 年獲博士學位，任哈佛大學日語教員。1946 年回國，任燕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1947 年任教授；1949 年轉任歷史系教授、系主任。1952 年院系調整後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歷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亞洲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系副主任、主任。1952 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56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周一良的學術專長是魏晉南北朝史研究，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論集》（1963）、《魏晉南北朝史札記》（1985）。文革前，他與吳于廑合作主編《世界通史》；80 年代，主編《中外文化交流史》。有了“梁效”的經歷，周一良寫出《畢竟是書生》，感歎身世。

東還可以在後方的窯洞裏挑燈夜讀。在位高權重的年代，他養尊處優，有書不讀。毛家灣藏書 7 萬多冊，林彪絕大部分沒有讀過，甚至沒有碰過。書多不讀，假充斯文而已。藏書中的儒家經典“四書五經”，根本沒有閱讀的痕跡。林彪的讀書方法很特別。他要讀哪本書，先讓秘書或圖書管理員將書中要點和警句抄成卡片，他只讀卡片不讀書，所得知識是經別人過濾的；而且 47 個卡片箱也只翻了一小部分。說林彪如何“尊孔”、景仰“孔孟之道”，未免過於抬舉。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前言還說林彪“尊孔反法，攻擊秦始皇”，但林彪“反法”的言論一條都沒有。

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題目是毛主席定的，格式也是毛主席定的，毛主席拿出一張紙，中間折開，給謝靜宜交代：一邊是林彪的話，一邊是孔孟的話，兩相對照，再加上按語，予以批判。”⁶毛澤東只想扮演批准轉發材料的角色，而掩蓋幕後操縱炮製材料的角色。愚蠢的“四人幫”、遲謝和“梁效”卻把內情一一抖落出來，以至於想要為毛開脫都很困難。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6月）（以下簡稱《決議》）中說：

1974 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⁷

《決議》是胡喬木起草的。這個刀筆吏用詞很講究。他寫道，“批林批孔”是江青、王洪文等“提出”的，毛澤東只是“批准”而已，於是開展運動。他截取了過程的一個片段。在江青、王洪文“提

⁶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⁷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單行本），2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出”之前，毛澤東早就提出了；而且江青、王洪文的“提出”也是毛澤東授意的。按《決議》的說法，“批林批孔”的矛頭“指向周恩來同志”，責任全在“江青等人”，好像與毛澤東無關。這一段論述與事實完全不符。江青、王洪文只不過將《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報請毛主席，轉發全國，不是“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提出“批林批孔”決策的是毛澤東，《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正是根據毛的決策炮製出來的，而且炮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毛是全程參與的。毛批評“四人幫”，是有這麼回事；但阻止或扭轉“四人幫”興風作浪的“批林批孔”運動，從來沒有。《毛澤東傳》中也說：“他（毛）並沒有提出在中央的全盤工作中突出‘批孔’問題，更沒有主張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⁸但事實上，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將《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為1974年一號文件批發全國，推動“批林批孔”運動，毛既是幕後的操盤手，又是前臺的發令人。《決議》和《毛澤東傳》意欲為毛開脫，顯然是徒勞的。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一份什麼樣的材料？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將近3萬字，分八個部分，標題是：

- 一，效法孔子“克己復禮”，妄圖復辟資本主義；
-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論，陰謀篡黨篡權；
- 三，宣傳“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觀，惡毒誣蔑勞動人民；
- 四，宣揚“德”“仁義”“忠恕”，攻擊無產階級；
- 五，販賣“中庸之道”，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
- 六，用孔孟反動的處世哲學，結黨營私，大搞陰謀詭計；
- 七，鼓吹“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剝削階級思想，攻擊

⁸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8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採取對比式排列，左邊是“林彪”，右邊是“孔孟”。“林彪”部分大約只有一半是林彪的，其餘為陳伯達言論（13條）、《“571工程”紀要》（林彪是否看過，未有確證，更談不上是否同意）中的摘錄（5條）、葉群言論（4條），還有吳法憲的揭發材料（1條）。就林彪的言論而言，大多是從條幅、眉批、卡片⁹上摘引的隻言片語。有幾段連貫的敘述，卻是1945年林彪在中共七大的發言。難道在1945年還沒有取得政權的時候，林彪就幹起“復辟”的勾當來了？那麼後來為什麼又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載入黨章的法定接班人？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第一條，“林彪”與“孔孟”都有“克己復禮”四個字，還算沾一點兒邊：

林彪	孔孟
悠悠萬事	克己復禮爲仁。
唯此爲大	一日克己復禮，
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
書贈葉群同志	《論語·顏淵》
育容（即林彪）	
一九六九·十·十九	
（條幅，林彪臥室）	

“梁效”對“孔孟”的譯文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

⁹ 徐景賢曾兩次參觀林家大院，他在《十年一夢》中寫道：“聽說這些卡片是林彪的秘書兼圖書管理員摘抄的，而林彪自己則不讀書、不看報，每天聽聽文件，所以卡片上的觀點不能代表林彪的觀點。後來，江青要清華、北大兩校的大批判組，從這些卡片裏摘出不少孔、孟的論述，對照林彪的言論，編成材料，加上按語，印發文件，作為批林批孔的‘靶子’，實在是牽強附會的。”（251頁，上海，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於周禮，這就是仁。一旦這樣做了，天下的人就會歸順你的統治了。”同一段話中兩個“仁”字，卻有不同的譯法，前一個“仁”字譯作“使自己的言行符合於周禮”，後一個“仁”字譯作“天下人就會歸順你的統治了”。¹⁰ 不是太隨心所欲了嗎？因為他們具有免於批評、指責的特權，誰也奈何不得。

好不容易找到“克己復禮”四個字，“林彪”與“孔孟”是相同的，但編者對“林彪”的解釋，又表明“林彪”與“孔孟”不沾邊：

按：“克己復禮”是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林彪和葉群從1969年10月到1970年1月，在不到3個月內，連續寫了以上四條。這充分暴露了他們迫不及待地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野心，把復辟資本主義作為萬事中的大事。

孔子的“克己復禮”是復“三代”之禮。且不說復“三代”之禮是不是“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¹¹，就算是吧。林彪的“克己復禮”是什麼意思？本人沒有解釋。¹² “梁效”斷定“克己復禮”是

¹⁰ 以前馮友蘭對“仁”的解釋與此二者都不同。他說：“針對封建領主的等級制度，孔子所提倡的‘仁’，還是有很大的進步意義的。它要求人以人的資格，承認於‘己’之外，還有與己相對的：‘別人’。它要求人互相承認對方有獨立的意志，有與自己相同的人格。”（《孔子思想研究》，《新建設》，1954年4月號。）

¹¹ 毛澤東說：“我贊成郭老（沫若）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為界。”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主張，中國古代社會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劃界在春秋、戰國之間。按毛澤東所贊成的郭沫若的主張，春秋仍是奴隸制時代。生活在春秋奴隸制時代的孔子提出“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此話根本不通。

¹² 朱永嘉的《林彪讀懂〈論語〉了嗎？》認為，林彪是讀不懂《論語》的。他對林彪的“克己復禮”有一種解釋：“客觀地講，林彪在家裏書寫這個條幅，是要與葉群一起約束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是在家中對自己廬山會議莽撞行事的一種反省。而梁效編這一材料把意思說反了，說是林彪欲借孔孟之道搞復辟。現在想來，這樣的解釋不妥帖。不能因為林彪後面的表現，一切都往壞處想，以此把批林與批孔聯繫在一起，便顯得生硬了。”這裏，時間上有出入，林彪書寫條幅是在廬山會議之前，但基本的分析是能夠成立的。“克己復禮”應是在毛、林矛盾中林彪和葉群的自警自策之詞。朱永嘉是“羅思鼎”的負責人。他如能在當時指出“梁效”的“不妥帖”，就好了；如能同時指出“羅思鼎”的“不妥帖”，那就更好了。辛子陵在他的書中記載，1969年，所謂“林副主

“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¹³怎麼能說“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是來自於“復辟奴隸制的反動綱領”？總之，“梁效”的批判，道理上說不通，事實上不成立。偉大的統帥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副統帥林副主席何曾有過堅持社會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鬥爭？

其他“林彪”與“孔孟”的對比，都是牛頭不對馬嘴。例如“林彪”中的一條：

天馬行空，獨來獨往

林彪贈葉群

六二・六一

(條幅，林彪臥室)

“孔孟”中用來對比的是：

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

《孟子・公孫丑下》

“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是儒家思想嗎？“天馬行空”語出元人劉廷振所作《薩天錫詩集序》：“其所以神化而超出於眾表者；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薩天錫即薩都刺（約 1272—1355 年），他的詩詞大多虛無歷史，優遊求仙。說它是道家思想還差不多。¹⁴林彪

席第一號命令”，毛澤東把它燒了。消息傳給林彪，其惶恐不安。當日，他寫了兩張“克己復禮”的條幅，一張掛在自己的起居室中，另一張送給葉群。辛子陵評說：“林彪這裏突出‘克己復禮’的意思，是深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對毛澤東的謙恭和尊敬，不可越位，不可越權。後來‘批林批孔’中那些批判‘克己復禮’的文章，是隔靴搔癢，言不及義。”（《紅太陽的隕落》，第 6 版，下卷，574 頁，香港，書作坊出版，2010。）“梁效”還不是“隔靴搔癢，言不及義”，而是反其意而用之。

¹³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公然宣稱：“如今批判‘克己復禮’一詞最時行，殊不知許多解釋是經不起推敲的。至於林彪寫‘克己復禮’這張條幅，……究竟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的‘己’和‘禮’又何所指？我看除了問他自己，別人難以解釋。”見第八章。

¹⁴ 林彪本人有贊揚道家的言論。網上流傳的《中央在內部單位逐步解密〈林彪日

未必讀過薩都刺的詩和劉廷振的序，“天馬行空”是從陳伯達的題詞“天馬行空，猛志常在”中檢來的。連《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編者，這些文史哲名家也未能註明“天馬行空”的來歷¹⁵。“梁效”的註說“天馬”是《史記·大宛傳》所記載的一種神馬，“天馬行空”一語只註了“天馬”兩個字，註與被註不相干。按劉廷振的意思，“天馬行空”是出神入化、步驟不凡。“梁效”在註林彪的“獨來獨往”時，說語出道家《莊子·在宥篇》，用來對比的又是儒家《孟子·公孫丑下》。“天馬行空”與“平治天下”怎麼能相當？一為出世，一為入世。難道僅僅因為都有一個“天”字？

統攝這一材料的標題是“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論，陰謀篡黨奪權”。這就更為離奇，從“天馬行空，獨來獨往”怎麼能演繹出“天才論”和“篡黨奪權”？

以往被認為“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林彪的警句“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這樣的天才，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前面隱去了“毛主席”三個字），現在也列入了“林彪與孔孟之道”。那麼，是不是還要談談“毛澤東思想”與“孔孟之道”是什麼關係？

還有更可笑的。林彪寫給女兒的“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頭”、寫給兒子的“學習韋編三絕的治學精神”，都作為“孔孟之道”受到批判。這一節的標題是“教子尊孔讀經，夢想建立林家世襲王朝”。

總之，對這個《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評論只能是八個字：“雜亂無章，牽強附會。”重要的是由誰來解釋。

記》，內容太驚人》，其中 1969 年 10 月 17 日林彪講道：“中國歷史上有很多偉大的學說，儒家重賞，法家重罰，道家賞罰分明。所以我相信道家比別的好一點。道家講究養生，我覺得有意思。我不想幹更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

¹⁵ 宋柏年說：“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是甚麼意思、出處為何？都要聽他們的意見。然後一些中青年的老師再去圖書館查書、起草按語。”“他們”就是指魏建功、周一良、馮友蘭這三位文史哲名家。見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 年 9 月 1 日。

《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是經馮友蘭審閱定稿的。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及用“梁效”（兩校）、“柏青”（北大、清華）等化名，一連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北京大學學報》等報刊上發出 10 多篇文章，諸如：《林彪與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的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孔丘其人》等。“梁效”是《林彪與孔孟之道》的編者，又壟斷了解釋權。這些文章也大多經馮友蘭審閱、修改。這些材料和文章，按馮友蘭的學問，完全能夠指出破綻和荒謬；按馮友蘭的人品，必須維護和修飾。這就是列寧所說可以為任何人服務的“賣淫文人”；這種人的全部學問都用來“賣淫”。

江青放出“炮隊”

1974 年 1 月 23 日（農曆大年初一），江青顯得格外興奮，她把遲群、謝靜宜、蘇延勛（謝靜宜丈夫，空軍黨委辦公廳副處長）等人找去談話，說：“我這個人愛放炮，是個炮手，又造炮，又造炮彈，又有炮隊。現在就把你們當炮隊放出去，替我放炮。”¹⁶ 派他們以“江青同志”的名義到處送“批林批孔”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放火燒荒”“點火放炮”。林彪、林立果有“小艦隊”，江青有“炮隊”；“小艦隊”手握槍桿子，“炮隊”手握筆桿子，各有千秋。

江青和王洪文各自以個人名義給中央軍委、外交部、中共中央聯絡部、軍委空軍、國防科委、中國科學院、2081 部隊（20 軍）防化連、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人民公社等單位寫信送了材料。¹⁷ 江青給防

¹⁶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3 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48 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又見《歷史的審判》（續集）中，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公訴人趙世如對被告人遲群所犯罪行的發言（51 頁，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¹⁷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

化連的材料是派遲群、謝靜宜送去的，信中煽動“揭發上級領導機關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大是大非問題”。

1月24日，江青擅自召開中央軍委機關和駐京部隊的萬人大會，會議的中心就是宣讀江青給中央軍委和全軍指戰員關於開展“批林批孔”的一封信，信中說：

相當長的時間了，從許多材料看來，全國範圍內的批林整風運動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則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體系和孔老二的關係，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林彪與孔孟之道》和《名詞簡釋》是可以幫助全體同志們解決這個問題的。因此我特請謝靜宜、遲群二位同志向全軍指戰員宣讀中央的通知。他們已下過連隊蹲點，取得經驗，可能對全軍有所幫助。有什麼問題報中央，我們也要和同志們一起學習，我們將努力解答同志們提出的問題。

批林批孔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大事，這是使國內外帝修反驚恐的事，全國黨、政、軍、民、學通過這個學習，會取得更大的團結和勝利！

.....

毛主席說要能文能武，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學得文武全才，方能完成毛主席、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接著由遲群、謝靜宜這兩個沒有軍隊領導職務的人做主要發言，宣讀中共中央 1974 年一號文件，講解《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江青在軍中沒有職務。同日，張春橋（兼總政治部主任、軍委委員）將江青的信批轉主持軍委工作的葉劍英：“建議軍委議一議，如何抓好批林批孔，並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實。”

“一二五”大會露崢嶸

第二天，江青又以傳達中共中央 1974 年一號文件為名，擅自召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幹部萬餘人在北京體育館舉行“批林批孔動員大會”，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五”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事先不知，臨時匆忙參加。但他爭取主動，一來就主持會議，不過他根本不知道會議的內容。他在大會上公開表示：

“我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不夠敏感，有點思想落後於形勢。幸好江青同志敏感，我應該檢討自己的思想，”¹⁸ 江青以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姿態，控制會場。她說：“今天是動員批林批孔的大會，要全國動員起來。這場批判運動，不是放空炮，要有的放矢，要緊密聯繫實際。我們有沒有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呢？這個問題大家要動腦子，想一想。”名曰“批林批孔”，既不“批林”，也不“批孔”，而是要揪“代表孔老二式的人物”。

會議的內容還是由遲群、謝靜宜宣講《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遲群說：

這個材料是在我們主席、江青同志直接關懷下編寫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體地指導下編寫的，像抓樣板戲一樣，指導我們一遍又一遍地改。江青同志是建議叫組織一個老中青三結合的一個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這方面有研究的，作點顧問。當時北大、清華組織了一個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說，北京大學的馮友蘭、周一良、魏建功，清華大學的王世敏、石國洪（應為史國衡）……。¹⁹

¹⁸ 《周恩來、江青、遲群、謝靜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月25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存。

¹⁹ 宋柏年說：“梁效……其中有三個人是由毛主席親自提名調進的，而且是梁效最早的成員。他們是：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而遲群說，這三個人是“江青同志提名的”。誰知道呢？

謝靜宜和遲群一吹一唱：

這個過程是這樣的：就是當我們向毛主席匯報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論的時候，主席說，噢，凡是反動的階級，主張歷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問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論或類似的語言？主席讓我們，就是讓我和遲群同志搞一個材料送給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遲群同志就召集幾個同志議了一下，整理了一個初稿，這個稿子只有兩三頁，送給了主席，也送給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後，立即找我們去了，就是說，給我們提了意見了，感到東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我們要到毛家灣去，找資料，所以這樣一來，東西就多了。他們那個裏頭的大瓷缸裏頭的東西，條幅，還有掛的條幅、橫幅，我們反正到那裏翻箱倒櫃呀，東西很多。材料這樣就豐富了。後來就編了一本，送給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仔細，連封皮標題，就是封面那個標題，前言，內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別是在內容方面。

遲群說了幾句，謝靜宜又接著說：

看得很細，給我們作了指示。把我們叫去之後，講了，肯定了這個材料比上次內容豐富多了，但是編得還比較亂，就是要分類，要通俗易懂，為工農兵著想，應該還編上一個簡釋出來。還給我們指出，有些地方不夠準確，所以要查，要核實。我舉一個例子，比如“天馬行空”，我們只查到了漢，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後還要查。²⁰

他們的來頭不是毛就是江。“批林批孔”這種推行全國的重大政治事件到底是怎樣決定的？國家大事成了毛江夫妻檔的家務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這一憲法規定早已作廢了。就

²⁰ 《周恩來、江青、遲群、謝靜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月25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存。又見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第6版，下卷，652頁，書作坊出版，2010。作者是“一二五”大會的參加者。

算共產黨一黨專權，也不是黨在做決定。黨的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並沒有參與發動“批林批孔”的決定，相反，他還是被決定的，成為運動影射的對象。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只此中國一家，舉世無雙；要說“中國特色”，中國從前也沒有，又是史無前例。

謝靜宜在會上講到馮友蘭：

另外，我還再講一遍，就是對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關心的。聽我們說到，就是說北大馮友蘭也寫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讓我們回去，說你回去拿，拿回來，給我看一看。所以我們當時就回去了，然後返回，把那一篇馮友蘭的文章拿來給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氣把它看完。很長吶，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鏡把它看完吶，一直都沒有休息，而且還看出了裏頭那些標點錯了，叫我們去改一改，很細。第二篇文章也是這樣的。第二篇馮友蘭的文章出來之後，又送給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總是看到這些老人的進步，主席是很高興的，哪怕是微小的進步主席就肯定。而且這兩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轉發了。

遲群強調了“批孔”的意義，“批林”結合“批孔”才能坐實林彪集團的極右實質：

批孔是批林的深入。中外反動派和歷次機會主義的頭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個組成部分。批林結合批孔，要從階級立場，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從哲學觀點，理論基礎和意識領域的階級鬥爭等方面來認識林彪與孔孟之道的關係，這樣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極右實質。²¹

在遲群、謝靜宜講話的過程中，江青、姚文元頻繁插話，說“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中主義”“凡是主張中庸之道的

²¹ 《周恩來、江青、遲群、謝靜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月25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存。

人，其實是很毒辣的”。他們所說，都是指向周恩來的。

謝靜宜發言時，批評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發出的《關於在部隊中批判孔子的意見》。當她唸到其中注意“批孔的口徑”“批什麼問題，批到什麼程度，一定要以中央報刊為標準，不要亂批，不要亂提口號，不要亂點名”，江青緊接著說：“屁話！就是主席講的‘屁話’。”²²

江青等人在“一二五”大會上全面出擊，他們叫喊“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修，不鬥則垮”。

江青寫過一首五言詩：

江上有奇峰，
鎖在煙霧中；
尋常看不見，
偶爾露崢嶸。

“一二五”大會就是她露了一下“崢嶸”。

1972年8月12日，江青將此詩寫在“廬山漢陽峰”照片背面，贈紐約賓翰頓大學助理教授羅克珊·維特克（Roxane Witke）。維特克將採訪江青所得寫成《江青同志》（Comrade Chiang Ching）一書，題詩作為插頁。維特克猜想，詩可能是毛澤東所作，非也。“一二五”大會後，江青又將照片和詩交《中國攝影》發表，署名“瑤琊石”。²³

“三箭齊發”

遲、謝的解釋，突出“抓大事”“反復辟”的主題，影射周恩

²²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976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²³ 山東臨沂古為瑤琊郡，產優質石材，稱瑤琊石，可製名硯。江青生於諸城，母為臨沂人，以“瑤琊石”自喻。

來：不抓大事，埋頭小事，就會“變修”；直指 1972 年的反極左是“右傾回潮”，是“復辟”。一再強調“批林批孔”要“聯繫實際”，批判的鋒芒指向站在工作第一線的周恩來、葉劍英和一大批黨政軍負責人所從事的“實際”。

遲群、謝靜宜“聯繫實際”，突出反“走後門”。遲群說：

還有那個走後門問題，批林批孔不要聯繫嗎？那完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背叛，對毛澤東思想的背叛。至於走後門問題，不只是這一個問題了，現在還有的單位問題比較嚴重。譬如說，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國語學院），很值得檢查。

謝靜宜說走後門是“孔老二的思想”，可笑。據說“幾千年的封資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把一些人就給俘虜了”。“封資修”並存了幾千年了嗎？亂說。她又說：

毛主席對關於杜絕走後門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批示，你知道嗎？（事實是毛主席本人就走後門）有些人總是口口聲聲說他忠於毛主席，但是不照指示去做。某一個領導人，為了讓自己的子女當兵上大學，什麼一個批示，一點頭啊，一個電話，比毛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²⁴

謝靜宜說的“某一個領導人”指的是葉劍英。1月30日，葉劍英向毛主席送上了檢討。張春橋的女兒不但利用關係參加了解放軍（本來應該下鄉去農村），還進了大學，²⁵卻不用檢討。毛對葉的檢討復信說：

劍英同志：

此事甚大，從支部到北京牽涉幾百萬人。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

²⁴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²⁵ 《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話》，下冊，673頁。

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批走後門，三箭齊發，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毛澤東
七四年二月十五日²⁶

因為毛說：“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下發。”張玉鳳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周說，有的省已經發了，不過，我可以馬上通知他們不要放錄音，沒發的就不發了。

張春橋嘲諷葉劍英：“用檢討的辦法來告狀，這也是一大發明。”²⁷

為什麼“批林批孔”不應“夾著批走後門”？毛辯解道：“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進來的也有壞人。”毛偷換了命題。“走後門”是合法與不合法的問題、正當與不正當的問題，他把它說成好人與壞人的問題。難道只要是好人，“走後門”就是合法的、正當的？實際上他在縱容“走後門”。毛之所以反對“批走後門”，因為批到他頭上了。毛在政治局會議上說：

走後門這樣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指王海容、唐聞生²⁸），我也是一個，我送了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她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上大學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謝靜宜）不得不

²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7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²⁷ 范碩等：《葉劍英傳》，623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

²⁸ 唐聞生（1943—），中國首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唐明照之女，生於美國紐約，1950年回國。1964年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學院；1965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曾任美大司副司長。她也是外交部的“五朵金花”之一。70年代參與基辛格秘密訪華和尼克松訪華等重要外事活動。她和王海容一起，在毛遠新當“聯絡員”之前，是毛澤東和政治局之間的“橋樑”。粉碎“四人幫”以後，到外交部“五七幹校”勞動。後任鐵道部外事司司長、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副主席、宋慶齡基金會副主席等職。

收，這些人不是壞人。²⁹

毛說的很清楚。走後門的有成百萬，“批林批孔都要這些人來幹，沒有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要反走後門，“批林批孔”還搞不搞？走後門的通行證是特權。文革的發動是為了反“走資派”，“走資派”即毛澤東所說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即特權階級。革命的結果，特權更流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革命的意義何在？

毛說的又不清不楚。這“幾個女孩子”與你是什麼關係？為什麼“沒有辦法”、一定要送她們上大學？毛送這“幾個女孩子”上大學，都是遲群、謝靜宜經手的，他們還好意思反“走後門”。我們哲學系就有一個這樣的“女孩子”，長得高高大大的。她本是江西廬山賓館的服務員，小學沒畢業，上課聽不懂。有人問她：“你是怎麼推薦上來的？”（工農兵學員的錄取不是憑考試，而是經“推薦”）她說：“你去問謝靜宜。”她向同學們出示“毛主席送的手錶”，人們還不相信：“毛主席為什麼要給你送手錶？”她又出示“毛主席送的手絹”，上面有毛澤東的簽名，這就不得不相信了。歷史系還有三個“女孩子”，無推薦單位，不知從何而來，有人打聽她們的身世，均守口如瓶。班主任很惱火，揚言一定要搞清她們的來歷，否則不准繼續學習。黨委得知後，找班主任談話，令他不要追究。在校期間每逢節假日，中共中央辦公廳還會把她們接走。³⁰ 後來得知這三個“女孩子”來自浙江文工團。

此後，毛澤東很久不見謝靜宜。謝托王海容、唐聞生捎話，說有錯誤可以批評，不見她，有些難過。毛堅持過一段時間再說。遲群的態度則不同，心中不服，耿耿於懷，直到兩年以後的1976年2月，他還說：“我有什麼大錯，不就是講了個走後門嗎？”“一二五”大

²⁹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2卷，3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³⁰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39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會憋氣，遲早要向全黨公佈。”³¹ 後來一直沒有聽到他“向全黨公佈”，帶著“憋氣”進了監獄，走向墳墓。

批了郭沫若，又批梁漱溟

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三次點名郭沫若，眾呼：“站起來！”郭不得不顫巍地站了起來。江青當眾羞辱一番，說他“對待秦始皇，對待孔子那樣的態度，和林彪一樣。”³² 此時，馮友蘭卻安坐在席位上，怡然自得。

當天晚上，周恩來派人到郭府表示慰問，傳話：“郭老已經是 80 多歲的高齡了，要保護好郭老，保證郭老的安全。”他還有四條具體指示：“第一，郭老身邊 24 小時不能離人，要配備專人晝夜值班；第二，要郭老從 10 多平方米的小臥室搬到大房子裏住；第三，郭老在家活動的地方，要鋪上地毯或膠墊，避免滑倒或跌傷；第四，具體工作由王廷芳（秘書）組織執行，出了問題由他負責。”郭沫若聽了周恩來的指示後，連說幾聲“謝謝總理，謝謝總理”。爾後，周恩來還兩次親自看望郭沫若。

張春橋則上門要郭沫若承認抗日時期的《十批判書》等作品是追隨王明路線的，還要他寫文章“批秦始皇的那個宰相”。郭沫若當場拒絕。2 月 10 日，江青到郭沫若家，逼他作檢查，要他承認歷史劇《屈原》和《十批判書》是王明路線的產物。郭在病中被她折磨了 3 個小時，當晚送醫院。³³ 張春橋和江青估計錯誤。他們以為郭沫若是很聽話的，不料郭沫若聽誰的話還是有所選擇的。

³¹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 82 號，《關於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 年 5 月 15 日，附件一：《“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陰謀活動》。

³²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368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³³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368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 3 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27 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江青批了郭沫若，又批梁漱溟。她說：“梁漱溟現在還反對我們，反對我們批孔。他是尊孔的。”“我們主席說孔老二有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我願朋友們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學孔夫子這一套，則幸甚。那麼當時講的這段談話，像梁漱溟這樣的先生老爺，會不領教的。”³⁴後來郭沫若獻詩一首：

呈毛主席

讀書卅載探龍穴，雲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醫俗骨，難排蠱毒困劣隅。
豈敢樗櫟悲繩墨，願竭駑駘效策驅。
猶幸春雷驚大地，寸心初覺視歸趨。³⁵

這是一首懺悔詩，也是獻媚詩。

梁漱溟與之不同。政協學習組批判了他半年，被他一言勾銷：“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見第八章）

批了中國人，又批外國人

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批評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拍攝的影片《中國》，說“這是一個間諜加漢奸搞出來的”。“間諜”當然是指安東尼奧尼，“漢奸”是指誰？讓人去猜。

安東尼奧尼是意大利共產黨員，於 1972 年春訪華時拍攝了一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紀錄片。美國廣播公司以 25 萬美元購進這部影片。放映之後，被評為 1973 年在美國上映的“十部最佳紀錄片”之

³⁴ 《周恩來、江青、遲群、謝靜宜、姚文元在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批林批孔動員大會上的講話》，1974年1月25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存。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4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³⁵ 引自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後半生》，473頁，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一。江青點了名，《人民日報》隨即跟進，於 1 月 30 日發表評論員文章，題目是《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文章認為，這部影片是“當前國際上一小撮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分子對新中國極端仇視的心理的反映。這個影片的出現，是一個嚴重的反華事件，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文章指責安東尼奧尼“懷著對中國人民的敵意，採取別有用心的、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這次訪問的機會，專門搜羅可以用來污衊攻擊中國的材料，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讓這樣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搖撞騙，那就是等於承認任意侮辱中國的反動宣傳是正當的行為，那就是向國際反動派的反華挑釁投降”。矛頭指向對外事工作負有領導責任的周恩來。

安東尼奧尼進行申辯：“我不承認誣蔑中國和歪曲中國現實的指責。”《紅旗》雜誌 1974 年第 4 期又發表《到底是誰家的工具——評安東尼奧尼的“申辯”》，繼續批判。在全國喧囂了一陣。

翻江青的土改老賬

江青在會上還說：“我在土改的時候就殺了一個惡霸，不殺他群眾起不來。”1951 年 10 月 9 日至 12 月 20 日，江青以“李進”的化名，在湖北武昌二區新屋鄉搞了 72 天的土改。不提也罷，提起土改，當年的工作隊隊員和當地的老鄉，至今憤慨難消。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專門寫了一個材料。不說別的，就說“三同”。當時規定，土改工作隊隊員必須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江青卻是“三不同”。

有一幢地主莊園，主人逃亡了，江青就住了進去。只住她一個人，卻設三重警衛。

她的伙食要另起爐灶，區里特派一名事務長和一名炊事員為她服務。除了一日三餐，晚上 11 點多，打完撲克，還要吃一次夜宵。她吃飯專門備有一雙銀筷，以防中毒。她吃魚一定要是活的。在鎮上買的活魚，拿回來死了，她不吃，非要她看到的活魚才吃。所以事務長

買魚時必須提個水桶。當時的鄉政府財糧委員袁清波記得，李進 72 天的伙食費花了 535 萬元（合今 535 元）。那時鄉幹部的津貼費每月才 1.2 萬元（1.2 元）。李進的伙食費區裏報銷不了，縣裏也報銷不了，最後拿到省裏的土改委員會才報了銷。

李進的勞動是爲了照相。一次，僱農曹宏寬在使牛耕地。李進去了，接過鞭子，扶一下犁，照了相就走了。僱農趙銀國在割穀子，已經割了一大片，李進去了，接過鐮刀，割了一把，照完相，又走了。群眾看到她的時候，嘴裏總是不停地吃東西，糖果、點心、水果，還叼著香煙。老鄉看了電影《列寧在 1918》後，說：“李進抽煙的鬼樣子，就像刺殺列寧的那個女特務！”³⁶

“梁效”承蒙接見

遲、謝講話時，江青問：“兩校大批判組搞《材料》的人來了沒有？”這些人不是國家機關幹部，當然沒有來。周恩來立即派人、派車去把他們接來，還當眾檢討：“我們疏忽了，沒有請材料組的同志來。”其實他自己也是一個多小時前才得到消息的。

會議結束，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陳錫聯、紀登奎等在北京體育館後臺接見了“梁效”的成員，特與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三位老先生一一握手。宋柏年寫道：“會議結束的時候，總理、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在後臺接見了我們。……總理在和馮、魏、周一良三位老先生握手後，突然見到我，很高興。那年我三十歲，總理在和我握手的時候，拍著我的肩膀說：‘年輕人，年輕人！’”³⁷江青則給王世敏打氣：“你這個女狀元要立新功！”

馮友蘭的女婿蔡仲德，在他編著的《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中，批評陳石之《評“四人幫”的代言人梁效》（《歷史研究》1977 年第 4

³⁶ 見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十一《江青破壞土改的罪行調查》（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1977 年 11 月 12 日。

³⁷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 年 9 月 1 日。

期），“此文還無中生有，說先生曾出席 1974 年‘一二五’大會……”。根據是馮友蘭本人對人說過，他沒有參加“一二五”大會。³⁸ 宋柏年證明，馮友蘭參加了“一二五”大會，而且是他送去的。“會議進行不久，……總理通過中央辦公廳通知北大。北大黨委辦公室通知我，讓我十分鐘之內將編寫組的同志集合，帶到首都體育館。那時沒有手機，多數同志家裏沒有電話，要想在十分鐘內集合是很難的。我只好把住在燕南園的馮友蘭、魏建功先生，住在燕東園的周一良先生找到，其他同志能找幾個算幾個，這樣，大概有十多人風馳電掣地開到了首都體育館。”³⁹ 宋柏年的敘述，連細節都很清楚。我想，大概老先生對於以數字命名的大會搞不清楚。同為參加大會的周一良，在《畢竟是書生》中說：“1974 年 1 月 25 日江青在首都體育館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湯一介同志在會上宣講所謂《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我補充講解了其中的歷史典故部分。”（71 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宋柏年說，他和湯一介是在北京市的另一個會上講了話，不是“一二五”大會，周一良搞混了。“一二五”大會輪不到他講話。周一良把無說成有，馮友蘭又把有說成無，殆因記憶有誤。想來馮友蘭不至於抵賴，眾目睽睽看到他坐在那裏，怎麼能賴得了？而且，他在會上聽到謝靜宜講毛主席要看馮友蘭的“批孔”文章的情節，把它寫進了《馮友蘭自述》（151 頁）。這是鐵證。問題是蔡仲德不做調查，輕率地批評別人“無中生有”，恰恰相反，他自己的闖謠才是無中生有。

鹿死誰手看兩家

會前，江青得意忘形地說：“哈哈，周總理都叫我搞得沒有辦法了！”⁴⁰ 會後，江青又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及遲群、謝靜宜召

³⁸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752 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

³⁹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 年 9 月 1 日

⁴⁰ 江青的秘書劉真、劉玉庭的揭發（1976 年 11 月 1 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 年 12

集到釣魚臺，她自吹自擂地說：“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線衝鋒陷陣、指揮戰鬥的。今天我們把周恩來搞得狼狽不堪。他這個龐然大物也得在大庭廣眾面前檢討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勢。他有什麼了不起的，照樣是我們手下敗將。”王洪文迎合江青，說：“周恩來是我們長期較量的對手。江青同志是指揮我們的統帥，你就率領我們和他周旋到底吧！”張春橋比較陰險，他說：“我們要防備他們背後捅刀子。王關戚是怎麼垮臺的？我們要注意。”江青滿不在乎，接著說：“不要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眼下，鹿死誰手，就看我們兩家了。從年齡、身體上，他都不佔優勢。他今年已七十六歲了，好景不長了。他有點像諸葛亮死前的處境，後繼無人。而我們是兵強馬壯，我們的年齡比周恩來、葉劍英小十六七歲，至於洪文、文元屬於少壯派。我們有信心戰勝他們。”⁴¹ 江青說“就看我們兩家了”，“兩家”中的江青這一家，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外戚。他們既無功勳，又無才學，是由於靠近權力中心而濫施淫威，但一時氣焰很盛。歷史上的外戚或宦官專權，是專制政治的副產品，演出最腐朽、最黑暗的一幕。江青所說的另一家，類似於中國歷史上的老臣，暫時處於守勢。

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點了中共中央聯絡部部長耿飈的名。會後，耿飈找周恩來，表示不滿，提出辭職。周恩來送他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論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要整你，不論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⁴² 這難道不是周恩來的自守之道嗎？胸懷悲壯，意志堅定。

江青指使遲群、謝靜宜整理講稿、修改錄音，準備發到全國。周恩來搶在前面。他要工作人員連夜將會上的講話、插話整理出來。26日上午，他把記錄稿看了一遍，在值得注意的地方劃了紅線，還寫了

月，中發〔1976〕24號。

⁴¹ 鄭謙、張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三），350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⁴² 石雷：《耿飈在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的關頭》，《炎黃春秋》1994年第4期。

一信，一並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事先不知，王海容、唐聞生向他說起“一二五”大會，他很不滿意。要調錄音來聽，但始終沒聽。

“一二五”大會後北大黨委立即行動，當天晚上，王連龍等人迫不及待地向黨委常委傳達大會的精神，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兩點多鐘。白天，又召開黨委擴大會，由遲群的秘書莊印、兩校大批判組的頭頭宋柏年傳達大會的精神。1月27日是星期日。1月28日，北大、清華召開兩校黨委常委聯席會議，討論如何貫徹“一二五”大會的精神，還討論了給江青寫“致敬信”。“致敬信”28日以後才起草，為了表示“緊跟”，最後簽署日期卻寫成“1974年1月26日”。信中表示，要以江青為榜樣，向她學習抓大事，“把批林批孔這個頭等大事抓好”。1月29日即召開北大全校師生員工大會，傳達“一二五”大會的精神。黨委副書記郭忠林說：“‘一二五’大會的精神，北京別的單位都沒有傳達，只有北大、清華傳達了。”

毛澤東指示“一二五”大會不要傳達，遲群、謝靜宜的講話錄音不要放。但北大、清華兩個大學早就行動起來了，仍舊我行我素。全體師生都下放到基層，向工人、農民講解《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一個美國的旅遊團回去以後說：“二月的北京大學空無一人。”⁴³

由於“四人幫”掌握了宣傳大權，“一二五”大會雖然沒有傳達，在輿論陣地上仍然在不斷擴大影響。特別是“梁效”的出世，成為推行“批林批孔”的衝鋒隊。

江青派人到軍隊“放火燒荒”

“一二五”大會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批林批孔”規定一些政策界限：軍隊的指揮作戰、機要、通訊、情報、供給

⁴³ Jan Prybyla, NOTES O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1974, Chinese Quarterly No. 62, June 1975, p. 296.

等部門不搞“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生產部門在生產以外的時間搞。周恩來的意見，得到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支持。江青等人以“會對群眾的發動定框框”為理由，極力反對。會後，他們動作連連。

2月8日，王洪文在一次會上說，總參謀部領導“右傾手軟，右得不能再右了”；對總政“可以奪權”。張春橋說總後勤部“垮得越徹底越好”。

2月10日，工程兵、鐵道兵、炮兵、二炮向軍委辦公會議匯報“批林批孔”情況，王洪文、張春橋指責這些單位的領導人說，大字報貼少了，運動開展不起來。因此，江青提出對軍隊要“放火燒荒”，整一整軍隊。

3月5日，江青、張春橋召集于會泳（文化部部長）、陳亞丁（原軍委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當時沒有職務）等開會。江青說：“今天我斗膽，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聽聽八一（電影製片廠）的吧。八一造孽了，軍閥管你們。”“春橋同志，看來要奪權。軍隊的文化工作還是讓亞丁去管起來，你在軍委提一下。”“放火燒荒，你們去三個人，去放火嘛。”沒有職務的陳亞丁擅自召集駐京部隊文藝單位的負責人開會，傳達江青的“三五講話”，說：“江青同志要我回到總政，就是要放火燒荒。今天叫你們來，就是叫你們回去放火。”

3月6日，王洪文在總參謀部匯報時說，總參的問題“盤根錯節”“要解決一下”“要繼續發動群眾，把蓋子揭開，一定要揭開，揭不開就砸，砸不開就用炸彈炸！”。

3月13日，張春橋在聽取總後勤部匯報時說：“總後已經癱瘓了，我看癱瘓得越徹底越好。”“不要怕派性。打內戰也可以，有些問題要靠打內戰才能解決。”

3月15日，王洪文污衊葉劍英兼管的總參作戰部說：“如果蘇修、美帝真的打來，我懷疑作戰部會有維持會。真的打起來，總參會有維持會會長、副會長，一套班子齊全。”

1月中旬時，《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短評《既要講批評，又要

講諒解》。王洪文說：“這篇文章很壞！”江青指使人寫文章批評，說“很像是折中主義，很像是中庸之道”。3月11日，張春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義，強令《解放軍報》只能轉發新華社的消息，停止編發自己的稿件。從3月中旬到9月初，《解放軍報》被迫變相停刊178天。

江青、王洪文、張春橋為什麼要搞亂軍隊？因為他們不能掌控軍隊，不能為我所用就把它搞亂，甚至企圖用民兵來取代。3月21日，王洪文向上海的王秀珍談“批林批孔”形勢和軍隊問題。他說：“全國的批林批孔形勢，總的很好。但是第十次路線鬥爭的蓋子沒有揭開，特別是總政、總參、總後、裝甲兵、炮司，多次運動蓋子沒有揭開。總參，人換了，路線沒有換，修正主義路線沒有變。”他一再說軍隊的路線不端正，不能領導民兵。他對王秀珍交代：民兵指揮權要掌握在市委手裏。民兵指揮部這個班子要配備好，把總工會常委多派些進去。我要搞全國民兵司令部，打起仗來依靠民兵。⁴⁴

“批林批孔”又成動亂

“批林批孔”的批判會夜以繼日，大字報鋪天蓋地。“批林批孔”進一步造成社會動蕩、經濟滑坡。造反派趁機而起，重立山頭，製造事端，擾亂秩序，尤以浙江和湖南最為嚴重。

1974年，“批林批孔”進入高潮，而國民經濟跌落低谷。中共中央連發幾個文件，企圖對“批林批孔”引起的亂局加以控制。

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主要內容是：“批林批孔運動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進行，不要成立戰鬥隊，不要搞串聯”“希望各級黨委認真加強領導，團結95%以上的群眾和幹部”。目的還是“使批林批孔進一步開展起來”。文革初期，被視為神聖的“大串聯”“戰鬥隊”，為什麼不要搞了？搞和

⁴⁴ 以上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5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不搞各有什麼理由？沒有理由。

5月18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政策問題的通知》，特別註明“毛主席已閱”。文件首先強調“注意掌握政策，團結95%以上的幹部和群眾”。可見，前一個文件提了“團結95%以上的群眾和幹部”不起作用，還要再提。其次，“必須注意清查的範圍應限制在同林彪反黨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問題，不要擴大化”。批林批孔本來不涉及“陰謀活動”，文件本身在搞擴大化。最後，要求“加強領導，爭取批林批孔運動和各項工作的新勝利”。

爭取“各項工作的新勝利”沒有指望，所以7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指出：“批林批孔”使許多地方和企業的領導幹部挨批、挨鬥，被打倒、打跑，不能領導和組織生產，致使前5個月全國工業總產值只比去年同期增長1%。在這5個月中，前3個月還能勉強略有增長，從4月開始急劇下降。一些地區和部門沒有完成計劃，特別是煤炭欠產，鐵路堵塞，嚴重影響全國的經濟。《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規定：不准揪幹部，不准打人、抓人，擅離職守的領導和幹部必須返回崗位。對於那些把打內戰、停工停產的行爲說成是“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的言論，必須加以批駁。“反潮流”“不為錯誤路線生產”都是自命為“正確路線”加以提倡的；現在又要“加以批駁”，不改變路線怎麼能批駁？《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分析，經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沒有“抓革命”“批林批孔”沒有搞好。下半年“狠抓革命”，加緊“批林批孔”。結果，經濟形勢更糟。1973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9.2%，其中，農業增長8.4%，工業增長9.5%。1974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僅比上年增長1.4%，其中，農業增長4.2%，工業增長0.3%。⁴⁵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本人發話，對正在“批林批孔”興頭上的江青潑了點涼水，但毫無糾正“批林批孔”的意思：

⁴⁵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帶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

你也是難改呢。

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⁴⁶

1975年2月3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長沙去杭州。途中的金華地區，兩派正動用輕重武器進行武鬥。毛的專列被堵在南昌。經採取措施，8日才到杭州。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鐵瑛向他匯報：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處興風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廠停工。原是魚米之鄉的浙江，不得不從北方調進口糧。幾天之前，譚啟龍和鐵瑛還被造反派綁架、挨了打。毛澤東聽了，“表情凝重”。⁴⁷他也只是“表情凝重”而已，何嘗反省“批林批孔”的決策錯誤。

7年以後，1981年，也是“一二五”，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宣判，主犯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江青興於“一二五”，也亡於“一二五”。

⁴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39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又見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474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⁴⁷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2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第七章

“批林批孔”中出世的怪胎——“梁效”

文革中有許許多多的“大批判組”，唯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是青史留名的。

1967年春，毛澤東提出：“不能光喊砸爛狗頭，秀才們應該寫些批判文章。”陳伯達發明了“大批判”這個概念。同年夏，根據陳伯達、江青的指示，在中央文革下面成立了“大批判組”。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大批判組”。成立大會是在沙灘大院（原中宣部所在地）的教育樓召開的，到會的有大、中學校和北京各界、各單位的代表數百人。中央文革的陳伯達、關鋒、戚本禹在會上講了話。陳伯達的這次講話，又發明了“走資派”的概念。他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簡化，是不是就叫“走資派”？從此，“走資派”的概念就廣泛流行了。中央文革大批判組的成員有楊永直、廖初江、林杰、閻長貴等10人。¹之後，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各大派都相繼成立了“大批判組”。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成立之前，北大各系早就有“大批判組”了，其中哲學系的“哲軍”，歷史系的“史軍”，中文系的“聞軍”，是北大的三大主力軍。“梁效”的成員葉朗、楊克明、湯一介先是“哲軍”的成員，范達人、何芳川等先是“史軍”的成員，孫慶升、胡經之等先是“聞軍”的成員。“梁效”們的辯解總

¹ 閻長貴：《戚本禹談“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問題》，鳳凰歷史，2016/04/22-23。

是說，他們是由黨組織調來的，個人無可選擇。但黨組織是有選擇的，為什麼在北大、清華四五千教職員中看上你們？就因為你們有“大批判”的來歷。北大、清華的黨委常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兩校聯合進行大批判，以北大的“三軍”為主，清華派人參加。1973年9月4日，《北京日報》刊登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是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名義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實際上是“哲軍”的作品。10月，兩校成立了聯合的“批林批孔研究小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就是這個小組的作品。所以“批林批孔研究小組”有時也稱“材料組”。北大批林批孔辦公室下面設有一個“批林批孔動態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完成後，1974年1月13日，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會議，宣佈北大、清華兩校批林批孔研究組（14人，北大8人、清華6人），大批判組（19人，北大12人、清華7人），動態組（5人，均為北大）合而為一，北大、清華兩校黨委常委聯席會議正式定名為“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譁名“梁效”²，進行“大批判”，並繼續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之三、之四。

“梁效”是荒誕時代出世的怪胎。

一個奇特機構

“梁效”的架構，當時不為人所知，“梁效”覆滅後才被揭示。

“梁效”的領導機構是一個特別黨支部，支部書記是北大黨委常委、黨委辦公室主任李家寬（原8341部隊秘書科副科長），北京大學的宋柏年（中文系畢業，原為外國留學生的漢語教師，文革中任黨委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批林整風辦公室副主任）、清華大學的王世敏（哲學教師，江青封的“女狀元”）為副書記。李、宋、王再加周

² “梁效”取“兩校”之諧音。姚文元說報刊上經常出現“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署名不大好，可以用個筆名。用什麼筆名？范達人提議用“梁效”，他以為這是他的創意。（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31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一良、湯一介、范達人、楊克明、王朝文、盧振義，組成支部委員會。盧振義是清華大學的電影放映員，算是工人。按毛主席的教導，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必須有工農分子“摻沙子”，否則就會板結，不透氣。其實是裝相，工人盧振義不過是知識分子的尾巴。支部委員會幾乎沒有開過會，有事都由李、宋、王說了算。

先後參加“梁效”的有 46 人，過程中有出有入。“表現不好”的，被踢出去；看中了的，加進來。堅持到最後的是 39 人（北大 30 人，清華 9 人），另有顧問 1 人（名單見第十二章附一）³。下分兩個大組：寫作組和材料組。還有一個動態組，人數不多。寫作組組長范達人，副組長楊克明；下面又分九個小組，范達人組（歷史），鍾哲明組（政治），葉朗組（哲學），胡經之組（《紅樓夢》），徐琳組（馬列主義），孫慶升組（文學），梁英明組（國際問題），湯一介組（哲學史），孫靜組（文學史）；其中，范達人組和鍾哲明組號稱“梁效”的“尖刀班”，尤其是范達人組（組員：何芳川、陳先達），發表了 30 多篇文章，在“梁效”中獨佔鰲頭，許多“重頭文章”，如《孔丘其人》《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等，都是這個組的作品。各小組還曾用過“柏青”“高路”“景華”“安傑”“秦懷文”“郭平”“常戈”“萬山紅”“祝小章”“梁小章”等化名。材料組組長湯一介，任務是繼續搞《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之三、之四。後來又從材料組分出一個注釋組，組長孫靜。毛澤東患老年白內障，不能看書，就由身邊工作人員給他朗讀。這些女孩子文化水平不高，讀古文有困難。“梁效”就將古文注音、釋義，有的還翻譯成白話，為朗讀做準備。毛澤東老來愁腸百結，屢讀庾信（513—581 年，南北朝時文學家）的《枯樹賦》，讀到最後，“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淒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尤為動情，潸然淚下。“梁效”注釋的《枯樹賦》受到表揚，毛說比上海的注釋本好。遲群、謝靜宜頗為得意，以為是他們的功勞。

³ 有些流傳的文章把楊榮國、馮天瑜列為“梁效”的成員，誤，只因他們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活躍一時。他們根本不是北大或清華的教師。

馮友蘭作為“批林批孔”的風雲人物，成了“梁效”的顧問。哲學系的同事王永江、陳啟偉在《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中說：“‘四人幫’反革命別動隊梁效的某位顧問先生，又是撰文，又是賦詩，名噪一時，紅得發紫。”（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一個時期，除了王、張、江、姚，其他人不得點名，只好用代名詞。例如，康生叫作“中央文革的那個顧問”；遲群、謝靜宜就是“江青的黑幹將”，如果分開來說，遲群是“江青的男黑幹將”，謝靜宜是“江青的女黑幹將”；馮友蘭自然就被稱為“梁效的某顧問”了。）

還有兩位老教授也是“梁效”的成員，語言文字學家魏建功和歷史學家周一良。後期，林庚⁴曾短暫參與注釋組工作。

“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在其中起了甚麼作用呢？”“梁效”的負責人之一宋柏年自問自答：“他們是資深教授，又是在文史哲各學科領域卓有成就和影響的學者。這樣，對一些孔孟、林彪的言論如何解釋、如何批判，他們當然起著主要的作用。比如：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是甚麼意思、出處為何？都要聽他們的意見。然後一些中青年的教師再去圖書館查書、起草按語。最後還要經大家一起討論定稿。”⁵這幾位老先生並不是如局外人所說的“花瓶”，“僅起諮詢作用”，而是局內人宋柏年所說的在“梁效”中“起著主要的作用”。原來《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有關“克己復禮”“天馬行空”等笑談，竟是聽了這幾位文史哲名家的“意見”拼湊出來的！

“梁效”中人，有一些本來就人品不好，一朝受重用，目中無人，忘乎所以。一些人本來人品不壞，如周一良、田餘慶，但經不起“誘以官、祿、德”（林彪箴言）。周一良說，每每深夜騎自行車回家，“不免欣然自得，忘卻疲勞”。“我又當了黨的十大代表。毛主席逝世，我列名治喪委員會，參加守靈。所以，直到‘四人幫’被打倒，我作為梁效成員始終處於順景。所幸者，我雖怡然自得，卻未忘

⁴ 林庚（1910—2006年），原籍福建閩侯，生於北京，字靜希。林庚是現代詩人，又是古代文學史家，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⁵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乎所以。”⁶ 怎麼沒有“忘乎所以”？周一良較之“梁效”中的惡劣者雖不為甚，但“欣然自得”“怡然自得”是為“德”字所誘；津津樂道當了十大代表、名列毛主席治喪委員會，是為“官”字所誘。

“梁效”之中，有四屆人大代表 4 人（馮友蘭、湯一介、范達人、王世敏），中共十大代表 1 人（周一良），出席國宴者 8 人（馮友蘭、范達人、湯一介、王世敏、周一良、田餘慶等），出國訪問者 2 人（范達人、宋柏年），名列毛主席治喪委員會者 2 人（馮友蘭、周一良），“火線”入黨者 2 人（何芳川、張世英）。范達人出席國宴後自鳴得意：“一時間，我成了新聞人物。”事後多少年，他還說：“在‘文革’那個年代，……可謂大紅大紫，內心感到萬分榮幸和異常興奮。當時的心情可以用‘受寵若驚，感恩戴德’八個大字來形容。”⁷ 他常說的“不要在這裏吃乾飯”成了“梁效”中流行的名言。湯一介在審查期間交代：四屆人大期間，江青向他洩露，他將當人大常委會委員。“江青對我說：‘以後開人大常委會，你不要都參加，還是搞你的研究，寫文章。’接著馬上又說：‘我不應該說，還沒有公佈呢，洩密了。’……江青這樣講，對我有很大影響，使我感到自己當四屆人大代表是江青的恩賜，從而更加賣力為她服務。”⁸ 江青裝腔作勢故意“洩密”，事實上湯一介並沒有當上人大常委會委員。同為四屆人大代表的王世敏交代，江青曾對她和湯一介說：“你們既要當秀才，又不要只當秀才。”王世敏說：“我在‘大批判組’一面組織炮製黑文，一面……搞亂了社會，根子就在這裏。”⁹ 宋柏年說：“什麼這個部、那個部，不就是那麼幾個鳥人！咱們大批判組就是一個部，我當部長！”以至于下面一個事務工作人員竟然說：

⁶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74 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⁷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74、78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⁸ 湯一介交代，1977 年 3 月 3 日。《梁效罪證材料》，31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⁹ 王世敏交代，1978 年 6 月 13 日。《梁效罪證材料》，8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頭頭當了部長，咱們也弄個司局長幹幹。”¹⁰ 許多“梁效”分子的腦袋裏都有一幅“升官圖”。

一個神秘據點

1974年1月31日，“梁效”佔領了北大朗潤園的北招待所。

朗潤園與鏡春園、淑春園（即未名湖）、蔚秀園、承澤園（均為原燕京大學舊址，1952年院系調整後，北京大學從城內沙灘遷此）乃萬園之園——圓明園——之一園，是沒有被1860年的英法聯軍燒掉或損毀不大的部分。朗潤園的北部邊牆外，隔一條馬路，就是圓明園廢墟。朗潤園的中心是一個湖（從網上的照片看到，現已乾涸，成了孩子們的遊樂場），周有亭榭。這裏是春風秋月的幽靜所在。北招待所為三層灰色樓房，50年代時是蘇聯專家招待所，¹¹ 當時屬豪華型賓館，70年代仍較一般教師宿舍為優。

“梁效”的一般成員，必須入住據點，不得請假，星期六回家，星期日返回。他們在一樓各佔一個套間，作為工作室兼臥室。二樓除了住著李家寬和宋柏年外，為機要室，儲藏機密材料；還有專門為江青保存貴重書籍的藏書室，存放特為江青大字印刷的綫裝書43種。三樓為女宿舍，還有遲群、謝靜宜的臨時休息室。“梁效”的成員未經批准也不得上二樓、三樓。周一良、魏建功年紀大了，則為“走讀”，住在家裏，按時上班。宋柏年說：“他（周一良）當時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每天工作到深夜，騎著自行車回家，十分辛苦。”¹²

¹⁰ 1976年12月2日批鬥反黨分子遲群大會上的發言，《大字報選編》（增刊一），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2月2日。

¹¹ 在朗潤園籌建專家招待所和五幢公寓大樓時，北大一批老教授聯名上書表示反對，理由是破壞了古典園林的景觀，甚至說是不可容忍的“罪過”。不要說區區一個朗潤園，就是巍峨的北京城牆，人民政府說拆就拆了，何嘗以半點人民意願為念？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北京舉辦了一個展覽會，會中展出一幅曹雪芹時代的朗潤園圖。北大人驚奇地發現，現存朗潤園與當時的朗潤園何其相似，就是多了那幾幢煞風景的洋樓，故園非復舊池臺。

¹²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馮友蘭的年紀更大，行動不便，“走讀”都免了，有事上門請教，送審稿件。

作為“梁效”的據點，北招待所成了機要重地，門衛森嚴，24小時有人值班，外人不得入內。有兩個解放軍戰士到北大找親戚，誤入“梁效”的禁區，被懷疑為“刺探情報”。“梁效”立即把他們押送北大保衛組審問，爾後交所在部隊批判。有一次，一條狗在據點附近被汽車撞死了，“梁效”疑神疑鬼，以為有人在周圍投毒，把死狗拉到公安局驗尸。他們與人民為敵，總覺得人民與他們為敵。

“梁效”內部，紀律嚴明。凡事不得與外人道，連家屬也不例外。領導交代：“該你知道的，不准外傳；不該你知道的，不准打聽。”還不准透露遲群、謝靜宜的行蹤，甚至連大夥吃什麼飯也不准外傳。遲群說：“誰要是洩露了班子的秘密，查出來，那就不客氣，請他離開這個班子。”有人說：“我正不想在這兒待呢！”遲群說：“那也沒有這麼便宜，回到原單位，你給我檢查，問題嚴重的，要作組織處理。”¹³遲群還要求“梁效”的成員“刮西風不動搖”，為“四人幫”賣命到底。內部各小組不許串聯，只能與頭頭單線聯繫。成員之間互相監視，有誰發個牢騷，上面就知道了，馬上會有人找他談話。“梁效”完全是一個神秘組織。

“梁效”在生活上享受特殊待遇，副食由商業部門特供，一律按外賓的規格。30多人一頓要吃30幾斤魚、排骨、雞（或鴨）。每天吃夜宵，看電影、打撲克過了鐘點照吃不誤。從1974年2月到1976年9月，光是伙食補貼多達23892元，大約相當於2000個大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他們30幾個人佔用50多間房，還有8個服務員專門伺候。江青給他們放映了50多場外面禁演的西方電影和舊戲曲片。

“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口號，他們叫喊的比誰都響；實際上的“資產階級法權”，他們享受的比誰都多。李家寬到臨湖軒（原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住宅，北京大學作為接待外賓的場所）拿招待外賓的好煙、好茶。服務人員說沒法報賬。李說：“腦子靈活一點，記到外賓

¹³ 《“四人幫”幹將遲群、謝靜宜部分言行摘編》，《大字報選編》，第9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1月17日。

賬上嘛。”服務人員說：“不要拿了，再拿就簽字。”李家寬大聲質問：“你受誰領導？”答：“受伙食科領導。”李又問：“伙食科受誰領導？”答：“受校務部領導。”李還問：“校務部受誰領導？”服務人員明白了，歸根到底是受黨領導，他就是代表黨。只好不吭聲。¹⁴ 這一番問答很簡明，也很深刻。在黨的領導下發生的腐敗，再由黨的領導來反腐敗，能反得徹底嗎？

“梁效”是誰領導的

“梁效”們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價，聲稱他們是“毛主席領導的”。講得最起勁的是范達人。¹⁵ 可是他自己的書中就提供了反證。

宋柏年的揭發交代寫道：

1974年“一二五”大會，“四人幫”批林批孔又反走後門，三箭齊發，毛主席嚴厲批評了他們並指出“形而上學猖獗”。反黨分子遲群、謝靜宜極力封鎖毛主席這一批評，後來有的同志知道了，遲、謝竟狗膽包天，說“這是謠言”。¹⁶

1975年春天，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中，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煽動人們“反經驗主義”。4月23日，毛批示：

提法似應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

¹⁴ 《揭發“四人幫”的據點原兩校大批判組的罪行》（北京大學伙食科、房管科、汽車隊、事務科、財務科、校醫院、校務部機關部分黨員），《大字報選編》，第9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1月17日。

¹⁵ 范達人：《“文革”御筆浮沉錄——“梁效”往事》，20~22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范達人：《“梁效”的成立與終結》，《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

¹⁶ 宋柏年的揭發交代，1976年11月1日。《梁效罪證材料》，41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¹⁷

毛主席的這個批示，遲群、謝靜宜對“梁效”的成員也是封鎖的。“梁效”中有人從外單位傳抄了毛的批示。遲群竟大發雷霆，勒令傳抄者“滾出”大批判組。更有甚者，遲、謝把毛的批示叫作“謠言”。遲群要北大黨委追查“謠言”，還繪成“聯絡圖”，圖中顯示毛主席的批示來自五個渠道、三種版本、傳抄百人左右。¹⁸

毛批評“三箭齊發”是“謠言”，毛批評“反經驗主義”又是“謠言”，不僅如此，教育部長周榮鑫引用毛的批示，指出：“教育戰線形而上學很猖狂。”“梁效”把這句話編入反面材料，按語中說：“周榮鑫……妄圖轉移人們的視線，為他推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大開方便之門。”¹⁹

雖然封鎖毛主席的指示，但范達人說：“但是，我們仍然感到氣氛的變化。‘梁效’從4月份（1975年）起開始蕭條，……無所事事。”²⁰

毛主席的批示，為何對毛主席領導的“梁效”封鎖？毛主席領導的“梁效”為何將毛主席的批示叫作“謠言”？毛主席批示後，毛主席領導的“梁效”為何蕭條？范達人及其同夥如何自圓其說？因為毛主席的指示對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不利，故加以封鎖；毛主席的指示不能直達“梁效”，如何領導？江青自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江青這條“狗”連同她的爪牙“梁效”，最終當然都要聽主子毛主席的吆喝。正像“羅思鼎”是張春橋、姚文元的班子，“唐曉文”是康生的班子，也要聽毛主席的吆喝。準確地說，階梯是這樣的：“梁效”——遲謝——江青——毛主席。“梁效”的頭上有三重天，“梁效”和毛主席之間還隔著兩層呢。毛澤東需要“梁效”是為了做“批

¹⁷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524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¹⁸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三》，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¹⁹ 《梁效罪證材料》，41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²⁰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92~93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林批孔”的文章，坐實林彪的極右，防止反極左反到文化大革命。他說：“批林批孔聯在一塊，我看許多人對孔夫子不大懂呢。”²¹ 所以，要網羅一幫文人來介紹許多人“不大懂”的孔夫子，以及挖空心思地把林彪和孔夫子“聯在一塊”。“批林批孔”搞了幾個月，197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批林批孔運動幾個問題的通知》，其中指出：“批林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批孔比批林更困難些。”批了幾個月，還認為“批孔”比“批林”更困難，因為“批孔”與“批林”實在扯不上。

江青把“梁效”叫作“我的班子”，交給她的兩個愛將遲群、謝靜宜掌管。遲群在“梁效”的會議上說：“你們對我負責，我對首長負責。”他口中的“首長”就是江青。江青需要“梁效”，是為了實現“組閣”、當“女皇”的野心，借“批林批孔”之機，繼續打倒一大批老幹部，故一再興風作浪。1975年4月，江青在新華印刷廠的一次工人座談會上說：“我在主席家裏可倒霉啦，受壓30年。”²² 她一心想要出頭。這時，毛澤東已經沒有文革初期那種鼓動“天下大亂”的氣概了，他的心思是希望不要再亂，倡言“以安定團結為好”。連連安撫舊部，承認整錯了人（賀龍，羅瑞卿，楊、余、傅等，推託“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江青卻在“一二五”大會上四面出擊。他們大反“走後門”是針對葉劍英的。會後，葉劍英立即向毛主席做檢討。毛的批示說：“現在，形而上學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²³ 毛極力防止“沖淡批林批孔”，批評江青“夾著”私貨。“批林批孔，什麼叫孔老二她（江青）也不懂，又夾了走後門。”²⁴ 後來又批評江青“夾了”反經

²¹ 毛澤東同李先念談話記錄，1974年8月20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9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²² 《憤怒聲討“四人幫”插手北京大學，利用兩校批判組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劉鴻儒代表北大宣傳隊在北京市科教系統大會上的發言，見《大字報選編》，第1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0月26日。

²³ 《給葉劍英的信》，見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451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²⁴ 毛澤東對江青來電話一事的談話記錄，1975年5月。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

驗主義的私貨。所以，“梁效”的作品，在揣摩毛澤東的上意的同時，更多的是“夾了”江青的私貨。

遲群、謝靜宜則狐假虎威，假傳聖旨，又在江青的私貨中夾帶假貨。遲群、謝靜宜這兩個人，不過粗通文墨而已，但在 8341 部隊軍宣隊的“土八路”中算是鶴立鵝群了。江青把他們稱作“金童玉女”。他們兩個人都是北大、清華的黨委常委，是兩校的實際操控者，飛揚跋扈，不可一世。北京大學號稱中國的“太學”，清華大學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理工大學，這兩所名校同時由兩個人掌控，史無前例；而且掌控者一個是初中生，一個是中專生，更是舉世難見。後來遲群是清華的黨委書記，謝靜宜是副書記。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把教育部長周榮鑫打倒、鬥死後，遲群奪了教育部的權。謝靜宜在中共十大混上中央委員，又補李訥²⁵之空缺，高就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按江青的“組閣”名單，謝靜宜是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遲群是教育部長。這兩個人跟著江青一心向上爬。他們才是“梁效”的實際操控者。毛主席批評反經驗主義以後，1975 年 7 月和 8 月，“梁效”不見他們的人影。范達人說：“7、8 月是北京最為炎熱的季節。可是，‘梁效’卻處於冷冷清清的狀態。當時我們有一種‘斷線’的感覺。”²⁶

遲群、謝靜宜把“梁效”搞成控制輿論、獨步文壇的一霸。一時之間，“梁效”握有意識形態霸權，提供整人的思想武器，是一批

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1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²⁵ 李訥（1940—），毛澤東與江青之女，生於延安。1959 年進入北大歷史系學習，曾因病休學一年，1965 年畢業。畢業後分配到解放軍報社，以“肖力（小李）”之名行時。肖力在文革中組織了“革命造反突擊隊”。1967 年 1 月 13 日，貼出《解放軍報向何處去？》的大字報，炮轟報社領導。1 月 17 日，林彪簽署的《給解放軍報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毛澤東批示：“同意，這樣答復好。”）支持這一行動，“在報社內部點起了革命火焰”。肖力擔任了《解放軍報》總編領導小組組長（相當於總編輯）。1973 年，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1974 年至 1975 年，先後任中共北京市平谷縣委書記和北京市委書記。李訥在北京市委書記任上隱退。

²⁶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96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軟刀子殺人”的殺手。他們還預報政治風雲變幻，在蠱惑人心、搞亂全國方面起了極其惡劣的作用。當年的民謠曰：“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

“梁效”是“一僕三主”：遲、謝為現管；遲、謝又服江青的管；毛主席的指示經兩層過濾，才能到達“梁效”。“三主”對“梁效”的期望是各懷鬼胎。

粉碎“四人幫”以後，揭發批判“梁效”，又說他們的罪狀是“反對偉大領袖毛主席”“把罪惡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云云。聲稱“梁效”由毛主席直接領導，以及譴責“梁效”反對毛主席，都是出於同樣思維方法的不實之詞。

“批林批孔”批“周公”

“梁效”是幹什麼的？

“梁效”借學術為包裝，含沙射影，以古諷今，指桑罵槐，旁敲側擊，創“影射史學”“影射文學”，大做“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說“紅樓”、評“水滸”的陰謀文章。誰主持中央工作，他們就把矛頭指向誰，先後是周恩來、鄧小平、華國鋒。人們常常捉摸“梁效”的文章，到底影射誰？遲群說：“你看像誰就是誰。”

“梁效”的第一炮是以《孔丘其人》影射周恩來。這是江青的命題寫作。1974年2月下旬交代任務，要求3月8日前發表。宋柏年說：“《孔丘其人》是我們接到的上面佈置的第一篇寫作任務，非常重視。起草交給第一小組——范達人組，實際上是傾整個大批判組之力寫作。周一良先生也參加了討論。稿子幾經修改，范達人小組幾天幾夜連軸轉，很少休息，以致范達人累得暈倒在衛生間裏。”²⁷文章沒能如期完成，寫了幾稿，江青都不滿意，以至于發脾氣：“乾脆不要你們寫了。”遲群給寫作班子開導：“文章必須有政治性，對著黨

²⁷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內機會主義頭子。與孔子的聯繫不能太實，要做些虛構。讓人看完後產生一個判斷，這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的東西。”寫到第八稿，江青滿意了，對於“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一節尤其滿意，說是寫出了孔丘“對國君如何畢恭畢敬，對權臣如何笑臉相迎，在大庭廣眾之中如何裝出一副忠厚老實的面孔，在社會上如何騙取正人君子的美名。”²⁸姚文元將它發表在《紅旗》雜誌 1974 年第 4 期。《孔丘其人》開宗明義就說：“今天，徹底揭露孔丘的反動面目，對於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這一類政治騙子，反擊開倒車、搞復辟的逆流，很有意義。”王明、劉少奇、林彪的面目不用“識別”了，需要“識別”的是“這一類政治騙子”。“……一類政治騙子”是個代名詞，隨時可以填入人名。“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是指林彪，“劉少奇、林彪這一類政治騙子”是指誰？誰夠這個級別？不言自明。這裏特別提到王明，暗示周恩來執行過王明路線。“梁效”的頭頭李家寬就在群眾中散佈：“等著吧，這次還要揪出個最大的來。”²⁹

《孔丘其人》是以“梁效”的“尖刀班”為主、傾“梁效”之全力寫作的。“尖刀班”班長范達人在接受審查時及後來發表的作品中，多方辯解。他說：“人們認為，這篇文章名為批林批孔，實為反對周總理。”“如果要問我，想在此文中影射何人，那麼，坦率地說，首先是林彪，其次是李德生。”³⁰拙劣的辯解！林彪是公開批判的對象，需要“影射”嗎？李德生早已地位不穩（他是中共歷史上任期最短的副主席），值得“影射”嗎？范達人的辯解顯得十分低能。“尖刀班”的成員何芳川，態度與他不同。何芳川老實承認：

在“四人幫”的欺騙下，自己頭腦中產生了批林批孔運動，毛主

²⁸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82 號，《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 年 5 月 15 日。附件一：《“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陰謀活動》，3 頁。

²⁹ 《“四人幫”的御用工具“梁效”反對周總理大事記》，《大字報選編》，第 2 期，北京大學歷史系，1976 年 11 月 8 日。

³⁰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51、55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席的下一步戰略部署可能批判周總理的念頭。就是在這種思想背景下，我參加了《孔丘其人》的炮製。

在我們寫作小組承擔《孔丘其人》的任務，連寫三稿都達不到要求，受到江青斥責，遲群又下令大批判組總動員突擊這篇文章的時候，我私心作弊，一方面容忍了一些人影射攻擊周總理的文字，一方面有意識地向遲、謝的“領導意圖”靠攏，參加和炮製了一些影射文字。當時看到報上，特別是上海報紙上有“識別王明、劉少奇、林彪一類政治騙子”的文字，自己意識到這是影射周總理。因此寫作小組寫上這句話的時候，自己想：這樣一寫，大約就可以達到“上面要求”了。³¹

果然，用這一句話開篇，文章就達到“上面要求”了。³²

1974年6月12日、14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梁效”和“唐曉文”的成員，舉行“批林批孔”座談會。她說：“我叫遲群組織寫一篇《孔丘其人》，文章寫得生龍活虎。但有一個缺點，外國人看了說，沒有孔丘的原文。”³³外國人都看出來了，離開了孔丘的原文，以便任意發揮。從文章的小標題就可以看出寫作的隨意性：“開

³¹ 何芳川交代材料，1977年1月11日。《關於原“兩校大批判組”成員何芳川的初步審查情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7年9月22日。

³²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345頁：“據謝靜宜‘文革’後回憶：《孔丘其人》一文發表前，毛澤東、周恩來都曾審閱。由此可見，文章影射周恩來可能性不大。”（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謝靜宜文革後的回憶沒有原文，沒有出處，即使確實，也是孤證，當時人、當事人都未曾提及周恩來審閱過“梁效”的文章。即使毛澤東、周恩來審閱過，怎麼能“由此可見”妄斷“文章影射周恩來可能性不大”？對影射的論斷只能說“是”或“不是”，不在於可能性大或不大。毛澤東是批“周公”的指示人，文章經他審閱同意，正是確認了影射周恩來。即使經周恩來本人審閱，也不能證明“影射周恩來可能性不大”。影射的妙用就在此，被影射者能提出反駁嗎？提出反駁就是承認和證實影射。中央政治局討論姚文元起草的1974年“兩報一刊”元旦社論，其中“大事不討論，埋頭於小事，這樣很危險，勢必要搞修正主義”是影射周恩來的。會議還是周恩來主持的，不是照樣通過嗎？

³³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51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兇狠殘暴的大惡霸”“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到處碰壁的喪家狗”。正因為離開原文隨意寫作，才能適應影射。為了影射，還杜撰了一個當時魯國並不存在的“宰相”職務。不是說“批林批孔”嗎？《孔丘其人》根本不“批林”。

在《從〈鄉黨〉篇看孔老二》³⁴一文中，“梁效”簡直是照著周恩來描繪孔老二，說他“端起胳膊”走路³⁵，說他“煞費苦心地練風度、練表情，對不同的人採取不同的態度，是為了做官，做官又是為了‘復禮’”“你看他為了騙取到‘正人君子’的名聲，在大庭廣眾之中，是如何裝模作樣的吧”“在國君面前，則小心翼翼，侷促不安，舉止恭順……真是醜態百出，令人作嘔”，如此等等。

“梁效”的“批孔”，在江青的導演下，瞄準周恩來，鼓噪“揪大儒”“批周公”“批宰相”，批了秦朝的宰相李斯，又批漢朝的宰相霍光，再批宋朝的宰相司馬光。1974年6月22日，江青到天津小蘄莊，要小蘄莊婦委會主任周福蘭改名：“你就叫周克周吧，用咱們這個‘周’，克制他那個‘周’。”³⁶江青，何等的肆無忌憚！

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座談會上，授意“揪現代大儒”。她說：“現在的文章除了林彪、陳伯達很少提到現代的儒。難道現在沒有儒了嗎？如果沒有，為什麼要批孔？為什麼要搞這樣大的運動？現代有

³⁴ 署名“柏青”，《北京日報》，1974年5月17日；又見《教育革命通訊》，1974年第6期。

³⁵ 1939年夏，周恩來在延安黨校做報告，返回楊家嶺時，江青與之策馬同行。江青為了顯示她的馬術，突然揚鞭，周的坐騎受驚，周墜馬，右臂受傷，痊愈後不能伸直。“梁效”把“趨進，翼如也”說成“端著兩個胳膊向前急走”。歷來，《論語》的注釋家沒有這樣說的。例如，邢昺疏：“趨進翼如也者，謂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用白話來說，“甩開膀子，大步流星”還差不多。“端著兩個胳膊”怎麼能說是“如鳥之張翼也”？完全是曲意影射。審查“梁效”時，他們辯解：“總理也不是端著‘兩個胳膊’呀！”（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53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³⁶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372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很大的儒，不要以爲到社會主義就沒有儒了，我們黨內就出了不少儒。”遲群回到“梁效”駐地，貫徹江青的精神，說：“不僅要批古代的儒，還要批現代的儒。”“梁效”的頭目之一宋柏年接著說：“剛才遲群講的大儒，不是指劉少奇，也不是指林彪、陳伯達。這一類文章不要。”謝靜直接著說：“對，宋柏年講了，就是這樣，不要批劉少奇、林彪、陳伯達的。”一個比一個露骨。³⁷宋柏年在別的場合還對人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人要搞臭他；但這個人又搞不臭，還很香。”有人問：“是不是陳毅？葉帥？”他搖搖頭：“都不是。”很明顯，他指的是周恩來。³⁸這個宋柏年後來又另有一套說辭：“周一良先生在《畢竟是書生》中說：‘我在梁效期間，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遲謝二人在任何會上暗示過。’這是實情。”³⁹他自己在30多年前寫的交代是這樣說的：

在反黨分子遲群講到：“批林批孔要普及、深入、持久，不僅要批古代的儒，還要批現代的儒”時，我插話：“這個儒不是劉少奇，也不是林彪。”根據我以上的交待，這句話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有江青講話交底在先，有梁效有關人員討論在先，我這句話是遲、謝毒害的結果，是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敬愛的周總理，這是我對總理犯下的滔天罪行。⁴⁰

是健忘還是抵賴？或是企圖翻案？

江青在天津讓人給隨從們唸一份新華社《國際內參》上的外電。這份外電，藉中共北京市委門前出現大字報一事，評論：“中國當前

³⁷ 《梁效罪證材料》，51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又見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9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周恩來傳》，下冊，209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³⁸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初編），7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³⁹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⁴⁰ 宋柏年的交代，1978年1月22日。《梁效罪證材料》，51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的鬥爭，是以周恩來爲代表的溫和派和以江青爲代表的激進派的鬥爭。文化大革命是從揪彭真開始打倒劉少奇，這次也是從揪北京市的吳德開始要打倒周恩來。”唸完，有人問爲什麼要唸這樣的外電？謝靜宜陰陽怪氣地說：“就是要讓大家瞭解瞭解嘛。”⁴¹ 范達人在他的書中另有一說：“粉碎‘四人幫’後，還有人揭發 1974 年 6 月，江青一行在天津時曾有人提到激進派與溫和派的鬥爭。據我所知，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一天在天津市委招待所內，王世敏給我們唸一些文件，……第二份是新華社的《國際內參》。她在讀世界對中國的評論時，的確唸到‘以江青爲首的激進派與以周恩來爲首的溫和派鬥爭’的內容。當時，謝靜宜說：‘那是胡說八道。’並要大家不要相信這種妄評。在場的我和其他一些同志並未意識到是授意我們反對周總理，”⁴² 既然是“胡說八道”，爲什麼要給大家唸？唸文件的王世敏和另一“梁效”成員梁英明寫的交代都沒有范達人所說的情節。1976 年 10 月 16 日，王世敏的交代中說：

6 月底（1974 年）的一天，在天津大理道天津第二招待所的會客室，謝靜宜召集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同志和黨校的同志一起“學習”。謝拿來一份《國內動態》清樣，並且說是江青讓給大家唸的。謝親自唸了一會，不知什麼事情要上樓去，就把這份清樣交到了我的手裏，交待說，唸完了還送到她樓上。我唸下去以後，才發現這份清樣原來是一篇外電的報道，報道北京街頭出現了李冬民等人貼吳德同志的大字報。外電評論中國黨內激進主義路線和周恩來的溫和主義、保守主義路線的鬥爭正在繼續，並且日益尖銳等等。顯然，這是對我們黨內生活的極大歪曲，對我們敬愛的周總理的及其惡毒的誹謗。……謝不以爲然地說：“這本來就是給大家瞭解瞭解。”我記得這份清樣右上角還有江青的名字。⁴³

⁴¹ 《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2 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 年 3 月 25 日。

⁴²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53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⁴³ 《梁效罪證材料》，53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范達人似有爲江青、謝靜宜開脫之嫌。當然，重要的是爲自己開脫，表明“在場的我……並未意識到是授意我們反對周總理”。周一良爲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所寫的序言中說，范書應出版，“以示人真實歷史，以正視聽”。范書中有許多諸如此類的說法，與他的“梁效”同夥不一致，難道這才是“真實歷史”？難道還要以范達人的說法來正別人的“視聽”？

1974年秋，在召開四屆人大前夕，“四人幫”爲了主導組閣，密謀由王洪文飛長沙向毛主席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與此同時，江青在10月24日將遲群、謝靜宜和中央黨校的武葆華叫到她的住地，指揮他們批“因循守舊”、批“賣國哲學”，指向周恩來、鄧小平。她說：“別的我都不管了，這兩篇文章我要親自過問，寫好後送給我。”她還對遲群單獨講：“就是要批幾個人，不是科長。”遲、謝在佈置任務時，強調“要向權威挑戰”“要發動一個比批林批孔還要大的運動”。“梁效”頭頭李家寬領會：批因循守舊是“帶有戰略性的部署”“文章發出去是一個重磅炸彈”“調子要高，使有些人看了出一身冷汗”。遲群嫌文章出得慢，大罵：“你們這批腐儒，文章可以討論三天，現實鬥爭不能等。”他們煞費苦心，既要讓人意識到批周恩來，又不能明白說出批周恩來。文章是馬上寫了，但拿出的第一稿，遲群認爲“調子不高”，下令重寫。曠日持久，炮製了《批判因循守舊，堅持繼續革命》，叫喊“必須整頓和革新國家機關”“改天換地”，不要“補天”，要“沖天”，要建立“新天”。姚文元三審其稿，從標題到內容改了39處之多。拖到1975年，才在《紅旗》雜誌第3期發表。⁴⁴

江青還要田餘慶以個人名義，批歷史上的因循守舊。田寫了《曹袁鬥爭和世家大族》一文。他首先把曹操和袁紹的鬥爭納入“儒法鬥爭”，然後，說袁紹“搞儒家路線，依靠世家大族，因循守舊，根本不可能收拾四分五裂局面，不可能實現統一”。說到曹操，稱他“同歷史上其它富有進取精神的法家人物一樣，都是在反對保守勢力、反

⁴⁴ 《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3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又見《梁效罪證材料》，60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對因循守舊的鬥爭中成長的”（《歷史研究》1974年12月）。⁴⁵他們論證儒法鬥爭，反對因循守舊，都是從古到今，貫徹始終的。

毛遠新向毛澤東打小報告：“鄧小平說批林批孔就是批總理，批經驗主義就是揪總理（上海市委書記馬天水揭發）。”⁴⁶鄧小平說錯了嗎？沒錯。

周恩來逝世後，遲群參加弔唁後到兩校大批判組吃飯，說：“我去轉了一圈就回來了，小謝守靈活受罪。”他看見大批判組有人戴黑紗，強令摘下，說：“你們不要帶這個頭。”謝靜宜接著說：“我去守靈，給我一個，丟一個。”⁴⁷遲、謝已經按捺不住對周恩來的憤激之情。謝靜宜打電話給青年團北京市委，詢問原定次日召開的“北京市應屆高中畢業生上山下鄉誓師大會”的準備情況，下令：“大會照常召開，要開得熱熱鬧鬧，要敲鑼打鼓。”在學生的強烈要求下，大會決定改期。謝靜宜又下令：與會者不得佩戴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在發言中提到周恩來的名字，不准講“繼承周總理的遺志”，會議要敲鑼打鼓，興高采烈。並強令團市委審查會議發言稿，將“懷念周總理”“學習周總理”“繼承周總理遺志”等字句全部刪去。⁴⁸

江青說：“走資派活著要反，死了也要反。”“梁效”成員湯一介主動請戰，炮製了《“克己復禮”再批判》。文中寫道：“孔老二當上司寇之後，立即將魯昭公與祖宗合葬，借這具僵尸為他的復辟活動張目，用死人來壓活人。”《光明日報》編輯看了這段文字很吃驚，建議刪去“用死人來壓活人”，說“免得敏感的群眾有聯想”。

“四人幫”在《光明日報》的代理人莫艾主張不刪，他挑明了：“現在要防止有些人利用總理的形象來貶低偉大領袖毛主席。”⁴⁹《光明

⁴⁵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黨發[1978]26號，《關於田餘慶的〈曹袁鬥爭和世家大族〉一文的審查情況》，1978年3月10日。

⁴⁶ 毛遠新：《關於中共中央4月4日討論天安門事件情況給毛澤東的報告》，1976年4月5日。轉引自青野、方雷：《鄧小平在1976年——天安門事件》，180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

⁴⁷ 《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7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⁴⁸ 《北京日報》，1977年2月4日、3月9日。

⁴⁹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82號，《關於對原“兩校大批判組”

日報》1976年3月6日發表時，這一段話沒有了（不知何故）。但刪去了文字，沒有刪去思想；針對紀念周恩來的活動，常被指責為“以死人壓活人”。

“梁效”發表《孔丘之憂》（《光明日報》，1976年2月13日，署名高路），在“憂”字上大做文章，污衊沉痛哀悼的群眾為“哭喪婦”，詛咒道：“讓舊制度的‘哭喪婦’抱著孔丘的骷髏去憂心如焚、呼天搶地吧。”“梁效”這一時期的文章大罵“哭喪婦”“哭喪棒”，大批“幽靈”“輓歌”，激起了群眾的公憤，為後來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事件準備了條件。

批了“周公”再批“周公”後

周恩來病重期間，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梁效”又把“孔孟之道”這個萬能標籤貼到鄧小平身上。“梁效”的頭目李家寬提出：“能不能把孔丘描繪成矮個子？”有人說不能，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明知不符事實，“矮個子”照寫不誤。

周恩來逝世後，毛澤東點了“不蠢”的華國鋒任代總理，眾將官皆出乎意外。華國鋒在12名副總理中名列第六，名列第一的副總理鄧小平被打倒了，名列第二的副總理是張春橋。毛沒有把大權交給“四人幫”，總算保留了最後一點清醒。1976年2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經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確定華國鋒同志為國務院代理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正巧，去年的一號文件，確定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張春橋惱恨交加，寫下了《1976年2月3日有感》：

又是一個一號文件。

去年發了一個一號文件。

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一：《“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陰謀活動》，11頁。

真是得志更猖狂。
來得快，來得兇，垮得也快。
錯誤路綫總是行不通的。……

每句話都是句號，句與句之間毫無邏輯聯繫，一句一發洩。

最後，張春橋引了王安石的《元日》詩：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⁵⁰

張春橋“有感”於兩個一號文件：“有感”於前一個一號文件，反鄧小平；“有感”於後一個一號文件，反華國鋒。他在等待，希望有一天，“新桃換舊符”。

遲群、謝靜宜在向“梁效”的夥計們傳達時，先要大家猜，誰當代總理？當場就有人說：“張春橋！張春橋！”遲群無可奈何地說：“主席提議華國鋒代總理。”謝靜宜馬上說：“先把他放在這個位置上。”遲群接著說：“春橋同志在黨內一樣起作用。”其實，毛澤東此舉用心良苦，是為了保護“四人幫”。如果把大權直接交給“四人幫”，在他身後必有“血雨腥風”。交給“老傢伙”也不行，他們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鄧小平不是試過了嗎？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把大權交給一個中間人物，在左右平衡中“四人幫”才能生存。毛希望張春橋安心做副手。他讓毛遠新帶一句話給張春橋：“遵義會議後，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嗎？”⁵¹愚蠢的“四人幫”不解其意，尤其是江青，毛去世後大鬧政治局，搞得會都開不成，活生生地把華國鋒推向對立面，乃自取滅亡。

配合張春橋的《1976年2月3日有感》，“梁效”又以《再論孔丘其人》影射華國鋒“一上臺就搞復辟”，大批“代理宰相”。李家寬在佈置任務時強調“不要全面寫孔丘”“要抓住孔丘上臺搞復辟來

⁵⁰ 葉永烈：《張春橋傳》，29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⁵¹ 閻長貴：《毛遠新再談毛澤東1976年情況》，《炎黃春秋》2011年第10期。

寫”。初稿寫出後，遲群很不滿意，說是“深刻性不夠”“現實性不夠”。李家寬、宋柏年提示：“‘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這句話很重要。”二稿遲群仍不滿意，說“文章怎麼又做到整頓上去了呢？”。 “整頓”是鄧小平的事業。根據遲群的意見，盡量抹掉攻擊鄧小平的痕跡，突出“一上臺就搞復辟”的主題。修改以後，滿篇都是“孔丘一上臺就心急火燎地搞復辟活動”“一旦得到權勢，還是一個十足的翻案復辟狂”“一旦權在手，就十分兇惡地從政治上、組織上進行反攻倒算，把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的行動”。文中明顯影射華國鋒的一句話是“他五十六歲由大司寇代理宰相”，改來改去沒改掉。最後，還是覺得太露骨，將“五十六歲”改為“魯定公十二年”。“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本來是指鄧小平，現在從單數改為複數，寫成“那些”“他們”，這就是說不僅是指鄧小平。⁵²

同一個孔丘，根據“四人幫”的“現實鬥爭的需要”，被“梁效”塗抹成各種不同的臉譜。影射周恩來時，寫了一篇《從〈鄉黨〉篇看孔老二》，說孔丘“端著兩個胳膊”走路，“七十一歲，重病在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時，孔丘就成了“矮個子”“抓生產”的人物。華國鋒任代總理兼公安部長時，孔丘又變為“五十六歲”“由司寇代理宰相”“管理司法公安工作”“兼管農業”等。⁵³孔丘成了變形金剛，在“梁效”的手中任意變來變去。

余英時先生說：

在“四人幫”控制下（特別是從1973年到1976年），中國史學研究的規範已完全遭到破壞，史實受到全面地、有組織地歪曲和篡

⁵²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為“四人幫”纂黨奪權大整黑材料，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行》，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30日。

⁵³ 《人民日報》1976年2月24日發表《再論孔丘其人》的前夕，姚文元急忙打電話給魯瑛，說“暫時不要聯繫”。於是將明顯影射華國鋒的話刪去，改為“他曾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在魯國當過大官”。（見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82號，《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二：《“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陰謀活動》。又見《梁效罪證材料》76~77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改。“四人幫”的那夥“史學家”們對中國歷史並無興趣，他們是用歷史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孔子先是與周恩來掛鉤，接著是鄧小平，最後是華國鋒。秦始皇與毛澤東，漢代的呂后和唐代的武則天與江青，法家與“四人幫”及其追隨者，儒家與部分老一輩革命家，也都劃上了等號。因此，“影射史學”一詞被用來描述“四人幫”直接影響下所出版的“歷史”著作的特征。⁵⁴

雖然隔著太平洋，他對中國大陸的事情看得很清楚。

編寫《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尷尬

說是“批林批孔”，實際上“批林”逐漸淡出，“批孔”則強調“為現實鬥爭服務”，批的不是原“孔”，而是“梁效”塑造的假“孔”。“梁效”又將“儒”區分為“學術儒”和“政治儒”，他們對“學術儒”不感興趣，批的是“政治儒”。在編發了《林彪和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後，接著編“材料之二”。江青要求比“材料之一”更集中火力對準“現代大儒”。所以“批孔”不是批“古代大儒”，而是對準“現代大儒”；“現代大儒”也不是指已死的劉少奇、林彪，而是活著的“大儒”。當時人已看出門道，調侃道：“不批林，假批孔，專門批‘周公’。”政治局委員吳德說：“‘批林批孔’實際搞成批‘周公’，即批周總理。政治局對‘批林批孔’運動的方針、步驟都沒有討論過。”⁵⁵

“材料之二”第一稿送審時，江青很不滿意。遲群要“梁效”停止工作3天，集中力量討論。他傳達江青的指示，說：“‘托古改制’（第3頁）要一下子提到前面來，第一條應該是‘托古改制’，

⁵⁴ 轉引自散木的《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政治謎案19件》中《“批林批孔”運動學人眾生相》一節，259頁，臺北，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3。

⁵⁵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57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這一條是這一本的綱。” “托古改制”與林彪無關，完全是影射周恩來。“材料之一”已經極其牽強附會，“材料之二”更難湊出林彪的尊孔言論。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命遲、謝組織一個“工作小組”，到毛家灣林彪的住地三進宮。這個“工作小組”共有 22 人（北大 13 人、清華 6 人、公安部 2 人、文物局 1 人），從 1974 年 2 月 20 日進駐，至 1975 年 7 月 17 日撤出，歷時一年零五個月，把林宅的 7 萬多冊圖書、40 多盒卡片、100 多件手跡，翻個遍，進行摘錄、復制、影印。不料這個“工作小組”中有幾個刺兒頭，專門唱反調。他們查出《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引用材料的錯誤達五六十條之多，一一列出，報給遲、謝。他們又查出，作為《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綱的“托古改制”，根本不是林彪的言論。林彪囑秘書，報刊上有什麼警句，抄下來，做成卡片。他就只讀警句。但幾十盒卡片，林彪絕大部分沒有讀過。有一張卡片上面寫著：“周予同⁵⁶：托古改制，復古改制……” “梁效”抹去“周予同”三個字，輕而易舉地變成了林彪的罪證。“工作小組”提出否定性意見。王世敏說：“這一條是上面定了的，不能刪。”宋柏年又說：“材料要為政治服務。” “工作小組”的成員指出，這樣搞法，將來影印件拿出來無法向全國人民交代。李家寬則說：“做影印件可以作技術處理，把‘周予同’三個字處理掉。” “工作小組”的成員當即抗議：“這叫做作偽證，我們不能幹！”宋柏年斥之為：“你們這是資產階級法律觀點。” “工作小組”的成員不為所動，進一步搞了一個“梁效”著作中所引用的林彪材料與原件出入的“對照表”，列舉的錯誤有數十處之多。遲群得知，大為惱火：“怎麼找了這麼一幫人來工作？”⁵⁷ “這麼一幫人”中的帶頭羊是北大的張顯揚、王貴秀，粉碎“四人幫”以後他們成為胡耀邦所讚揚的思想解放運動中的“闖將”。

“梁效”的大批判振振有詞，背後竟是弄虛作假、製造偽證的勾

⁵⁶ 周予同（1898—1981 年），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

⁵⁷ 《關於毛家灣“工作小組”有關問題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 年 10 月。

當。“工作小組”的“這麼一幫人”與“梁效”的那麼一幫人，形成鮮明的對照。粉碎“四人幫”以後，“梁效”們的自辯詞總是說，他們是黨組織調來的，個人無任何選擇權。“工作小組”的成員不也是黨組織調來的嗎？他們怎麼就有選擇權呢？他們也曾得到江青的關愛，獲贈芒果。但他們對江青、遲、謝一夥的密謀選擇了抵制和反對。這個“工作小組”的作爲，是對“梁效”的有力駁斥和無情鞭撻。

到毛家灣三進宮非但沒有進一步撈到什麼罪證材料，反而對已發表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產生了質疑，對已形成框架的《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形同拆臺。沒有材料，怎麼辦？負責編纂“材料之二”的王世敏向梁效專案組的交代中寫道：“《孔丘其人》是《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的理論化；《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是《孔丘其人》的材料化。”⁵⁸《孔丘其人》已被外國人批評爲“沒有孔丘的原話”，即沒有材料。將沒有材料的《孔丘其人》“材料化”，能搞出什麼樣的材料，可想而知。沒有材料，只好將理論“材料化”，即以觀點代替事實。“材料之二”前後編了 19 稿，歷時 12 個月，最終還是沒有公佈，可謂難產矣！遲群開出的支票還有材料之三、之四，更無從兌現了。

“批林批孔”演化爲“儒法鬥爭”

“批林”淡出以後的“批林批孔”演化爲“儒法鬥爭”。講“儒法鬥爭”更能爲現實的“兩條路線鬥爭”服務。6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在鬥爭中培養理論隊伍》，姚文元生硬地加了一段話：“兩千多年來的儒法鬥爭，一直影響到現在，繼續到現在，還會影響到今後。”

江青說：“宣傳法家是主要的，也要搞點儒家批註，也是必要

⁵⁸ 《梁效罪證材料》，65~66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的。”⁵⁹ 什麼是江青所宣傳的法家？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的講話中說：

在我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賣國主義的，所有尊法反儒的都是愛國的。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標誌。⁶⁰

在春秋戰國時代，根本沒有“愛國”與“賣國”的觀念，“朝秦暮楚”是尋常事。孔子周遊列國是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都不是。這個區分儒法的“相當大的標誌”，對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就不適用。江青杜撰歷史是為當代“法家”的臉上貼金。

這個“相當大的標誌”是不成立的。還有什麼“標誌”？秦始皇是他們宣傳的大法家，秦始皇的作為就是法家的標誌。江青說：

他（秦始皇）坑的知識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說八道搞政變的，而且是宣傳老天爺的，宣傳迷信的，殺的對。……他（秦始皇）殺的人太少。⁶¹

“焚書坑儒”，這確實是法家的一個“標誌”，而且殺人不能太少。有人自稱超過秦始皇百倍，那就是毛澤東。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講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引起毛澤東的一番議論：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

⁵⁹ 《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1976年10月27日。

⁶⁰ 同上。

⁶¹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的講話。見《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1976年10月27日。

加以補充。（大笑）⁶²

江青定義的這個法家“標誌”是爲毛澤東設計的，根據這個“標誌”，毛就是超越了大法家秦始皇百倍的超大法家，但也只適用於毛澤東。還有什麼“標誌”？江青說：

“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是指漢武帝。內多慾，這樣慾，那樣慾，就是法家而絕非儒家，這是沒說的。⁶³

這個法家的“標誌”，江青是爲“四人幫”及其追隨者、特別是爲她自己設計的。這“內多慾”的一幫，“這樣慾，那樣慾”，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自稱爲當代法家。

1974年6月，王洪文授意“梁效”編寫《儒法鬥爭史概況》，他說：“講儒法鬥爭的歷史一定要結合當前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這樣材料就生動了。”“梁效”編造了一套“儒法鬥爭”從古到今的“歷史經驗”：歸結到一點，要堅持“法家路線”，必須有幾個“在中央決策的法家人物”，必須形成一個“中央機構中的法家領導集團”。不用說，當今的“在中央決策的法家人物”“中央機構中的法家領導集團”就是“四人幫”了。這話，不光是說給老百姓聽的，也是說給毛澤東聽的。要搞儒法鬥爭，就必須對“在中央決策的法家人物”“中央機構中的法家領導集團”委以重任。《儒法鬥爭史概況》以“北京大學儒法鬥爭史編寫小組”的名義出版，在全國範圍廣爲散發。北大還辦了多期“儒法鬥爭史學習班”，組織了“儒法鬥爭史宣講團”，在北京和外地到處宣講，聽眾達60多萬人次。⁶⁴

講“儒法鬥爭”要爲“當前政治鬥爭和路線鬥爭”服務，必須把

⁶²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一）》，見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39卷，267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這一篇文字流傳甚廣，但《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均不見。

⁶³ 1974年6月12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的講話。轉引自《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1976年10月27日。

⁶⁴ 《梁效罪證材料》，115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儒法鬥爭”講得貫穿古今。“四人幫”的幫派體系自稱爲“法家黨”，把他們反對的一方叫作“儒家黨”。爲什麼封建時代的“儒法鬥爭”一直貫穿到社會主義時代？爲什麼現在還要堅持“法家路線”？需要一番論證。“梁效”顧問、哲學家馮友蘭大顯身手了。

“四人幫”對馮友蘭來說是後生小子

馮友蘭說：用“儒法鬥爭”囊括先秦以來 2000 多年的中國歷史是“有理由的，有根據的”，“在戰國時期，堅持革新、進步這條路線的是法家，堅持保守、倒退這條路線的是儒家”。先秦時代，春秋是諸子蠭起、百家爭鳴的時代，不是只有儒法兩家，歷史更不是“儒法鬥爭”可以囊括的。戰國最時行的是“九流十家”中的縱橫家，貫穿合縱連橫的兩條路線鬥爭，也不是“儒法鬥爭”可以囊括的。馮友蘭企圖用“儒法鬥爭”囊括先秦以來 2000 多年的中國歷史，在起點上就說不通。可是他不管說得通、說不通，繼續推論：“我們現在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以前路線鬥爭的繼續。所以我們還繼續用法家、儒家這兩個稱號。這正表明我們不割斷歷史。”現在還要繼續使用法家、儒家的稱號，是從先秦的“儒法鬥爭”推導出來的。這個大前提是靠不住的，所以結論是不成立的。馮友蘭越說越接近現實：“我們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修正主義路線，這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⁶⁵

馮友蘭的方法論是他一貫玩弄的抽象與具體的把戲。先從古代的“儒法鬥爭”抽象出堅持革新、進步和堅持保守、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這是任意的抽象，不是科學的抽象；再從抽象回到具體，用抽象公式套取具體現實，“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修正主義路線，這是從古以來兩條路線鬥爭的繼續”。他做了一個概括：“在社會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隨著社會存在而存在的，在社會中兩條路線的鬥

⁶⁵ 《詠史》初稿後記。這篇後記，見報時被壓縮成幾句話。但刪節了文字沒有刪節思想，這裏所表述的思想，“梁效”上門諮詢時馮友蘭一再重複，成爲“梁效”寫作的指導思想，化入了作品。

爭，就是革新、前進和保守、倒退兩條路線的鬥爭。只要有社會就有兩條路線的鬥爭。”⁶⁶ 這樣一來，中國歷史乃至人類歷史就是革新、進步和保守、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史。這就為“四人幫”編造“儒法鬥爭”史提供了基本線索。馮友蘭是有學問的幫辦，彌補了江青的破綻。“梁效”發表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紅旗》雜誌，1974年第10期），就沒有採用江青的愛國主義和賣國主義這個“相當大的標誌”，而是遵循馮友蘭的兩條路線鬥爭之說。在《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北京日報》，1974年9月9日）中更為明顯，直接引用了馮友蘭的詞句：“法家是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和思想代表，要求革新，要求前進”“而儒家代表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利益，搞‘克己復禮’，搞復古倒退。”惟其如此，才能引出“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就是一條反對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的極右路線，是孔老二以來儒家路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續”。按照馮友蘭的兩條路線鬥爭，把春秋戰國至當代的歷史貫通了。

粉碎“四人幫”以後，馮友蘭向哲學系遞交的《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批判》卻說“當時（即‘詠史’之時）就已經認識到儒法鬥爭只能應用於中國封建社會。所以那幾首詩寫到王夫之以下也就截止了”。正像從“尊孔”忽然變為“批孔”，講“儒法鬥爭”從古到今忽然又說當時就已認識到只能應用於中國封建社會，這就是馮友蘭的不老實了，從文品可見其人品。至於《詠史》寫到王夫之為止，能成為論據嗎？江青要“梁效”寫的《法家人物介紹》只寫到王充，難道他們認為“儒法鬥爭”鬥到東漢就完結了嗎？

哲學系同事王永江、陳啟偉在《再評梁效某顧問》（《哲學研究》，1978年第3期）中評論道：

從政治上來說，“四人幫”是主子，顧問（馮友蘭）是有學問的幫辦。但從理論上來說，作為哲學家顧問先生卻堪為師表，“四人幫”則不過是一些還需要向他多多學習的後生小子。

⁶⁶ 同上。

可見，馮友蘭在“梁效”中的作用，並不是如有人所說僅僅是“作歷史典故方面的顧問”。⁶⁷

“四人幫”是叫賣“馬克思主義”的，卻落入馮友蘭的歷史唯心主義圈套而不自知。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的基本綫索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是社會的物質運動，社會界與自然界一樣，具有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人們認識與否、承認與否、同意與否，它總是按照鐵的必然性在發生作用。歷史上的集團、政黨、階級採取什麼路線，決定於思想政治狀況，是主觀領域的事情。用革新、前進和保守、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代替社會的物質運動、歷史的客觀規律，完全是歷史唯心主義。“四人幫”這些“後生小子”，從馮顧問的革新、前進和保守、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中又領悟出路線是決定一切的。張春橋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是否正確，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決定了這些工廠實際上歸哪個階級所有。”⁶⁸ 梁效則發揮“張春橋思想”，講得更為露骨：“在企業裏，執行什麼路線，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裏，則決定著所有制的性質。”⁶⁹ 根據這些說法，一部分

⁶⁷ 陳來：《一介書生周一良》，《讀書》雜誌，1999年第6期；又見中國戰略與管理網。陳來極力為周一良、馮友蘭等人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表現辯護。他還說：周一良、馮友蘭等人“在四人幫被打倒以後很受到一些論者的不諒解，這些不諒解一方面是出於反對四人幫的激情和正義感，另一方面又是起於對具體事實的不瞭解，而盲目聽信流行的謠傳。”照陳來說，王永江、陳啟偉就是兩個“不諒解”的論者。“反對四人幫的激情和正義感”成了嘲諷，是造成“不諒解”的原因。另一個原因是“盲目聽信流行的謠言”。陳來1978年才考上北大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現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馮友蘭當“梁效”顧問的時候，不知他在哪裏，他對“具體事實”能有多少瞭解？究竟是哲學系的同事王永江、陳啟偉瞭解“具體事實”，還是不知在哪裏的陳來瞭解“具體事實”？陳來畢業後曾當過馮友蘭的助手。陳來的一套說辭不過是遵循儒家的“為尊者諱”而已，何嘗以“具體事實”為依據？“盲目聽信流行的謠言”也是有的。謠言有兩種，或褒或貶。陳來就是盲目聽信了一味褒揚馮友蘭的謠言。

⁶⁸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人民日報》，1975年4月1日；《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

⁶⁹ 北京二七機車輛廠工人理論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路線決定企業的領導權》，《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文章完全是“梁效”炮製的，他們到工廠或農村轉悠一下，就以與“工人理論組”或“農民批

工廠的領導人執行正確路線就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另一部分工廠執行錯誤路線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同一個工廠，今天領導人執行正確路線就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明天領導人犯了路線錯誤馬上就變成資本主義所有制。他們還發明一個新名詞，執行錯誤路線的工廠，叫作“走資派所有制”。所有制成了完全以執行什麼路線（即領導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東西。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線決定所有制，即上層建築決定經濟基礎，這就把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倒過來了。

“梁效”根據馮顧問的革新、前進和保守、倒退的兩條路線鬥爭，為“四人幫”上臺大造輿論。在炮製《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主要執筆者葉朗在日記中多次表示要效忠江青。他說：“鬥爭的路很長，眼光要放遠一些，要時刻記住這次天津之行江青同志對我們的信任、關懷和期望，努力再努力。”“要把注意力從儒法鬥爭的一些所謂理論問題轉到研究儒法鬥爭的現實意義，這樣，寫文章的現實鬥爭性就強了。”他還表示：“要刷新一下自己的精神，要打衝鋒。”文章曾3次送姚文元審閱，姚每次都作修改，第一次就改了40多處。文章中寫道：“西漢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復辟鬥爭中取得勝利”，這和“在中央政權始終保持了一個法家領導集團有很大關係”。這個“法家領導集團”的核心是呂后。說什麼“劉邦死後，實權掌握在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的呂后手裏。在她掌權的十六年中，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文帝以後的幾代，也都重用像晁錯、主父偃、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由於在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在整整七代中得到了堅持。……這是漢代一條十分值得注意的經驗。”由於文稿吹捧呂后過於露骨，發表前姚文元將上述一段文字改為：“劉邦死後，呂后和漢文帝以後的幾代，都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並重用像晁錯、主父偃、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此文發表在《紅旗》雜誌的1974年第10期。欲蓋彌彰。“四人幫”在各地的代理人還是看出其中的機

林批孔小組”合作的名義拋出來。

關，紛紛呼籲“法家領導集團主持中央工作”，以配合江青的組閣陰謀。葉朗事後交代：“我在寫這一段時，就是以江青在天津的那番話作為指導思想的。所謂‘法家領導集團’，就是指江青、‘四人幫’。”“這段話叫嚷什麼要保證‘法家路線得到堅持’，就必須重用‘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在當時的背景下，就是赤裸裸地要求由‘四人幫’上臺組閣。”“這篇文章直接配合了‘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反革命行動部署。”⁷⁰

大講“儒法鬥爭”的司馬昭之心，連兩個外國人都看得很清楚：

新出的有關“儒法鬥爭史”的文章、書籍在中華大地上連篇累牘，層出不窮。有的文章、書籍是想寫成學術作品，……但是更多的是徹頭徹尾的借古喻今，是從派系角度評點當今某些“儒家”的錯誤，其意圖是攻擊周恩來、鄧小平或葉劍英這樣的領導人，是不顧歷史、無恥地吹捧某些所謂“法家”。究其實質不過是在暗中肯定江青的領導地位。⁷¹

說《紅樓夢》、評《水滸》也是戰場

“梁效”開創了“影射史學”，還有“影射文學”。

“梁效”的《紅樓夢》研究也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

江青指使“梁效”寫一篇《賈政其人》，與《孔丘其人》相呼應。文章寫成後，將題目改為《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紅樓夢〉裏的賈政》（《人民日報》，1974年6月28日）。文中，“梁效”瞧著周恩來給賈政“畫像”，說他是“不只有銜而且有權的現職官員”“賈家的

⁷⁰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 82 號，《北京大學關於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台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5頁。

⁷¹ [美]麥克法夸爾、[瑞典]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376頁，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內政外交，……決策大權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他“騙得了許多好名聲，什麼‘端方正直’‘古樸忠厚’‘禮賢下士’等等，儼然是一個超等的‘正人君子’”。最後，點明：“解剖一下這個封建正統人物典型，認清其真面目，將有助於我們提高更好地識別林彪一類騙子的能力。”“林彪一類騙子”是指誰？還用說嗎！

“梁效”的評《水滸》又評到政敵頭上。

毛不看電視、不聽音樂，以閱讀古典文學為消遣。眼力不濟了，就由身邊的“女孩子”為他朗讀。這些“女孩子”讀古典文學實在吃力，張玉鳳提議：能不能從大學裏找個老師來唸？於是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北大中文系選中了四位，毛欽點中年女教師蘆荻。1975年5月26日，蘆荻進入中南海，作為毛的“侍讀”。8月，蘆荻為毛讀《水滸》《紅樓夢》《三國演義》。13日，先讀《水滸》。蘆荻說，對《水滸》的評價一向是很高的，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批判《水滸》的文章，有人說《水滸》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後來傳說，主席有個講話，講到《水滸》。蘆荻問，是否真的？毛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說到對《水滸》的評價，毛回答：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⁷² 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毛澤東肯定魯迅對《水滸》的批評，認為金聖嘆把《水滸》砍掉

⁷² 毛以為這是他的重大發現，崇毛者認為這是他的深刻思想。北大師生在討論中提出：“說宋江不反皇帝，法家也不反皇帝。秦代以來的法家大多不反皇帝。怎樣從本質上區分他們？”（《內部情況》登載《開展〈水滸〉討論和批判的情況反映》，見《北京大學紀事》，下冊，771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當時都在頌揚法家，沒有人回答北大師生提出的問題。

了二十多回，不真實。他提出：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當時在場的張玉鳳又問：現在都說這部書好，到底好在哪裏？毛說：

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⁷³

張玉鳳按機要秘書的習慣，要蘆荻將毛的談話要點整理出來，經毛審閱、認可，存檔。

毛的應答是即興式的，並沒有現實的針對性。因為他提議三種版本的《水滸》都要出，張玉鳳就讓汪東興將這個談話記錄送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5月、6月，經鄧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會議的批評，

“四人幫”已經沉寂了兩三個月。姚文元見有機可乘，不妨借題發揮，立即給毛寫信，要求展開對《水滸》的評論，說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當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並做出宣傳規劃。⁷⁴ 姚在給毛的信中說得如此中聽，毛當然“同意”。於是，將毛關於《水滸》的談話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發至全國。當天，姚就將毛關於《水滸》的談話及他給毛的信，密送“梁效”。

毛將“修正主義”的帽子扣在宋江頭上，古代的故事現代化了。也許他並無深意，但對“四人幫”卻是啟發。本來是文藝評論，毛澤東同意了姚文元的宣傳規劃，就成為政治評論了。《人民日報》1975

⁷³ 《關於〈水滸〉的評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57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又見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48~1749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⁷⁴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第二版（光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年9月4日發表《開展對〈水滸〉的評論》，說評《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這些話，對於一般人來說莫名其妙。“四人幫”又在背後搞陰謀。

江青忽然活躍起來。她通過謝靜宜向“梁效”下達指示：《水滸》的要害一是“架空晁蓋”，二是“拉盧俊義上山”。蕭條了一陣子的“梁效”又緊急動員。遲群說：“這是有針對性的，我們要做這個文章，越快越好。”⁷⁵針對性又是指向周恩來、鄧小平。江青大談評《水滸》的“現實意義”，“就是現在有人要架空毛主席”。將周恩來委託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比附為“拉盧俊義上山”。“梁效”制定計劃，以“屏晁拉盧”為主調，加班加點評《水滸》。揪了“現代大儒”，又揪“現代投降派”，接連拋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評〈水滸〉》《投降主義路線的讚歌——批判〈水滸〉》《評投降派宋江》《評盧俊義上山》《宋江一上山就……》等十多篇文章。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對在場的“梁效”、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北影、長影、新影、法家著作注釋組成員100多人講話：

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⁷⁶現在有沒有人架空

⁷⁵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 82號，《北京大學關於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三：《“兩校大批判組”打擊誣陷敬愛的鄧副主席的陰謀活動》，2頁。

⁷⁶ 江青忘了，兩年以前她還頌揚過宋江。1973年1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團訪華。他們受日本國際放映公司委託，要求為該公司攝製的電視片《水滸》學習武打動作，以便回去傳授。2月2日晚，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陪同日本友人觀看演出。席間，江青向正在創作《水滸》曲譜的日本友人談到，宋江是農民起義領袖，後來受招安了。據此，外賓認為江青把宋江看作“兩面派人物”。接待小組將外賓這一反映寫入了簡報。江青看了發火，說她根本沒有講過宋江是“兩面派人物”，下令追查，是翻譯翻錯了還是簡報寫錯了？為此，2月22日，江青特地召集中聯部、外交部和對外友協的一些同志談《水滸傳》，進行糾正。她說：“《水滸》中的主要人物宋江，是真實的歷史人物。我們應該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宋江等農民起義的領袖。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歷史人物，有智、有謀、有正義感，喜歡劫富濟貧，能團結人，因此受人民群眾的愛戴，人們稱他‘及時雨’。在封建社會中，官逼民反，

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她還說：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⁷⁷

當事人蘆荻在 1975 年 9 月離開中南海之前，給毛澤東醫療組成員講課，講怎樣讀《水滸》。她講到：“現在有人說黨內有投降派，要抓現代的投降派，毛主席完全沒有這個意思。”⁷⁸以江青為首的左派要抓“現代投降派”，只有一個人深知其中奧秘，那就是周恩來。

1973 年 11 月，政治局的“幫周會議”曾給周恩來戴“投降主義”的帽子，因此他對評《水滸》、批“投降派”的動向十分關注。他找來幾個版本的《水滸》，進行研究。他說：“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指向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⁷⁹周恩來在病中，一再受到精神上的打擊，終於爆發了。他在做第四次大手術前，後果難料。他要人找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錄音記錄稿，把自己關在盥洗室，仔細看一遍。門外的人怕他出事，敲門，不開。一個多小時後，他出來了。用顫抖的手在記錄稿上簽了名，特註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9.20”。他大概想到這可能是別有用心的人把他打成“投降派”的把柄。

宋江被逼上梁山後，領導起義，同封建統治階級堅決鬥爭，起了很大作用。這些積極方面，應充分予以肯定。另一方面，應看到宋江由於出身於地主階級，有階級的局限性和動搖性。他有一種正統觀念，認為不能反皇帝，以至對皇帝的招安抱有幻想，認為可以戴罪立功。”（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黨的核心小組：《江青投降主義醜惡靈魂的自我暴露——吹捧投降派宋江是“英雄人物”》，1976 年 10 月 28 日。）江青在評《水滸傳》的運動中常常給人扣“投降主義”的帽子，這個揭發材料把“投降主義”的帽子反扣在她自己頭上。其實，都是亂扣帽子。

⁷⁷ 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500 頁，台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⁷⁸ 楊建業：《在毛主席身邊讀書》，見《毛澤東同志八十九誕辰紀念文選》，225 頁。

⁷⁹ 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352~353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文革中，1967年5月，天津紅衛兵在舊報紙上查到《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以下簡稱《啟事》）。“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紅衛兵將文章的影印件送給江青。江青一看，如獲至寶。1967年5月17日，她給林彪、周恩來、康生寫了一信，並附上《啟事》。信中寫道：“他們查到了一個反共啟事，為首的是伍豪（周XX），要求同我面談。”江青向周恩來發起進攻。19日，周恩來在江青的信上寫了一段話，予以回擊：“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純屬敵人造謠。只舉出‘二百四十三人’，無另一姓名一事，便知為偽造無疑。我當時已在中央蘇區，在上海的康生、陳雲同志均知為敵人所為，故採取了措施。詳情另報。”同時，他又給毛澤東寫信，說明事實真相。1931年12月，因處境險惡，周恩來離開上海，經秘密通道進入江西瑞金中央蘇區。1932年2月，上海的《申報》《時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刊登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當時留在上海的陳雲、康生都做證，這是國民黨的造謠污衊。毛澤東還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發出佈告，云：“事實上伍豪同志正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任軍委會的職務，不但絕對沒有脫離共產黨的事實，而且更不會發表那個啟事裏的荒謬反動的言論，這顯然是屠殺工農兵而出賣中國於帝國主義的國民黨黨徒的造謠污衊。”⁸⁰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心懷叵測，惡意搜集周恩來的材料。1967年10月，她在釣魚臺對吳法憲說：“我這裏什麼人的材料都有。”她指了一指，“這一口袋是周總理的材料。”⁸¹

周恩來深知江青其人，她可以製造偽證把劉少奇打成“叛徒、工賊、內奸”，難道就不會利用這個偽造的《啟事》製造事端？故十分警惕。1972年6月23日，周恩來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做了《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專題報告，並根據政治局的意見，將報告的錄音和根據錄音整理的記錄稿及有關文獻資

⁸⁰ 《關於國民黨造謠污衊地登載所謂〈伍豪啟事〉問題的文件》（周恩來生前親自編定），《黨史研究》，1980年第1期；又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463頁，注釋[2]。

⁸¹ 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406頁，台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料，存入中央檔案館，同時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各保存一份，以便黨內瞭解事件真相。事後，這個措施沒有落實。周恩來不放心，生怕有人在他身後做手腳，故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要再一次敲定這個文件，留得清白在人間。一向逆來順受的周恩來，發出最後的怒吼。在進入手術室的走廊裏，他在平推車上大聲喊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場的醫務人員，還有鄧小平、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鄧穎超，都怔住了。只有鄧穎超能瞭解周恩來憤憤不平的心情，她要汪東興將此情此景報告毛澤東。這是周恩來最後的抗爭。⁸² 葉劍英說：“總理啊，你是累死的、氣死的、委屈死的……”⁸³ 曾在他身邊工作過的顧保孜、杜修賢在他們的回憶錄中寫道：

周恩來一生忍辱負重，不計個人得失。他年輕時沒有享受過人生，沒有子女，沒有家產，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惡毒攻擊。屬於自己的唯剩這把隨時都會化為灰燼的忠骨。他忍受了許多許多，唯獨不能忍受對他政治生命的踐踏。在生命最後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為了一個不應該讓他承受的冤案申辯，為保護清白的政治名譽而不惜耗盡最後一絲精力！⁸⁴

更為令人驚奇的是，周恩來居然對張春橋說：“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好幫助王洪文同志，他還年輕。”他對蓄意要把他打成“投降派”的人卻顯出一片善心。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⁸⁵

⁸² 高文謙：《在最後的日子裏——記病重住院的周恩來同志》，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67 年紀實》1，79 頁，北京，華夏出版社，1986。又見《周恩來癌症手術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黨史博覽，環球網；《“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周恩來在人生最後階段》；《周總理為什麼至死疾呼——我不是投降派！》（藍劍軍團），鐵血網。

⁸³ 鐵竹偉：《我心中的周恩來》，《文匯》月刊，1989 年第 12 期。

⁸⁴ 顧保孜、杜修賢：《周恩來最後 600 天》，556 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

⁸⁵ 同上。

“梁效”式的大批判風行一時

“梁效”還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時評，宣揚一個又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謬論，左右全國輿論，諸如：“路線決定企業的領導權”“領導權決定所有制的性質”“政治決定經濟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按勞分配是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是產生新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狠批唯生產力論”“老幹部從民主派到走資派”“一切矛盾的對立面都是對著幹”等等。

1975年，在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中，“梁效”又抓住“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大做文章，吹捧張春橋。

毛澤東在關於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指示中說：

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他在長沙與周恩來的談話還說道：

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⁸⁶

張春橋寫了一篇《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發表在《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文中強調要反“資產風”。

毛澤東要張春橋“寫這類文章”是有來歷的。1958年10月，張春橋在上海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此前的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說：“等級制度，腦力勞動者工資多，體力勞動者工資少，這是資產階級法權。”柯慶施向張春橋透露了精神。張春橋

⁸⁶ 《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要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13頁，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500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迎合上意，提供了刮“共產風”的理論依據。張春橋從 1958 年刮“共產風”到 1975 年反“資產風”，一以貫之。

毛看了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命《人民日報》轉載（1958 年 10 月 13 日）。毛澤東寫的“編者按”中說：

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 6 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即使按毛的左傾標準，還指出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張文發表後，也有許多反對意見。1975 年 2 月，江青在與“梁效”成員座談時，竟說“春橋文章反映了主席思想”。“當時劉少奇一夥推出陳伯達等來攻擊，按語加上‘有一些片面性’兩句，在當時是為了容易發表。”“梁效”更進一步，說：“張春橋文章沒有片面性，毛主席這樣批示是為了向陳伯達讓步。”他們編了一本《關於 1958 年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大辯論》的材料。李家寬說：要把那場辯論寫成“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材料的按語中說：張春橋“代表正確路線”，還強調這場大辯論的“現實意義”。材料的炮製者後來交代：“在編這個材料時，當時我就把張春橋看成是最早響應毛主席號召，提出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領導人，而且認為他在 1958 年就提出來了是不簡單的，因而把他看成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模範。我們當時的指導思想就認為 1958 年張是正確觀點、正確路線的代表，盡力吹捧他，為他評功擺好，招搖撞騙。”⁸⁷ 其實，張春橋的反“資產階級法權”豈止“有一些片面性”，而且充滿虛偽性。據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副司令員詹大南揭發：“張春橋的女兒結婚，請了 50 桌客，收的禮物有西德進口的 29 吋電視機兩部，國產電視機 7、8 部，可以開一個電視機公

⁸⁷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 82 號，《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 年 5 月 15 日，附件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台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7 頁。

司了。”⁸⁸

3 年中，“梁效”共寫了 219 篇文章，在《紅旗》雜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北京大學學報》等權威報刊上發表了 181 篇（見第十二章附二），其中，36 篇是“四人幫”直接授意的命題作文。文章一經發表，全國各地大小報刊必轉載，被視為釋放中央高層的信息，30 多篇成為當時圈定的學習文件。他們還編寫了 100 多種材料（其中突出的有為張春橋塗脂抹粉的《關於 1958 年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大辯論》，把江青比附為列寧夫人的《關於二、三十年代蘇聯兩次教育大辯論》等），搜集和整理中央和地方負責人的“黑材料”30 餘份。

還有追隨“梁效”的“班子”、上海市委的“羅思鼎”、北京市委的“洪廣思”、中央黨校的“唐曉文”、文化部的“初瀾”、《紅旗》雜誌的“池恒”，一齊興風作浪，所作所為統稱“‘梁效’式的大批判”。

“‘梁效’式的大批判”開啟了一種惡劣的大批判文風，虛張聲勢，誇大其詞，亂戴帽子，胡掄棍子，特別是歪曲地摘引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著作，用來嚇唬群眾。1976 年 1 月 15 日，“梁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文中說：“列寧曾經深刻地指出，舊學校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是為資產階級政治服務的，‘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幹的工人’（《列寧全集》，第 28 卷，69 頁）；列寧這個精闢的論斷，擊中了舊學校的要害，揭露了它的階級實質，是批判舊教育制度的銳利武器。”列寧的原話見於 1918 年 8 月 28 日《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這裏所說的學校是“資產階級國家的學校”，“梁效”很方便地把它變成“舊學校”，於是證明中國文化大革命前的學校就是這樣的“舊學校”，好像列寧的語錄是為“四人幫”準備的。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1976 年 10 月 4 日）一文中，“梁效”為了說明恩格斯“堅持馬克思的既定方針”，運用了不光彩的手

⁸⁸ 《廖漢生、詹大南同志在南京軍區常委擴大會上揭發張春橋的罪行》。

法。文章引了列寧的一段話：“從馬克思逝世以後，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總是始終不渝地在‘矯正’被德國機會主義者所歪曲的路線。”一查原文，這段話前面還有幾個字：“從那時起，特別是……”（《〈約·菲·貝克爾等致弗·阿·左爾格等書信集〉俄譯本序言》，《列寧選集》，第1卷，699頁。）“那時”是1882年，馬克思還沒有逝世。列寧引了恩格斯1882年6月20日給左爾格的信中批評伯恩斯坦派的一番話，然後寫下了上述“從那時起……”的一段話。本來是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開始的對伯恩斯坦的批評，抹去幾個字，在“梁效”的筆下就很方便地變成了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以後“按既定方針辦”。這種引證的隨意性，是“梁效”的一貫文風：掐頭去尾、腰斬截肢、移花接木、張冠李戴等等，都是慣用的手法。

“梁效”的特殊使命

葉劍英指出，“四人幫”的活動是“遼海兩校一綫穿”。“梁效”就是串通遼寧和上海的據點。他們與“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經常保持電話聯繫、書信來往、人員互訪。

“梁效”與“四人幫”在遼寧的死黨毛遠新也關係密切，來往頻繁。從1974年底到1976年9月，他們之間的串聯活動達11次之多。此外，“梁效”與文化部的于會泳、教育部的薛玉珊、天津市委文教書記王曼恬、湖北造反派頭頭夏邦銀、江西造反派頭頭翁森鶴等，也有秘密聯絡。

“梁效”的郁龍余是負責行政工作的，遲群就經常派他迎來送往。他在交代中承認“梁效”是“一個秘密聯絡點”：

從他們頻繁而詭秘的活動中，可以知道他們是如何幹著見不得人的勾當，是如何陰謀篡黨奪權的。也可以看到大批判組這個名義上是個寫作班子，實際上在遲群、四人幫這場篡黨奪權的陰謀中具有重要地位，起了十分惡劣的作用。大批判組不僅替四人幫寫了許多反黨黑

文，而且是他們一個秘密聯絡站。⁸⁹

“梁效”與“四人幫”在各地的爪牙及風派（見風使舵的）、震派（鬧地震的）人物建立了聯繫，他們紛紛打小報告、送黑材料。3年中，“梁效”共收到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和部隊的來信、來文2000多件，都及時摘要、編排，密報“四人幫”。有一部分，編成《來信摘報》，上送下發，供“批判”用。其中，有的是請他們轉黨中央、毛主席的，他們竟擅自處理。他們還為江青代擬復信。

1974年，王洪文利用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機會，私自決定讓“梁效”給中央政治局成員選送“學習材料”。每周送一篇至三篇，每篇送37份，兩年多時間共送了171篇。凡是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華國鋒的文章悉數奉上。

1976年春天，江青命“梁效”派8個組到20多個單位調查“黨內資產階級問題”。

總之，“梁效”不僅是寫作班子，還是從事特殊使命的秘密機關。梁效專案組說他們是“四人幫”的“偽中辦”。

⁸⁹ 郁龍余交代，1978年6月4日。《梁效罪證材料》，28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第八章

“梁效”顧問叫誰“敢於作皇帝”？

“梁效”的全部事業無非是兩個方面，在攻擊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華國鋒的同時，哄抬“四人幫”，特別是美化、吹捧、擁戴江青。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江青異常活躍，離京出巡，到處講話，批發材料，儼然以“旗手”自居。而“梁效”則宣揚武則天、呂后。為江青上“紅都女皇”之位大肆鼓吹，充當“北門學士”¹。

江青自比武則天

1967年，文革中發生所謂“二月逆流”時，譚震林罵江青是“當代武則天”。江青撒野：“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又怎的？她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我就是要學她！”江青以武則天自比。1974年6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會堂批林批孔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

為什麼武則天得人心？在那樣的社會一個女人能當皇帝，重臣為她所用，就是因為她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基礎比李世民寬多了。當時

¹ 武則天物色了一批文人學士，名義上是修撰著作，實際上是組建智囊班子，參與朝政，分宰相權。這些人被特許從北面的玄武門出入禁中，他們常在門前集合，故人稱“北門學士”。

20 萬人上書要武則天當皇帝嘛！這一定有她的社會基礎，她的政策符合更廣大的地主階層。²

“梁效”立即寫了一篇《法家女皇武則天》，後來覺得題目太露骨，按照江青自己對武則天為“女政治家”的稱呼，改作《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但改了題目沒有改內容，文章一開頭就說：“在我國兩千多年漫長的封建社會裏，出現過一位女皇帝，這就是：唐朝的武則天。”最後的結論又說：“……稱之為：法家女皇武則天，應該說這是符合歷史實際的。”江青愛騎馬，文中大寫武則天馴馬，讓人產生聯想。（《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

1976年3月，周恩來逝世了，鄧小平被打倒了，毛澤東病重了，江青放肆地說：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武則天，一個女的，在封建社會當皇帝啊，同志們，不簡單啊，不簡單！她那個丈夫也是很厲害的，就是有病。她協助丈夫辦理國事，這樣鍛煉了才幹。

他們就是用下流的東西誹謗武則天，誹謗呂后，誹謗我。³

江青自居武則天、呂后之列，當女皇的野心畢露無遺。她還有實際步驟。遲群、謝靜宜向“梁效”交代：“江青同志很重視古代服裝、髮型，主要是唐代的”，又說“主要是女的”“也是為了古為今用嘛！”。“梁效”的頭頭李家寬心領神會，立即派人到許多文物機構、圖書館、博物院查閱資料、圖片、實物，說這是“政治任務”。花了兩個多月，寫了16000多字的唐代服飾材料，繪出40多張圖樣，報送江青，為江青登基當女皇做準備。⁴

² 《梁效罪證材料》，109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³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中央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擅自召集的12省、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336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⁴ 《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3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又見《梁效罪證材料》，116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1974年6月，在從天津去寶坻的火車上，江青指著自己設計的服裝，向隨從們鼓吹穿“古代沒領的服裝”。王世敏當場畫了一張圖樣，稱之為“江青服”。

江青為了見菲律賓馬科斯總統夫人，特地制作了“皇帝服”和“太君鞋”。江青自己看了也覺得不像樣，沒有穿。⁵

在那個時代，提到武則天就想起江青，提到江青就想起武則天。范達人卻說：“我們在起草《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時，……無意把武則天與江青作歷史的比擬。”⁶他的“尖刀班”同伴、文章的合作者何芳川，說法不同：

在炮製《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一文過程中，當寫到武則天的“北門學士，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的時候，自己頭腦裏閃過這樣的念頭，覺得遲、謝帶著“兩校大批判組”部分成員，又是接見，又是座談和陪同“出巡”，不是頗有點“北門學士”的味道嗎？遲群和謝靜宜，一個主持科教組，又主持“全國法家注釋會議”，一個身兼數職，不是也有一步一步分總理權的樣子嗎？上述這種“聯想”，正是一種御用文人的意識。自己就是帶著這種御用文人的念頭，積極貫徹了江青關於武則天的各項黑精神，大肆鼓吹武則天，為江青篡黨奪權當女皇製造了反革命輿論。⁷

何芳川自認完全具有“御用文人的意识”。“梁效”的御用文人豈止何芳川一人？范達人和何芳川，兩個同案人，其說不一，旁觀者不難判定真偽。看來何芳川比范達人要誠實一點。

⁵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561頁，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⁶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71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⁷ 何芳川交代材料，1977年7月7日。《關於原“兩校大批判組”成員何芳川的初步審查情況》，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7年9月22日。

女的要掌大權

1974年6月22日，江青帶了一幫“梁效”人從天津到小靳莊，召集一個“批林批孔”匯報會。會上，江青批判“男尊女卑”，鼓吹婦女應該掌大權，改變政治局的“大男子主義”。她還有一番論證：

你們學過政治經濟學嗎？生產力中人是最活躍的。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因此在生產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

在氏族社會，是女的當家。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將來管理國家的還得是女同志。到了共產主義也有女皇。我在政治局講這些話，他們還直撇嘴。

然後就抱怨：

在政治局我是單幹戶。我們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義。到了掌握政權，都出來了，一把抓。就我一個，他們沒有辦法，只好要我，這回要改變。⁸

江青說“這回要改變”，變成什麼？她在小靳莊的另一次講話直截了當地說：“男的要讓位，女的來管理。”那就是男的要讓位給女的江青來管理。遲、謝把江青的這些話視為“黨的核心機密”“極為重要的首長精神”，責令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向“梁效”的留京人員，以及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副書記魏銀秋、郭宗林傳達。執筆寫作《法家女皇武則天》的何芳川事後交代說：“看到江青‘出巡’的架勢和排場，覺得江青真要當接班人了。我們寫《武則天》時，自己就在這種潛意識的支配下，積極貫徹江青關於武則天的各種黑精神，大肆吹捧武則天，為江青上臺大造反革命輿論。”⁹

⁸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82號，《北京大學黨委關於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臺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2頁。

⁹ 同上。

江青盡量從歷史上找“女的來管理”。除了武則天、呂后，她說：“西太后（慈禧）你們知道嗎？名為太后，實際上是女皇帝。”她還說：“蕭太后是了不起的。”又說：“漢武帝的皇后衛子夫要宣傳一下。”¹⁰一般人都不知道“蕭太后”是誰，她是遼景宗的皇后，以太后臨朝，掌握了遼國的大權。江青是挖空心思找出來的。

江青為了強調“女的來管理”，以致美化封建社會裏女人的地位。她說：“漢朝的女人還是比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麼叫‘面首’？同志們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¹¹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裏，缺的就是自由。女人對沒有自由的男人還要“三從四德”，更沒有自由。而江青所說的“自由”是“可以有‘面首’”，不過是她自己暗中迷戀的“自由”而已。

顧問詠史頌女皇

1974年6月12日、14日，馮友蘭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由江青主持，主要內容是要求加強“尊法反儒”的宣傳。馮友蘭高度近視，看不清人，只知道有王洪文參加了會議。17日，謝靜宜通知他外出開會，並規定與會者不准寫信、不准打電話、不准上街，很是神秘。到達天津後才知道是參觀小蘄莊。第二天上午，馮友蘭還和江青、王曼恬（王海容的姑姑，天津市委文教書記）等人聊天，誰知下午，左腿丹毒發作，進了醫院。

馮友蘭隨江青“出巡”天津期間，有病還不忘效力，躺在病床上哼了一組《詠史》詩，發表於9月14日的《光明日報》。他在後記中說：“躺在床上，什麼事也不能做，但是還可以想。近來我聽到了中央領導同志對歷史人物的評價，自己覺得也還是有一點體會。”

¹⁰ 1974年6月21日，江青在天津的講話。《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1976年10月27日。

¹¹ 1974年6月19日，江青在天津的講話。同上。

馮友蘭從“中央領導同志”那裏聽到了什麼？

我國歷史上，自春秋戰國以來，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賣國主義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愛國主義的，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標誌。歷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壓的，他們是基層起來的，要鬥爭；凡是有作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還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總的來看，歷史上法家是愛國主義的，對群眾是愛護的，使群眾受到鼓勵；儒家對群眾，奴隸也好，農民也好，對我們工人階級也好，他們是殘酷無情的。你們不要以為社會主義沒有儒了，我們黨內就出了不少儒。這次運動重點是批“黨內的大儒”。

1974年6月19日，從晚上7點半到次日凌晨，江青主持了千餘人參加的天津市儒法鬥爭史報告會。這是在會上講話的開頭部分。¹²

馮友蘭說：“中國的舊詩中本來有詠史這個傳統題目。我也想寫幾首詩，把我的一點體會記錄下來。”先是寫了18首“體會”。不僅動筆，而且還動口，向周圍的人宣講“儒法鬥爭”，竟使“病房成了會場”。回北京後又繼續寫“體會”，增至24首，臨發表前又加一首，共25首。其中的第11首特別刺眼：

破碎山河復一統，¹³
寒門庶族勝豪宗。
則天敢於作皇帝，
亘古反儒女英雄。¹⁴

詩是打油，不合格律，毫無詩意，但功夫在詩外，向江青諂媚的

¹²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93~1094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¹³ 此句與史實不符。武則天之前，大唐未曾有過“破碎山河”。武則天之“一統”稱帝是690年。發生“破碎山河”的安史之亂（750年）是在武則天的孫子唐玄宗時期，乃武則天“一統”之後的60年。時序顛倒，教授見笑了。

¹⁴ 《梁效罪證材料》，115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韵味十足，完全是演繹江青“女人能當皇帝”的那番話。馮友蘭用心良苦，後兩句 14 個字竟是反復推敲、三易其稿而成。先是“太宗雄略高宗弱，則天代起繼唐功”，此句不過敘述史事，太過平淡；隨後改為“則天繼續太宗業，唯一法家女英雄”，則天成了主角；馮仍嫌筆力不夠，最後定稿是“則天敢於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這才表達了勸進效忠之意，也撩撥了江青的野心。你要做“反儒女英雄”嗎？就得“敢於作皇帝”。“梁效”中的另一位老教授魏建功，跟隨江青出巡以後吹捧道：“江青同志統帥許多方面指揮若定。”表示“要學習江青同志勢如破竹的革命精神”，還說“要拼著老命幹”。

作家舒蕪¹⁵以詩刺之：

貞元三策記當年，又見西宮侍講筵。
莫信批儒反戈擊，悽悽南子是心傳。

舒蕪的《四皓新詠》，另有三絕分詠魏建功、周一良、林庚。

詩人盲目（指愛羅先珂）爾盲心，白首終愧魯迅箴。（1923 年，魯迅曾爲文“斥魏建功”。）

一卷《離騷》進天后，翻成一曲雨鈴霖。

射影含沙罵孔丘，謗書箋鑰護奸謀。（這一句是誤傳。當時傳說，周一良房間的保險櫃裏藏有反周總理的黑材料。解放軍拿槍逼著他，才把鑰匙交出來。周一良是“走讀”，深夜查封“梁效”時，他不在現場。）

先生熟讀隋唐史，本紀何曾記武周？

¹⁵ 舒蕪（1922—2009 年），本名方管，安徽桐城人。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著作甚豐。曾爲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大學教授。20 世紀 50 年代，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70 年代任《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編審。1955 年 5 月 13 日，《人民日報》以《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一些材料》爲標題，公佈了舒蕪交出的與胡風的來往信件。胡風等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團”，全國掀起反胡風運動。胡風案平反後，舒蕪遭人非議。本人自辯，交出信件並非出於主動。人民日報記者葉遙向舒蕪約稿，舒蕪在文中引了胡風給他的信。葉遙要求核對原件，舒蕪交出信件後，被編輯部主任上交。

進講唐詩侍黛螺，北京重唱老情歌。
義山未得擣扯厄，拉入申韓更奈何！¹⁶

“四皓”為秦末漢初（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四位隱士：東園公唐秉、角（lù）里先生周術、綺里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他們本是秦朝 70 位博士中的 4 位，秦亡後，隱居商山（今陝西省商洛市境內）。後為呂后收買，出山時，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故曰“商山四皓”（見《史記·留侯世家》）。舒蕪以喻“梁效”的四個老頭為“四皓”，也有人稱之為“新四皓”。

學者唐蘭（1901—1979 年，著名歷史學家、文字學家、青銅器專家）、王利器（1912—1998 年，著名文字學家）還作詩與舒蕪應和，為文壇一時之興。

唐蘭《和四皓新詠》詩云：

貞元世論闡天書，元老丘明學謫儒。
耳畔博然環佩響，招搖過市女同車。

盲目詩人辱愛羅，少年輕薄記曾呵。
淮纓灌足須重論，山鬼（魏建功號山鬼）能知事幾多。

司寇重新論孔丘，尚須含蓄隱機謀。
捉刀盡爾翻雲雨，學舌鸚鵡豈識羞。

獮祭蟲魚老玉溪，巫山滄海總無題。
鄭箋昨日翻新樣，前度劉郎漫比齊。

王利器《和新四皓》詩云：

東魯歸來道益尊，無端狗曲恣窮經。
世間笑罵由他去，自有諸生呼聖人。

盜丘女褐啟宗風，國予先生一脈通。

¹⁶ 引自周一良：《畢竟是書生》，78 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若問當年齊楚事，是琳是傳大江東。

通黃轉綠無定期，又是經筵侍講時。

一部宮闈形管史，野雞先諱漢宮儀。

美人芳草寄幽思，不盡閒扯說楚辭。

自古談詩無達信，腐儒集注有朱熹。¹⁷

哲學系的同事王永江、陳啟偉評論道：

顧問（指馮友蘭）過去講“應帝王”的時候用了《老子》的一句話：“能受國之垢者，始可爲社稷主”（《新世訓》第十篇《應帝王》），也就是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韙，“敢於作皇帝”的意思。這個話過去顧問是講給獨夫民賊蔣介石聽的，現在則是講給他心目中“天之歷數在爾躬”的“幫”主大野心家江青聽的。所不同的是，現在比過去講得更加露骨、更加肆無忌憚。顧問先生不愧爲《應帝王》篇的作者，時隔三十多年，益發精於此道了。¹⁸

又誇呂后了不起

1974年6月12日、14日，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梁效”“唐曉文”等寫作班子，並進行座談，江青說：

呂后了不起！一道幫助劉邦定天下，劉邦沒有果斷地殺韓信，只是貶了韓信，而呂后果斷地殺了韓信，這樣就斷了後患。劉邦死後，呂后獨自掌權。劉邦死後漢朝爲什麼沒有亂？就是因爲有呂后。呂后是執行法家路綫，漢高祖的路綫。¹⁹

¹⁷ 見豆瓣網。

¹⁸ 王永江、陳啟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

¹⁹ 《憤怒聲討“四人幫”插手北京大學，利用兩校大批判組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劉鴻儒代表北大宣傳隊在北京市科教系統大會上的發言，《大字報

1974年6月18日，江青在天津第二招待所的講話中說：

我現在覺得有一個歷史人物值得考慮，呂后。她是偉大的政治家，封建政治家，法家，不能低估。因為劉邦去世後，沒有亂，以後才有文、景、武、昭、宣。

第二天，江青在天津站向工人宣講“儒法鬥爭史”。她推薦《北京日報》上刊載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然後又說：

呂后要作為單獨的一條，突出宣傳一下。因為她輔佐高祖定天下，高祖死後，她繼續了法家路線，經文、景、武、昭、宣幾代皇帝，直到元帝才轉向尊孔。²⁰

江青不懂裝懂，信口亂說。明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她卻說他是“法家路線”。

遲、謝派宋柏年連夜回北京，向留守的“梁效”頭頭李家寬傳達江青的旨意。“梁效”立即撰寫了單獨的《法家人物介紹——呂后》，文中大肆吹捧，歪曲歷史，說什麼“劉邦死後，呂后掌權。她為人剛毅，曾佐高祖定天下。當政後，繼續推行法家路線”。李家寬派專人去天津，將稿子送遲群、謝靜宜和江青審閱。江青親自決定，送回北京，讓《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同時發表。

後來，江青果然自己招認：

有人寫信給林彪說我是武則天，又有人說我是呂后，我也不勝榮幸之至。呂后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實際上政權掌握在她手裏，她是執行法家路線的。²¹

選編》，第1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0月26日。

²⁰ 《梁效罪證材料》，112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²¹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中央批鄧打招呼會議期間擅自召集的12省、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336頁，長春，吉林人民

江青接見法家著作注釋工作會議與會人員時，她一開口就說：“聽說出土了呂后的玉璽，這很重要，把它弄來給我看看。”玉璽是“沒有戴帽子的皇帝”呂后掌權的信物，江青大有興趣。

馮友蘭的《詠史》詩也與之配合，將呂后提升到與劉邦並列的地位：“秦帝巡行東復東，趙高叛變路途中。項王倒退烏江死，劉皇呂后繼秦功”（《詠史》第5首）。“梁效”中有人認為將呂后與劉皇相提並論太過分，馮友蘭改為“漢祖繼秦歌《大風》”。改來改去都是“繼秦”。馮友蘭多次說，一個朝代推翻前朝就是繼承前朝。馮友蘭在《詠史》初稿後記中有一番注解。他說：“我們講歷史，所著重的，不是朝代的廢興，而是歷史發展的階段，從現象上看，一個朝代反對另一個朝代，把它滅了，取而代之。他們是互相反對的。但從歷史發展階段看，一個朝代往往是接著前朝所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繼續它的事業，一個新的統治者的地位變了，他的作用也就變了。我的詩中所說的‘繼秦功’‘繼唐功’，就是這個意思。”這是馮友蘭的老調子，早在《貞元六書》的時代，他就說：“新”與“舊”並非斷然可分，“社會上的事情，新的一方面都是舊的繼續”（《新事論》），“一新社會的出現，不是取消一舊的社會，而是繼承一舊的社會。社會中任何事，如思想，文學，藝術等，均是如此。”“革命是演化中之一事”（《新理學》）。更早，在《中國哲學史》中，他就這樣說了：“社會組織，由簡趨繁，學術由不明晰至於明晰。後人根據前人已有之經驗，故一切較之前人，皆能取精用宏。故歷史是進步的。”在馮友蘭看來，所謂歷史的“進步”，只是“由簡趨繁”“由不明晰至於明晰”，不過是事物量的增減而已。

按照馮友蘭的這種“吾道一以貫之”的形而上學歷史觀，歷史中沒有質變、沒有飛躍，所謂的“發展”，只是平滑的進化。

馮友蘭的《詠史》第21首云：“撥開迷霧見青天，千年國史還真相。”他和“梁效”編造的“儒法鬥爭”改寫了歷史，這就是“千年國史還真相”？《詠史》第24首說：“上窮往古下今日，安排基

業與後人。”就是說，“四人幫”搞所謂“儒法鬥爭”是要解決由誰來“安排”中國的“基業”和接班的“後人”。“梁效”一再強調，堅持法家路線，就必須有幾個“在中央決策的法家人物”，必須形成一個“中央機構中的法家領導集團”。在他們看來，“儒法鬥爭”從古到今，歷史的重任已經落在“四人幫”的肩上。

在籌備四屆人大之際，江青積極活動。她要王洪文取代朱德做未來的委員長，張春橋當未來的總理，而她自己就是毛澤東之後的中共中央主席了。“梁效”在《紅旗》雜誌 1974 年第 10 期發表的《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把江青的意圖表露無遺：“劉邦死後，呂后和漢文帝以後的幾代，都繼續貫徹了劉邦的法家路線，並重用像晁錯、張湯、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讓他們在中央主持工作。由於中央有了這樣一個比較連貫的法家領導集團，才保證了法家路線得到堅持。”劉邦就是毛澤東的代名詞，呂后就是江青的代名詞，晁錯、張湯、桑弘羊就是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代名詞，法家領導集團就是“四人幫”的代名詞。

在毛澤東逝世後，“梁效”們又拿呂后說事，論證“按既定方針辦”。據說由於呂后按劉邦的“既定方針”辦，才穩定了漢初的局面。劉邦的“既定方針”是什麼？沒有說明。

呂后恰恰違背了劉邦的某項“既定方針”。劉邦與大臣有約：“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呂后大封諸呂，稱王稱侯，開外戚禍亂之始。恰恰是絳侯周勃誅殺諸呂，執行了劉邦的“既定方針”。呂后的同時代人和後來人，除了江青和追隨江青的馮友蘭等人，有誰承認呂后是法家？

“梁效”為江青效勞的多功能

毛澤東告誡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掄鐵棍子。江青絲毫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梁效”是這兩個工廠的門市部，大批量推銷帽子和棍子。有了“梁效”，江青如虎添翼。“梁效”不僅是江青的寫作“班

子”，還是秘書“班子”，情報“班子”。

“梁效”充當江青的特使，到處送信、送材料，還代替她抓點。江青宣稱 20 軍防化連和天津小靳莊是她抓的點。防化連，她一次也沒去過，都是“梁效”不斷去人，幫他們修改詩歌、修改《法家軍事著作注釋》，送出去發表。“梁效”又懲惡防化連給江青寫致敬信。小靳莊，江青倒是去過，但認識的人沒有幾個。她就派宋柏年帶上攝影師去給社員和幹部照相，每張照片背面寫上姓名、職務。江青坐在家裏用翻閱照片的辦法“聯繫群眾”。

“梁效”還編造了小靳莊層出不窮的“新氣象、新事物”十大件，作為江青抓點的成果。江青要求社員人人都會唱樣板戲，佔用勞動時間安排專人教唱。同時，調來大批解放軍戰士和機關幹部替他們“義務勞動”。有人嘲諷，小靳莊是“社員唱戲，請人種地”。²²

《人民日報》1974 年 8 月 4 日報道了“天津市寶坻縣小靳莊十件新事”，向全國推廣。據《天津日報》統計，從 1974 年 6 月 25 日到 1976 年底，共發表宣傳小靳莊的稿件 466 篇。從 1974 年 8 月 21 日至 11 月 7 日，有 27 個省市 512 個單位 18000 餘人到小靳莊參觀。²³ 爾後，各地到處有“十件新事”，弄虛作假成風。

“梁效”是江青的侍讀。1975 年，毛主席號召“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中共中央發通知，號召全黨學六本書：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

恩格斯：《反杜林論》

列寧：《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列寧：《國家與革命》

²² 見《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第 7 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 年 3 月 25 日。

²³ 王輝《天津文革親歷記》第 204 頁。

江青也裝模作樣地學起來了，但要“梁效”在《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書上重要的地方畫紅線。“梁效”把它作為正兒八經的大事，先畫出一個大樣，經審閱後，再往大字本上畫。請看“梁效”的頭頭給遲群、謝靜宜的報告：

遲群、謝靜宜同志：

送上《哥達綱領批判》已劃出了重點。經研究認為，選那些重點是合適的。請審閱後退我們，正式往大字本上劃（劃大字本也是紅鉛筆）。《國家與革命》大字本劃否？

致 敬禮

李宋王 25/3

遲群批語：

可劃大本。另送《國家與革命》一部劃出重點。（同上次）。

三月廿五日

“梁效”的人手不夠，專門調一個人（經濟系的女教師王俊宜）來做畫線工作。江青就只讀書上畫線的部分。她比林彪省事，林彪還要別人抄卡片，她只要別人畫紅線就行了。不過，江青還有不省事的地方，她讀了也不懂，又要讓“梁效”講解。“梁效”的頭頭給遲、謝的報告寫道：

遲群、靜宜同志：

《老子》一書的講課已落實，在抓緊準備。

馬列著作講課跟連龍、老魏商量了一兩次。我們認為：……以上講《國家與革命》和《哥達綱領批判》人選還好，講帝國主義論人選還不理想。人選問題，備課（找本人）問題請決定後快告我們。

致以 革命敬禮

李、宋、王 16/2²⁴

²⁴ 《梁效罪證材料》，19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老子》的講課，落實到湯一介、田餘慶頭上。他們認真做了準備，江青沒有安排時間，未講成。但他們各獲江青贈綫裝書《老子》一部。《國家與革命》和《哥達綱領批判》的講員是由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副書記魏銀秋在文科教師中物色的。“梁效”本身及組織別人，給江青講了 10 次課。徐琳寫的交代中關於他參加的一次給江青講課的情節，很有意思：

1975 年春天，偉大領袖發出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號召，全國掀起了學習運動。“四人幫”接過這個口號大反經驗主義。在這種形勢下一貫反馬列的江青忽然要學習馬列著作，學習《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並且要原兩校大批判組這個御用工具派人輔導。1975 年 5 月份，一天凌晨，去我家通知學習《哥達綱領批判》，我順手從家裏拿了一本書就和宋柏年、XXX、XXX 等人被用小汽車接到釣魚臺給江青講課。一個人講，我和另一個人陪著聽，準備江青提問題，主講人答不上來時，我們可以幫腔。其實江青什麼問題也提不出來，只問了一句，“哥達”在德國什麼地方，便伏在桌子上睡大覺。講完了，她也睡醒了，胡謔一通學習理論要反對經驗主義。她說一夜未睡，就讓我們走了。

徐琳

1977 年 9 月 23 日²⁵

毛同江青談話，談到一些典故，她不懂，就叫“梁效”趕快查書，寫出解釋。

1976 年 6 月、7 月間，江青要“梁效”介紹哥本哈根學派和一些西方原子能科學家。“梁效”幹不了，只得請求外援，由北大物理系和化學系的幾位教授幫忙，寫成材料交卷。

不學無術的江青，有一次在同北京大學的教師座談時，居然說“生產關係是上層建築”。違反常識，滿座驚訝。有人糾正她，說生產關係是經濟基礎。她板起面孔說：“我講的是政治經濟學，你們講

²⁵ 《梁效罪證材料》，21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的是資產階級經濟學。”明明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梁效”卻曲意奉迎，挖空心思地為江青的謬論辯護，編了一本《馬列和毛主席論生產關係》，呈送上去。²⁶

“梁效”又是江青的侍從。江青去天津、小靳莊、大寨等地 13 次，均有“梁效”的成員隨同行走。“梁效”的頭頭王世敏隨江青在天津寫下了出巡日誌：

26/6—74 中午

出海去大港油田，海上學《離騷》。

江青同志要我們把離騷背景寫出來。

告遲謝：《論語》批註和《三字經》諺語各地搞了很多，匯總一個發給全國

27/6—74 上午開幹部會

江青同志指示：

1. 今天離開天津去楊春（村）路上繼續學《離騷》，要抽條，表演節目，在楊春（村）吃午飯

2. 離楊村回京途中看文件

（詩）一首

六級風浪小艇上

首長帶領學《離騷》

批判繼承歷史遺產

繼續革命永向前

27/6—74 中午

離津去楊村 66 軍 169 師②同樂會上江青同志吟詩

“六十六軍戰鬥隊

能文能武啥都會

能文超過隨陸賈

²⁶ 《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7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能武嚇得絳灌退”²⁷

又要老中青都表演，指定我唱歌，我唱了“我愛北京天安門”
①攝影③聚餐④看軍事訓練匯報⑤打靶⑥江青同志親自騎馬²⁸

“女狀元”王世敏的寫作文句不通，湊合著看吧。“江青同志親自騎馬”一句尤其令人發笑，騎馬還有不親自的嗎？

王世敏只說“我唱了《我愛北京天安門》”，太簡單，還有動人的情節，請看孫靜的揭發：

1974年6月大野心家江青帶領兩校大批判組和中央黨校寫作組部分成員去天津……返京途中，曾到楊村九連參觀打靶。在打靶開始前，江青組織一個同樂會，要大家吟詩唱歌講話，為她的天津之行歌功頌德。王世敏在這個同樂會上肉麻地吹捧江青說：江青像慈母一樣，帶著大家出來，她自己像孩子似的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她要唱一支兒歌表達她的心情。接著學小孩的聲調唱了《我愛北京天安門》這首兒童歌曲。這次會上，江青與浩亮合唱《紅燈記》，浩亮扮演李玉和，江青扮演李奶奶，浩亮當著江青的面喊出“謝謝媽”。王世敏和浩亮一樣，表達了她對江青的無恥吹捧。²⁹

北京人傳說浩亮認江青作媽，典故就出在這裏。不過，浩亮是逢

²⁷ 1973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軍委會議（討論八大司令員對調）的成員時，勸許世友看《紅樓夢》要看5遍。許說過“《紅樓夢》是吊膀子的書”。毛說：“你這個人以後搞點文學吧。”因而說起：“漢書裏邊有漢高祖和陸賈的傳，那裏邊說：‘常恨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許說：“應該搞點文。”“隨”是隨何，“陸”是陸賈，文臣；“絳”是絳侯周勃，“灌”是灌嬰，武將。江青的歪詩是從毛澤東那裏販來的。毛還對許說：“周勃厚重少文，你這個人也是厚重少文。你就作周勃嘛。”周勃是誅殺后黨諸呂的太尉。當時江青以呂后自居。軍中傳說，毛主席要許世友“作周勃”，對付江青。這是過度解讀，恐怕毛沒有這個意思。

²⁸ 《梁效罪證材料》，17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²⁹ 孫靜的揭發材料，1978年6月30日。《梁效罪證材料》，37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場作戲，真正認江青做“慈母”的，是“梁效”的頭頭王世敏。

“梁效”還從事江青交辦的各種特殊任務，甚至奉命抓“高級特務”。江青到新華印刷廠參加勞動，頭上蒙一條白毛巾，雙手戴手套，幹的是很輕鬆的折頁的活。黨委安排一幫人和她一起幹活，實際是陪她聊天，一個小時能幹完的活，非得兩個小時。江青疑神疑鬼，說是有“高級特務”盯著她。江青批：“小謝、遲群同志：請將新華印刷廠的特務調查清楚告我，不要打草驚蛇！”新華印刷廠工人連秀榮等9人揭發：

1976年9月8日下午6點多，就在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前幾個小時，江青事先沒有通知，突然來廠。……江突然問：“小謝，我問你的問題，你為什麼不回答，你知道嗎？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派來高級特務，監視我，搞我的情報。”又說：“工人同志們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誰是特務，站出來，自首，保護自首的。”又對遲、謝說：“你要給我弄清楚！”遲群說：“你別急，會弄清楚的。”江又說：“我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1976年10月30日）³⁰

“梁效”派宋柏年去偵破。結果一無所獲，因為本來就沒有。

小米粥裏有政治

江青對她的“班子”自然關懷備至，不時送些小米、冬瓜、茄子、芒果和文冠果製品之類。“梁效”們受寵若驚，感恩戴德。“梁效”的注釋組長孫靜寫的交代中說：

大約74年下半年，江青給“大批判組”送來芒果，李家寬、宋柏年召集大家說了這件事，並且宣揚說：“中央首長”關懷“大批判組”號召大家要用更大的幹勁報答首長的關懷。然後每個小組一兩個

³⁰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芒果，要大家一邊吃，一邊談思想。大家吃芒果時一般都表示決不辜負“中央首長”的關懷，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大約 75 年上半年，江青給“大批判組”送來小米，李家寬同樣借此宣揚“首長”時刻不忘“大批判組”，為了表示敬重，指示食堂將小米熬成了糖粥。

75 年 7 月我與林庚到釣魚臺講賦，休息時，散步到菜園地。江青誇耀她種的冬瓜長的大，隨後說送給一些大家吃，同時又摘了一些茄子。我將冬瓜和茄子帶回“大批判組”，李家寬找來小組長，對大家說，“這些冬瓜和茄子說明了許多問題”。李很明顯是要借此穩定軍心。

76 年上半年，江青給“大批判組”送來油莎豆、文冠果製的食品，有糕點、糖、酒，因為東西很少，李家寬將小組長以上幹部叫到他的房間裏對大家說：“首長送來了油莎豆、文冠果製品，因為東西太少，不能大家吃，將你們找來分嘗一點，就算代表大家接受了。”他同樣又宣揚一通“首長”在任何時候都不忘關懷“大批判組”。³¹

聖經中有一則著名的故事：古代的以掃爲了一碗紅豆湯而出賣長子權。他被人們嘲笑了幾千年，說他蠢，說他貪心，說他無原則。現代的以掃——“梁效”爲了一碗小米粥而出賣靈魂，叫人們怎麼說它？他們還能從小米粥中吃出“意義”來。“梁效”的支部副書記王世敏流著眼淚說：“吃了這些東西，心裏什麼都明白了。”在一篇發言稿中，她又寫道：

1974 年“十一”當我們批林批孔取得一些成績的時候，領導同志（指江青）送來了芒果……又給我們送來了小米。1975 年 7、8、9 月，右傾翻案風刮起來了，又是領導同志（指江青）給我們送來了冬瓜和茄子，一下子清醒了我們的頭腦，堅定了我們的信心。³²

江青的小米、冬瓜和茄子居然具有政治功效。

³¹ 《梁效罪證材料》，35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³² 《梁效罪證材料》，33 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 年 8 月。

幸臨“梁效”據點

1976年8月26日下午，江青在遲群、謝靜宜的陪同下，來到“梁效”的駐地。

江青命北大黨委找來幾個理科的教授。她先是不懂裝懂大談電子計算機。1975年華國鋒和國務院另外三位副總理簽署批准，以科學院為主研製每秒千萬次電子計算機。江青為了對抗，命清華、北大將參加科學院協作的人員撤了回來，另搞一套。她說：

清華、北大要爭口氣，千萬次電子計算機一定要搞出來。要依靠工農兵，不然就一事無成。我們可以引進一些，拆了，為了趕超。外國有的，我們一定要有。我們不要簡單模仿，而是要趕超。我很以兩校為自豪。

江青“以兩校為自豪”，是經常掛在嘴上的。江青又不懂裝懂，大談《紅樓夢》，東拉西扯地說：

曹雪芹是補天，不是變天。但他比19世紀歐洲的作家們高得多。那些人向上爬，曹雪芹不向上爬。晴雯、襲人有什麼區別？我最喜歡晴雯，襲人是特務。誰收買的她？不是王夫人，是寶釵。《紅樓夢》裏有階級鬥爭。柳嫂和秦顯家的就爭廚房的權，各自都有後臺。賈府的奴隸四百多人，主子不到三十人。奴隸也有大有小。賴大家這奴隸後來闊了，作了官。賴家請客，賈府都去。賈府還向賴大的兒子借五百兩銀子。清朝有個宰相叫法式善，官作大了，但他家原來地位很低，遇到原來主人家辦喪事，還要做吹鼓手。³³

³³ 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對這段話有一個批註：“法式善從來沒有做過宰相，也沒有為主人當過吹鼓手。江青所說的事，不是法式善的，是松筠的。真是張冠李戴。江青為什麼胡扯這類事情呢？原來她要她的奴才們當了大官後，不要忘記主子的栽培，仍要效忠於她，永遠充當工具。”（《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大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組，1976年10月27日。）

江青的“帽子工廠”生產了大批量的特務帽子，文革中任意派發，居然還戴到《紅樓夢》人物的頭上。

楊克明對江青說：“代問主席好！”江不理他的茬，卻指著他的花白頭髮說：“莫等閒白了少年頭。”一轉念又說：“但是我們無產階級不空悲切，而是加油幹，幹革命。”

江青的思維是跳躍式的。忽然問：“這裏誰是民兵指揮？”李家寬回答：“我。”她發指示：“要把民兵工作抓好，民兵工作很重要。”從民兵工作又跳到保衛工作，“保衛工作很重要。我們要提高警惕，現在肯定有人要破壞。要鎮定、沉著、冷靜。”

范達人爲了攀高枝，和江青套近乎，說他和李訥是同學。范是歷史系 57 級，李訥是 59 級；范 62 年畢業，李 65 年才畢業，根本攀不上。“一提到李訥，江青立刻激動起來，她說李訥在上大學時，受到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迫害，後來到了解放軍報社又遭到打擊，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李訥“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是事實，但江青所說導致精神上受刺激的兩條是謊言，其實另有原因。江青還說：“李訥比較軟弱，經不起刺激。我這個人是經得起刺激的。她不如我。”³⁴

江青說：“你們向鄧小平開炮開得好，這不僅是對我們前一段鬥爭的支持和鼓勵，而且還鞭策我們今後集中火力，抓住要害，更深入地批鄧，更勇猛地同走資派作戰。”她還說：“難道走資派只有鄧小平一個？現在出現了更大的走資派。”“更大的走資派”是誰？除了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還能是誰！

江青同“梁效”的每個人都照了合影。江離開後，遲群說：“今天大家都滿意了吧，首長和一個人一個人都照了相。”³⁵“梁效”的

³⁴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39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1966 年 7 月 26 日，江青在北大的萬人大會上點歷史系年輕教師郝斌的名，說他“迫害李訥”。於是在北大，“反革命”的定義多了一條“迫害李訥”。所謂“迫害李訥”，事見郭羅基：《我有兩個高貴的學生》（下），《明報月刊》，2012 年 4 月號。

³⁵ 見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一《8 月 26 日江青到清華、北大的情況》，1976 年 11 月 3 日；《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 年 3 月。

“一個人一個人”以與江青合影為榮，將照片到處示人。

這一天的活動結束，江青擬發一條消息：大標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黨中央看望首都人民”，副標題是“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廣大革命群眾決心深入批鄧，抓革命、促生產，搞好抗震救災鬥爭，用實際行動回答毛主席、黨中央的親切關懷”，消息的內容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同志，於8月26日，冒雨先後到北京新華印刷廠、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代表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看望和慰問廣大群眾和幹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鼓勵大家認真學習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鄧，抓革命、促生產，積極支援災區人民，……。”這條消息，被華國鋒壓下，沒有發。華國鋒之所以敢於這樣做，因為毛澤東說過：“她（指江青）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諂媚江青”何所求？

馮友蘭被梁漱溟³⁶指責為“諂媚江青”，馮邀梁赴壽宴遭拒。

³⁶ 梁漱溟（1893—1988年），原名煥鼎，字壽銘，以筆名漱溟行世。蒙古族，先祖為元世祖五子忽哥赤。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早年加入同盟會。1917年，應蔡元培之邀，任教於北京大學。30年代，從事鄉村建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活動，曾任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院長。1940年，為中國民主同盟成立的發起人之一，任中央常務委員。1943年，拒絕參加國民黨一手操辦的“憲政實施協進會”，痛斥“民有痛癢務掩之，士有氣節必摧之”的專制獨裁。1938年和1946年，曾兩次訪問延安，宣佈：“我已經認定跟著共產黨走了。”1946年5月，以民主同盟秘書長身份，作為“第三方面”人士參加國共和談。梁漱溟從南京到上海見周恩來，敦促和談。他從上海回到南京的時候，國軍已經攻佔了張家口。他說：“一覺醒來，和平已經死了。”這句話被各大報刊登在頭版頭條，成為一時名言。同年，受民盟總部委託，赴昆明調查“李公樸、聞一多慘案”，發表《李聞慘案調查報告》《李聞被殺真相》。1947年，退出民主同盟，從事講學和著述。1949年夏，在重慶北碚縉雲山修習藏密功法。1949年秋，應邀赴京，歷任第一屆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和六屆政協常委。1953年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7次會議期間（政協委員列席），梁漱溟在發言中說，解放以後，工人的生活在“九天”，農民的生活在“九地”。毛澤東不以為然，在大會上嚴厲

“批林批孔”之初，梁漱溟在政協學習會上拒不表態。後來他回憶說：

不料保持沉默也是有“罪”的。在全組二十餘人都紛紛“表態”，積極參加這場運動，努力改造思想之後，我依然沉默，便有人說話了。有人在會上不指名地警告說：“對重大政治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這裏邊有個感情問題，立場問題。”緊接著有人又在會上指名道姓地說：“前幾天北京大學某教授公開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由一貫尊孔而轉變為支持批孔，影響全國，群眾歡迎。據悉，某教授五四時代在北大還是一名學生，而梁先生那時已經在北大講壇上講授印度哲學和儒家哲學了。時至今日，如果梁先生也向某教授學習，公開表態和支持批孔，影響將會更大，大家都會歡迎你的轉變。”我聽罷直擺手，不禁脫口而出：“某教授的文章我拜讀過了，我與他相熟，前不久還碰見他呢。我懷疑他文章所說的是否是他內心要說的真話。”會上馬上有人反擊，嚴厲地說：“你有什麼根據懷疑別人？就憑這句話，你對當前運動持什麼態度已經暴露無遺了。如何端正態度，在你自己。我奉勸梁先生不要再一次作運動的對立面了。”³⁷

批評；梁與之爭辯，會議氣氛緊張。30年後，梁漱溟90高齡時憶當年，說：“當時是我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毛）很為難。我更不應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那件事後，我的政協委員照當，生活待遇照舊，也沒有受到任何處理。我知道那是毛澤東的意思。他們（指毛澤東和周恩來）已故世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任華、馳方：《梁漱溟先生訪問記》附錄，梁漱溟：《我的努力與反省》，442~443頁，桂林，灕江出版社，1987。）文革中梁漱溟公然反對“批孔”。1974年2月，在政協做《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的發言，成了“大批判”的對象。粉碎“四人幫”以後，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他的代表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等，晚年又出版《人心與人生》《東方學概觀》。梁自稱“是一個有思想，又且本著他的思想而行動的人”。1988年逝世，墓地在桂林穿山公園，部分骨灰埋葬在山東鄒平當年從事鄉村建設之地。

³⁷ 散木：《梁漱溟回絕馮友蘭的90大壽宴請：只因後者曾“諂媚江青”》，人民網—文史頻道。

梁漱溟認為，“批林”可以，“批孔”則不可。1973年12月14日，他參加在京的全國政協委員和民主黨派、工商聯成員的學習，在會上說：

毛主席多次講過，允許保留不同意見。我對當前批林批孔運動持保留態度。至於如何評價孔子，我有話要說，我準備專門寫篇文章。我很不同意時下流行的批孔意見。

江青在“一二五”大會上點了梁漱溟的名之後，批判升級，從20多人的小組會擴大到一二百人的聯組會。眾人圍攻多時，梁漱溟遂於1974年2月22日和25日做長篇發言，講了兩個上午，系統論述《今天我們應該如何評價孔子》，寫成文章長達3萬字。他說：

我現在認識到的孔子，有功和過兩個方面。我的文章，我的觀點，確實是對時下流行的批孔意見不同意的。中國有五千年文化，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響著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如今批判“克己復禮”一詞最時行，殊不知許多解釋是經不起推敲的。至於林彪寫“克己復禮”這張條幅，……究竟他為什麼這樣做，他的“己”和“禮”又何所指？我看除了問他自己，別人難以解釋。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

梁發言後，其他人群起而攻之，又追問他對“批林”的態度。他說：

你們非要我發言，我就講：我的態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我認為，林彪沒有路線，談不上路線。路線是公開的，可以見人的。不敢見人的，不是路線。從做人的角度說，光明是人，不光明是鬼。林彪就是一個鬼，他夠不上做一個人，沒有人格。劉少奇的主張很多，都是公開的。彭德懷也有公開信給毛主席，他們都有為國家、民族前途設想而提出的主張。多年來我一直與中共領導黨求大同、存小異的。但我是公開的、光明的，而林彪則專搞陰謀詭計。我堂堂正正是個人，林彪不夠做人的資格。

於是，全國政協學習小組的“批林批孔”變成了“批梁”。從1974年3月至9月，批了他半年，大小批判會開了100多次。給梁漱溟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賢孫”“孔孟之道的衛道士”等。

梁漱溟每會必到，到則沉默。9月13日的會上，問他感想如何？他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³⁸無論怎樣批判，不可奪梁漱溟的匹夫之志。

耿介之士梁漱溟罵林彪是鬼，但對周恩來卻是一贊三嘆：

周總理是好，周總理人真好！啊呀！周總理大家都說是人民的好總理，嘖！我對他佩服，我佩服周總理。啊呀！啊呀！周總理是好人，嘖，啊呀！立身乾淨得很！嘖，啊呀，一心爲公啊！（說到此處，梁老哽咽，唏噓不已，眼睛發紅，淚水盈眶，語不成聲。）啊呀！周總理可是好人，他這個人有善可陳，無疵可指。你指他的毛病，挑毛病，挑不出來。嘖！（哽咽）……他是一直忙、一直忙，忙到死啊，他是累死的，有口皆碑。

談到周恩來嗎？我都談了。總之周公是一個完人，他只有優點。他一生沒有毛病，指不出來，無疵可指。他人太好了，太好了！提到周總理忍辱負重，那是真的，真是委曲求全。啊呀，嘖！總理，感人哪！啊呀，總理人太好了。（梁老唏噓不已）³⁹

值得梁漱溟誇獎的人是不多的。

上文所說的“北京大學某教授”即馮友蘭。1980年，梁漱溟與美國學者艾愷⁴⁰交談時，還說到馮友蘭：

³⁸ 以上均見《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團結報》，1986年5月3日、10日、17日；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041~1042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³⁹ 《梁漱溟談周恩來》，《團結報》，1986年1月4日。

⁴⁰ 艾愷（Guy S. Alitto），1975年獲美國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出版了《最後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南京十年的鄉村建設》《世界範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等著作。

梁：有一個人叫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他是我班上的學生，他是留美，在美國。他留美的時候還常常從美國寫信給我，通信。從美國回來就做大學教授，很出名。寫了三本書，特別是他有一部《中國哲學史》。這個人呢，——一個人有一個人的性情，個性不同了——他好像是儒家，好像是發揮中國傳統思想，好像是這樣，可其實呢，他的爲人是老莊的吧，老子一派。老子一派，就是不像那個儒家，好像忠於自己，一定要很正直，他不是那樣，他是有一點……有一點那個叫什麼，“什麼世不恭”啊，有那麼四個字（艾：是。）“玩世不恭”（艾：對。），他不是那麼本著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實，不隨風轉舵，不，他有點像玩世不恭。

艾：其實這一點我們西方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公認的。

梁：後來不是那個江青（笑）很欣賞他，到北京大學去看他，他還把詩詞送給江青，後來江青失敗了，所以他的名氣也就好了。⁴¹

1973 年，馮友蘭請梁漱溟吃飯，臨別時，馮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梁很高興，視爲同道。不料第二年馮就高調“批孔反儒”，氣得梁漱溟要與他斷交。故 1985 年 12 月 4 日，馮友蘭九十壽辰，設家宴請梁漱溟參加，梁斷然拒絕。在電話中，梁藉故“天氣不好，不宜出門”，事後，梁致函馮，說明真實理由：

尊處電話邀晤，北大舊人現唯我二人存矣，應當會晤。我卻斷然拒絕者，實以足下曾諂媚江青。

如承枉駕來我家，自當以禮接待交談，傾吐衷懷。

信函沒有稱呼。梁漱溟說明拒赴馮友蘭壽宴的真實理由是因“足下諂媚江青”。馮友蘭回復說：

十一月二十一日來信，敬悉一切。前寄奉近出《三松堂自序》，回憶錄之類也。如蒙閱覽觀過知仁，有所諒解，則當趨謁，面聆教

⁴¹ 梁漱溟、[美]艾愷：《這個世界會好嗎？》（增訂本），48 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益，歡若平生，乃可貴耳。若無諒解，胸有芥蒂，雖能以禮相待，亦覺意味索然，復何貴乎？來書竟無上款，窺其意，蓋不欲有所稱謂也。相待以禮，復如是乎？疾惡如仇之心有餘，與人為善之心不足。忠恕之道，豈其然乎？譬猶嗟來之食，雖曰招致，意實拒之千里之外矣。“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詩人誠慨乎其言之也。非敢有憾於左右，來書真率坦白，甚為感動，以為雖古之遺直不能過也。故亦不自隱其胸臆耳。⁴²



1918年6月，北京大學哲學門第二屆畢業合影。前排教師左起：康寶忠、崔適、陳映璜、馬敘倫、蔡元培、陳獨秀、梁漱溟、陳漢章；中排左四馮友蘭，左七胡鳴盛；後排左二黃文弼，左五孫本文⁴³

梁漱溟雖只比馮友蘭年長兩歲，當年馮友蘭在北大哲學門當學生

⁴² 見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14卷，書信集，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⁴³ 採自《有哲學門以來：北京大學哲學系 1912—2012》，21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2012。關於這張照片，馮友蘭還講了一個笑話。梁漱溟坐在陳獨秀的旁邊。梁年輕，態度恭謹。陳很豪放，他的一隻腳直伸到梁的跟前。照片洗出後，我們送一張給陳先生。他一看，說：“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腳，伸出太遠了一點。”我們的班長孫本文說：“這是先生的腳。”陳也為之大笑。

時，梁漱溟已是教師，講授“印度哲學”。⁴⁴ 馮與梁亦師亦友。

1985年12月24日，馮友蘭由女宗璞陪同，趨梁府會晤。馮友蘭為自己辯解，說他是從“反儒”出發，以為武則天“反儒”最為徹底，却並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圖”。又說，儘管當時有許多人私下議論“女皇”的種種傳聞，自己“向來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書房也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認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國內外的資產階級編造出來的。我只信報紙上的消息，我對於國內外形勢的認識都是以國內的報紙為憑。”言談多矛盾。說坐在書房聽不到多少小道消息，但知道“當時有許多人私下議論‘女皇’”；知道議論“女皇”，又說不知道“江青有作女皇的企圖”。

馮友蘭之女宗璞，根據儒家“子（女）為父隱”的教誨，反駁梁漱溟：所謂“曾諂媚江青”，並非事實。反而批評梁的信，乃是“不問事實的主觀妄斷”“這種態度很要不得”。宗璞還譴責別人：“有些人慣於歪曲詩的本意，甚至在所謂研究文章中杜撰，把自己的揣測硬安在別人頭上，這種做法甚不足取。”⁴⁵ 雖然馮友蘭的詩文俱在，“詩無定詁”嘛，所以宗璞與眾人詁得不一樣。馮鍾璞和馮友蘭父女情深，她說什麼姑妄聽之，把它當作感情的宣洩。至於對馮友蘭的客觀評價，不是由她說了算的，也不必與之爭論。

馮鍾璞敘述了80年代馮梁交往，說：“後來梁先生曾到我家，兩位老友暢談甚歡。《三松堂自序》俱有記載。梁、馮之間雖有不

⁴⁴ 1916年，梁漱溟在《東方雜誌》上發表《究元決疑論》。1917年，梁漱溟23歲，他投考北京大學未取，將自己寫的一本哲學書稿寄給北大校長蔡元培，意在證明學歷，要求進北大讀書。不料蔡元培回信說：“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學。”梁漱溟驚訝莫名：“我只有中學學歷，而且近幾年才自學佛學，對印度哲學沒有多少見識。”蔡元培與之長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但我也沒有發現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你就大膽地幹吧！”梁漱溟感歎：“欲當北大學生而不得，卻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師。”蔡元培是有眼光的，梁漱溟果然成為“一個搞哲學的人才”。但蔡元培對梁漱溟也有所批評：“憑空辯論，勢必如張之洞‘中體西用’的標語，梁漱溟‘東西文化’的懸談。”（<https://kknews.cc/zh-hk/other/xkqm28.html>）

⁴⁵ 人民網-文史頻道。

快，最終卻能化開，又有一歡若平生之會，並沒有‘朋友不終’的不幸。”⁴⁶有人以此為據，說明梁漱溟對馮友蘭“諂媚江青”的批評不算數了。

“梁效”之“諂媚江青”，已有定論。馮友蘭加入了“梁效”的大合唱。如欲洗刷馮友蘭“諂媚江青”的垢評，必須證明：在大合唱中，馮友蘭與“梁效”有何本質不同？

馮鍾璞對馮友蘭的辯解是感情問題，不可以理喻之；馮鍾璞想要改變別人對馮友蘭的看法，也是徒勞的。

不管梁漱溟是否改變了對馮友蘭的看法，上述艾愷對梁漱溟的採訪中說，馮友蘭的隨風轉舵、玩世不恭，西方研究中國的人都是公認的。還有兩位西方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者，美國的麥克法夸爾和瑞典的沈邁克，把這種看法寫進了他們的專著：

該小組（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的成員急於討好這位手握重權的女施主（指江青）。病中的馮友蘭在接受江青邀請一起“視察”天津後，向她獻上下面這首詩：“破碎山河復一統，寒門庶族勝豪宗。則天敢於作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⁴⁷

海外華人學者、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周質平也說：

國內學者對馮友蘭的批評則集中在“批林批孔”時期，馮氏迎合江青，為四人幫做顧問的那段歲月。這樣的批評，可以王永江、陳啟偉1977年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評梁效某顧問》為代表。⁴⁸

海外華人學者注意到國內學者王永江、陳啟偉對馮友蘭的批評。王永江、陳啟偉說了什麼？

⁴⁶ 宗璞：《給古人少許公平》，馮友蘭研究所版權所有。

⁴⁷ 麥克法夸爾、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372頁，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⁴⁸ 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又見《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江青對顧問恩寵備至，顧問對江青感恩戴德。對於江青的每一恩典，他不是賦詩答謝，就是以實際行動報效忠心。⁴⁹

馮友蘭《詠史》詩的最後一首的最後一句是：“昨非今是能回首，感謝耆年帶路人。”他時時處處不忘表態。發表前的最後一刻，又將“感謝”改為“深謝”。馮友蘭怨憤江青“敢於作皇帝”，是不是為了讓她做通天之路上的“帶路人”？

⁴⁹ 王永江、陳啓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

第九章

“梁效” 的蕭條

按照毛澤東的“皮毛”論，“梁效”就是附在“四人幫”這張“皮”上的“毛”。“四人幫”囂張，“梁效”就興旺；“四人幫”沉潛，“梁效”就蕭條。正是在鄧小平厲行整頓、“四人幫”受挫、形勢好轉之際，“梁效”蕭條了。

鄧小平復出

鄧小平在流放地聽了關於林彪事件的傳達後，兩次給毛澤東寫信，譴責林彪、陳伯達，保證自己“永不翻案”，要求工作。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主要之點是：“鄧小平同志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

1972年5月18日，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移行上皮細胞癌，健康狀況日益惡化。他需要有人來協助他，並在必要時接替他。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信做出批示後，周恩來積極活動。經4個多月，毛終於同意周關於恢復鄧小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建議。1973年2月，在江西南昌蟄居了3年多的鄧小平接到通知回北京。

1973年4月12日，在周恩來為歡迎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舉行的晚宴上，鄧小平公開露面。有記者報道：

隻身孤影，緘默無聲。他那對大而近似歐洲人的眼睛，正掃視著所有在場的人，……。宴席未散就搶先急匆匆地走下樓梯的各國新聞

記者，直奔近處的郵電總局，向全世界傳播一條重大新聞：“鄧小平復出！”¹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以後，鄧小平當上了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毛澤東在討論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²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登上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的講壇，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言，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的理論。鄧小平成為國際上的政治明星。此前，政治局討論時，江青激烈地反對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毛澤東給她寫了一封信：

江青：

鄧小平同志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意見。

毛澤東

3月27日

鄧小平在国内政壇上更有底氣。

江青以為，在“批林批孔”中拱倒了周恩來，便可大權在握。不料1966年打倒的鄧小平東山再起，大有取代周恩來之勢，因此江青視之為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在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對鄧小平事事作梗。

1974年毛澤東在長沙養病。11月12日，鄧小平向他匯報工作，毛對鄧的工作大為讚賞，並支持他與江青對抗。

毛：你開了一家鋼鐵公司！

鄧：主席也知道了。（指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與江青

¹ [匈牙利]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2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²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7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的衝突)

毛：好！

鄧：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讚成你。

鄧：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毛：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用手指王海容、唐聞生）都不高興。

鄧：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講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

毛：這個好。

鄧：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過了，不應再提什麼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

毛：沒有辦法呢，只好擔起來囉。³

1975年1月8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根據周恩來的建議，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人大閉幕之後，周恩來宣佈：“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第一副總理鄧小平主持。”鄧還擔任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他的頭銜是“三副一總”：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實權反超文革之前。

全面整頓大見成效

鄧小平肩負毛澤東的信任，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大膽地幹起來了。那個時候，只有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才能幹事。

毛澤東說過“軍隊要整頓”。鄧小平利用這個題目，1975年1月25日在總參謀部機關團以上幹部會上發表《軍隊要整頓》的講話，說“現在是問題成堆”“軍隊被搞得相當亂”，所以要大刀闊斧地進

³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492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行軍隊的整頓。這是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以後所發表的首次重要講話，開始收拾文化大革命的亂局。他利用毛提出的“整頓”概念，將軍隊的整頓推向全面的整頓。

在山西昔陽召開的農業學大寨會議上，鄧小平說：

現在全國存在各方面要整頓的問題。毛主席講過，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地方整頓又有好多方面，工業要整頓，農業要整頓，商業也要整頓，文化教育也要整頓，科學技術隊伍也要整頓。文藝，毛主席叫調整，實際上調整也是整頓。⁴

鄧小平一口氣講了 10 個“整頓”，總之，“各方面要整頓”就是全面整頓。

在同一次會議上，江青大談評《水滸》，要害是“架空晁蓋”“拉盧俊義上山”。她還要求印發她的講話稿，播放她的講話錄音。9月 24 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筭後，向他報告江青在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毛很氣憤，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⁵ 毛還說，江青講話的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

毛澤東明顯地壓制江青，支持鄧小平的全面整頓。

在全面整頓中，鄧小平首先狠抓鐵路。他認為：“當前的薄弱環節是鐵路。鐵路運輸的問題不解決，生產部署統統打亂，整個計劃都會落空。所以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⁶ “批林批孔”以來，各地因派性發作，武鬥不斷，阻攔火車，說什麼“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

⁴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98~99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⁵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103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據“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記錄，1975 年 9 月 24 日”，還多了一句：“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1751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⁶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25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又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24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由於運輸中斷，造成生產癱瘓或半癱瘓。鄧小平召見四屆人大剛任命的鐵道部長萬里，要求整頓鐵路。萬里表示用半年時間可以解決問題。鄧小平說，不行！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堅決的措施、迅速扭轉。1975年3月，鄧小平用鐵腕治鐵路，派萬里坐鎮問題嚴重的徐州鐵路局。只花了一個多月，這個老大難問題得到解決，打響了全面整頓的第一炮，在全國範圍樹立了變革的信心。他說：“解決鐵路問題的經驗，對其他工業部門會有幫助。”⁷ 繼鐵路之後，鋼鐵、煤炭等13個工業部門的整頓全面鋪開。

整頓，是後來鄧小平倡導的改革的預演。他說：“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⁸

毛提出理論問題

在鄧小平進行全面整頓的同時，毛澤東發動全民學習理論。

1974年12月下旬，毛澤東在長沙與周恩來、王洪文談了幾次話。26日，毛澤東81歲生日那天，他打發王洪文去韶山參觀，與周恩來徹夜長談。所談的全部內容已無人知曉。內容之一，是要大家學習理論。周恩來整理了一篇《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關於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讀，然後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⁹ 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

毛主席說，我同丹麥首相談過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

⁷ 《鄧小平文選》，第2卷，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⁸ 《鄧小平文選》，第3卷，2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⁹ 姚文元寫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張春橋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

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

毛澤東 1974 年 12 月 20 日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

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¹⁰

1958 年刮“共產風”，毛就想消滅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大躍進雖然失敗了，他是不死心的，10 多年後又舊事重提。

四屆人大剛開過半個月，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社論，公佈了毛主席的指示，中共中央也發了《學習毛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的通知》，要求廣大黨員、幹部和黨外群眾認真學習。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和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四個現代化”，都被擠到一邊去了，毛又把人們的注意力拉到階級鬥爭和對資產階級專政。他在審閱周恩來整理的談話記錄時，在“林彪”之後加“一類”兩字。林彪已經滅亡，“一類”還有誰？讓人費解。

張春橋、姚文元根據毛的指示，編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語錄 33 條。本來群眾只學毛主席語錄，乏味了。學了幾條馬克思、恩格斯的論述，被他們的思想深刻性所吸引，產生了理論興趣。這倒是意外收穫。北大哲學系、政治系、經濟系的教師和學員都被請出去開展學習經典著作的輔導。

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根據先進國家的政治現實提出來的，列寧根據落後國家的政治現實對它進行了歪曲。毛澤東鍾愛的就是列寧的歪曲；否則，問題的提法應該是“馬克思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毛說：“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這個問題不搞清

¹⁰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413 頁，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 51 卷，500 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楚，就會變修正主義。”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的理論和實踐，對馬克思主義來說，本身就是修正主義，搞清楚了還是修正主義。而且，“對資產階級專政”並不等於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專政，同時也譴責封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毛澤東只說“對資產階級專政”，不說是誰對資產階級專政。他恨的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博愛”，站在落後於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上強調對資產階級專政。

張春橋、姚文元編的這個 33 條語錄，選了列寧的 23 條，馬克思、恩格斯兩個人只選了 10 條；而且遺漏了（或者說是隱瞞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論述。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資產階級的統治應當推翻，但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必須保留。馬克思說：“反對資產階級專政，要求改造社會，要把民主共和機構保存起來，作為他們運動的工具。”¹¹ 老年恩格斯在《1891 年社會民主黨綱領草案批判》中說：“如果說有什麼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甚至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¹² 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後出現的民主共和國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特殊形式”，而且是“毋庸置疑的”，聽起來真像是修正主義。

過了 3 年，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他又強調：“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將來進行統治的現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這種“現成的政治形式”，無產階級還要馬上去建立。他以德國人的口氣對法國人拉法格說：“你們比我們優越的地方就是，你們已經有了共和國，而我們則不同，我們還必須需花費 24 小時去建立它。”¹³ 可見，事情是多麼緊迫！在沒有民主共和國的地方，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必須在 24 小時內立即建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見，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下，實行資產階級的統治是資產階級專政；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統治，依然在民主共和國的形式下，建立無產階級的統治，就是無產階級專

¹¹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3 版，第 1 卷，530 頁。

¹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第 22 卷，274 頁。

¹³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 2 版，第 4 卷，735 頁。

政。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個重要思想，對於生在落後國家、不知民主共和國為何物，因而也不知無產階級專政為何事的列寧、毛澤東，是一概忽略、盡力摒棄的。

“四人幫”販賣私貨——反經驗主義

四屆人大之前，為配合江青的組閣陰謀，“梁效”大批因循守舊。組閣失敗，批因循守舊也隨之偃旗息鼓。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四人幫”在理論學習中施展陰謀，大批經驗主義，目標還是周恩來及一大批有經驗的老幹部。自延安整風以來，周恩來被認作經驗主義的代表。由於“四人幫”控制了全國的輿論宣傳工具，一時頗有聲勢，有的地方開起了“反經驗主義”的經驗交流大會，還創造出“反經驗主義”的典型來。

3月1日，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發出信號，大談反經驗主義。他引用1958年毛澤東說過的話：“理論上我們過去批判了教條主義，但是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然後說：“在延安整風當中，主要批教條主義。全國解放以後，也批教條主義，對經驗主義沒有注意批過。主席把經驗主義問題提出來了。”“對經驗主義的危險，恐怕還是要警惕。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你說學習了（指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但沒有用。主要是領導幹部不是抓得很緊。”¹⁴同日，姚文元發表《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他和張春橋一樣，用“過去”來論證“現在”，引用1959年毛批評彭德懷的言論，強調“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1959年的“現在”，變成1975年的“現在”。並謊稱“這十幾年來，毛主席多次重複了這個意見。”“梁效”內部傳達了江青的一個電話記錄稿，宋柏年交代：

¹⁴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19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1975年4月，叛徒江青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新華印刷廠工人座談會，會上江青講了“反對經驗主義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會後，已是夜裏十一點多，遲群、謝靜宜把我叫到清華大學，遲群說“首長那裏來電話了，說剛才有個問題沒說清楚，叫我們記下來傳達到今天晚上到會的人。”說完，他拿著電話記錄唸，叫我記。內容是：“當前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是大敵、是修正主義的幫兇，大敵當前，有打倒的必要。”¹⁵

“梁效”正要發表一篇文章，不管接得上接不上，立即加上一句：“經驗主義是修正主義的幫兇，是阻礙我們前進的大敵。”¹⁶

“梁效”在接著寫作的文章中，也塞進了反經驗主義的內容。范達人承認：“所謂反對經驗主義，當然是把矛頭直接指向那些有經驗的人，指向文革前擔任領導職務的‘走資派’。這一點是明確的。”¹⁷他們的文章中說什麼“老幹部只有長征、打日本的經驗”“把過去的經驗照搬到今天，是用舊皇曆對付新情況”，什麼“經驗主義者醉心於狹隘的無原則的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什麼“經驗主義者缺乏明確的方向，沒有遠大的理想，總是埋怨革命的列車開得太快”，等等。

4月1日，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雜誌，1975年第4期）。上海的“四人幫”幫派體系吹捧“這是張春橋思想”，還是“第四個里程碑”¹⁸。張、姚的兩篇文章發揮了毛澤東的左傾思想。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根據兩個“凡是”的天條，還說這兩篇文章是毛主席看過的、畫了圈的，不能批。4月7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經驗主義怎樣成爲王

¹⁵ 《梁效罪證材料》，63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¹⁶ 見北京平谷縣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組：《革命能改變一切——學習〈介紹一個合作社〉》，《人民日報》，1975年4月13日。

¹⁷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93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¹⁸ 馬、恩是第一個里程碑，列、斯是第二個里程碑，毛是第三個里程碑。毛還沒過去，他們就樹起張春橋爲第四個里程碑。

明機會主義的助手》，明目張膽地攻擊周恩來。說經驗主義者是參加了1926年至1927年的北伐戰爭的，“恰恰是這些同志自覺或不自覺地成了王明教條主義的合作者”。

4月18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金日成。毛對金說：“我今年82歲了，快不行了。……我不談政治，由他來跟你談（毛揮手指向鄧）。此人叫鄧小平。他會打仗，還會反修正主義。紅衛兵整他，現在無事了。那個時候打倒了好幾年，現在又起來了。我們要他。”¹⁹毛當年把鄧整成“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成員、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卻說“紅衛兵整他”。這個人的爲人起碼是不誠實的；但現在他說“我們要他”，倒是誠實的。毛對鄧的器重溢於言表。會見之後，鄧匯報情況，特別談到江青等人3月初以來大批經驗主義的問題。江青在政治局提出討論反經驗主義問題，被鄧小平擋置。鄧向毛表示，他不同意關於“經驗主義是當前主要危險”的提法。毛讚同鄧的意見。這時毛對鄧是言聽計從的；而鄧也只有利用毛這張“王牌”，才能壓倒“四人幫”，改變局面。

4月23日，姚文元給毛澤東送上新華社《關於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請示報告》。1975年2月，新華社曾制定一個報道計劃，其中沒有批判經驗主義的提法。姚文元留中不發。3月底，姚讓新華社修改，把批經驗主義作爲報道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主要內容。²⁰然後，繞過政治局，呈請毛主席批准，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不料毛做了一番不利於“四人幫”的批示。他早已讚同鄧小平的意見，正欲有所表示，姚文元恰好給了他一個機會。

提法似應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兩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爲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爲是，動不動就訓

¹⁹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579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²⁰ 新華社記者述評：《四人幫上演反經驗主義醜劇的前前後後》，新華社1977年3月2日電。

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此問題請提政治局一議。²¹

對於毛的這一番指示，王洪文居然批：“暫不傳達。”姚文元也批：“同意暫不傳達。精神可在新華社工作中貫徹執行。”《毛澤東傳》的作者說：“這裏批評的‘自以爲是，動不動就訓人’、其實‘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顯然是針對江青的。”²²江青是該批的。毛澤東本人呢？他運用“馬列”這個概念，將“馬”和“列”連在一起，說明他也不懂“馬列”，既不懂馬克思，也不懂列寧。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是列寧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藝。所謂“馬列”，其實，既非“馬”，又非“列”，而是斯大林主義。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實際也是“秦始皇加斯大林”；秦始皇和馬克思是不能相加的，秦始皇和斯大林才可以相加。不管“馬”和“列”，毛都是不讀的。毛身邊的女孩子孟錦雲說，她看到毛常讀的書是《二十四史》，《紅樓夢》也讀過好幾遍。毛告訴小孟，他把《資治通鑑》讀了 17 遍。另一部“資”字頭的著作——《資本論》卻一遍都沒有讀過。他號召人們：“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想辦一個展覽，讓大家看看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怎樣“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的。結果，搬出來的綾裝書上，圈圈點點，密密麻麻；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上了無痕跡。²³這個展覽就沒法辦了。毛的知識結構是殘缺的。他迷戀中國古代典籍，不了解西方文明，所以很難“弄通”建立在西方文明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

²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426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 51 卷，524 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²²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0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²³ 于光遠說，他可以證明毛沒有讀過《資本論》。在延安時他任圖書館館長，毛沒有借閱過《資本論》。從汪東興籌辦的這個流產的展覽可以看到，毛進了北京，也沒有讀過《資本論》。

4月27日，政治局開會，傳達毛關於反經驗主義的批示。毛要“政治局一議”，很自然，“議”到了江青頭上。鄧小平、葉劍英等在會上發言，揭露和批評江青等人以反經驗主義為名，攻擊周恩來，而且1973年以來已多次發難。會後，江青等人認為，這是“突然襲擊”，搞“圍攻”，是1970年“廬山會議的再現”。王洪文給毛澤東寫信，說：“這場爭論，實際上是總理想說而不好說的話，由葉、鄧說出來，目的是翻前年12月會議的案。”“12月會議”即1973年12月批判周恩來的投降主義的會議。江青也給毛澤東住處打電話，張玉鳳留下一份記錄：

1975年5月我向毛主席報告江青同志來電話，說這幾天政治局開會對她進行圍攻的情況（大意）。毛主席說：這個會有成績，把問題攤開了。批評江青還是第一次。她這個人只能批評別人，很兇。別人不能批評她。批林批孔，什麼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夾了走後門。幾十萬人都走後門，又要這幾十萬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門，就有走後門，幾萬年還會有。以上談話，毛主席當時沒有指示傳達。張玉鳳記，1975年5月。²⁴

張、姚反經驗主義是毛默許的。他聽了鄧小平的話，要扭轉反經驗主義，江青、王洪文反彈強烈。他不得不親自出馬了。

毛說“不要搞四人幫”

5月3日深夜，毛澤東在他的住地中南海游泳池召開政治局會議，自去年7月17日會議後，闊別10個月了。這是他去南方養病之後第一次同大家見面，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主持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抱病出席。會前，毛同來人一一握手。

和陳永貴握手時說：

²⁴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不要住在釣魚臺，那裏沒有魚可釣，你和吳桂賢都搬出來。

江青住在釣魚臺 17 號樓，那裏是她的地盤。毛要陳永貴、吳桂賢他們退出。

毛和謝靜宜握手時，有一段對話：

毛：你當了大官了，要謹慎呀。

謝：我不想當大官，但是現在官做得越來越大。²⁵

毛：試試看吧，搞不好就捲鋪蓋。（毛做了一個捲鋪蓋的手勢）

謝靜宜不過是毛的機要員，竟能當“大官”、列席政治局會議，何也？

會上，大家都聽毛一個人講話。他從反經驗主義講起：

多久不見了。有一個問題，我與你們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個別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春橋那篇文章（他記錯了，不是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應為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我沒有看出來。（鄧小平提了不同意見，他才“看出來”）我只聽了一遍，我是沒有看，我也不能看書，講了經驗主義的問題我放過了。

毛澤東是很難認錯的，為了扭轉反經驗主義，他居然說“我自己也犯了錯誤”。接著又批評別人：

你們只恨經驗主義，不恨教條主義，二十八個半統治了四年之久，打著共產國際的旗幟，嚇唬中國黨，凡不讚成的就要打，俘虜了一批經驗主義。你（指周恩來）一個，朱德一個，還有別的人，主要

²⁵ 1975年9月在釣魚臺，江青對謝靜宜說：“做了大官了，不大見了。”謝說：“我才不願意做大官呢。”江說：“真不願意做大官？說的是真心話？”謝扭扭捏捏地說：“是真心話。”（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六《江青反黨言論摘編》，1976年11月12日。）連江青都懷疑她“不想當大官”“不願意做大官”是不是真心話。

是林彪、彭德懷。

說起教條主義之害，他還講了一點親身經歷：

外國人放個屁都是香的，害得我兩年不能吃雞蛋。因為蘇聯人發表一篇文章，說裏面有膽固醇。後來又一篇文章說膽固醇不要緊，又可以吃啦。

大家笑過，又聽他談嚴肅的問題：

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廬山會議反對林彪是對的。²⁶

他又說：

我看批經驗主義的人，自己就是經驗主義。……中國與俄國的經驗批判主義，列寧說，那些人是大知識分子，完全是巴克萊學說。巴克萊是英國的一個大主教，你們去把列寧的書看一看。

這時，江青想賣弄一點知識，問：“主席是不是說看《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

毛：“嗯。”又問，“那是誰？”

²⁶ 毛針對“四人幫”講的“三要三不要”，與警告林彪的說法相同，又說“和廬山會議不同”。吳德說，毛主席說“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我不懂這個意思。毛時代高層的人都是謹小慎微的，生怕毛的話裏有陷阱。吳德問張玉鳳，張告訴他：4月27日政治局會議後，江青打電話告狀，要她報告主席，說會上葉（劍英）、吳（德）等跳出來圍攻他們，連倪志福也跳出來了，這是廬山會議的再現。毛主席不同意江青這樣說，所以說“這次和廬山會議不同”。吳德聽了，說：“我才恍然大悟。”（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66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張玉鳳答：“江青同志。”

毛的白內障很嚴重，近距離都看不清人了。但自己老婆的聲音聽不出來嗎？奇怪！想必是久不見面，有點陌生了。但江青在公眾場合卻常常高喊：“我代表毛主席來看望你們！”“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毛主席身體非常健康！”

提到江青，毛就說江青：

江青同志，黨的一大半鬥爭沒有參加，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都沒有參加鬥爭，沒有參加長征，所以也難怪。我看江青就是一個小小的經驗主義者，教條主義談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樣寫了一篇《更加布爾什維克化》，也不會像張聞天那樣寫《機會主義的動搖》。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自作主張，要跟政治局討論，有意見要在政治局討論，印成文件發下去，要以中央的名義，不要用個人的名義，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義，我是從來不送什麼材料的。

他以前在 1974 年 7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到“上海幫”，這個會上改稱“四人幫”。你叫他們“不要搞四人幫”，他們“照樣搞”，怎麼辦？毛又把話說回來了：

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但有問題要講明白。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²⁷

後年解決不了呢？那就不要解決了。毛在打擊周恩來之後，又批評“四人幫”。但並不是要“解決”“四人幫”，而是左右開弓，兩面敲打，以便居高臨下，駕馭兩派。俄國的歷史學家亞歷山大·潘佐

²⁷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0 頁。這個談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及《毛澤東文集》均不見。張迪傑主編的《毛澤東全集》第 52 卷有這個談話，題為《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談話》（1975 年 5 月 3 日）（1~7 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夫評說：“毛是個政治謀略的大師，他有意在不同派別的領導人之間搞平衡，迫使他們只聽從他一個人的調遣。”²⁸ 他讓鄧小平兼總參謀長的同時，還讓張春橋兼總政治部主任，也是為了平衡。批評是一回事，還有扶持。吳德的回憶錄中說：“1973年8月召開了黨的十大之後，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找我們談話，提出要扶助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他指著房子外邊菜地裏的一些蔬菜比喻說，就像培植它們的生長一樣。”²⁹ 真要“解決”還不是很容易！毛澤東和後來的毛二世鄧小平，批評左傾和極左，總是一邊批評、一邊保護；反起右來，卻是冷酷無情，一個巴掌打下去，人仰馬翻。歷來如此！但毛沒有料到，他留下的“四人幫”概念，成了華國鋒手中的武器。沒到後年，“四人幫”問題果真“解決”了。

毛講話後，應由副主席王洪文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貫徹落實，王拖延不辦。3個星期之後，5月27日，經毛批准，由鄧小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到6月3日，會議開了3次。在會上，王洪文檢討了幾句，江青未認錯。會議決定，要向主席做報告。6月14日，王洪文給毛主席的信中說：

這次會議上，大家主要對於“批判經驗主義”的問題，“四人幫”的問題，“以個人名義送材料”的問題，提“十一次路線鬥爭”的問題等，進行了批評。會上，春橋、文元同志對於在講話、文章中提出反對經驗主義有片面性問題，作了自我批評。江青同志除了在4月27日會議上對批判經驗主義問題上承擔了責任、作了些自我批評外，這次會議上也談了一下“四人幫”的歷史關係和工作上的關係。會後電話告我，她還要給主席寫書面的自我批評。我在這次會議上對於批林批孔、讚成批“走後門”、兩次大會沒有向主席報告，對讚成“批判經驗主義”問題、“四人幫”問題、“不抓大事”問題上作了自我批評。這次會議總的來說，開得一般。就我個人看，會議上對於

²⁸ [俄]亞歷山大·潘佐夫：《毛澤東傳》（下），83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這部書是海外學者所撰寫的毛澤東傳記中比較優秀的一部。

²⁹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10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評是不滿意的。³⁰

6月28日，江青向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書面檢討，說：“我對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們，更對不起小平同志。”她檢查一年多來所犯的錯誤，包括批評周恩來時提出“第十一次路線鬥爭”“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齊發”“個人自作主張送材料”，以及講“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等。她承認確有“四人幫”：

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麼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在這個問題上，我負主要責任，連累了他們三位同志受批評，是很對不起他們。以上的錯誤是嚴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團結和三要三不要方針的。造成這些錯誤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個人主義、主觀主義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謹慎，不謙虛，……我有信心和決心遵照主席的教導、黨的要求去改正錯誤。³¹

江青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囂張氣焰遭到了打擊。

王洪文在十大以後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澤東是把他作為接班人來培養的，但一年多來深感失望。6月下旬，他被派到浙江、上海去“幫助工作”。鄧小平本來主持國務院工作，自7月以後，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也由他主持。

1975年夏，“四人幫”處於頽勢，連他們的同夥康生也反戈一擊了。氣息奄奄的康生把王海容、唐聞生叫到病榻前，對她們說：“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他還提供

³⁰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7~17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³¹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38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232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了證人，一個叫王觀瀾，一個叫吳仲超。³² 毛似乎並不採信，在接著而來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依然重用江青和張春橋。粉碎“四人幫”以後，江青和張春橋的叛徒問題查無實據。康生是中共黨內整人、害人的惡魔，雖然老奸巨猾，終究逃不脫歷史的懲罰。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宣佈康生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中共中央宣佈將康生永遠開除出黨。他的骨灰被撤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排除了“四人幫”的阻力，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大見成效。他又打著毛主席的旗號，將毛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講的三句話——“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以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歸納成“三項指示為綱”，重點當然是“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的精神，有關部門擬了三個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即《工業20條》）、《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即《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論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

1975年的中國，大有起色。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增長8.7%，其中工業增長15.5%，農業增長3.1%。³³ 另有一組統計數字：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增長11.9%，其中工業總產值比上增長15.1%，農業總產值比上增長4.6%。³⁴ 中國的統計數字都是“參考消息”，以上兩種統計，不知何者為確。也許兩者數字都不確，但工農業生產有所增長是確實的。

³² 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510頁，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葉永烈：《張春橋傳》，28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又見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258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³³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5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³⁴ 《中國共產黨執政40年》（增訂本），394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江青後院起火

江青向來視文藝界為自己的領地，旁人不得染指。

群眾對文藝問題的種種不滿，也傳到了毛澤東的耳朵裏。1975年7月初，毛與鄧小平談話時指出：“樣板戲太少。而且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百花齊放都沒有了。別人不能提意見，不好。”鄧小平說：“現在文藝不活躍。”毛說：“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³⁵

7月14日，毛又找江青談話，說：

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一年、兩年、三年。逐步擴大文藝節目。缺少詩歌，缺少小說，缺少散文，缺少文藝評論。³⁶

1975年7月以後，文藝界人士紛紛上書毛主席，要求對文藝政策進行調整。其中，長春電影製品廠編劇張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殺故事片《創業》的事件，尤為突出。

《創業》是有關石油工人的奮鬥故事。春節上映後，受到觀眾的好評。2月10日，江青要秘書給姚文元打電話，說“今天《人民日報》用了極大的篇幅吹捧《創業》，建議今後不要再登這類東西”。她還建議“組織一篇有說服力的評論文章，這種評論權力我們不能放棄”。文化部長于會泳聞風而動，給《創業》定了10條罪狀，打入冷宮。³⁷4月，在江青的指使下，文化部把主管文教的吉林省委常委蔣天錄和《創業》劇組叫到北京，責令省委和長春電影製片廠黨委做檢查。編劇張天民想不通，給毛寫了信。³⁸7月25日，毛聽了張玉鳳

³⁵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64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2卷21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³⁶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4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2卷，23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³⁷ 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499頁，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³⁸ 《吉林省常委揭發江青扼殺〈創業〉和去年在大寨的反黨言論》，1976年11月。

唸過張天民的信件後，非常生氣。他說了“文藝政策應該調整一下”，江青反調整，當然要生氣，立即寫了幾句嚴厲的批示：

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十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的文藝政策。³⁹

這個批示有利於糾正文革流行病，對“四人幫”、尤其對江青是一大挫折。備受壓抑的文藝界和廣大知識分子看到了希望。

江青的火氣大了。1975年9月，她在大寨對吉林省委書記阮泊生說：“此片無大錯，還是有錯嘛。有人攻擊文化部，我給頂著。”她還要阮打電話給省委第一書記王淮湘，讓王和《創業》的導演、編劇、攝影、主要演員來大寨。9月16日，江青當眾訓斥張天民：

張天民你多大了？（張答：我46了。）那你還是個娃娃，你告我刁狀，老娘今天要教訓你。有誰給你出主意？（張答：沒有。）你必須給主席寫個檢討，你既敢給主席寫信，就必須給主席寫檢討，因為你說了謊，告了刁狀。

目前有人攻擊文化部，給文化部施加壓力，說文化部是大行幫。我替他們頂著，老子不怕。

江青一會兒自稱“老娘”，一會兒自稱“老子”。她氣糊塗了，連自己是男是女都搞不清了。江青還撒野罵娘：

張天民信上說，我看了第二天就停演了。我他媽的什麼時候看過？什麼時候說給停演？這告的是刁狀。⁴⁰

你沒有看過，怎麼要秘書給姚文元打電話斷定《人民日報》在“吹捧”《創業》？這比看過以後發話更蠻橫。

³⁹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5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毛澤東文集》，第8卷，4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2卷，28頁，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⁴⁰ 葉永烈：《末代女皇江青》，500頁，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3。

“梁效”像斷了綫的風箏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前後江青“組閣”失敗；3月反經驗主義，因鄧小平的建言，4月被毛澤東扭轉；5月，毛說不要搞“四人幫”；5月至6月，政治局開會，批“四人幫”；7月，毛關於《創業》的批示，激起文藝界對“旗手”的反抗。受到連續打擊的“四人幫”，沉潛了一個時期。1976年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遲、謝常常說“去年7、8、9三個月，謠言四起”。所謂的“謠言四起”就是政治局開會批評“四人幫”以後擴散出去的民間議論。范達人說：“這些情況，作為‘梁效’寫作組長的我，當時一無所知。”遲群、謝靜宜只傳達對他們有利的指示，他們竟敢一手遮天。

毛對反經驗主義的批評，北大、清華和“梁效”都沒有傳達。北大黨委曾要哲學系辦反經驗主義的學習班，連毛主席語錄也編印好了。毛發話後，黨委書記王連龍改口說：“我不是要你們馬上辦，而是要你們做準備。”他們既不傳達也不認錯，而且一直在“做準備”。1975年10月8日，遲群與北大文科部分教師座談。有人提意見：“中央有什麼指示應及時傳達，例如，聽說經驗主義是主要危險的提法有錯誤，我們就不知道。”遲群馬上頂住：“經驗主義還是要反的！”所以，反經驗主義的打算，他們並沒有放棄。

《創業》的故事發生在大慶油田。毛的批示，使油田的職工歡欣鼓舞。在“四人幫”控制的“梁效”和兩校（北大、清華）是嚴密封鎖的。北大教師得知此批示，是從遠在千里之外的大慶那裏傳來的。范達人說：“四屆人大後，‘梁效’的人感到遲群有點情緒低沉，且到‘梁效’的次數明顯減少。什麼原因？大家均不得而知。”我可以告訴你，遲群在發瘋。

謝靜宜在中共十大被選為中央委員，又在四屆人大被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遲群在四屆人大之前是國務院科教組負責人。1974年11月12日，江青給毛澤東寫信，提議謝靜宜任副委員長，喬冠華任副總理，遲群任教育部長。⁴¹遲群志在必得，以為教育部長的職務非他

⁴¹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225

莫屬。周恩來在組閣期間與鄧小平、李先念商量，文化、體育兩個部門可以讓，教育部門不能讓，於是提名周榮鑫為教育部長。遲群不服氣，大叫大嚷：“老子辛辛苦苦幹了這麼多年，落了這個下場！”

“難的地方都叫我去。毛主席身邊的人都有職位，為什麼不給我安排？”他和謝靜宜吵架，說“一個臭機要員有什麼了不起”“當了中央委員有什麼了不起”“當個人大常委有什麼了不起”。半夜三更跑去踢謝靜宜的房門。謝靜宜曾跪在他面前拉著他的手求饒。遲群除了罵人，就是摔東西，把公家的幾套茶具摔掉，把兩張大寫字臺的玻璃打碎。大白天躺在房間裏睡覺，不接電話，不看文件，不做工作。晚上，他經常大劑量地服安眠藥，一次五六片。由於吃過安眠藥後在床上抽煙，燒毀了學校的兩床被褥。他覺得在房間裏“憋氣”，吃了安眠藥到院子裏轉悠，倒在地上，摔裂了肋骨，送到醫院。有一次撞在走廊的柱子上，碰破了頭，醫生給縫了好幾針。還有一次，夜裏 12 點，他吃了安眠藥以後，獨自一人到校外轉悠。保衛部門出動了清華、北大的 20 多人，出去尋找，1 點多鐘才在清華通往北大的馬路上找到他。⁴² 總之，遲群為名利而癲狂，醜態百出。

范達人說：“反對經驗主義問題似乎不再有人提倡，彷彿上面已經‘剎車’。傳說毛主席對此有批示。”“儘管毛主席四月的重要批示未向我們傳達，但是，我們仍感到氣氛的變化。‘梁效’從四月份起開始蕭條，大家沒有什麼具體任務，有點無所事事。”李家寬打發他們到北京市東城區一家乳膠廠進行勞動。“之後，便進入 7、8 月北京最為炎熱的季節。可是，‘梁效’卻處於冷冷清清的狀態。當時，我們有一種‘斷線’的感覺。因為，以往遲群、謝靜宜不時地到‘梁效’來，常帶些上邊的精神來，而現在，他們很少來，幾乎見不到他們的人影。我們沒有上邊的精神，豈不就像斷線的風箏。”⁴³ 比喻很生動。蕭條的“梁效”，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在半空中飄蕩。

頁，北京，當代出版社，2004。

⁴²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⁴³ 以上范達人所說，見《“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90~96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第十章

“梁效”的瘋狂

毛澤東病魔纏身之際，發動了最後一場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從“批林批孔”轉向“反擊右傾翻案風”，是他進一步護衛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步驟。

“四人幫”將“反擊右傾翻案風”推向“點名批鄧”，從清華、北大的“點名批鄧”推向北京的“點名批鄧”，從北京的“點名批鄧”推向全國的“點名批鄧”；最終打倒鄧小平。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點名批鄧”時期，是“梁效”的巔峰，也是滅亡前的瘋狂。

形勢逆轉

人們沒有料到，1975 年的大好形勢倏忽逆轉。轉向的由頭是毛澤東批示了清華大學的一封來信。

毛主席對《創業》的批示，打破了文藝界的沉悶局面，於是人們一時紛紛上書。但問題只有捅到毛主席那裏才能解決，難就難在信件怎樣才能送到毛主席手裏。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¹、惠憲鈞、柳

¹ 劉冰（1921—2017 年），原名姚發光，河南伊川人。1938 年參加抗日戰爭，曾為中共縣委書記。1949 年後，從事青年團工作，任團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56 年，調任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1975 年，因向毛澤東寫信揭發遲群，引發“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運動中遭批鬥、撤職、下放勞動。1978

一安和黨委常委呂方正（劉爲老幹部，後三人爲軍宣隊、工宣隊成員）也寫了一封聯名信，通過鄧小平轉給毛澤東，告遲群專橫跋扈，作風惡劣。

黨委副書記劉冰、惠憲鈞（軍宣隊負責人）、柳一安（工宣隊負責人）對黨委書記遲群進行勸說無效，他們就想請求上級領導來解決問題。找誰？找北京市委，吳德有沒有這個膽量來解決遲、謝的問題？恐怕沒有。找中央，哪個部門？教育部不是黨的機構，無權處理黨委書記遲群的問題。找中央辦公廳，遲群正是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派來的，受到信用。想來想去，清華不是“毛主席抓的點”嗎？只有寫信給毛主席了。1975年8月，他們三位副書記再加上政治部主任呂方正（軍宣隊成員），經秘密磋商，起草了一封給毛主席的信，反映遲群的問題，請求中央派人來解決。他們所羅列的遲群的問題是：

- 一，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嚴重。
- 二，毫無黨的觀念。
- 三，搞一言堂、家長式的惡劣作風。
- 四，任人唯親，封官許願，違反黨的幹部政策。
- 五，資產階級生活作風。

寫了信，如何送到毛主席那裏，又是難題。劉冰找了在團中央工作時的領導胡耀邦，胡支持他們的行動，指點他們多寫事實，盡量將虛詞去掉。胡介紹劉去找鄧小平的秘書王瑞林，再經鄧轉毛。此信同時抄送北京市委。信發出了將近兩個月，沒有動靜。10月，他們又寫了一封，對8月的信做了補充和報告後續情況，經教育部副部長李琦，交胡喬木，轉鄧小平，送毛主席。同樣也抄送北京市委。²這一次動靜就大了。毛居然做了這樣一番批示：

¹ 年平反後任蘭州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1979年任甘肅省副省長；1981年任甘肅省委副書記；1986年任甘肅省人大主任。1988年任七屆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

² 劉冰：《風雨歲月——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憶實》，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劉冰等人的兩封信，又見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³

《毛澤東傳》下冊 1754 頁，有毛批示的另一個版本：

10 月 19 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後同李先念、汪東興等談話，說：“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一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⁴ 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指劉冰等同年 8 月和 10 月的兩次來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毛澤東同李先念、汪東興等談話記錄，1975 年 10 月 19 日）

劉冰等人的信件告的就是遲群、謝靜宜，毛卻要他們二人參與對信件的處理，由被告發人來處理告發人。

這一篇話，既無事實根據，又無邏輯聯繫。就憑這一派胡言，發動了全國範圍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雖然“四人幫”利用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興風作浪，但這一運動的發動完全出於毛澤東的本意。起初的一些會議，毛澤東還向毛遠新交代，不要讓江青知道。

毛的批示，除了第一句敘事外，下面的論斷性語言，每句話都是錯的。劉冰等人雖然告遲群，但，是請求上級來處理，不是要“打

³ 《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486 頁，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⁴ 非也。“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是 1968 年 7 月，沒有“小謝”；“小謝”進清華是 1969 年 3 月，沒有“三萬工人”。而且當時軍宣隊帶隊的是警衛團團長兼政委楊德中，也不是“小謝”。毛只記得他的身邊人。

倒”；如果要“打到”，那是上級的事情。第一封信對“小謝”還有拉攏的意思，更談不上“打倒”。“信的動機不純”從何證明？至於說矛頭對著毛，完全是強加於人。給我寫信，就是矛頭對著我，什麼邏輯？以後誰還敢給你寫信？劉冰等人的兩封信，水平不高，但根本沒有涉及“兩條路線鬥爭”，怎麼成爲“當前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從批示的內容來看，毛已是昏庸不堪，但從他採取的動作來看，卻是精心設計的。毛搞政治慣於運用戰爭的戰略策略。先是確定要打這一仗，然後尋找戰機。

1957年，從整風轉爲反右，5月中，他就把右派分子帽子拿在手裏；國務院副秘書長盧郁文（民主黨派人士）收到一封匿名信，戰機來了；他小題大做，把它說成“階級鬥爭的信號”；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爲什麼？》的社論，下達總攻令，把右派分子帽子派發出去。這一次，他先是確定要發動又一次兩條路線鬥爭，來維護文化大革命，然後抓住劉冰等人10月的來信作爲戰機。劉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是8月發出的，那時毛還沒有決定要打這一仗；而決定了打這一仗，目標是鄧小平，所以要把戰火引到鄧小平身上；轉信成了把柄。他忘了，7月張天民的信也是經鄧小平轉的，還有《海霞》編劇謝鐵驪、導演錢江的信，洗星海夫人錢鈞玲要求舉辦紀念人民音樂家洗星海、聾耳音樂會的信，周海嬰要求出版魯迅書信和著作的信等，都是經鄧小平轉的。那一次次的轉信，他沒有提出責問。“我在北京，寫信爲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同樣的問題，也可以指向毛本人，你不想一想：“給我寫信爲什麼‘還要經小平轉’？”鄧小平轉信時未置一詞，從何證明“小平偏袒劉冰”？

毛遠新這個小人物起了大作用

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全面整頓的成效是讚賞的，但全面整頓實際上是糾文革之偏，所以他同時又擔心鄧小平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想到這裏，說翻臉就翻臉。

毛遠新利用了毛澤東的矛盾心理，把他推向窮途末路。

毛遠新爲毛澤東之弟毛澤民之子。文革中，他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造反派，30多歲就當上了遼寧省委書記、瀋陽軍區政委。因父親1943年在新疆被殺害，1975年9月，他隨中央代表團參加慶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成立20週年的活動。10月返回，路經北京時被毛澤東留在身邊，成爲足不出戶的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從小在江青身邊長大。他們在政治傾向、思想觀點上是一致的。毛澤東晚年不願見江青，而毛遠新則常侍左右，向毛澤東耳邊吹風。因而毛遠新起了“四人幫”所不能起的作用。而且，自從來了毛遠新，鄧小平和其他政治局委員都見不到毛澤東了，連王海容、唐聞生也被冷落了。⁵

自從毛遠新當上了“聯絡員”，每次政治局會議的開場就由他傳達“毛主席指示”，而政治局會議的收場，也由他向毛主席匯報。他揚言：“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幾段話，就夠他們學習一個月的。”⁶

姚文元在受審訊時交代：

毛遠新是以毛主席的聯絡員的名義列席政治局會議的，但他又不像是聯絡員，他的每次發言都成了中心調子。每次傳達毛主席指示之後，都有他自己的解釋，而且還說毛主席同意他的看法。這就超過聯絡員的職責，這也說明當時黨內生活極不正常。⁷

毛遠新講到文化大革命，最能打動毛澤東的心：

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

他認爲：這股風似乎比72年批極左還兇些。⁸

⁵ 毛說過：“這兩個小耗子，看見我這只船要沉了，就跑到別的船上去。”（《“文革”時期外交部的“小姐”和“老爺”》，指他們要跑到鄧小平的“船上”去。）

⁶ 高新：《習近平大哥是毛遠新最好的朋友》，自由亞洲電臺，2018-05-28。

⁷ 史雲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395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⁸ 毛遠新筆記，1975年9—11月。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

他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綫。今年以來，沒有聽他講過怎樣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怎樣批《水滸》，怎樣批修正主義。⁹

8月，毛澤東收到劉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時，他對秘書說：“先放著。”9月，他還批評江青在大寨的講話是“放屁”，支持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毛遠新的耳邊風吹了一個多月。10月，毛澤東收到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時，是在毛遠新進讒言之後。第一封信只是告遲群，第二封信涉及毛的寵信謝靜宜。他又讓秘書把第一封信找出來看了一遍，問了毛遠新有關遲、謝的情況。毛遠新和遲、謝早就有勾結，他們共同炮製、推廣了朝陽農學院的所謂“教育革命經驗”。他提供的遲、謝的什麼情況，可想而知。毛澤東說：“遲群不能走。遲群走了，不是又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嗎？”他還說：“他們罵遲群，實際上是反對我，可又不敢，就把氣發到遲群身上。”¹⁰毛認為劉冰等人的思想情緒代表了對文革不滿甚至要算賬的一批人的態度。11月2日，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就順著他的思路說了：

有兩種態度，一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

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

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

清華所涉及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路綫鬥爭的反映。

你找小平、東興、錫聯談一下，把你的意見全講，開門見山，不

（1949—1976），下冊，175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⁹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415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此書出版後廣受質疑。但毛遠新所說，可與其他言論互相印證，不失為可信。

¹⁰ 徐景賢：《十年一夢》，377頁，臺北，時代國際出版社，2005。徐說，此話是他在與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閒談時聽到的。

要吞吞吐吐。你要幫助他（指鄧小平）提高。¹¹

毛澤東要初出茅廬的毛遠新去教訓鄧小平，鄧小平不買賬，頂了起來。毛遠新按毛澤東的指示，“開門見山”提出 11 個問題，批評鄧小平。鄧說：“照你這麼說，我是執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綫囉！說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搞了修正主義路綫，不好說。從 9 號文件以後，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可以想一想嘛。”¹² 事後毛遠新向上海的“四人幫”幫派體系馬天水、徐景賢等人描述時，他站起來，左手叉腰，右手指著鄧小平說：“不錯，你搞的就是修正主義！”¹³ 毛遠新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對毛遠新說：“你有理，頂了他，這就叫幫助。”這時，毛澤東已經自我封閉，他所接觸的人只有毛遠新一個，只知道這一個人“有理”，別人是否還有別人的理？他根本不知道。

鄧小平自稱“桃花源中人”

毛希望鄧小平“有個轉彎”，因此提出由鄧主持，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統一思想。決議產生之前，結論已經有了。毛說：“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錯誤是兩條：“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這是典型的中國庸人的思維方法，在需要量化的地方，只有模糊概念；在無法量化的地方，卻來“三七開”。三與七的比例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打倒一切”的“一切”，“全面內戰”的“全面”，都不是局部性的錯誤，爲什麼只占三成？況且文革的錯誤遠不止這兩條。而承認兩條錯誤，也是遮遮掩掩的。毛說了兩條錯誤，接著說：“打倒一切其

¹¹ 毛遠新筆記，1975 年 11 月 2 日。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55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¹²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 6 卷，619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126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¹³ 徐景賢：《十年一夢》，375 頁，臺北，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鍛煉。但是把人往死裏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¹⁴ 承認兩條錯誤，連標點，總共 14 個字；爲兩條錯誤辯護倒有 105 個字。

毛內心深知文化大革命搞糟了。毛對毛遠新、張玉鳳說：“小毛（遠新）、小張（玉鳳），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後，可能不出一年，長了不出三、四年，會有翻天覆地。民心、軍心，我看不在（我們）這邊。你們要信！”¹⁵ 正因如此，他要利用自己的權力和威望作最後一搏，以爲在他生前做個決議，文化大革命就永世不得翻案了。結果，比他想象的還要來得快，不出一個月就翻天覆地了。對歷史問題做決議，這是斯大林的遺風，他甚至對學術問題以至于一本教科書都要做決議。歷史問題、學術問題，都是研究的對象，追求真理，常議常新。運用政治權力做決議，以堵悠悠之口，只能收一時之效。斯大林在 20 世紀 30、40 年代做的多少決議，到了 50 年代還不是全都煙消雲散了！即使按照毛的意圖做個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能管多久？毛澤東的文革思維已經鑽進了牛角尖，沒有一點智慧。

不料，鄧小平不識抬舉，拒絕接受對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的要求。他的女兒鄧榕在書中寫道：

鄧小平明確地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他不願違心地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¹⁶

¹⁴ 《毛主席重要指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 13 冊，488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¹⁵ 1993 年 12 月 24 日，張玉鳳在中國人民大學毛澤東誕辰 100 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14 年後發表於《社會科學論壇》。

¹⁶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427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鄧小平曾推給政治局委員紀登奎起草決議，紀也不幹。後來紀在接受採訪中談道：

毛主席本想“文革”兩年就結束了，沒想到駕馭不了啦，已經 9 年了。要安定團結，但要給“文革”做個結論，沒有結論收不住。林彪事件後，已經證明“文革”在理論上、實踐上失敗，毛主席的頭腦中是打問號的。小平執政，一系列措施觸及“文化大革命”。劉冰寫信的事發生以後，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寫個決議，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他還定了口徑：三七開。小平婉言拒絕了，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¹⁷

鄧違拗了毛的意志，但沒有拋棄毛的思維方式。他不願主持寫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6 年以後，卻主持寫了一個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即《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 年 6 月）。這個決議一出，文革就不容討論、不能研究了。鄧和毛一樣，都是以決議作為統一思想的緘口之術。他們可以算是大人物了，但有一個小問題卻不懂得：思想深藏在人們的腦殼裏，統一與不統一如何驗證？因而，思想是不可用權力來統一的，只能在思想的自由市場上通過交換達成多數人的共識；也不是一切問題都可以達成共識，只能在思想不一致的前提下，就某些問題達成共識。

“反擊右傾翻案風”從清華大學點火

毛不能容忍鄧違拗他的意志，不允許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又要來一次運動了。鄧的“整頓”，實際上是為了糾正文革的兩個錯誤：“打倒一切”和“全面內戰”；毛卻說他是刮“翻案風”。毛雖承認文革的錯誤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但為了反對“翻案風”，他又要指令“打倒”和發動“內戰”了。毛陷入自相矛盾的泥潭，不

¹⁷ 紀登奎談話記錄，1987 年 10 月。轉引自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57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可自拔。1975年11月21日，根據毛的指示，在黨政軍老幹部136人中“打招呼”，免得他們“犯新的錯誤”。經毛批准的《談話要點》是：

一，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於1975年8月、10月兩次寫信給毛主席，他們用造謠污衊、顛倒黑白的手段，誣告於1968年7月帶領工人宣傳隊進駐清華、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副書記謝靜宜兩同志。¹⁸ 他們的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主席的。根據毛主席指示，清華大學黨委自11月3日起召開常委擴大會，就劉冰等同志的信展開了大辯論。這個會逐步擴大，現在已經在全校師生中進行辯論。

二，毛主席指出：“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認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儘管黨的九大、十大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作了總結，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賬，總是要翻案。根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通過辯論，弄清思想，團結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華大學的這場大辯論必然影響全國。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招呼，以免這些同志犯新的錯誤。中央希望大家認真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正確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自己，同廣大幹部、廣大群眾團結在一起，以階級鬥爭為綱，把各項工作做好。

¹⁸ 重複了毛的不實之詞。1968年7月27日宣傳隊3萬人進清華時，不是8341部隊，沒有遲群、謝靜宜。遲群、謝靜宜是1969年3月24日進清華的，帶隊的是警衛團團長楊德中。與此同時，8341部隊85人也進了北大。請看謝靜宜自己的敘述：“主席關於進北大的事，也做了多次指示。最後當主席指示‘可以進了’時，於1969年3月24日由楊德中政委、王連龍副政委帶領剛組建的85人的隊伍（也包括我在內）開進北大。”（謝靜宜：《毛澤東身邊工作瑣憶》，182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於是，黨中央發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號令，持續了9個月的“全面整頓”為之中斷，戛然而止。林彪事件之後，毛一再強調“以安定團結為好”。一搞運動，又顧不得“安定團結”了。

“打招呼”的會，毛澤東還是讓鄧小平主持，逼他對文化大革命表態。“四人幫”則煽風點火、推波助瀾，把“反擊右傾翻案風”引向“點名批鄧”，打倒鄧小平。

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早在中央的“打招呼”會以前就開始了。毛說：“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從此“大批判”改稱“大辯論”。

遲群、謝靜宜以毛的批示為“尚方寶劍”，在清華大學發動“大辯論”。遲、謝自稱為“毛主席的兩個兵”。遲群在“梁效”的辦公室拍著桌子喊叫：“他媽的，這下好辦了，主席說話了。”“周榮鑫¹⁹以為我看中了教育部長這個肥缺，我還嫌這個廟小呢！”²⁰遲群從頹廢中甦醒，恢復狂徒的本色，亢奮異常。

大辯論由清華黨委常委會到常委擴大會、再到黨委擴大會乃至全校大會，採取層層擴大、逐步升級的策略，以製造持久的緊張氣氛。

11月3日，召開清華黨委常委會，吳德在會上傳達了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批示。吳德指責劉冰等人，不要在桌子底下做小動作。劉冰當場反駁：“我們上書毛主席兩次都抄送市委，你們沒有反應，怎麼能說是我們‘做小動作’？”吳德無言以對。遲群要劉冰把他們的信當眾唸一遍，在唸的過程中，遲群的人不斷起哄，對劉冰等人的

¹⁹ 周榮鑫（1917—1976年），原名周文華，山東蓬萊人。1937年加入共產黨，同年赴延安，入抗大學習；又進中央黨校，結業後留校工作。1943年後，一直在晉察冀邊區工作。1949年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建築工程部副部長、浙江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教育部副部長、國務院秘書長等職務。文革初期，奉周恩來之命，為保護老干部到處奔波，人稱“救火隊長”。1970年被下放到寧夏勞動。“九一三”事件後恢復工作。1975年1月，經周恩來提名，在四屆人大被任命為教育部部長，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被迫害致死。1977年，中共中央為周榮鑫平反昭雪，8月28日，在北京召開追悼會，鄧小平、李先念、王震、谷牧等參人加了追悼會。

²⁰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初編），7頁，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教育革命大辯論”由此開始，而劉冰等人的兩封信根本沒有涉及教育革命。信的一開頭就說：“教育革命形勢大好，廣大幹部和教職工為之歡欣鼓舞。”雖然這是一句空話，至少決無反對教育革命的意思。

11月12日，擴大到全校支部書記以上幹部1300多人。

11月18日，在遲群主持下，清華大學召開萬人辯論大會，還是先由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傳達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批示，然後15人上臺發言，傾盆大雨潑向劉冰等人。發言者明明都是“大批判”的語言，卻說是“教育革命大辯論”；聲稱“大辯論”，又不給辯論對方發言的機會。因為剝奪了對方的發言權，故這種“大辯論”無往而不勝。

北京大學繼之而起

清華大學的大字報鋪天蓋地。北大組織全校師生員工分批到清華看大字報、抄大字報，回來後如法炮製，建起大字報欄。北京人以至于外地人又到清華、北大看大字報、抄大字報，每天來者數以萬計。

北大移植了清華的經驗，也是層層擴大、逐步升級，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在辯論中“反擊右傾翻案風”。

11月12日，北大召開黨委常委會，傳達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批示，介紹清華的“教育革命大辯論”經驗，研究北大的“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怎麼搞。黨委書記王連龍在會上說：“今年以來，特別是7、8、9月份，社會上造謠、傳謠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謠言傳播之廣、內容之惡毒，都是驚人的。社會上的這股風也刮到我們學校。有的說：‘這幾年教育革命搞的是形而上學。’有的說：‘理向工靠，不要基本理論。’‘知識分子政策不落實。’‘現在不是知識私有，而是知識沒有。’”他把領導人的指示和群眾的正當批評都當作“右傾翻案風”。同日，北大黨委常委會成員全體參加清華的千人大會，旁聽對劉冰等人的揭發、批判。

11月15日，會議擴大到黨委委員、總支書記等88人參加。

11月16日，會議擴大到支部委員以上幹部1628人參加。上個月，華國鋒在全國第一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要使全國每個縣都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基礎上實現安定團結，萬眾一心地大幹社會主義。”王連龍在批判“右傾翻案風”時影射說：“四個現代化要搞上去，但是靠什麼搞上去？是不是就靠學呀！鈎呀！幹呀！靠萬眾一心，包括地富反壞右？”

11月17日，支部以上幹部會議繼續進行，部署全校範圍的“教育革命大辯論”，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1月21日、22日，連續召開全校師生員工及家屬大會，傳達毛主席對劉冰等人來信的批示和吳德的講話，聽取清華“大辯論”的實況錄音，黨委書記王連龍做開展“教育革命大辯論”“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動員報告。

“追風源”害死周榮鑫

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進一步“追風源”。先是從劉冰追到教育部部長周榮鑫。周榮鑫在鄧小平的全面整頓中，表現積極。鄧小平對他說：“現在學生不讀書了，你是教育部長，要發表演說。”當時流行一個說法：“大學的招牌，中學的水平。”周榮鑫極力扭轉文革以來，特別是“四人幫”的幹將遲群、謝靜宜控制的北大、清華所推行的一套極左做法。他有一個口號：“就是要扭！”他在哪裏發表演說，謝靜宜和北京市委就派科教組組長蕭英到哪裏去“消毒”。²¹

11月8日，張春橋作爲主管文教的副總理，找周榮鑫談話，要他檢討。周與之爭辯。張無奈，說周“九頭牛也拉不回來”。張春橋說：

²¹ 《關於蕭英同志去鋼院“消毒”問題的調查報告》，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參考材料之六，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1日。

社會上有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教育革命的風。

一個是培養有資產階級覺悟的、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一個是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沒文化的勞動者，你說要什麼人？我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

培養什麼人？張春橋說“寧要一個沒文化的勞動者，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沒有文化的勞動者”需要培養嗎？張春橋還說過“知識越多越反動”。他的主張就是從根本上取消教育。張春橋有名的昏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就是出於這次談話。

²² “四人幫”讓人民吃“社會主義的草”，他們自己是不吃的。在“四人幫”的社會主義藍圖上，人民是草食動物，他們自己是肉食動物；他們非但不吃草，還要吃“特供”。張春橋甚至還說：“階級鬥爭抓好了，就是顆粒無收也不要緊。”“只要不出修正主義，全國都成了文盲也在所不惜。”這些可笑而又可惡的論調都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引申。

張春橋的“寧要……，不要……”成了一個公式，以後就套用出許多來，諸如“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鐵路），“寧要社會主義的低產，不要資本主義的高產”（農業），“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工業），“寧要社會主義的貧窮，不要資本主義的富裕”等。他們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變成絕對觀念，企圖用觀念來改變事實。什麼壞事，只要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就成了正義；什麼好事，只要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就成了罪惡。這樣一來，人們內心的選擇只能是“寧要資本主義，不要社會主義”。高喊激進的革命口號的“四人幫”，才是真正的反社會主義的一夥。反社會主義的“四人幫”是在中國的土壤上產生的。

社會主義是千百年來人類追求的理想。從蘇聯到中國所發生的災難，不是堅持社會主義的結果，恰恰是對背離社會主義的懲罰。蘇聯

²² 史雲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401 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特色的假社會主義，已經被歷史所埋葬，“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如不改弦更張，還能維持多久？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轉發《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大辯論的情況報告》，要求下發到大、中、小學的黨支部。“教育革命的大辯論”推向全國。

教育部負責人周榮鑫、李琦挨批鬥。周榮鑫是鄧小平厲行整頓所依靠的“四大金剛”之一（另外三個“金剛”是胡耀邦、萬里、張愛萍），又是“四大金剛”中受迫害最嚴重的一個。從1975年12月開始，周榮鑫就被批鬥；病了，住進醫院，又被揪出來，批鬥了50多次。1976年4月12日，在批鬥會上昏倒，13日凌晨0:35去世，終年59歲。

“梁效”編發了《周榮鑫講話選編》和《周榮鑫言論摘編》。周榮鑫講：“總理說過，理科和外語要挑中學生好的直接上大學。這幾年沒實行，明年非實行不可。”“梁效”抹掉“總理說過”四個字，把周恩來說的編入周榮鑫的言論，當作“右傾翻案風”來批。

“追風源”追到鄧小平

從劉冰追到周榮鑫，再從周榮鑫追到鄧小平，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層層擴大、逐步升級，又演練了一遍。

1976年1月27日，北大黨委常委擴大會，擴大到各系總支書記、軍工宣隊負責人62人，進行“點名批鄧”。當日編發的內刊《北京大學情況簡報》第77期，報道常委擴大會“批鄧”情況，說：“通過兩個多月的大辯論，……使我們清楚認識到：鄧小平就是翻案復辟的總後臺，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修正主義在黨中央的總代表。”會上，唯有黨委常委周培源一人，對“點名批鄧”拒不表態。

2月5日，召開第四次常委擴大會議，進行“點名批鄧”。會議擴大到各系黨總支副書記、革委會副主任以上幹部142人。

2月10日，召開第五次常委擴大會議，進行“點名批鄧”。會議

擴大到各專業分總支書記、專業主任、共青團總支書記、全體工宣隊員、機關黨員幹部，共 785 人。遲群在會上說：“批判一百個劉冰、一百個周榮鑫，不解決鄧小平問題不行。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就是鄧小平。”“這個人向來如此，歷來如此，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犯錯誤屢教不改。在民主革命時期是這樣，十七年是這樣，文化大革命中保護了他，出來工作後又搞了。這說明搞機會主義，爲頭的改也難。他說他是維吾爾族的姑娘，辮子多。辮子多就抓你，抓你的大辮子。”

2 月 13 日，召開全校大會，批判“右傾翻案風”。在校大會上，口徑與全國一致，只提“反擊右傾翻案風”，不提“批鄧”。在層層擴大、逐步升級的會議上才搞“點名批鄧”，使得會議具有神秘感，而且參加者以爲受到了信任。

2 月 20 日，召開第七次常委擴大會議，進行“點名批鄧”。會議擴大到黨支部委員、共青團幹部共 2000 人。

3 月 4 日，召開全校大會，進行“點名批鄧”。爾後，人人必須表態；誰不表態就同誰進行“大辯論”。我從“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就是“大辯論”的對象，“點名批鄧”不表態，又罪加一等。中共中央發出五號文件，公開“批鄧”。在清華、北大，五號文件沒有向群眾傳達，因爲兩校的運動早已超過五號文件了，但特地向我一個人單獨傳達。那時我因情緒憤激，導致胃出血，住在醫院裏。哲學系工宣隊拿著文件到病床前向我傳達，要我表態。我說：“知道了。”“沒有了？”“沒有了。”工宣隊傳出去說，郭羅基對“批鄧”的表態只有三個字“知道了”。一個“批鄧”積極分子對工宣隊說：“郭羅基講的‘知道了’這三個字是有來歷的，你們知道嗎？”“什麼來歷？”“過去皇上批奏折就是用這三個字。”工宣隊恨恨地說：“郭羅基這傢伙反動透頂！”

黨委書記王連龍在一次幹部會上點名：“北大批鄧不表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周培源，一個郭羅基。”言下有罪大惡極之意。大多數人的“批鄧”表態，不過是在壓力之下的逢場作戲，聽說有人居然敢於不表態，反而受到了鼓舞。

“點名批鄧”是陰謀

北大黨委內定1月27日召開“追風源”的常委擴大會。前一日，黨委副書記魏銀秋（原8341部隊營教導員）、郭忠林（原4587部隊團政治處主任）召集麻子英、劉鴻儒、王麗梅（以上均為黨委常委）、霍生杰（政治部副主任）、孫紹友（工宣隊）、張純友（工宣隊、哲學系總支書記）6人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授意他們在第二天的常委擴大會上起來發難。魏銀秋說：“明天副政委（王連龍，原為8341部隊副政委，現為北大革委會主任、黨委書記）主持會議，追風源，但他不點名，由你們來點。”郭忠林為了搶頭功，自告奮勇一定要第一個發言。

27日上午，召開了有62人參加的常委擴大會。黨委書記王連龍主持會議，裝模作樣地提出“怎樣把運動引向深入”的問題，要大家“討論”。黨委副書記郭忠林首先跳出來“引路”。他說：“幾個月來，在揭批劉冰、周榮鑫及教育界、科技界的奇談怪論時，大家不斷想到一個問題，這股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在哪裏？廣大幹部早有議論，早有意見，早就想揭發，解決這個問題。看看運動的來龍去脈，認識到鄧小平就是總根子、總後臺，就是修正主義在黨內的總代表。”接著，魏銀秋事先佈置的那幾個人緊緊跟上，誣稱鄧小平是“當前黨內最大的走資派”“睡在毛主席身邊的赫魯曉夫”“右傾翻案風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頑固不化的正在走的走資派”“地主還鄉團團長”“中國的納吉”等等。會上，周培源沒有表態，但並不妨礙魏銀秋在《北京大學情況簡報》中寫上“參加會議的同志一致認為”。他別有用心地把郭忠林的發言改為“一致指出”，並加了一段：“揭發批判鄧小平，群衆中早有要求，要不是黨中央有統一部署，早把揭發批判鄧小平的大字報貼出去了。”請看，明明是遲、謝、王、魏、郭、李秉承“四人幫”的旨意陰謀策劃的暗中“點名批鄧”，通過《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卻變成了“群衆的要求”。“四人幫”又根據這種“群衆的要求”脅逼政治局做出公開“點名批鄧”的決定。

《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就是搞陰謀的工具。從發動“反擊右傾翻

案風”的1975年11月初至“四人幫”垮臺的1976年10月初，將近一年中，《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共出了163期，差不多兩天一期。這些簡報大部分由魏銀秋出題，簡報組起草，由他（有時王連龍、郭忠林也參加）修改定稿，再抄成大稿紙，送兩校大批判組，由李家寬、宋柏年在“文字上把關”。然後由遲群、謝靜宜審閱、簽發（遲、謝在北大的職務是黨委常委，他們的實權却在黨委書記之上，成了太上皇。黨委書記王連龍，為人還算老實，是無能之輩，被遲、謝捏在手裏）。最後，稿子裝在一個大信封裏，寫上“絕密 市委陳一夫同志親收”。

經陳一夫（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的手，稿子就成了大字鉛印的《北京大學情況簡報》（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都是老眼昏花，凡是他們閱讀的書籍、內參、文件都要用大字印刷；反之，凡是大字印刷的，就是送中央高層的）。每期印多少，送給誰，都由陳一夫全權處理。這個陳一夫又把每期簡報退給北大5份，大信封上寫著“絕密北大王連龍同志親收”。這5份簡報的分配是：王、魏、郭每人一份，“梁效”一份，簡報組存一份。黨委其他副書記、常委非但看不到《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壓根兒就不知有此事。另有一種《北京大學簡報》（少“情況”兩個字，確實是沒有“情況”的簡報），這才是發給黨委其他副書記、常委看的。王、魏、郭認為《北京大學情況簡報》中有些“情況”是需要讓黨委其他副書記、常委知道的，就有選擇地作為《北京大學簡報》另行編號。《北京大學簡報》除了在校內分發外，同樣也要上送北京市委若干份。同一個單位出兩種簡報，你說怪也不怪！

《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從它所起的作用來看，是“四人幫”和遲、謝、王、魏、郭、李之間上下勾結的渠道，也是他們向黨中央進攻的武器；從它的炮製、發送的過程來看，是“四人幫”和遲、謝、王、魏、郭、李自成體系的鐵證。這兩方面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它是重大的政治陰謀嗎？遲群1977年11月15日交代：“‘四人幫’從運動一開始就‘注意簡報’，我們根據‘四人幫’的意圖，不斷地把簡報搞成借群眾之口，欺騙毛主席、黨中央，成為替‘四人幫’另搞一

套的急先鋒的工具之一。”²³ 周恩來逝世後，政治局任命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北大校園裏有人刷大標語，表示擁護。謝靜宜卻指示簡報組不許寫簡報。

北大、清華是兩個基層單位，為什麼要單獨出簡報上送中央？為什麼要在已有的簡報之外出一種特別的見不得人的絕密簡報？這些簡報為什麼不在本單位印發，而要由市委的陳一夫轉手？陳一夫到底把簡報印了多少、送至何人？陳一夫是怎樣在上下之間挂鉤的？陳一夫可能只是一個執行者，但是誰給了他這個秘密使命？粉碎“四人幫”以後，由於吳德捂蓋子，北京市委內部的問題根本沒有查清楚。

緊跟清華、北大的第三家

北京市委不僅秘密上送《清華大學情況簡報》《北京大學情況簡報》，協助“四人幫”和兩校之間搞陰謀，而且還緊跟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

“北京市委緊跟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這個提法看起來有點荒唐。清華、北大是兩個基層單位；中共北京市委是兩校黨委的領導機構。領導機構怎麼會緊跟兩個基層單位去搞什麼名堂呢？然而這却是事實。只有聯繫 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政治鬥爭的特殊歷史環境，才能理解這個事實。荒唐的提法不過是對荒唐的事實的反映。可是，粉碎“四人幫”之後，中共北京市委反而說對“點名批鄧”進行了種種抵制云云，這就在荒唐之上更加荒唐。

1975 年 11 月，“四人幫”嚴密控制的清華、北大各自搞了絕密的《清華大學情況簡報》《北京大學情況簡報》，通過北京市委上送中央高層。兩校的《情況簡報》宣揚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戰果。

“四人幫”看了這些簡報，壁上觀火，頗為自得。到了 1976 年 1 月，王洪文、張春橋、毛遠新却說：“清華、北大的簡報沒有看頭。”為什麼？因為只是影射鄧小平，他們看厭了，不過癮了，他們想看“點

²³ 轉引自《魏銀秋罪行綜合材料》，魏銀秋專案組，1978 年 10 月。

名批鄧”的簡報。遲群、謝靜宜根據“四人幫”的旨意，在1月下旬召集清華、北大兩校的頭頭開了一個黑會，進行策劃。1月25日，清華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點名批鄧”；而且越來越擴大，直到召開幾千人參加的“常委擴大會”和萬人以上的全校大會。北大跟上，1月27日，召開黨委常委擴大會，“點名批鄧”。以後又連續召開6次“常委擴大會”和全校大會。第三家從2月6日開始召開常委擴大會“點名批鄧”的，就是中共北京市委。會議模仿清華、北大，層層擴大、逐步升級：2月6日36人參加，2月13日64人參加，2月18日400多人參加，2月23日擴大到1400多人。

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上，把《清華大學情況簡報》《北京大學情況簡報》中有關“點名批鄧”的內容全部印發給與會者，以供效法。2月18日的會上，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的講話中說：

自從去年11月3日開始，清華、北大開展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教育革命大辯論。在清華、北大的帶動下，全市大、中、小學和科技界以及有關方面，也先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在揭批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傾翻案的奇談怪論中，大家都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這股右傾翻案風的根子在哪裏？從各方面材料看，去年7、8、9三個月刮起的右傾翻案風，總根子就是鄧小平同志。在鄧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有一條同主席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

吳德的說法完全是北大黨委副書記郭忠林1月27日在北大的“引路”發言的翻版。怪不得參加這次會議並擔任組長的郭忠林洋洋得意。

2月23日，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擴大到1400多人。在兩天共17人的發言中，大力販賣清華、北大的《情況簡報》中打擊、誣陷鄧小平的那套貨色。只要看一看這些發言的題目就一目了然了。

趙俊楨（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共青團市委書記）：《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動搖派，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復辟派——揭露鄧小平的民主派的面目》；

榮泳霖（劉冰等人被撤職後提拔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代表清華、北大聯合發言。榮泳霖本來沒有參加這次會議。由於這個發言事關重大，遲群特意派他出場。他的發言是遲群親自授意、審閱的。）：《批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爲綱”》；

XX（北京市委宣傳組副組長，後爲《北京日報》黨委副書記）：《鄧小平與“走資派還在走”》；

馬小六（北京市民兵總指揮）：《狠批“三項指示爲綱”，加強首都民兵建設》；

XXX（北京市委科教組負責人）：《鄧小平是科技界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

XXX（北京市委農林組負責人）：《鄧小平在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是在農村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

XX（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三項指示爲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蕭英（原北京市委科教組負責人，後爲體育衛生部部長）：《徹底批判修正主義路線，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的勝利成果》；

XXX（首都鋼鐵廠黨委副書記）：《批判“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

XXX（北京市婦聯負責人）：《婦女運動必須以階級鬥爭爲綱——批判鄧小平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的謬論》；

XXX（北京市總工會負責人）：《不允許篡改工人運動的方向》；

XXX（北京市建委主任，後爲市委常委、市革委會副主任）：《批判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爲綱”》；

XX（北京衛戍區副政委）：《批判鄧小平妄圖破壞軍隊建設》；

XXX（北京市委常委、計委主任，後爲市委書記）：《批判鄧小平在工交戰線散布的修正主義謬論》；

XXX（《北京日報》黨委副書記）：《鄧小平與孔孟之道》；

XXX（北京團市委書記）：《鄧小平就是現代的宋江》；

XX（北京市委宣傳組副組長）：《批判鄧小平的折衷主義手法》。

會上的發言者有不同的情況：有的是指定發言不得已而爲之，有的是認識問題，也有像趙俊楨、榮泳霖、蕭英這樣可能是參與了陰謀的人。從這些發言的題目之多、範圍之廣、調子之高，不難嗅出會議的氣氛，也不難判斷這個會議在打擊、誣陷鄧小平的問題上所起的惡劣作用。會議的組織者、大合唱的指揮者，居心何在？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的公開“點名批鄧”是緊跟在清華、北大之後，中央“批鄧”的五號文件下達之前。完全可以這樣說，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是清華、北大公開“點名批鄧”的繼續和擴大，是脅逼中央發出五號文件的嚴重步驟。

會議最後，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吳德再一次號召各區、縣、局推廣清華、北大的做法，並且把《清華大學情況簡報》《北京大學情況簡報》與中央文件相提並論。他說：

會議期間大家學習了中央文件，閱讀了清華、北大的《情況簡報》。他們開始得早些，是帶頭的。

在會上大家揭發批判了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了右傾翻案風。這場鬥爭是搞馬克思主義還是搞修正主義的兩條路線鬥爭，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在黨內的反映，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前途的頭等大事。這次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總後臺就是鄧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中廣大群衆雖然對他進行批判幫助，毛主席對他耐心教育，但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根本沒有得到改造，所以上臺不久就炮製了一條與毛主席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猖狂地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向無產階級發動全面進攻，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九大、十大的案。他采用折衷主義的手法，編造了“三項指示爲綱”的修正主義綱領，否定以階級鬥爭爲綱。沒討論、沒商量、沒報告，還是獨立王國。他同劉少奇一樣，鼓吹“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作爲搞右傾翻案和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

吳德對鄧小平定了性，又羅列了四個方面的“罪狀”：一曰“鄧小平打著貫徹毛主席指示的旗號，把攻擊的矛頭指向毛主席、指向毛

主席路綫”，二曰“打著實現‘四個現代化’、關心教育科技的旗號，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擴大三大差別，破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搞資產階級專政”，三曰“打著要落實政策、消除派性、安定團結的旗號，挑撥幹部、知識分子和黨的關係，打擊新生事物，破壞老、中、青三結合，拼湊復辟倒退勢力”，四曰“打著軍隊要整頓、地方要整頓的旗號，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綫，妄圖復辟資本主義，改變黨和國家的顏色”。在當時來說，凡是正面的東西，在吳德看來都叫作“打著……的旗號”。他的結論是：“這說明在鄧小平那裏階級鬥爭並未熄滅，他是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發起進攻的黨內不肯悔改的走資派。‘階級鬥爭熄滅論’只不過是掩護走資派還在走的烟幕。”²⁴

吳德當時的態度是可以諒解的。問題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吳德聲稱他和北京市委是抵制“批鄧”、反對“四人幫”的，這就不可諒解了。故有必要將他本人當時的言論和北京市委的活動立此存照。吳德在他的回憶錄中根本不提北京市委緊跟清華、北大“點名批鄧”的事，非但掩蓋事實，而且顛倒時序，說：“北京市委是直到中央批准可以點名批鄧後才點名的。”²⁵

經清華、北大和北京市委自下而上施加壓力及“四人幫”在各種會議上鼓譟，3月3日，中共中央發出五號文件，公開“批鄧”，要求學習毛遠新整理的《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內容雜亂無章。毛晚年的“最高指示”沒有文字的依據，只有口述，而他又口齒不清，無法求證毛遠新傳達下來的是否符合原意。針對鄧小平，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批評鄧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代表資

²⁴ 以上，見1977年10月6日北京大學哲學系領導小組大字報：《陳一夫是什麼人？——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必須認真清查》《中共北京市委緊跟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的內幕必須揭開》。大字報敘述的事實是北大黨委常委王麗梅提供的。

²⁵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97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產階級”。但直到此時，毛對鄧小平沒有再次打倒的意思：“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如劉少奇、林彪那樣。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²⁶ 本來他對“以三項指示爲綱”是同意的。張玉鳳給他唸準備下發的中央文件，唸到“三項指示爲綱”一段時，他讓停下來再唸一遍，然後點頭說“好”，圈閱下發。²⁷

下發《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時，轉發華國鋒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提到：“毛主席說，錯了的，中央負責。政治局認爲主要由鄧小平同志負責。”他要求大家“深入揭發、批判鄧小平同志的修正主義路線，在揭發、批判過程中轉好彎子”。本來，鄧小平做的都是代表中央，或中央同意的。中央“轉彎子”了，鄧小平就成“修正主義路線”。但只要跟著中央“轉彎子”，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沒事，由“中央負責”；不肯“轉彎子”的，就成爲運動的打擊對象。於是，清華、北大和北京市委暗中推動的“點名批鄧”轉爲公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改稱爲“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中共中央五號文件，北大、清華沒有傳達。遲群說：“五號文件是開始搞運動，我們已經搞了一段，沒有必要傳達了。”北大、清華的運動已經超越五號文件了。

1976年2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長文，題目也很長，叫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繼續和深入——喜看清華大學教育革命大辯論破浪前進》，說：

走資派還在走，投降派確實有，這股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在哪裏？就在黨內那些堅持劉少奇、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²⁶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769、17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毛主席重要指示》全文，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486~490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²⁷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

他們（清華大學）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會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義奇談怪論聯繫起來批判，不僅看到大旗底下極為險惡的禍心，而且看到“四個現代化”的背後有一整套修正主義的綱領路綫。

這篇文章發表後，“四人幫”控制的宣傳工具掀起了批判“四個現代化”的浪潮。

以“反擊右傾翻案風”否定全面整頓，國民經濟再度滑坡；從“反擊右傾翻案風”推向“批鄧”，全國形勢更加動蕩不安。人民的不滿在積累，一場群眾性的抗議浪潮在醞釀。

中國特色的悼念式抗議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

1月11日，當靈車駛向八寶山時，首都百萬人，不分男女老幼，自發地佇立在數十里的西長安街兩側，在寒風中揮淚送別，靈車緩緩駛近時一片哭聲。靈車過去了，人們仍佇立不動，堅持數小時，等待靈車回。這種動人的場面，中外古今未曾有過。新華社寫了長篇通訊，姚文元下令一個字也不准報道。《人民日報》卻在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1月14日的頭版頭條發表一篇長文，題為《大辯論帶來大變化》，第一句話就說“近來全國人民都在關心著清華大學關於教育革命的大辯論”。此舉傷害了人民的感情，讀者無不憤慨，有人當街將報紙撕個粉碎，踩在腳下。曾任中央警衛團團長的張耀祠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周恩來遺體送八寶山火化時，上百萬人冒嚴寒在十里長街默哀送靈車。主席看了簡報後沉默多時。張玉鳳三次請主席吃飯，主席不作聲。後來汪東興又請主席吃飯，主席怒罵：‘滾，滾！都滾開！你們對我封鎖新聞。’”²⁸偉大領袖都被“封鎖新聞”了，何況

²⁸ 出自《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初稿。1996年9月，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張耀祠回憶毛澤東》時，將“有損領袖形象”的內容刪除，留作檔案資料，見文學城。

老百姓？

治喪期間，姚文元指令媒體盡量淡化宣傳，不發全國性的專題消息，壓縮外國唁電的版面，說是不能影響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報道。

治喪委員會聲稱“喪儀改革”。早不改晚不改，輪到悼念周恩來就改革了。通知說：“不准設靈堂，不准帶黑紗，不准送花圈。”北大黨委再加兩個不准：不准去天安門，不准開追悼會。

以中共中央的名義違抗民意，壓制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不料壓出一個天安門運動。群眾的憤怒終於在清明節前後爆發，天安門廣場出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以悼念為形式的抗議活動。儘管壓制人民的表達自由，但人民總能找到合理、合法的形式來進行表達。13年後，又一次爆發以悼念胡耀邦為形式的天安門運動。在中國，顯示了在壓制中尋求表達的強有力的政治邏輯。

自2月起，全中國就不安定了。重慶、福州、武漢、貴陽、鄭州、西安、太原、合肥、杭州、南京等地先後發生群眾性的抗議活動，其中尤以南京最為激烈。3月28日，南京大學數學系師生400多人抬著周恩來的巨幅畫像和大花圈，繞道繁華的新街口，來到周恩來曾居住和戰鬥過的梅園新村，進行緬懷和紀念。沿途市民自動加入，成為南京市反“四人幫”的第一次大規模遊行。而後數日，學生和市民遊行集會不斷。由於官方不報道南京的消息，學生們在南京車站堅持10多個小時，用油漆或柏油在過往的列車上刷了198條大標語：“打倒野心家、陰謀家張春橋！”“批周必亂，反周必亡！”“懷念周總理！懷念楊開慧！”等等，把南京群眾的抗議消息隨著列車送到北京和全國各地。

4月1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南京事件。不料，中南海牆外也鬧起來了。成千上萬的北京人湧向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所獻的花圈、詩詞，借題發揮，矛頭指向文革新貴和“秦皇專制”。除了悼念周恩來，還有懷念楊開慧的。廣場上響徹《國際歌》的歌聲，沒有人唱《東方紅》了。長久以來，政治空氣沉悶，有話無處講，現在好了，來到天安門廣場大講特講。這裏是自由的海洋。四面八方的人



1976年4月3日，天安門廣場旗杆下，“北京大學革命教師”敬獻的馬蹄蓮鮮花花籃。

杆下出現一個“北京大學革命教師懷念周總理”的馬蹄蓮鮮花花籃。這是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花籃海洋裏唯一來自北京大學的。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東北的燈柱上，又出現一朵大白花，上面附一段悼詞：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向您獻上這朵表達我們心意的白花，在廣場成千上萬的花圈海洋中，我們這朵白花顯得太拙劣了，可是就連這樣普通的白花他們也不讓我們扎，不准花圈出校園。我們只能在校外扎了這朵平常而普通的白花，把我們全部的愛、全部的恨、全部的懷念之情、全部的憤怒之心都扎在這朵白花中。敬愛的周總理，您是理解我們的。

下面署名“清華大學幾名工農兵學員”，這是唯一來自清華大學

們，雖然互不相識，來的就是戰友，可以盡情傾訴，可以高聲朗誦。文革的發動是“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聽從“中央文革”，奉旨造反；文革的結果，卻是對煽動造反者的造反，其中不乏覺悟了的紅衛兵。這才是下層對抗上層的真正的造反。奉旨造反，高喊“造反有理”；真正的造反，卻被認為造反無理，力圖鎮壓。

4月2日北大黨委召開總支書記會議，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門廣場，更不要送花圈，說“鬥爭很複雜，還在走的走資派在繼續對抗”。

4月3日，天安門廣場旗

的悼念。廣場上的人群，一批又一批地朗誦這幾句悼詞。有人高喊：“打倒遲群，打倒謝靜宜！”

北大的一個花籃和清華的一朵白花特別引人注意，大家知道這是抗爭中的悼念。

北大黨委如臨大敵，下令追查，並要求各單位保證，決不允許再有花籃、花圈出校門；隨後，封鎖了校門。很快查出來，花籃是亞非研究所的教師丁始琪送的，花籃不是經校門送出去的，而是在城裏購買的。黨委給丁始琪辦“學習班”，變相軟禁，使她失去了自由。清華的“白花事件”涉及 9 名學員，被遲群打成反革命小集團，為首者周禹民竟遭逮捕。北大、清華歷來在中國的民主運動中是走在前列的，在這一次的天安門運動中不得不缺席了。

夜裏，王洪文到廣場打著手電查看紀念碑周圍的花圈和詩詞，隨後打電話給公安部：“我剛到天安門前看了一下，那些反動詩詞你們拍下來沒有？不拍下來怎麼行？你們應該組織人去把它拍下來，要考慮將來破案。”是準備秋後算賬的。

4月4日是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達到高潮，這一天，先後進入天安門廣場者達 200 多萬人次，天安門廣場乃至天安門前的觀禮臺都擺滿了花圈。有人貼出一首詩：“欲悲闌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後來知道，作者是山西青年工人王立山。）該詩被競相抄寫傳頌，成為廣場上的代表作。有人將悼念周總理的詩詞譜成歌曲，在天安門廣場教唱，出現萬人齊唱的動人場面。

傍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可以俯瞰天安門廣場）開會，討論天安門事件。華國鋒主持，聯絡員毛遠新參加。吳德在會上報告說：“在紀念碑前獻花圈 2073 個，花圈最大的直徑為 6 米，獻送單位 1400 多個，……詩詞、悼詞、小字報有 48 起是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華國鋒說：“一批壞人跳出來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主席，很多攻擊中央”“很惡毒的”。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 1974 到 1975 年，他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天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吳德提供證據了嗎？沒有，對於打倒的對象無論怎樣聲討、譴責都是不

需要證據的。政治局認為，天安門廣場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活動，但還沒有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將要散會時，姚文元收到《人民日報》負責人魯瑛送來的一張條子，說在人民英雄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江青暴跳如雷，指著吳德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麼允許反革命演講？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是右傾。”吳德說：“我在這裏開會，怎麼會知道。”吳德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打電話，問有無此事，政治局的意見要把他抓起來。吳忠說確有此事，現在聽眾很多，不好下手，要抓也得在聽眾散去後再抓。吳德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未獲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在上面發號施令好說，下面執行的人不好辦。吳德正為難之際，吳忠打來電話，說那個人已經抓起來了。

這是怎麼回事？其實不是發表演講，而是朗誦大字報。4月4日，在紀念碑西南角貼出一篇聲討江青的檄文《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陳子明正在看，後面有人喊：“請前面的同志唸一唸！”有一隻手從後面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意思是讓他唸。他就和身旁的另一青年朗讀這篇檄文。他們倆唸一句，周圍的幾十個人重複一句，以傳給更遠的人們。由人群組成的“擴音器”發出的吶喊聲在廣場上迴蕩。人們歡呼：“寫得好！”陳子明嗓子唸啞了，另一個人接替他唸。吳忠說“那個人已經抓起來了”，就是接替陳子明的人。²⁹

江青又生一計。她一看手錶，說現在已經過了12點，清明節過去了，悼念活動應該結束，天亮以前把全部花圈送到八寶山。政治局原定4月6日收花圈，江青的意見提前了兩天。吳德顧慮會激怒群眾，惹出亂子，希望放寬期限，做好說服工作。最後，華國鋒附和江青的意見，對吳德說：“老吳，你考慮考慮，動員力量，今天晚上解決了吧。”

4月5日凌晨，群眾到天安門廣場一看，花圈已蕩然無存，夜裏守衛花圈的人被抓。果然群情激奮，一下子聚集了10多萬人，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有人說花圈都在人民大會堂裏面，於

²⁹ 《民主運動在中國4》，140~141頁，香港，世界華文傳媒出版機構，2010。

是就群起衝擊人民大會堂。有人說廣場東南角的一幢小樓是指揮所，於是就點火燒小樓。見了公用車就砸、就燒，盡量發洩。

4月5日，毛遠新向毛澤東書面報告天安門廣場動態和政治局討論情況，其中說道：“這次看出存在一個地下的‘裴多菲俱樂部’，有計劃地組織活動。”

下午，政治局又開會。張春橋特地通知鄧小平參加，劈頭蓋臉地大罵：“你就是納吉！”³⁰ 鄧小平一言不發。3月下旬，在“批鄧”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弄來一幫清華、北大的人列席，炮轟鄧小平，他也是一言不發。最後，他開腔了：“聾子不怕響雷轟，死豬不怕開水燙。”這兩句話傳出來，民間為鄧小平的頑固態度叫好。會上，毛遠新唸了毛主席的條子：“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語不成句，毛遠新做了解釋。同樣的事件，發生在首都，性質就變了？發生在首都的天安門，性質就變了？什麼道理？沒有道理。張玉鳳提供的材料，他倒是講了一些道理：“是炮打我，是對總理的緬懷，是對江、張的聲討，是對翻案主帥下臺抱不平，總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³¹ 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的回憶錄中也說：“毛澤東聽了華國鋒、吳德、江青、毛遠新、王海容、唐聞生、汪東興等的多組彙報後說：‘悼念總理，反的是當代秦始皇毛潤之，打倒、剷除的是江青、洪文、春橋、文元，再加上華國鋒，迎接鄧小平復辟上臺。’”³² 根據毛“性質變了”的指示，政治局將天安門廣場的抗議

³⁰ 1980年，在審訊中，特別法庭出示了張春橋給他兒子“親愛的毛弟”的親筆信，其中說：“這一個月我過的相當緊張，從南京到天安門廣場到處鬧。4月5日，我是中午到的人民大會堂，如同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樣。從望遠鏡裏看的很清楚，當著鄧小平的面，我罵了他是納吉。”（《歷史的審判》，87頁，解放日報編輯部編印，1981年1月。）納吉是1956年發生匈牙利事件時的政府總理，推行自由化運動。蘇聯出兵平息“反革命暴亂”後，納吉遭處決。1989年，納吉在匈牙利民主化運動中得到平反。

³¹ 1993年12月24日，張玉鳳在中國人民大學毛澤東誕辰10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14年後發表於《社會科學論壇》。

³² 出自《張耀祠回憶毛澤東》初稿。那話的內容，與張玉鳳提供的證詞一致，但細節不真實。對誰說的？張耀祠說是“聽了華國鋒、吳德、江青、毛遠新、王海容、唐聞生、汪東興等的多組彙報後說”的。是對這些人一起說的還是一個一個分別說的？事實是這時毛所接觸的人除了一幫“女孩子”，只有聯

活動定性爲“反革命事件”，討論如何進行鎮壓。王洪文說要調 10 萬民兵。吳德說現在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這么多。王洪文問能調多少？倪志福認為頂多也就兩三萬人。吳德說調兩三萬人進去解決不了問題，廣場上的人比能調動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情況更混亂。張春橋則說，可以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動員群眾離開。江青指著吳德說：“你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你怕什麼？應由你出面講話，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不斷地放。”華國鋒等人同意由吳德出面講話，並決定：6 時廣播講話，8 時出動民兵。

吳德于 6:25 發表廣播講話。他說：“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吳德的威脅性語言沒有奏效。廣場上的人，走的沒有，來的不少；因爲正值下班時間，人們離開了車間、辦公室沒有回家，直奔天安門廣場。接著就應該清場。吳德、倪志福與吳忠商量，吳忠說：“廣場上的群眾那麼多，民兵進去，可能發生流血事件，將來誰負責任？”吳德說：“政治局決定 8 點出動民兵，怎麼辦？”吳忠說：“絕對不能 8 點出動，只能採取拖的辦法，等群眾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動民兵清場，否則肯定要出問題。”8 點到了，華國鋒不斷打電話催問吳德、吳忠，爲什麼還不出動民兵？吳德再次與吳忠商量，吳忠還是堅持不能立即出動。他們編了幾條不能立即出動的理由，例如，工人剛下班，民兵都是挨家挨戶找來的，集合不容易等。其實，民兵已經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待命，就是按兵不動。到了 10 點半，在人民大會堂樓上用望遠鏡觀戰的華國鋒、陳錫聯又打電話催問，他們對二吳很不滿意。

經過天安門的公共汽車末班是 11 點，大部分群眾乘末班車回家了。11 點半，吳忠向吳德報告，廣場上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左右，

絡員毛遠新一個。

聚集在紀念碑下堅決不肯離開的只有 200 多人，現在可以清場了。政治局的決議，被吳忠打了折扣，但避免了大規模流血事件。黨國要人華國鋒等人的政治智慧不及一介武夫吳忠。

清場時，打開廣場的全部探照燈，以示威嚇。出動民兵 1 萬人，公安 3000 人，衛戍部隊 5 個營，手持棍棒，包圍廣場，對群眾進行驅趕，其間免不了扭打，有人流了血，但總算沒死人。這次事件，幾天中前後逮捕 388 人，立案追查 1984 件。

凌晨 3 時，毛遠新又向毛澤東提出書面報告，其中說天安門事件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門廣場光天化日之下群魔亂舞，是歷史上沒有的”。還說：“只打擊表面上這些年輕人不行，要揪出地下司令部。”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士氣大振，好，好，好。”

³³ 文革初期，毛針對劉鄧派工作組問題，說：“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文革的收場，卻輪到毛自己扮演“鎮壓學生運動的人”了，鎮壓的勁頭比派工作組厲害得多。他說：“好，好，好。”他能好得了嗎？

4 月 6 日，天安門廣場戒嚴。

4 月 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不通知葉劍英、蘇振華，做出兩個決議：第一，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做出《關於華國鋒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的決議》；第二，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的最近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做出《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的決議》。黨章上並沒有“第一副主席”的設置，這是法外立法。任命國務院總理、撤銷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可以

³³ 以上據《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399~400 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中《1976 年天安門事件的經過》一節（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吳德口述：《1976 年天安門事件真相》，《百年潮》，2004 年第 2 期；吳忠口述：《我經歷的 1976 年天安門事件》，《炎黃春秋》，2012 年第 3 期。

決定的嗎？這是有法不依。1954 年憲法固然已經作廢，但一年前，四屆人大剛通過的 1975 年憲法，其中規定：“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提議任免國務院總理和國務院的組成人員”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之一。就連文革憲法及依據它產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都被拋到九霄雲外了。到了這時，真是無法無天！

1976 年的天安門事件，雖然被當權者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一時遭到鎮壓，但人民稱之為“四五運動”，奠定了日後粉碎“四人幫”的民意基礎，並賦思想解放運動之先聲。

北大的清查和馮友蘭的捧場

遲群、謝靜宜、王連龍等人以高壓姿態在北大肅清“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影響，搞群眾性的清查，鼓動檢舉、揭發，追查“反革命謠言”，威逼 2479 人，查出各類“政治謠言”3420 條；強迫群眾交出所謂“反動詩詞”542 首、“反動照片”89 張。燕園一片恐怖。

馮友蘭適時獻上一首長詩，題為《天安門廣場幾個蒼蠅碰壁》。他譴責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使“神州再沉淪”“國家變色顏”“中華隨逆流”；他歡呼鎮壓：“害人之蟲誓掃盡，捉鱉那怕下五洋。碰壁蒼蠅大驚慌，搗亂失敗至滅亡。”馮友蘭哲學系的同事王永江、陳啟偉評論道：“殺機畢露！這同他當年跟著蔣介石咒罵共產黨是‘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的那副反革命凶相一模一樣。”“從蔣介石王朝到‘四人幫’橫行之時，這位顧問都是助紂為虐，用筆殺人的。”³⁴

天安門事件以打倒鄧小平告終。不幸，13 年以後天安門事件又重演，但鄧小平完成了角色轉換。1976 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總後臺”，反而獲得人民的擁戴，成為復出的巨大政治資本。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鄧小平把人民打成“反革命暴

³⁴ 王永江、陳啟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 年第 4 期。

徒”，又把老本輸得精光，留下千古罵名。魯迅在《端午節》一文中說，起初在街上看到當兵的打拉車的，總是憤憤不平。後來一想，倘若拉車的當了兵，當兵的拉了車，大抵還是照樣打。這就是魯迅思想的深刻所在，從偶然的街頭事件追究某種社會的必然性。當年鄧小平是“拉車的”，挨了毛澤東的打；後來鄧小平成了“當兵的”，對胡耀邦、趙紫陽還是照樣打。他的戲劇性變化，揭示了中國現行政治體制的某種必然性。

“批鄧”與“反周”

打倒鄧小平，“四人幫”達到了目的。鄧小平本人乃始料所不及，他以為毛已託付重任。陳雲曾問正在進行全面整頓的鄧小平，摸準主席的脈沒有？鄧小平說摸準了。陳雲後來說，看來他沒有摸準。

³⁵ 只有周恩來摸準了“主席的脈”。1975年4月28日，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關於經驗主義的批示，吳德“鼓了很大的勇氣”，批評“四人幫”。周恩來在305醫院把吳德找來，向他打招呼。周心情沉重地說：“你知道不知道，主席對兩方面意見正在觀察中，他們會反攻的，反攻時你是吃不消的。”³⁶

鄧小平沒有看透毛澤東的心計，急於解決“四人幫”問題。毛在批評“四人幫”的同時，還有一句“我看問題不大，不要小題大做”，鄧小平忽略了，這就沒有摸準“主席的脈”。果然，反攻過來，他就“吃不消”了。此時，世間已無周恩來，人有疑難向誰問？

³⁵ 史雲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391頁，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

³⁶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162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史雲編著的《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中記載，周恩來的這一番話是對紀登奎講的。史雲、李丹慧在於2016年出版的《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中有所糾正，確認上述那番話是對吳德講的。“同時，周還把紀登奎等一些政治局委員也找來醫院，向他們打招呼，要他們適可而止，不要計較江青的態度，注意團結她一道工作。”（585頁）

鄧小平在政治鬥爭中打了敗仗，個人的進退還是小事，嚴重的是又一次動亂升級，經濟下滑，瀕臨崩潰的邊緣。在橫掃“鄧小平復辟的社會基礎”時，千萬人受難（本人也在其中，故有切身體驗）。周恩來和葉劍英曾勸鄧小平要穩扎穩打，他聽不進去。形勢逆轉後，葉劍英私下評論說：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³⁷

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第一號目標，還不是鄧小平，而是周恩來。早在文革之初，“中央文革”就提出“新文革與舊政府”的矛盾。“舊政府”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周恩來。戚本禹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指劉少奇“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又說“那個最大的保皇派不行了，要下來”。“那個最大的保皇派”當然也是指的周恩來。³⁸

林彪覆滅後，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傳回林彪死無全尸的照片，周恩來見了號啕大哭。在場的紀登奎說：“總理，林彪一夥摔死了，您該高興，對不？”周搖著頭，連連說：“你不懂，你不懂！”³⁹如果有關黨國命運，說出來紀登奎不會不懂。實際上，周痛苦的是：“不能

³⁷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576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原注：“訪問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的談話記錄。”

³⁸ 逢先知、呂澄、沈棟年、王象乾：《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關於〈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炎黃春秋》，2016年第10期。

³⁹ 《林彪叛逃死无全尸，周恩来为何嚎啕大哭？》，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年11月24日，本文摘自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來》，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說：“這件事目前已在海內外廣為流傳，出自大陸不久前出版的《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遺憾的是，書中對當時情景的記述並不準確，某些解釋也牽強，原因在於使用的並非第一手材料，而是輾轉聽說而來的，出處就是本書作者當年的採訪。”（357~358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高文謙摘引了“第一手材料”將近300字，註“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註明出處是為了讓讀者、評者可以查對。但這個“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何處可尋？書中介紹作者“曾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參與編寫中國官方《周恩來傳》……等”。中國官方《周恩來傳》（1998年出版）中，並沒有引用“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這個“第一手材料”。公佈“訪問紀登奎談話記錄，1988年春”的《晚年周恩來》在海外出版於後，《我的伯父周恩來》在中國出版於前，出版於前者怎麼可能從出版於後者“輾轉聽說而來”？

說，不能說！”周對中國政治的險惡了然於心，對毛澤東的爲人深知其詭。他可能擔心的是，自己會不會是繼劉少奇、林彪之後的第三個？⁴⁰ 周恩來明白，在劉少奇、林彪之前，50 年代毛第一個想扳倒的就是他。此刻，周恩來也並非神經過敏。林彪事件之後，毛的心腹謝靜宜就說過：“現在不是‘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而是‘林周反黨集團’的問題。”⁴¹ 周未必知道謝靜宜透露的這個重要信息，但他清醒地知道有人要打倒他，他頑強地苦鬥，不讓人打倒。

林彪垮臺後，反對批極左，批投降主義路線，“批林批孔批周公”，揪現代大儒，反經驗主義，批投降派……一箭又一箭，箭箭都以周恩來爲靶心。經五六個回合，他依然站立，直至生命的終點，打而不倒，此乃偉大勝利。可見，周恩來化解來襲的太極神功何等了得！鄧小平只經“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回合就倒了。兩個政治家的水平高下立現。1967 年，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說：“打倒劉少奇，毛主席只不過動動小手指頭。”對付周恩來，毛十個手指頭都動了，再加“四人幫”的四十個指頭，五十個指頭也不能把他怎麼樣。“四人幫”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背後就是毛。華國鋒、汪東興等“凡是”派批“四人幫”，說他們“批林批孔”“批鄧”另搞一套。“四人幫”搞的一套，就是毛的一套，根本不存在兩套。區別在於，“四人幫”是一反到底，而毛常在反與不反之間蕩鞦韆，因爲他知道“批周民必亂，反周民必反”⁴²。

1973 年 11 月到 12 月，毛指示政治局召開“幫周會議”，批判周恩來的投降主義，江青說是繼林彪事件之後的“第 11 次路線鬥爭”

⁴⁰ 有人說周之所以號啕大哭是因爲“周恩來在林彪事件發生上有幾分內疚”。（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修訂版，12 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聊備一說。

⁴¹ 《林彪事件：“九一三”四十周年文史研討會上張清林的發言》（續一）：“謝靜宜到北京火車站接的我和林豆豆，然後來到西郊玉泉山。跟我們接觸的就一個人，就謝靜宜，她是獨人單線，很神秘。”“謝靜宜很惱火，說了這句話：現在不是‘林彪反黨集團’的問題，而是‘林周反黨集團’的問題。這讓我們感到很震驚。說這話是 72 年，到 74 年才出來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嘛。”張清林是林豆豆的丈夫、林彪的女婿。

⁴² 這是當時流傳的毛的說法，但未見出處。

(沒有想到，後來“第 11 次路線鬥爭”的帽子被華國鋒扣到了江青自己的頭上)。外交部的小字輩王海容、唐聞生非但被指派參加政治局會議，而且充當毛與政治局之間的“橋樑”，每天匯報情況、聽取指示。明明是毛慾反周，他又對周當面安撫、羈縻。1973 年 12 月 29 日，毛澤東會見尼伯爾國王比蘭德拉時，與陪同會見的周恩來長時間熱烈握手，指著王海容、唐聞生對周恩來說：“總理呀，你挨整啦，聽說她們整得你不亦樂乎。”“現在的小將不好惹呢。”“你把他們提起來，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⁴³ 王、唐二人私下發牢騷：“他要我們去批總理，批完了，他給總理臺階下。”“他做臉，我們做屁股。”⁴⁴

1974 年“批林批孔”時，毛又對王海容說：“現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時候了。”⁴⁵ 所以，外交部的“兩位小姐”——王海容、唐聞生興風作浪，大反總理。粉碎“四人幫”以後，追查他們與江青的關係。王海容拿出錄音，一聽，是毛的聲音，追不下去了。

毛的上策是控制醫療，讓周死在前面。周一死，毛終於出了一口氣。周逝世後，40 名軍隊高級將領給毛寫信，要求他出席追悼會。其中就有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吳忠說：

總理的遺體告別毛主席沒去，追悼會毛主席也沒去，我感到很不理解，毛主席應該去。總理病重，也沒聽說主席去看望過，當時我就很有想法，這是為什麼？是毛主席病重嗎？說病重，可是總理逝世以後，毛主席還不斷接見外賓呢？是多次接見外賓。既然可以接見外

⁴³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1671 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⁴⁴ 章含之談話記錄，1980 年 7 月 21 日。轉引自高文謙：《晚年周恩來》，476 頁，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又見徐景賢：《最後的回憶》。

⁴⁵ 王海容對毛說：“我總感到周總理，雖然他很有才華，給黨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對文化大革命，卻是貌合神離。造反派在哪裏點火，他總到哪裏去滅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總要去保那些人。他嘴裏也擁護文化大革命，但他行動上又總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的。”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不停地吸煙，看著煙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說出一句石破天驚的話：“現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時候了。”（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下卷，第 655 頁，書作坊出版，2010 年第 6 版；又見辛子陵《文革中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四次打击》）。

賓，為什麼不能參加追悼會？不能參加遺體告別？⁴⁶

吳忠的“很不理解”，也是當時許多人的“很不理解”。吳忠還強調：“當時不理解，現在（2012年）也不理解。”如果能聽到毛自己怎麼說，不理解的就理解了——預告1月15日舉行追悼會，1月12日，毛說：

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利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了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參加。總理是反對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還是老的，都聽他的；擁護我，高呼我萬歲，是無奈的。我明白，這點我和總理的鴻溝是沒法彌補的。⁴⁷

悼詞原稿稱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被毛一筆勾銷。清明節，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都在為周恩來爭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而發聲。1977年1月，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一個周恩來逝世週年祭，《人民日報》發的悼念文章由民間封周恩來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雖然不在了，貶周與頌毛，在這兩個人的身後還在繼續。“凡是”派汪東興跑出來訓斥《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

⁴⁶ 吳忠口述《我經歷的1976年天安門事件》，《炎黃春秋》2012年第3期。

⁴⁷ 《歷史的真相——毛澤東的生活秘書張玉鳳的若干回憶》，《動向》2004年5月號。《動向》透露，近日張玉鳳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關於毛澤東晚年的回憶資料以及部分檔案資料，揭示了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據張玉鳳稱，這些談話記錄和資料，在毛澤東逝世後，是交警衛組組長保存的，直至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開前夕，才要回來自己保存。張聲稱，當初將這些資料轉移，是怕江青、汪東興要拿走。《歷史的真相》發表後，港臺期刊和大陸網站多有轉載，未見官方機關闢謠。汪東興、毛遠新否認張玉鳳提供的“名單”，除此以外，他們都默認了。[美]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中寫道：“在這位總理生前最後的幾小時，他（毛）曾到醫院守候在周恩來的病床前，一種孤獨或是內疚的悲痛使他要同這位在他所有高級同事中與他關係最持久，對他最忠誠的人講幾句話。毛澤東是除醫務人員外與周恩來談話的最後一人。”（476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作者沒有註明消息來源，所說不是事實。這部名聲很大的著作，類似的失實之處不少。書中充滿冷嘲熱諷的評論，總起來說不像嚴肅的歷史著作，而是隨感錄。

“悼詞是偉大領袖毛主席修改過三次的，你們是不是要重新寫一篇悼詞？”

政治鬥爭像打仗一樣，首先要保存自己，才能壓倒對方。要保存自己，不得不妥協、退讓，說違心話，做違心事。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旗幟鮮明，大義凜然，但於事無補，反而導致形勢惡化。周恩來暗中抵制，迂迴曲折，以柔克剛，但原則上損失太大。周恩來“以革命為情侶”（李劫語），為了心愛的“革命”，個人忍辱含垢，勞心折壽；但於國於民避免了更大的災難。如果周恩來被打倒，對中國社會的震蕩，會遠遠超過打倒劉少奇、打倒林彪。劉少奇的根基是黨務系統，林彪的根基是軍事系統，而周恩來扎根於黨、政、軍各個系統，特別是門生故吏、下屬舊部遍及統戰、情報、外交、文化等子系統，株連所及必將禍害一大片。

周恩來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政治人物，有關爭議不少。一個匈牙利人發表了公允之論：

周恩來是在明智地權衡各方的利弊之後，才決定這樣做的。

這位總理得出的結論是，如果他公開反對毛澤東，顯然不利於國家的利益。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處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種明智，對受到威脅的幹部給予一定的保護，可以減輕數百萬人的痛苦。此外，他還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奪最高權力的企圖，防止爆發一場新的悲劇。如果他離職，內戰局勢勢必更加惡化。如果他公開發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為英雄，其處境將更加困難，不堪設想。⁴⁸

“梁效”發出“大進攻的信號”

“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前，“梁效”主要是做“影射史學”“影射文學”的文章。而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梁效”

⁴⁸ [匈牙利]巴拉奇·代內什：《鄧小平》，191–192頁，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大做批判性的政論文章。這是“梁效”最瘋狂的時期。

1975年11月，李家寬正帶領“梁效”的人馬在大寨活動，遲群、謝靜宜從北京打電話，通知“班子”速回，有重要任務。

“梁效”們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清華、北大的“教育革命大辯論”，並領受姚文元下達的“重要任務”，由兩個“尖刀班”之一的鍾哲明小組，寫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發表於《紅旗》雜誌1975年12期。12月4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在頭版頭條轉載。這篇文章，從清華、北大的“大辯論”殺向全國，發出了新的“路線鬥爭”的號召，被“四人幫”的各地的擁戴者稱作“大進攻的信號”。文章中說：

教育界有一種奇談怪論，說什麼文化大革命以來，教育革命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總沒有解決好”，因而“就是要扭”。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當前爭論的焦點在於：是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還是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舊教育制度？

現在，教育界的奇談怪論就是企圖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翻案，進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教育戰線上的這場爭論，是當前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組成部分。

“梁效”的矛頭直指教育部部長周榮鑫，以及鄧小平的全面整頓。文中還把周總理的言論當作“右傾翻案風”，批了周總理關於招生問題的指示：“從個別專業中試招中學生好的直接上大學。”當時有人就說：“這話是周總理講的，不能批吧。”遲群說：“周榮鑫講過的就可以批”“誰講了誰吃啞巴虧”。他們以批周榮鑫為名，把周恩來、鄧小平的言論也作為“奇談怪論”來批。以後，“奇談怪論”成了一個針對“大辯論”對象的專有名詞。

接著，“梁效”的另一個“尖刀班”范達人小組，又領受了“重要任務”，寫作《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文章的內容是針對胡耀邦、李昌在中國科學院發表的言論，同樣也指向鄧小平的全面整頓。姚文元說：“科學院暫時沒有力量，由兩校大批判組來寫這篇文

章。”他在改定文章時，特地加了一句：“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劉少奇一夥在科技界推行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許多科學研究單位同樣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下。”這也是“梁效”發出的一發重型炮彈，將教育界的“大辯論”延伸到科技界，“奇談怪論”被定性為“右傾翻案風”，說：

前一時期，科技界的奇談怪論和教育界的奇談怪論相互呼應、彼此配合，刮起一陣右傾翻案風。結論是：從教育界的種種奇談怪論，到科技界的一系列修正主義觀點……說明存在著一條與毛主席革命路線相對抗的修正主義路線。它的理論基礎是階級鬥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它的手段是折中主義。

姚文元嫌文章意猶不足，加上一筆：“難道他們代表黨嗎？不，他們代表的是資產階級。”這些什麼路線、什麼論和什麼主義，代表什麼階級，後來都是扣在鄧小平頭上的帽子。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 1976 年第 2 期，同樣也由《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大報頭版頭條轉載。范達人說：“這篇文章是在 1976 年春節播放的，大年初一清早，我打開收音機，聽到正在播放《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一文。當時，我很興奮……事後看來，此文顛倒是非，擾亂人心。”⁴⁹

從教育界到科技界，下面就輪到文藝界了。李家寬說：“我們已經寫了教育界、科技界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章，文藝界也要寫，一定要寫好。”⁵⁰ “梁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1976 年 3 月 6 日）。開宗明義就說：

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正在深入發展。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拋出的修正主義綱領，不僅在教育界、科技界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而且在文藝界也同樣煽起

⁴⁹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119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⁵⁰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初編），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 年 3 月 25 日。

了一股右傾翻案風。……為十七年修正主義文藝路線翻案，妄圖達到從文藝舞臺到政治舞臺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且不說十七年的文藝路線是不是修正主義，也不說“文藝革命”是不是革命，否定“文藝革命”怎麼會導致從文藝舞臺到政治舞臺復辟資本主義？這正是文章的標題需要論證的，然而內文什麼論證都沒有，只有斷語。這就是“梁效”的文風。下斷語，算是文明的，更有甚者，還有潑婦的腔調：“對於這些修正主義的奇談怪論，我們斬釘截鐵地回答：不須放屁，試看天翻地覆。”先有毛澤東“放屁”入詩，遂有“梁效”跟著“放屁”入文，還要加粗。

這篇文章出現的“黨內那個不肯悔改的走資派”的概念，配合清華、北大和北京市委的“點名批鄧”，公開影射鄧小平。在文革中，打倒某人，總是先出現代名詞：劉少奇的代名詞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林彪的代名詞是“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周恩來的代名詞是“劉少奇、林彪一類政治騙子”（周恩來打而不倒），鄧小平的代名詞就是“黨內那個最大的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梁效”搶先點出最大的走資派

在清華、北大暗中“點名批鄧”的同時，“梁效”公開製造輿論，把矛頭指向鄧小平。遲群說：“這個界，那個界，解決今後的問題，要找總根子鄧小平。”1976年2月12日，《北京日報》以頭版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梁效”的《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文中點出“黨內至今還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總代表、總根子”。這樣的提法，前所未見，全國未見，引人注目。當天的《北京日報》加印了5萬份。

“梁效”送給《北京日報》的初稿並無“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報社排出小樣，送市委審查，同時也送“梁效”校閱。2月11日晚上，李家寬召集“梁效”全體人員開會，遲、謝也參加了。李家寬說：“遲群看了文章，加了幾句話，征求大家的意

見。”接著就唸遲群加的幾句話：

當前那股右傾翻案風的風源在哪裏？就在黨內至今還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這就是右傾翻案風的總代表、總根子。

遲群得意揚揚地說：“這個提法是第一次見報，叫《北京日報》立即發表，我要買5份。”李家寬說：“買5份就不要說了吧。”遲群大聲地嚷：“你照我的話說，就說我要買5份。”並問謝靜宜：“你同意嗎？”謝狡猾地說：“我同意。但你寫的字別人認識，改一下。”於是，李家寬用橡皮把遲群加的那幾句話擦掉，另行重寫。

“梁效”通知《北京日報》派人來取稿。王世敏對來人說：“這是兩校大批判組集體定的稿。根據運動的發展，現在需要這樣提。希望你們明天見報。如果你們明天不發，以後就不要發了，會有別的報紙來發。如果你們明天發，遲群、謝靜宜要各買5份送人。”最後，她鄭重地說：“這不是開玩笑。你們如果有事聯繫，我們整夜都有人。”

《北京日報》將“梁效”退回的小樣和王世敏的談話記錄向市委請示。市委的負責人吳德、倪志福、丁國鈺、賈汀都在場。他們認為，中央報刊還沒有公開批判“三項指示爲綱”和“最大的走資派”，《北京日報》是否應該發表“梁效”的文章？丁國鈺提議問一下小謝。吳德便到另一個房間打了一個電話，回來說：“就這樣發吧，小謝說研究過多次了。”

吳德和謝靜宜在電話裏說了什麼？

吳德說：“現在報上還沒有這個提法。”謝靜宜說：“明天報上一登，不就有了嗎？”吳德還想探個底細，問：“要不要請示主席？”謝說：“那不是讓主席爲難嗎？”她哈哈大笑。人們都以爲謝靜宜是傳達天庭秘示的人，吳德只好同意《北京日報》明天見報。第二天，《北京日報》給“梁效”送去50份。⁵¹

⁵¹ 關於《北京日報》最先使用“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提法攻擊、誣陷

歪曲和篡改階級鬥爭學說

“梁效”的《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的主題是：

毛主席在同國內外修正主義路線鬥爭的過程中，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完全說反了。毛澤東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正好歪曲和篡改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

發現階級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以前的法國歷史學家的貢獻，但僅僅是對歷史現象的描述。馬克思把它提升為理論，作為唯物主義歷史觀的一部分。馬克思的貢獻在於論證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客觀性、必然性、歷史性。斯大林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所造成的災難，不是錯在理論本身，而是斯大林、毛澤東歪曲了理論，錯誤地運用理論。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種階級鬥爭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主觀上“抓”出來的。1956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宣佈階級消滅了，但階級鬥爭還存在。這種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當時人譏之為“有牆無磚論”，就是人為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據1956年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發展狀況，中國是不可能消滅階級的，非說階級消滅了，就是人為地消滅。階級鬥爭可以人為地製造，階級也可以人為地消滅，完全抹殺了階級的存在和階級鬥爭的進行所依賴的必然性。毛還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講個沒完，這就用永恆性代替了歷史性。在斯大林、毛澤東那裏，階級觀念、階級分析、階級鬥爭都具有主觀性、人為性、永恆性。毛澤東還說：“八億人口不鬥行嗎？”“八億人口”和“鬥”有什麼必然聯繫？實際上他是想說：不鬥何以駕馭這八億人口？階級鬥爭理論變成一種操作方法，乃弄權牧民之術。開進學校的軍宣隊深得

鄧副主席的問題》，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材料之五，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5日印。

毛語錄之精髓。北大的軍宣隊負責人就說：“在學校裏，一年半載要抓一次右派。不樹立對立面，我們就站不住腳。”⁵² 遷群的口頭禪是：“鬥則進，不鬥則退，不鬥則垮，不鬥則修。”他們就是靠一個“鬥”字來統治學校。

毛澤東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實際上人為製造的階級鬥爭越抓越不靈。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中說，他讀了《共產黨宣言》，只取四個字：階級鬥爭。他對這四個字的含義只取了一半。《共產黨宣言》中說：階級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⁵³有一種破壞性的階級鬥爭，結局是同歸於盡。毛澤東抓階級鬥爭越抓越不靈，就因為他所進行的是破壞性的階級鬥爭。破壞性的階級鬥爭導致社會混亂，又把它歸之於階級鬥爭抓得不夠狠；抓階級鬥爭一狠再狠，“革革過命的人的命”，昨日的革命者成了今日的反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進行破壞性的階級鬥爭的典型，只能在泥潭中愈陷愈深。事實證明，中國的出路是從根本上廢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綱。

何謂“本質上的聯繫”？

“梁效”又把“孔老二”這個標籤貼到鄧小平身上，不管貼得上貼不上，硬是要貼。姚文元給了“梁效”一個題目：《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尖刀班的范達人、何芳川、陳先達三個人，費盡心機，查遍鄧小平言論，找不到“孔孟之道”，只找到一句“名不正則言不順”。這句話已是成語，難以承載“孔孟之道”。文章是一定要做的，怎麼做？他們三個人和《紅旗》雜誌的編輯一起討論，決定把鄧小平和“孔孟之道”從本質上聯繫起來。何謂“從本質上聯繫起來”？孔老二要復辟，恢復周禮；鄧小平要恢復文革前的一套，也是復辟。從復辟這一點來說，構成“本質上的聯繫”。這也是運用

⁵² 《魏銀秋罪行綜合材料》，魏銀秋專案組，1978年10月。

⁵³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40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了他們的顧問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事後，范達人不得不承認：“於是，我們便牽強附會地寫出了這一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文章，生拉硬扯，將鄧小平與孔孟之道連在一起。”⁵⁴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 1976 年第 9 期。

天安門事件後，罷了鄧小平的官，“批鄧”升級。遲群傳達江青的指示：“批鄧要與天安門廣場事件聯繫起來，說明鄧小平代表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反革命利益；批鄧要同整個黨內兩條路線鬥爭聯繫起來，同黨內大大小小走資派聯繫起來才能深入。”⁵⁵“梁效”一連發了《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1976 年 4 月 28 日）、《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對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剖析》（《人民日報》，1976 年 5 月 18 日）、《用革命輿論粉碎反革命輿論》（《紅旗》雜誌，1976 年第 5 期）等殺氣騰騰的文章。范達人承認：“我們的文章想說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臺。但是，聽說事發那天，鄧小平既沒有去天安門，也沒有在幕後指揮，而是到前門飯店理了髮。因此，我們只好說實質上是總後臺。”⁵⁶鄧小平的言論中找不到“孔孟之道”，就說是“本質上的聯繫”，鄧小平沒去天安門，就說是“實質上的總後臺”。“梁效”的論證，就是不要事實、沒有證據可以從“本質上”“實質上”構陷成罪。

從“批鄧”到“批一層人”

此外，“梁效”還發表了影射華國鋒的《再論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文章。李先念在一個會議的發言中說到“現在不是知識私有，而是知識沒有”；“梁效”針對他發表了《林彪一類鼓吹

⁵⁴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119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⁵⁵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82 號，《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 年 5 月 15 日。附件三：《“兩校大批判組”打擊誣陷敬愛的鄧副主席的陰謀活動》。

⁵⁶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120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知識私有”居心何在？》。在《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一文中，批判了政治局委員、海軍政委蘇振華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人民日報》約“梁效”寫了一篇《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事件》，其中說“在鄧小平與天安門事件之間有一隻黑手”。宋柏年指著旁邊一個人穿的綠褲子說：“如果有一隻黑手的話，很可能是穿這個的（即穿軍裝的）。”執筆者以“這隻黑手”影射當時主持中央軍委的陳錫聯。總之，在這個時期，“梁效”四面出擊、萬炮齊轟，達到了瘋狂的程度。

“梁效”除了發表文章，在“四人幫”的授意下，還編發所謂“批判材料”。“四人幫”提供中央文件、會議記錄，“梁效”印發了《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同志接見參加鋼鐵工業座談會代表的發言》《鄧小平在聽取胡耀邦匯報時的插話》《鄧小平在南方十二省省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胡耀邦匯報時國務院負責同志插話》《江渭清同志傳達中央領導同志講話材料》《鐵道部長萬里的講話摘錄》及《國務院工作會議記錄》《國務院鋼鐵會議記錄》等。這些材料中，除了鄧小平的講話，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插話。“梁效”以“批鄧”為由，將與鄧小平有關的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人的言論都列入了“批判材料”。他們還搜集地方上的負責人講話，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掛上鉤。

遲、謝佈置“梁效”搞一個《鄧小平言論摘編》。據宋柏年交代，遲群傳達張春橋、姚文元的指示，說：“根據當前運動的需要，全國迫切需要批鄧的材料，光說批鄧，沒有材料怎麼批？……現在你們要集中力量，全力以赴，當作頭等大事，把《鄧小平言論摘編》搞出來，像《林彪與孔孟之道》一樣，懂了吧？”遲群特別強調：“總的要求是把最尖端、最典型的話摘出來，要編得精彩，活畫出鄧小平這個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面目。”⁵⁷ “梁效”組織了20多人，日夜突擊，從6月初到7月1日，六易其稿才告完成。其中“精彩”之處，例如，摘了鄧小平的一番言論：

⁵⁷ 《梁效罪證材料》，103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鬥了七、八年結下了不解之仇”，“橫下一條心，拼老命”，“復辟就是我”。

然後批判：

對廣大革命群眾批判走資派恨得咬牙切齒，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向無產階級撲來。

鄧小平的言論是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問題講的。第一個逗號是在整頓鐵路時，批評派性嚴重的單位；第二個逗號是說搞好整頓要敢字當頭、下定決心；針對有人把中央關於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說成“復辟的綱領”，鄧小平才說“復辟就是我”。“梁效”把鄧小平的言論掐頭去尾、東拼西湊，活畫出“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的面目”。這是一幅馬賽克拼圖。

有些材料，連拼湊的原話都沒有，而是“XXX 揭發”“鄧對 XXX 的談話”。XXX 都是故隱其名。是否確有其人、確有其事？無從查證。

《鄧小平言論摘編》原有三個附件，即鄧小平授意寫作的三個文件：《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關於科技工作的幾個問題》《論全黨全國工作的總綱》。張春橋、姚文元在改定《鄧小平言論摘編》時，將它們抽出來，作為“三株大毒草”單獨批判，冠以《加快資本主義復辟的工業管理條例》《修正主義的標本》《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宣言》的標題。“三株大毒草”每株加上幾篇批判文章和“梁效”寫的前言，形成“三本小冊子”。這是張春橋、姚文元指使“梁效”炮製的，說什麼“鄧小平下臺了，鬥爭並沒有結束”“批三株大毒草就是要把大小走資派串到一起批”。張、姚三審其稿，多次修改。8月12日，令遲群、謝靜宜將被稱作“不以中央名義發的中央文件”的“三本小冊子”拋向全國，共印發了8131萬冊。⁵⁸

8月17日，在紀念毛主席“新北大”題詞十週年大會上，王連龍

⁵⁸ 《梁效罪證材料》，79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說：“當前，批‘三株大毒草’是毛主席、黨中央的重大戰略部署，要掀起學習‘三本小冊子’、深入批鄧的新高潮。”8月19日，北大黨委舉辦學習“三本小冊子”的學習班，參加者有黨委委員、總支委員、支部書記等共123人，通過他們去推動全校學習“三本小冊子”的活動。李家寬在學習班上說：“‘三本小冊子’不是一般的小冊子，政治局討論後通知出版局，第二天就排印出清樣，第三天就印出來了，發到全國。‘三本小冊子’是在中央指示下搞出來的。”郭忠林說：“這‘三本小冊子’是960萬平方公里上的大事，是8億人口中的大事，是千年大計……。要做到家喻戶曉，人人皆知。”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要求掀起批判“三株大毒草”的高潮。北大在校範圍開展批判“三株大毒草”、學習“三本小冊子”的活動。鄧小平授意寫作的三個文件，前兩個文件已有定稿，後一個文件尚在討論之中。由於“四人幫”控制了宣傳陣地，已有定稿的前兩個文件也不為人知。在“三本小冊子”中，人們才初次見識“三株大毒草”。討論中，膽子大的人說：“講得很對啊！”結果，反面文章正面讀，人們對“毒草”的興趣超過“梁效”對“毒草”的批判。

還有一個《鄧小平與機會主義頭子言論對照》，這個材料包括鄧小平的材料65條；機會主義頭子的對照材料76條，其中有伯恩斯坦2條、考茨基5條、托洛茨基7條、布哈林3條、普列漢諾夫1條、赫魯曉夫10條、勃列日涅夫7條、王明1條、高崗1條、彭德懷2條、劉少奇24條、林彪13條。

此外，還有《周榮鑫講話選編》《周榮鑫言論摘編》《關於文藝問題的右傾翻案言論摘編》等13種“批判材料”。“梁效”所起的這種特殊作用，在全國範圍造成極大的混亂。江青卻“以梁效自豪”。姚文元一再誇獎“梁效”，聲稱“挺滿意”。

從“教育革命大辯論”到“反擊右傾翻案風”，再到公開“批鄧”，“梁效”以瘋狂的勁頭，開足馬力，在9個多月的時間裡，發表了80多篇文章，編印了20多份材料，代為“四人幫”發洩憤恨，把鄧小平同古今中外20多個壞人、惡人類比，編排了上百條罪狀，

扣了 30 多頂大帽子。遲群猶不以此為休，鼓吹“一級盯一級”“層層揪代理人”“揪一層人”“橫掃鄧小平復辟的社會基礎”。遲群說：“批陳整風，批林整風，批鄧要不要整風？要不要聯繫實際？我們在批鄧的大前提下，抓階級鬥爭，解決一些實際存在的問題，為什麼不可以呢？有人會說這是矛頭向下。我們就是要下到你這個人頭上，解決你的問題。”謝靜宜破口大罵：“他媽的還有比他（鄧小平）更厲害的呢，他們這些傢伙了解情況就是不揭，我們想揭的不了解情況。”（由於她一派潑婦腔，人們背後稱她是“小號江青”）⁵⁹遲群還煽動：“不為錯誤路線生產”；套用張春橋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叫喊：“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指鐵路）“梁效”的種種謬論，擾亂了社會秩序，衝擊了國民經濟。從“批林批孔”到“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4—1976），工業總產值損失 1000 億元，財政少收 400 億元。⁶⁰

“在打擊一層人、一批人”的同時，也冒出不少趨炎附勢、投機取巧的“批鄧”幹將。中國歷史多詭異。在鄧小平成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之後，“梁效”分子和“批鄧”幹將，卻搖身一變，成了擁護鄧小平的“社會基礎”；而當年作為“鄧小平復辟的社會基礎”被“四人幫”打擊的人，又作為“自由化分子”成了鄧小平打擊的對象。

蘇共 20 大以後，“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反得也很積極。”毛澤東說，這些人“缺乏革命道德”。“你從前那麼擁護，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不擁護斯大林的，其實從前是很擁護的。”（《毛澤東選集》第 5 卷，第 334 頁）“缺乏革命道德”的，中國也大有人在，而且還受到重用。“批鄧”的時候，反對鄧小平很積極的人，後來又變得擁護鄧小平很積極了。上面毛澤東講

⁵⁹ 《遲群、謝靜宜在清華大學機械系學員和幹部學習 1976 年 5 月 16 日“兩報一刊”社論座談會上的講話》。

⁶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大事輯要：1949—1985》377 頁，紅旗出版社，1987 年。

過的那段話稍微改一下，也適用於他們：“你從前那麼反對，現在總要講一點理由，才能轉過這個彎來吧！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麼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從來就是擁護鄧小平的，其實從前是很反對的。”從前鄧小平正確的方面也反對，後來鄧小平錯誤的方面也擁護。如果有一天，中國出現全面的、公開的反對改革開放的逆流，我可以斷定，這些人又將再次成為“批鄧”的幹將。那時，“自由化分子”又要為維護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拼死鬥爭了。

第十一章

“梁效” 的覆滅

1976 年 9 月 9 日中午，北大校園裏的大喇叭響了：“全體教職員工，全體工農兵學員，下午四時到各系各單位集中收聽重要廣播。”一連重複了幾遍。我猜想，是毛駕崩了。我不能去。事後得知，聽了廣播後，幾個工宣隊員痛哭流涕，捶胸頓足，如喪考妣。也有人擠不出眼淚來，伏在桌子上哼哼，假裝悲痛。如果我在場，見此情景，沒準笑出聲來，一定會遭到批鬥。毛逝世後，氣氛很緊張，嚴密注視“反革命分子”是否蠢蠢欲動。

這一天，正好是毛發動秋收起義的 49 週年紀念日。9 月 9 日，是東方的政治明星升起的日子，也是隕落的日子。

毛澤東生前對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上臺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¹ 的確，“他死得好”！他一死，促成社會危機的解決。

當時的中國，就像雷雨之前的沉悶。社會危機找不到出路，自然規律發生了作用。雖然人們高呼“萬歲”，自然規律不允許“萬歲”。還不到“萬歲”的百分之一，終於是“辯證法的勝利”。

毛澤東一死，揭開了變革的序幕，不同政治派別的較量尖銳化、表面化。

¹ 吳曉梅：《傾聽毛澤東》，361 頁，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

馮友蘭得知毛逝世的第一句話是：“這是天崩地裂的消息。”上了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1976年9月11日）。²對於他這樣依附型的知識分子來說是“天崩地裂”，對於另一些人來說是“天翻地覆”。

毛澤東逝世的當天，王洪文在中南海紫光閣架設了17部電話機，以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通知各省、市、自治區，重大問題直接向他報告，以切斷各地與華國鋒的聯繫。江青則以坐落在北大朗潤園的“梁效”據點作為她的聯絡站。

策劃“效忠信”

9月9日上午，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尚未公佈，遲群就向“梁效”佈置任務：給江青寫“致敬信”。宋柏年起草後交遲群審閱。遲群說：“第一部分講心情，可以；第二部分講毛主席的豐功偉績，要壓縮；第三部分寫班子，要充實。要講首長（指江青）的關懷，如何帶領我們一步一步前進，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³

對“梁效”來說，“毛主席的豐功偉績”抵不上江青的“關懷”。江青稱“梁效”為“我的班子”；“梁效”也以“班子”自稱。信的最後寫道：

我們一定要……在今後的革命征途中，不管出現多少艱難曲折、不管遇到什麼險風惡浪，我們都要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定要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進行到底。

我們衷心希望敬愛的江青同志為革命多多保重！

他們還召開表忠心會，李家寬說：“黨內資產階級是不會甘心

²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990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³ 《“四人幫”幹將遲群、謝靜宜部分言行摘編》，《大字報選編》，第9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1月17日。

的，會不斷興風作浪的，我向黨表決心：誓死保衛江青同志！”有人更癡，說：“為保衛敬愛的江青同志貢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唯一生命。”⁴

遲群、謝靜宜立即在北大、清華號召大家以“梁效”為榜樣，給江青寫“致敬信”“慰問信”。有人問：“是否要給黨中央寫信？”遲群連連擺手：“不用，不用！”只給江青寫信，實際上是類似江青所說的“20萬人上書要武則天當皇帝”的“勸進書”“效忠信”。

遲群讓王連龍以北大師生員工及家屬的名義給江青寫信。王連龍建議以北大、清華兩校的名義聯合寫一封。信由清華起草，說道：

敬愛的江青同志：

此時此刻，同志們都想到了您，我們的心和您連在一起，我們向您表示親切慰問。

在毛主席、黨中央作出點名批鄧重大部署的當天，您來到了清華園，給了我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看大字報的五萬餘人也受到極大鼓舞。

今年8月，您兩次來到清華、北大，親切地勉勵我們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抗震救災的鬥爭中走在前頭，充分體現了毛主席、黨中央的關懷。

.....

不管現在和將來，誰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危害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我們就同他堅決鬥爭到底！

我們兩校全體革命同志都在同您一起，分擔巨大的悲痛，衷心希望您多多保重身體，指導我們繼承毛主席的遺志，為無產階級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

他們的腔調和“梁效”一樣，在向江青表忠心的同時，總要尋找鬥爭目標，“同他堅決鬥爭到底”一句，用的是第三人稱單數。“他”是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能有誰？

⁴ 《梁效罪證材料》，37~38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北大黨委認為，信的內容沒有反映北大的特點，寫了一段補充。9月12日，遲、謝派專人給江青送去，還附上他們兩人的一封短信：

江青同志：

呈上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給您的信。

我們也一定保持清醒的頭腦，狠狠批鄧，準備應付可能遇到的複雜情況。請江青同志放心。

小謝、遲群

1976.12.9.⁵

這封盜用“兩校全體師生員工和革命家屬”的名義向江青發出的“效忠信”，非但北大師生員工及家屬不知道，就連黨委的成員也沒有幾個人與聞。

遲、謝還要王連龍、魏銀秋“啟發”廣大幹部和群眾寫“效忠信”“勸進書”。遲群虛張聲勢地說：“清華已經寫了很多了。”然後，要求北大“統計一下給江青同志寫了多少慰問信，包括準備寫的”。他把“包括準備寫的”這一妙語重複了兩遍。魏銀秋對遲群說的“統計”和“包括”心領神會。第一次“統計”加“包括”，僅有寥寥幾封。魏銀秋將兩校的那封信印發給大家，作為樣板，再次“啟發”。18日、19日兩天，都在“打招呼”。第二次“統計”加“包括”，也只有85封。魏銀秋對手下的人說，給各個單位“打招呼”，多寫幾封。有的部門一定要寫，例如團委會、學生會、校刊，還有教育革命部、政治部等。第三次“統計”加“包括”，是114封。9月22日，上報統計表，但各單位寫的信沒有送來多少，因為大部分是“準備寫的”。黨委派人去催。直到9月27日，統計與信件仍有差距。魏銀秋不管它了，將信件打包送遲群轉江青，附一說明：“全校革命師生員工，在極其悲痛悼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的時刻，紛紛給敬愛的江青同志寫了116封慰問信……。”其中，有的信

⁵ 此件是從江青住地搜出的。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件要求江青當黨中央主席。粉碎“四人幫”以後查明，其中還有寫給黨中央、華主席的，他們都算到江青的名下了。⁶

清華大學有一封信說得很露骨：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的手裏？我懇切地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⁷

9月23日，姚文元要新華社給江青寫信：“你們給江青同志寫一信，表示你們堅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信寫好後，經我轉。”

借外國人說中國事

“四人幫”和“梁效”慣於以古射今，還有一手是以洋射中。

江青以武則天、呂后自比，畢竟比較遙遠，而且這兩個是封建時代的人物。毛澤東去世後，這兩個人物並不足以成為江青的政治資本，所以她又抬出另一個人物來，那就是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

1976年3月，在為“反擊右傾翻案風”進行的“教育革命大辯論”中，“梁效”曾委託北大蘇聯東歐研究所翻譯過20世紀20、30年代蘇聯兩次教育大辯論的材料。1976年9月下旬，遲群對李家寬交代任務，說：“最近，江青同志又問起蘇聯20年代教育上的大辯論，要出一本小冊子。”遲群傳達江青的指示：“蘇聯20、30年代那場大辯論類似現代我國。”“那場大辯論很重要，是列寧夫人克魯

⁶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關於王連龍、魏銀秋夥同遲群、謝靜宜策劃給江青寫“效忠信”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年9月。

⁷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413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普斯卡婭領導的，路線是基本正確的。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有錯誤。”又說：“列寧夫人只抓教育，結果失敗了。要吸取這個教訓。”遲群加以發揮，對“梁效”說：“眼界應放寬些，即看到整個黨的路線鬥爭。”10月3日，遲群還要“梁效”把所有的材料匯編成冊，前面寫一篇有分析、有理論、有介紹的文章，作為前言。他再三交代：“這是首長（指江青）讓搞的，她抓得很緊，老催問我。”

“這是個大問題，不要看輕了。”李家寬佈置梁英明小組寫一篇關於蘇聯兩次教育大辯論的文章。從10月3日到10月6日，遲群對“梁效”天天催辦。⁸遲群及江青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他們一方面搞材料，把江青作為列寧夫人抬出來；另一方面，又印發《共產黨波蘭向右轉》等5個外電，把當時的形勢描繪成為“右派得勢”“右派上臺”，要左派組織起來“把右派打倒”。

9月28日深夜兩點，遲群給“梁效”打電話，葉朗接的電話，並做了記錄：“《參考資料》上有兩篇外國電訊，一篇是《共產黨波蘭向右轉》，一篇是《波蘭工資相差十九倍》，要印一下，發給兩校師生員工每人一份，作為反面教材，前面要加幾句‘說明’。印得好一點。”29日一早，葉朗向李家寬報告，李立即組織人馬交辦，擬了一個“說明”：

美報文章《共產黨波蘭向右轉》和路透社關於波蘭工資情況的報道，可以使人們清楚地看到，修正主義的統治必然導致資本主義公開的全面的復辟。現將這兩篇材料印發給全體師生員工。研究一下波蘭修正主義這個反面教員，對於我們深入批鄧，進一步認清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線的極右實質，是有幫助的。

遲群審閱後，當天晚上11點多，命李家寬馬上開印。李佈置北大印刷廠連夜加班，還說如沒有人上班，“梁效”可以派車去接來。

⁸ 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 82號，《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1978年5月15日。附件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臺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9頁。又見《梁效罪證材料》，123~124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12 點多，遲群又拿出一本《參考資料》，對“梁效”的人說：“還有兩篇文章，《巴基斯坦時報》的《創紀元的偉人》、日刊的《悼念毛澤東主席逝世》，上面也讓印一下。今天首長（指江青）看了這兩篇文章，說要印，發兩校師生員工人手一冊，作為國慶學習材料。”這兩篇文章中暗示毛逝世後中國將“動蕩起來”“面臨考驗”“前途多難”“劉鄧路線可能復活”等等。遲群還說：“要加個‘說明’，明天中午印好，給我送來。”於是，李家寬、王世敏立即起草“說明”。20 分鐘後，草稿剛寫成，遲群又來電話催問：“寫得怎麼樣了？”李家寬把草稿在電話中唸了一遍。遲群說：“這是代表中央寫的，可要寫好。今晚就搞好，印出來，明天一早給我送 20 份。”從明天“中午”提前到“一早”，加急！李家寬叫來鍾哲明等人，按遲群的旨意修改“說明”。定稿時已是深夜 3 點多，急送印刷廠。兩批材料各印出 43000 份。第二天一早，李家寬派人將兩批材料各送 20 份給遲群。10 月 5 日，李家寬、梁英明又選送了一篇英刊文章《毛澤東使無產階級最後戰勝資產階級日子提前》。遲群批：“同意，即印，印數同上次。”下午，送印刷廠。李家寬電話急催：“印得越快越好，印出一部分、裝訂一部分。”急如星火！無奈這個材料還沒印完，“四人幫”就完蛋了。李家寬通知印刷廠停印。⁹

那幾天，他們實在忙碌，萬分緊張。10 月 6 日白天，遲群在清華大學團委和上管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他說：“有人講，主席在，一個個跳出來，好辦；主席不在了怎麼辦？無非是修正主義上臺嘛！我們再把他趕下來就是了。”他們少不了談論“右派上臺”“修正主義上臺”。晚上 7 點，清華大學的人事處長李士存有事到遲群辦公室，他看到桌子上放著《鄧小平言論摘編》。遲群說：“這是準備送政治局的，以前送過一個樣本，這是新編的。”他們想，也像《林彪與孔孟之道》一樣，將《鄧小平言論摘編》作為中央文件發下去。¹⁰ “批鄧”不過是個幌子，揪住鄧小平這個死老虎，是

⁹ 《關於“梁效”印發〈共產黨波蘭向右轉〉等五個外電材料的清查報告》，“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8 年 3 月 21 日。

¹⁰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6 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

爲了打活老虎。例如，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在國務院匯報科學院工作時，談到群眾性科研問題，華國鋒插話說：“強調依靠工農兵是對的，但同時也要重視專業隊伍，不能把專業隊伍搞得亂七八糟。”“四人幫”向“梁效”提供了記錄，“梁效”把“依靠工農兵是對的”加了一個字，歪曲成“依靠工農兵是相對的”，當作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言論來批。¹¹

可惜，一切都晚了，僅僅過了一個多小時，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四人幫”及遲、謝紛紛束手就擒，江青的女皇夢、列寧夫人夢及“批鄧”夢、打倒右派夢一齊破滅。

“四人幫”的目標和手段

毛澤東病危期間，江青帶著“梁效”一幫人，在大寨騎馬、逗鹿、玩兔。



毛澤東病危期間，江青在大寨騎馬，後面跟著一幫“梁效”人（資料圖片）

1977年3月15日。

¹¹《關於“兩校大批判組”炮製的反黨黑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審查報告》，中共北京大學黨委黨發[78]6號，1978年1月6日。

9月5日晚上9點半，北京通知她火速返京。江青的表現很奇怪。她的警衛員周金銘揭發：

我們工作人員一聽這個消息，都知道一定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病情惡化了，個個心裏怦怦直跳，猶如天快塌下來似的。我們立即把江青從睡夢中叫醒，當向她報告中央電話通知時，我們的聲音都發抖了，然而反黨分子江青卻若無其事。她躺在床上慢悠悠地說：“沒有事，不要慌。”她起床後，我們緊張地收拾行李，她卻高高興興、又說又笑地打了兩個小時的撲克。從陽泉乘火車到石家莊行了兩個小時，她除了吃飯時間，就是打撲克。從石家莊改乘飛機到北京，僅僅只有20多分鐘，她也不放過，繼續打撲克，一直打到北京。一路上，她談笑風生。¹²

據陳永貴說，江青在大寨得知毛病重的消息，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強作鎮定，還吆喝：“打牌，打牌！”她和大家一邊打撲克一邊等火車。但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還不停地看手錶。¹³江青是演員。人們弄不清哪是她的真身，哪是所扮演給人看的角色。

王洪文則在中南海釣魚、打鳥、游泳、看電影。毛澤東一度屬意王洪文為接班人，曾要他讀《後漢書》中的《劉盆子傳》。他讀不懂古文，回上海時請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講解。劉盆子是漢朝劉氏宗室，西漢末年，家道破落，淪為牧童。赤眉農民起義軍樊崇進攻長安，有人給他出主意：你的威望不夠，可以找一個劉氏宗室來做皇帝，號令天下。劉盆子經抓鬮當上了皇帝，時年15歲。當了皇帝，仍與一班放牛娃嬉戲遊玩，最後身敗名裂。徐景賢評論，王洪文“比劉盆子還‘劉盆子’”。1975年3月10日，徐景賢給張春橋、姚文元寫了一封長信，反映王洪文的種種問題，其中說：“我們和他接

¹²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6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¹³ 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史》下篇，994頁，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6。

觸，聽他談話的內容，幾乎極少提到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但是打獵呀，釣魚呀，打撲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電影呀，等等，卻佔據了他生活和話題的很大一部分內容。”¹⁴ 王洪文讀過《劉盆子傳》，若有所悟。毛澤東一死，他就放肆起來了。最後，也落得劉盆子的下場。

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中說，他們對毛的病危“幸災樂禍”。幸災樂禍，未必，但他們大概以為出頭之日來到了，都很興奮。

毛澤東一死，他們就活躍起來。

1976年9月27日，江青帶著一個排的警衛隊伍，卡車上裝了幾匹馬，在遲群、謝靜宜的陪同下，跑到清華大學分校（前園河農場）。三四十人陪她吃了一頓飯。她說：“主席逝世後，我沒哭一聲，沒流一滴眼淚。”還對大家說：“你們不要有兒女之情，哭哭啼啼。”下午4點，她騎馬到花生地，象徵性地勞動了幾分鐘。回去時帶走一筐花生。10月1日，江青又去清華大興分校，吃喝玩樂之餘，對群眾發表講話。她說：

我在主席逝世後的第一次中央會上，就控訴了鄧小平，要開除他的黨籍。沒有開除，要以觀後效，還會有人要為他翻案。我也要向你們年輕人宣誓，一定要鍛煉好身體，和他們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還長著呢。形勢是好的，你們看好不好？但是要警惕。（她又心虛地說：“政治局開會的情況不要洩露出去。”）¹⁵

江青不小心泄露了天機，她對大家說：“膠捲要留在慶祝重大政治事件時照”“蘋果要留在慶祝重大政治事件時吃”，臨走時她還要人們“等著特大喜訊，準備學習公報”。她的幹將遲群更不謹慎，居然說江青已經“邁著領袖的步伐”。他們以為，不久就會迎來一個

¹⁴ 徐景賢：《十年一夢》，203~300頁，臺北，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¹⁵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6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新桃換舊符”的狂歡節，誰知不由自主地走向了鬼門關。

江青還說要來北大，黨委準備了 1000 多人的歡迎隊伍和幾十人的座談會。守候到晚上 10 點，江青人沒來，來了一個條子，是遲群、謝靜宜帶來的，說：“本來要去，時間不夠，請遲群、小謝代我向北大革命師生員工致敬，祝節日好！”黨委召集總支書記開緊急會議，宣讀江青的條子，要求連夜傳達，說：“今天傳達和明天傳達，意義是不一樣的。”半夜三更把人叫出來折騰一番，就為聽江青的一句廢話。第二天，上送一份《北京大學情況簡報》，題目是《以親切的關懷為動力》。

王洪文在 10 月 2 日拍攝了“標準像”，為他上臺做準備。10 月 3 日，他到平谷縣“視察”，一頓飯吃了兩三個小時，喝得醉醺醺的，走路東倒西歪到了許家務大隊。轉悠了一番，臨走時抬去兩筐蘋果。他講了一番話：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打倒！別人搞修正主義，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義，你們也來造反。最好是不出現修正主義，但這只是個人願望，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建國以來，中國就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鄧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後還可能出什麼唐小平、王小平之類，要警惕！不只是鄧小平搞修正主義，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要把眼睛睜的大大的看著修正主義。¹⁶

他們瞄準了另一個“鄧小平”，人們都以為他們要動手了。

“四人幫”還攝製了一部煽動性的電影《反擊》，主題思想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劇本中原來的一號反面人物是大學的黨委副書記。遲群說：“小鼻子小眼，太沒勁了！”指責劇作者“對重大理論問題理解不夠”。劇作者改成省委副書記。遲群又說：“厲

¹⁶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6 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 年 3 月 15 日。

害的不是副的，而是第一把手。”把走資派改成省委第一書記。他說：“要寫大走資派，一直寫到中央。”“要讓人們的眼睛一級一級往上看，一直盯到中央。”當《反擊》在河南拍攝時，引發派性鬥爭，有人要揪省委第一把手。遲群十分得意，在一個報告上寫道：“《反擊》在走資派那裏已成為強級地震。”他希望“引起連鎖反應”。預定影片 10 月 1 日出廠，因故未出。10 月 6 日，文化部的“四人幫”部下劉慶棠督促北影廠攝製組趕快出廠。畢竟來不及了。

上海還有呼應。“四人幫”授意炮製的大型話劇《盛大的節日》，以歌頌上海的“一月風暴”為名，吹捧王洪文、張春橋，並批判“走資派”。1976 年夏，又要想把它搬上銀幕，說是“北面的《反擊》，南面的《盛大》要作為兩個戰役來打。”毛逝世後，他們說：“《盛大的節日》是‘按既定方針辦’的形象教材。”可惜，兩個戰役都沒打響。

“四人幫”的黨羽、爪牙們也蠢蠢欲動，講得最露骨的是張鐵生¹⁷，他說：

¹⁷ 張鐵生（1950—），1968 年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在遼寧省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當隊長。1973 年 6 月，被推薦考大學。在物理化學考試時，大部分試題不會回答。他在考卷的背面寫了《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信中說：“對於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法外的浪蕩書呆子們，我是不服氣的，而有著極大的煩（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他們的自由生活和為個人的努力等於了我的為人民熱忱忘我的勞苦工作和誠懇的心（詞句不通，意義不明）。”“有一點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沒有為此而耽誤集體的工作，我在隊裏負全面、完全責任的。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著自己鑽到小屋子裏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會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現勝似黃牛，對於我這個城市長大的孩子，幾年來真是鍛煉極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觀的改造方面，可以說是一個飛躍。”“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學考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為盼。”他的這封信，迎合了“教育革命”的潮流，受到毛遠新的賞識。本來工農兵上大學是不需要考試的，只憑單位“推薦”。1973 年 4 月，國務院發出通知，高校錄取新生必須進行文化考試。1973 年 7 月 19 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毛遠新寫的“編者按”和經改錯、刪節的張鐵生的信，後《人民日報》又加以轉載，批判“舊高考制度的復辟”。張鐵生一下子身價飛升，江青說：“他真了不起，是個英雄，他敢反潮流。”（《人民日報》1976 年 11 月 30 日）“四人幫”稱之為“反潮流英雄”，但民間稱之為“白卷英雄”。他當上了鐵嶺農學院核心小組副組

現在，我們的國家好像一個大家庭一樣，父親去世了，家裏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領著過日子。現在的問題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說的充滿著擔心就在這裏。

華現在是第一號人物了，已經是很顯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幹什麼？我給黨中央和人大寫過信，沒想到主席會去世這麼早。他在計委會上的講話，與洪文的講話就不一樣，不能說絕然不同，但起碼是有差距。

總之一句話，目前，我對國家的領導人，對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很擔心，尤其是對軍隊充滿了擔心。

我真擔心，這樣一個思想路線是右的，滿腦子舊的東西，大搞唯生產力論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這樣的人在支持擁護他。

華的講話對右的人是個鼓舞。有的省有人來信說，他們全省傳達，而不是內部傳達，反響很大，二老爺很猖狂。他可是國家的一把手了。¹⁸

“四人幫”提出，要培養“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人。張鐵生就是他們的培養對象，他所講的想必是在他們之間流傳的私房話。張鐵生到清華，毛遠新的秘書給遲群打電話，受到破格接待。有人說，省委書記都沒有這樣接待過。遲群說：“要比任何客人規格都高，親不親，階級分。”遲群對張鐵生說：“這個地方是咱們的，這個舞臺允許你去佔領，到了家了。咱們是一家人，有什麼話都可以講。”所以他就放肆地講了。

他們的目標很明確。張春橋說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¹⁹毛生前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

長、院黨委副書記，1975年竟成爲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由於追隨“四人幫”，猖狂一時，1976年10月以後被撤銷職務、開除黨籍。1983年，張鐵生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刑滿釋放後，與人合辦飼料公司，經營多年，成爲億萬富翁。

¹⁸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¹⁹ 《歷史的審判》，4頁，解放日報編輯部編印，1981年1月。

的主席。”²⁰ 張春橋的《二月三日有感》表明，他自以爲國務院總理的職務非他莫屬。

實現目標的手段是什麼？在張春橋的住地搜出的一個提綱，其中寫道：

歷史與現實。爲今。時代。

革命與專政。怎樣革、怎樣鞏固政權，殺人。

他的手段是殺人。姚文元也有同樣的想法。在他的住地搜出的日記，其中寫道：

中國這個國家，激烈的鬥爭不斷，但解決矛盾（某一個方面、部份）卻總是不徹底。爲什麼不能槍斃一批反革命分子呢？專政究竟不是繡花。²¹

張鐵生在北大的演講中說：“老幹部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民主革命的民主派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走資派。”“要殺雞給猴看”“要動大手術”。黨委書記王連龍帶頭鼓掌，說：“革命的聽了高興，不革命的聽了害怕。”²² 他們將採取的手段就是要使一些人高興，另一些人害怕。

“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

毛澤東逝世後，發生了一場“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的糾紛。

看起來，字面上的意思差不多（據傳，彭真就說：“完全是咬文

²⁰ 張迪傑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卷，香港，474頁，潤東出版社，2013。

²¹ 以上引文均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²²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二》，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嚼字，兩者有什麼區別？”），其實不然。本來是指毛主席生前的事“照過去方針辦”，經“四人幫”的篡改，成了毛主席身後的事“按既定方針辦”。“照過去方針辦”的方針是確定的，就是過去實行的方針；“按既定方針辦”的方針是不確定的。什麼是既定方針？需要解釋。誰來解釋？“四人幫”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就是為了搶旗幟，壟斷“按既定方針辦”的解釋權。“照過去方針辦”的內容，是華國鋒所請示的具體事件；“既定方針”被“四人幫”說成無所不包、漫無止境的。“既定方針”究竟是什麼？就像魔術師的口袋，需要什麼就能掏出什麼。可以不時地從中伸出棍子來打人，飛出帽子來扣人，一個一個地收拾“對立面”。

1976年4月30日，毛主席接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時由華國鋒陪同。接見完畢，華國鋒送走客人，返回向毛主席匯報工作。他說有幾個省的形勢不大好。那時毛已有語言障礙，口齒不清。他得的是一種非常罕見的絕症，叫作“肌肉萎縮性側索硬化症”。起初是手腕無力，逐漸擴展到全身，以致不能吞嚥，不能說話，最後是不能呼吸。毛咕嚕咕嚕的話，只有張玉鳳能聽得懂。這一回，毛對華說的幾句話，連在一旁的張玉鳳都聽不懂了。毛用哆里哆嗦的手寫了三張條子：“慢慢來，不要招（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華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前兩句。²³

三張條子，兩軍對戰。在場的張玉鳳說：“當時主席寫這三句話是答復華國鋒同志匯報的幾個省的問題的意見。後來傳說‘照過去方針辦’是臨終囑咐，‘你辦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這是不符合事實的。”²⁴“四人幫”陣營把“照過去方針辦”歪曲成“按既定方針辦”，說成是“臨終囑咐”；華國鋒陣營把“你辦事，我放心”說成“指定接班人”。兩者都是隨心所欲。

²³ 粉碎“四人幫”以後，在王洪文、江青住處搜出的筆記本上，明明寫著“主席：照過去方針辦”。見《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²⁴ 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未刊稿。轉引自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659頁，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毛澤東逝世後，政治局討論、通過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和華國鋒在追悼大會上的《悼詞》，均沒有“按既定方針辦”的“臨終囑咐”。9月中，姚文元佈置手下人寫“兩報一刊”社論。9月15日，社論初稿送姚文元審閱，姚在其中加寫：“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按慣例，報刊上的黑體為毛主席語錄）。”9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以《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為題發表。9月22日，“按既定方針辦”乾脆列入《人民日報》報頭毛主席語錄欄。

1980年7月17日，專案組在審訊姚文元時，問“為什麼要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他回答：

過去毛主席一直是保護我的。毛主席逝世後，我就聯想到他說的“四人幫”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我就擔心解決到自己頭上來了。毛主席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問題不至馬上發生。²⁵

但最早提出“按既定方針辦”的，還不是姚文元，而是張春橋。據王洪文1980年7月9日在特別法庭庭審時交代，張春橋曾對他說：

我最後一次見到毛主席時，主席拉著我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²⁶

社論見報後，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問：“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後，有什麼反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反復宣傳。”從9月17日開始，姚文元一連幾天打電話給新聞單位，要求集中力量宣傳“按既定方針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將“兩報一刊”社論連續播出15遍。姚文元要求

²⁵ 霞飛：《“四人幫”倒臺前姚文元收到兩封信》，《黨史博覽》，2005年第12期；又見《姚文元政治生命結束前的掙扎》，多維新聞網。

²⁶ 同上。

新華社，國慶報道凡有“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不要怕重複；沒有的，要寫上類似的話。然後又利用他們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連篇累牘、不厭其煩地加以宣揚。

至 9 月底，僅中央一級 6 家報刊，據不完全統計，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各種文章就有 236 篇。“四人幫”的夥計們一齊起哄，說什麼“今後就是按既定方針辦還是不按既定方針辦的鬥爭”。他們把全部賭注都押在這個偽造的“臨終囑咐”上了。但是，政治局討論華國鋒在 9 月 18 日的追悼會上致悼詞時，“四人幫”並沒有提出寫入“臨終囑咐”，又企圖陷華國鋒於隱瞞或違背“按既定方針辦”的境地。

對“兩報一刊”社論首先引起警覺的是葉劍英，他雖是軍中元帥，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他在“按既定方針辦”下面畫了一道紅線，旁邊打了一個問號，交給華國鋒。華沒有反應。9 月 17 日，上海《解放日報》以頭版頭條通欄標題的形式宣傳“按既定方針辦”。葉劍英拿著這張報紙找到華國鋒，對他說：“‘按既定方針辦’和你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照過去方針辦’是不一樣的。他們說‘按既定方針辦’是毛主席的‘臨終囑咐’，別有用心！毛主席寫‘照過去方針辦’是 1976 年 4 月 30 日，距他去世還有四個多月，怎麼能說是‘臨終囑咐’？”這才引起華國鋒的警覺。他本來大概以為“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意思差不多。華國鋒和汪東興商量，如何澄清？汪東興說，由他出面，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講。

9 月 29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汪東興一開口就被吳桂賢打斷，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國鋒同志在計劃會議上講的。”²⁷ 汪東興沒有再說下去，華國鋒也沒有表示。看來華國鋒確實講過“按既定

²⁷ 旁證，范達人在《“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中寫道：“‘按既定方針辦’最早是由他（華國鋒）向下傳達的，那是 1976 年 8 月份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他的講話刊載在新華社《內參》上。”（141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魯瑛也曾對姚文元說：“我聽劉湘萍同志（時任衛生部長）說，國鋒同志 7 月份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傳達主席的指示時，好像講的就是‘按既定方針辦’。”（青野、方雷：《鄧小平在 1976 年》，下卷，249 頁，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

方針辦”，經葉劍英提醒，他才覺察有問題。後來終於找到一個澄清的機會。1976年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中，把“按既定方針辦”的字樣統統刪去，還寫了一段批語：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首先畫圈表示“同意”。奇怪的是，王洪文也表示“同意”。張春橋在表示“同意”後，又加了一句：“國鋒同志的批註，建議不要傳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²⁸張春橋沒有堅持“按既定方針辦”，更沒有拿出毛主席拉著他的手低聲說的證據。他不可能拿出證據來。早在4月30日，毛已說不清，別人也聽不懂，所以才寫了三張歪歪扭扭的字條，在這之後，怎麼還會對張春橋低聲說出“按既定方針辦”，作為“臨終囑咐”？華國鋒說的“照過去方針辦”有物證和人證，物證是那三張條子，人證是在場的張玉鳳；張春橋說的“按既定方針辦”，既無物證，又無人證。

據華國鋒澄清，毛主席的指示和他在政治局的傳達都是“照過去方針辦”，這裏的方針是處理幾個省的具體問題的方針，不是治國的方針，也不是臨終時留下的囑咐，而是在臨終前4個多月寫的條子。

10月3日姚文元與魯瑛商量：“要想個辦法，採取措施。”姚搖動筆桿，把稿件上的“按既定方針辦”，改成“按照毛主席過去既定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辦”。將“照過去方針辦”與“按既定方針辦”來了個真假合璧。

²⁸ 以上，見金薔薇：《石破天驚大事記》。

製造警惕“右派上臺”的輿論

毛逝世後，在“四人幫”的授意下，“梁效”和北大、清華都在組織學習毛主席《給江青的信》。信中說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通過學習，製造警惕“右派上臺”的輿論。

毛的信中簽署的日期是1966年7月8日。林彪事件後，1972年5月，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公佈了此信。信中說，同意中央轉發林彪的“五一八講話”及接受他的吹捧，“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中這還是第一次”。²⁹

公佈這封信的意圖，是說明偉大領袖對林彪有先見之明。江青在參加華東組、中南組討論時，儼然以權威的身份解釋，毛主席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³⁰按江青的說法，毛早已識破林彪。這是捉襟見肘，既然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何結交為“親密戰友”、培養成為接班人？漏洞更大了。為了顯示可信度，說當時周恩來、王任重看過此信。但當時他們看過的信，是否就是1972年公佈的信？時人竊竊私議，懷疑信的真實性。《參考消息》上登外國通訊社的報道，說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專家經過分析後認為，這封信是偽造的。³¹中國人也不是好糊弄的。見諸文字的有陳小雅的《毛澤東〈給江青的一封信〉真偽辯》（原載《重審林彪罪案》，614~620頁），文中說，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應該不是1972年公佈的那封信。1972年的信是“夫妻合謀，演出一場‘三年早知道’”。

果然，日後毛的身邊人張玉鳳提供的證言說：“主席、汪東興告

²⁹ 《給江青的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³⁰ 她的發言刊登會議簡報，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443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³¹ 見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下）489頁，明報出版社，2003。

知，我才清楚：1966年7月8日主席給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張春橋和江青研究後寫成的。”所以，1966年的信是1972年的偽作。1972年國慶前夕，為安撫舊部，毛在中南海宴請近30位老帥、老將軍，汪東興也參加了，毛要張玉鳳做些記錄。毛的開場白說：“我們之間是戰友加同志，有誤會，有爭議，也有過傷害，請多多包涵。我的親密戰友不告而別，今天還是百思不解。……”席間，有老帥、老將軍“贊主席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給江青的信，已對林彪有防備，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陰謀家”等等。毛聽後，搖搖手，說：“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親密的戰友了。我勸（你們）不要相信這封信。”宴請結束後，汪東興下令，把記錄上的這段話全部刪去，說：“這是主席的偉大胸懷。如果擴散出去，會給階級敵人、帝修反作反面宣傳。”

張玉鳳憶及：“主席曾多次談到1966年7月8日給江青信中的內容，問過總理、汪東興、江青、張春橋關於黨內外的反應和議論。這些人的回答總是千篇一律地說：‘主席英明、偉大，洞察一切，顧全大局，讓林彪有個（暴露）過程’等等。主席聽後，總是哈哈大笑。還問過總理：‘你也信嗎？’總理不知如何回答。主席說了一句：‘你不瞭解，但是你明白。’”毛是指康生、張春橋、江青如何炮製假信，周不瞭解，但憑周的政治經驗，毛料他是明白的。同樣，周憑自己的政治經驗，明白也不說。張玉鳳又說：“1972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親自點將，邀請了康生、江青、張春橋、汪東興、張玉鳳。晚餐前，主席又提及1966年7月8日給江青信中的內容。主席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動機，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為文件下達，世人皆知，是主動還是被動，難下結論。總而言之，會成個謎。我不信，總理，還有一些老帥，會被謎迷倒。’主席又說：‘這件事，我是違心接受的。’”³²毛逝世後，

³² 見《張玉鳳揭示若干重要歷史事件的真相》，《爭鳴》2006年2月號。汪東興、毛遠新對張玉鳳提供的毛圈定的“名單”，予以否定。但對其餘未有質疑。這兩個人，一個是毛的近侍，一個是毛的心腹，他們過目而無異議，等於證實。據分析，毛確有給江青的信，但如毛所說“康老，還有春橋，在信中做了文章”。所以，1972年公佈的不是1966年的原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

1976年9月27日，江青在清華大學大興分校的群眾場合說：“現在重溫毛主席給我的那封信，就像新寫給我的一樣。”³³ 偽造假信之後又說假話，假上加假。假話也說得太拙劣，毛主席已經不在了，還能“新寫”嗎？

遲群佈置“梁效”的寫作，要他們特別指出警惕“右派政變”“右派上臺”。葉朗等人寫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可抗拒》，根據遲群的旨意，把形勢說成“右派利用毛主席的信任，得勢於一時”，號召左派們起來與修正主義路線做鬥爭。遲群授意楊克明等人寫的《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一定能勝利》，把毛逝世後的形勢與馬、恩逝世後修正主義者篡奪第二國際領導權的形勢相提並論，將中國的形勢說成“右派要上臺”，革命會出現“迂迴”“曲折”“迷誤”。“我們要作好充分的思想準備去迎接風浪。”文章的最後講到“反動派暫時得勢的可能性”，引用毛在給江青的信中的一句話做總結：“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³⁴ 他們預感到“風浪”的來臨，只不過左派和右派在他們的頭腦中是顛倒的。

“梁效”論證“按既定方針辦”

在警惕“右派上臺”的喧囂聲中，“梁效”宣揚“按既定方針辦”。

9月15日，“梁效”得到通知，在駐地待命，等著學習將要發表的“兩報一刊”重要社論。控制“梁效”的“四人幫”的那兩個幹將，一男一女，一前一後，忙碌起來了。晚上，遲群和《人民日報》

稿》第12冊錄入時，文末注“根據修改件刊印”。意即承認有原件和修改件兩個文件，只是沒有說明修改了什麼、何時修改。

³³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六《江青反黨黑話摘編》，1976年11月12日。

³⁴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第7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編輯部通電話，要求向他口述尚未發表的社論內容。謝靜宜在為毛主席守靈時，和《人民日報》的那個“四人幫”的部下魯瑛暗通款曲，得到一份題為《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的社論清樣；魯瑛同時也給了《光明日報》總編莫艾一份。你看他們多麼緊張！謝靜宜回到“梁效”的據點，已是晚上 10 點，不到一個小時，這份清樣先後在“梁效”和北大黨委、清華黨委方圓十幾里的三個地方、七八十人中傳了一遍。“四人幫”的兩個幹將，一個尖叫，一個幹號，說什麼“今後的鬥爭就是圍繞是不是‘按既定方針辦’”！與此同時，莫艾召開光明日報社核心組會議，說：“‘按既定方針辦’是總的報道思想。”並決定組織一系列稿件。

9月16日，拋出‘按既定方針辦’的社論剛一發表，“梁效”就討論寫作計劃，將寫作“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列為9月、10月的重點。遲群說：“現在正是戰鬥的時候，要大寫，特寫，快寫！”“梁效”擰緊發條，在毛逝世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寫了 25 篇文章，差不多每天一篇，發了 11 篇，還有 14 篇沒來得及發。

“四人幫”操縱的宣傳機器都在快速運轉。同一天，《光明日報》就來電話，說他們的負責人要親臨兩校“大批判組”約稿。第二天，《光明日報》的負責人和兩校“大批判組”的頭目，共同策劃《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他們說：“現在藍圖已經繪好，問題是要堅持按既定方針辦，不要另搞一套。”這篇文章要寫“按既定方針走下去，走到底，不走調，不變樣，否則就是搞修正主義。”還說：“現在大部分文章是悼念毛主席的。我們這篇文章要寫走資派還在走。”兩下裏說得十分投機，一拍即合。基調已經定了。誰要是不接受他們偽造的“按既定方針辦”，就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遲群號叫幾聲：“文章給我抓緊寫！文章給我抓緊寫！”

文章的寫作交給了“梁效”中“最能領會上面精神”“最有戰鬥力”的“范達人尖刀班”。許多臭名昭著的大塊文章，諸如《孔丘其人》《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等，都是這個“尖刀班”的作品。9月20日，“尖刀班”的成員范達人、何芳川、陳先達又奉命和《光

明日報》幾位負責人討論了詳細的提綱。《光明日報》的負責人傾巢而出約一篇稿子，又親自出馬討論詳細提綱，這是從來沒有過的。可見意義重大、任務緊迫！

提綱定了，何芳川說：“好寫，好寫！”自告奮勇，執筆起草。9月21日，文章的初稿就出籠了，確是抓得很緊。初稿中，他們以“四人幫”的代言人的口氣寫道：“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文章的起草者何芳川說，這是為了“給華國鋒發出一個警告”。討論提綱時，《光明日報》的負責人提出要寫上：“斯大林逝世後，就出了赫魯曉夫……。”開始時覺得太露骨，經過一陣猶豫，終於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寫上了。陳先達還認為“文章不够勁”，又加上“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打它三棍子。

9月24日，文章送《光明日報》。25日，打出8份小樣，分送“梁效”和報社負責人。27日，“梁效”將小樣送遲群、謝靜宜審閱。上寫：“遲群、靜宜同志：這是《光明日報》約稿，爭取近期發表。此文是范達人、何芳川、陳先達同志寫的，請審閱。兩校批判組9月27日。”30日，遲群通知說：“文章可以發表。”李家寬又看了一遍，將文中“毛主席親自締造的朝氣蓬勃、後繼有人的中國共產黨”一句，刪去“朝氣蓬勃、後繼有人的”。既然“給華國鋒發出一個警告”，又說“後繼有人”就不合適了，李家寬消除了一個矛盾。武器已經鍛造完畢。箭在弦上，正在窺測方向，選擇時機，隨時準備發射出去。

10月2日，華國鋒否定了“按既定方針辦”。10月3日深夜，《光明日報》的總編莫艾急急忙忙通知報社，“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一定要在次日頭版頭條見報，迫使編輯人員連夜改版。10月4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拋出“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對抗華國鋒的意味很明顯，更明顯的是它的內容。“梁效”的文章指出：“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這裏說的是“修正主義頭子”，還

不是“修正主義分子”。“修正主義頭子”究竟指的是誰？是鄧小平嗎？顯然不是，鄧小平早已被打倒了。在“修正主義頭子”前面加上“任何”一詞，當然是在鄧小平之外另有所指。而且文章中還說，這樣的“修正主義頭子”就在“人民面前”。他們唯恐別人還不明白，進一步說：“當一條錯誤路綫受到批判和清算時，一些新的機會主義路綫頭子，就會以正確路綫代表者自居，在反對錯誤路綫的幌子下，繼續推行同一條路綫。”當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綫受到批判，就會有新的機會主義路綫的頭子繼續推行同一條路綫。就差把華國鋒的名字點出來了。他們又要製造新的事端，抓就在人民面前的“修正主義頭子”“新的機會主義路綫頭子”了。

什麼是“既定方針”？

偽造毛主席的“臨終囑咐”，重要的還在於對它的解釋。“四人幫”手中拿著“按既定方針辦”，就像搶到一個揚聲器的話筒，目的是通過這個話筒不斷發出自己的聲音。

姚文元改定的9月16日“兩報一刊”社論中說：“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綫和各項政策辦。”到了“梁效”那裏，這個“既定方針”又膨脹了，不僅有“路綫”和“政策”，也包括“綱”，還有“主義”“道路”，既是“戰略措施”又是繼續革命的“學說”。據說，篡改“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那麼，“既定方針”又等於馬克思主義、等於社會主義了。真是無所不包，應有盡有。

路綫決定方針、政策。方針是在路綫的決定之下，指導某一方面（如教育方針）、某一時期（如1946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某一戰役（如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某一運動（如減租減息的方針）的局部性的東西。“照過去方針辦”的方針，明明是就一定時期、針對一定問題而言的。可是“四人幫”把“照過去方針辦”6個字篡改了三個，“方針”二字雖未動，但意義和內容完全變了。“四人幫”和“梁效”的江湖騙術就在於，首先把一切都納入“既定方針”，然後

就從“既定方針”中變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

這個“既定方針”不僅包括一切，而且還縱貫古今。“梁效”爲了給“按既定方針辦”的旗號重重地抹上一些油彩，不管事實符不符，不顧情理通不通，說什麼恩格斯“始終不渝地堅持馬克思的既定方針”，還說什麼“列寧堅持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針”。恩格斯和馬克思同樣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19世紀工人運動的領袖，恩格斯稱他的戰友馬克思爲第二個“自我”。如果說有什麼“既定方針”的話，那麼，馬克思的“既定方針”也就是恩格斯的“既定方針”。硬說恩格斯按馬克思的“既定方針”辦，不覺得荒唐可笑嗎？再者，杜撰一個公式，馬克思以後都是“按既定方針辦”，更是荒謬絕倫。馬克思、恩格斯什麼時候爲俄國規定一個“既定方針”讓列寧去辦呢？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又在什麼時候爲中國規定了一個“既定方針”讓毛澤東去辦呢？“四人幫”還授意御用文人炮製一個歷史材料加以散發，說什麼秦之所以速亡，是因爲秦始皇的“既定方針”沒有得到貫徹；漢之所以興盛，是因爲呂后執行了劉邦的“既定方針”。“四人幫”偽造“按既定方針辦”，以江青比擬呂后，在那裏抒發專制主義君主統治之幽情。

這個“既定方針”不僅管現在，還要管將來。“梁效”說，“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紀和下世紀”，都要“按既定方針辦”。他們討論提綱時，說要“管世世代代”，現在的文章中說要管到“永遠”，意思是一樣的。

發難的號角成了滅亡的喪鐘

“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被認爲是“四人幫”行動的信號，觸發了政治地震。

10月4日早上7:00，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華國鋒在睡夢中被叫醒。李鑫遞上剛出版的當天的《光明日報》。華國鋒一看“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認爲“四人幫”要動手了，說“形勢相當緊張”。葉劍英也得到部下的報

告，說當天的《光明日報》上有異動。³⁵ 葉劍英把“梁效”的文章看作“四人幫”的篡黨奪權動員令。吳德參與了抓“四人幫”的密謀。他的回憶錄中說，他們注意到了：“10月4日，《光明日報》發表《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不點名地稱華國鋒是修正主義頭子，更表明了‘四人幫’已決意將華國鋒等人打倒，是他們開始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行動的信號。”³⁶ 主持軍委工作的陳錫聯也將《光明日報》的文章拿給華看，說“這是一個信號”。

中共中央發出的1976年第16號文件就是這樣認定的：“10月4日，他們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用‘梁效’名義寫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反黨文章，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這就清楚地表明，他們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的密謀已定，本來準備在10月9日毛主席去世一個月的忌日之後，動手抓“四人幫”。看了“梁效”的文章，既然“他們加快了步伐”，老謀深算的葉劍英提出要“以快打慢”，決定提前抓捕。所以，“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作為“四人幫”的行動信號，變成了抓“四人幫”的行動信號。

從9月12日開始，遲、謝在北大、清華，姚文元在全國，極力煽動群眾給江青寫“效忠信”“勸進書”。耿飈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們的行動方案是在上海等地組織群眾遊行，直逼北京，擁戴江青上位。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這柄偽造

³⁵ 葉永烈：《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58~5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2012年9月。

³⁶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234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志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臺，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帶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制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

我聽他這麼說，一方面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³⁷

華國鋒交給耿飈的“任務”是在抓“四人幫”後立即接管廣播事業局。

“梁效”的文章，意在把華國鋒拉下馬，為江青騰出位置。“四人幫”手中還有一篇“梁效”的文章，題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勇往直前》，經姚文元三次審改，預定于10月8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見報。這是《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續篇。只是遲了兩天，未及出世，就胎死腹中了。“梁效”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文章共寫了7篇，還有5篇當然也永無出頭之日了。其中，《鄧小平路線是林彪路線的繼續》極為惡毒，這又是“尖刀班”范達人、何芳川、陳先達的作品。文中說：“我們戰勝了鄧小平修正主義路

³⁷ 耿飈：《耿飈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8月。又見葉永烈：《鄧小平改變中國——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59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北京）華夏出版社聯合出版，2012年9月。

綫。……但是鬥爭並沒有結束。究竟是執行還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的鬥爭，將會是長期的。”他們把自以爲得意之筆再次宣揚：“當一條錯誤路綫受到批判和清算時，一些新的機會主義路綫頭子，就會以正確路綫代表者自居，在反對錯誤路綫的幌子下，繼續推行同一條路綫。”³⁸ 他們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批判和清算鄧小平修正主義路綫時，又出現了新的機會主義路綫頭子，在反對錯誤路綫的幌子下，繼續推行同一條路綫。

中南海的懷仁堂之變

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在進行密謀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時候，討論過解決的辦法，無非是兩種：一是把人抓起來；二是通過投票解除職務。李先念問道：“你們知道赫魯曉夫是怎樣上臺的嗎？”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是少數；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是多數，他們決定撤赫魯曉夫的職。赫魯曉夫藉助朱可夫，開軍用飛機把中央委員從各地接到莫斯科，在中央委員會上赫魯曉夫成了多數，推翻了主席團的決議，反過來把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打成“反黨集團”。華國鋒等人分析，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有把握，“四人幫”只有四張半票，除了他們自己的四張票，頂多還有吳桂賢會投他們的票，但吳是候補委員，只能算半張。在中央委員會投票我們沒有把握，十大產生的中央委員擠進了不少造反派。結論：只有抓人才是穩妥的辦法。³⁹ 政變的主要決策者是華國鋒、葉劍英，實際操作者是汪東興。江青與汪東興的矛盾，類似中國歷史上的外戚與宦官。⁴⁰

³⁸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³⁹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237~239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⁴⁰ 1979年初的理論務虛會上，批判“凡是”派的時候，呂正操罵汪東興是“那個太監頭子”。

1976年10月6日晚上8點，中南海發生懷仁堂之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設局把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抓了起來。

江青被抓，不是在懷仁堂，而是在她的住地，由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執行。事先，江青說過，她是有準備的。一個星期前，她在清華大學分校的公眾場合說：“他們要暗殺我，軟禁我。”“他們綁架過我一次，我準備被綁架第二次，我帶了一把剪刀。”她將隨身攜帶的那把剪刀拿出來晃了一晃，那是一把長七八寸的手術剪刀。江青不願為演員，演得很逼真；不過，真正事到臨頭，又不演了。她並沒有拿出剪刀來，而是乖乖地就范了。傳說江青曾在地上打滾，大喊大叫，抗拒拘捕等等，這純粹是民間文學。江青還說過：“他們想弄死我，又怕弄死我對他們不利。我不願意死，我要活，活著跟他們鬥。”⁴¹聲稱“不願意死”“活著跟他們鬥”的江青，最後還是在囚禁中自己“弄死”自己了。

毛遠新住在江青附近。汪東興對張耀祠發指示：“你順便把毛遠新也一起解決！”⁴²

這幾個人，暫時關押在中南海的地下室。

解決“四人幫”問題，所謂“一舉粉碎”，大約只費了不到一小時。與此同時，“四人幫”手下的幹將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總工會）等被一網打盡。這些人被關押在北京衛戍區。

粉碎“四人幫”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實際操作過程似乎並無驚心動魄的故事。

10月6日晚10時至翌日早5時，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在玉泉山開會，一致同意對江青等人採取的措施，順利通過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不放一槍，沒流一滴血，解

⁴¹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五《江青在清華大學的言論摘錄》，1976年11月8日。

⁴² 毛遠新和“四人幫”一起被抓，但沒有一起受審。關了10年，到1986年，才由軍事法庭審理，判處徒刑17年，自關押之日起算起。刑期執行了13年，保外就醫。出獄後的毛遠新，改名李實，表示他繼續追隨江青。江青原名李雲鶴。

決了“四人幫”問題，掃除了中國歷史前進的障礙。但此舉與黨內程序有所不合。⁴³ 是不是有更好的辦法？其實，“把人抓起來”和“通過投票解除職務”這兩個辦法可以結合起來。召開中央委員會沒有把握，可以先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毛主席交代的“解決四人幫問題”，由多數人做出決定，對“四人幫”進行審查；然後，押出會場，把人關起來。事後召開的政治局會議，為什麼不能事先召開？這樣做，雖然程序不完整，總還是進入了程序，比赤裸裸的抓人要好。

陳雲說“下不為例”。之後兩任黨的總書記的更迭，依然是違反黨內程序的；而陳雲都是非程序性更迭的積極推動者、參與者，他說的“下不為例”，自己就不遵守。非程序性更迭開了頭，是很難糾正的。

把“四人幫”抓起來後，宣佈他們是“王、張、江、姚反黨集團”。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時，定性為“江青反革命集團”。

10月7日，華國鋒向各省市、各軍區和中央各部委負責人分批“打招呼”，消息既不見諸報刊，也不向下傳達。葉劍英想學毛澤東處理林彪事件的方式，將粉碎“四人幫”的消息保密兩個月。但禁不住小道消息的傳播。粉碎“四人幫”用的是特殊手段，消息的傳遞也是經由特殊渠道。小道消息都是私相授受，只通向政治態度相同的人。街頭巷尾常見三三兩兩的人竊竊私議，夜幕降臨則到處串門。真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那些“梁效”的成員、“批鄧”的積極分子、“四人幫”的追隨者却得不到半點消息。“梁效”的范達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說：“1976年10月10日晚，京城許多消息靈通人士正在家中或餐館與親朋好友開懷暢飲，歡慶‘四人幫’覆亡，而我却對外

⁴³ 萬里在一次講話中透露：“在處理‘四人幫’過程中，黨的秘密情報機關起到了特殊作用，難以說明、又不可缺少的作用，老帥要利用自己的親屬與情報機關作溝通，打招呼。這一事實被隱瞞了整整32年。誰承擔這種隱瞞的責任？一個執政黨的領導人運用親屬、情報機關、軍隊的力量來解決黨內糾紛，這種‘下不為例’的事情，真的下不為例了嗎？”（《萬里給歷史留下的見證書》，人民報網站。）究竟如何利用情報機關來解決黨內糾紛？還是語焉不詳。

界變化懵然無知，仍像往常一樣，從家返回‘梁效’駐地。……因為‘梁效’早有規定，星期日晚上，大家定要返回大批判組。”⁴⁴他沒有料到，這一“返回”竟是自投羅網。

夜半“梁效”遭查封

10月8日早上，我照例騎自行車到哲學系去“上班”，行至未名湖，有人叫停，說：“我正要到你家去，報告一個驚人消息。中央出了‘四人幫’，那四個人被抓起來了。”從“反擊右傾翻案風”以來，我成了“大辯論”的對象，“靠邊站”已將近一年。“上班”是工宣隊對我的懲罰，教師本來是不上班的。聽到這個消息，我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自我解放：“老子不去上班了。”掉轉車頭，打道回府。晚上，我到燕南園56號周培源家。

自從王連龍點名，北大“批鄧”，只有周培源和我兩個人不表態，我故意迴避與周老的來往，免得被人抓住辯子：“串聯！”現在好了，一切都不在乎了。周老與家人正在客廳談論“四人幫”。我們核對信息來源。我的消息朋友說來自北京軍區，他們的消息來自總政。周老說：“那就是確實的了。”10月6日晚上動手，10月7日華國鋒分批“打招呼”，10月8日就傳到我們的耳朵裏，消息擴散得很快。後來得知，鄧小平、胡耀邦也是在這天上午才得到消息，那是葉劍英派他的兒子葉選寧去他們兩家通報的。我們在北京算是消息靈通人士了。

我說，這一抓，抓得及時，否則“四人幫”又要鬧事了。周老問：“有根據嗎？”周老是科學家，又是社會活動家。他常說：“我們要以搞科學的態度來搞政治。”凡事總愛問：“有根據嗎？”這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我說，根據就是《光明日報》10月4日頭版頭條“梁效”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他說：“我怎

⁴⁴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1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麼沒有看出問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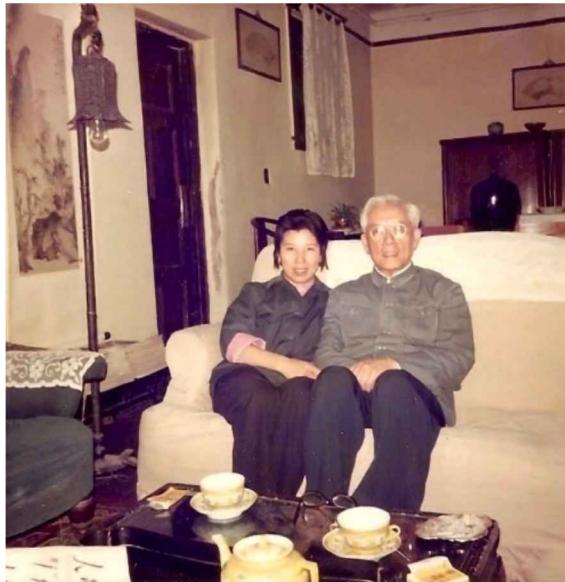
他走進書房，拿出這一天的報紙。

我將“梁效”的文章邊讀邊議，特別指出一個地方：“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我說：“這裏說的是‘修正主義頭子’，還不是‘修正主義分子’。究竟指的是誰？是鄧小平嗎？顯然不是，鄧小平早已被打倒了。在‘修正主義頭子’前面還加上‘任何’一詞，當然是在鄧小平之外另有所指。而且文章中還說，這樣的‘修正主義頭子’就在‘人民面前’，就差把華國鋒的名字點出來了。他們又要製造新的事端，抓就在人民面前的‘修正主義頭子’了。”周老連連點頭，說：“快把你的意見寫出來，讓大家知道。”是的，我要寫文章了。

10月9日，傳達中共中央十五號文件《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還有兩個決定：一個是保存毛澤東遺體，建立毛主席紀念堂；一個是儘快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並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傳達後討論，折騰了一整天。

10月10日是星期日，我坐下來寫文章，題目是《“四人幫”的反革命動員令——評“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

文革中，我對那種“大批判”的惡劣文風極為反感。流行的觀點我不願寫、也不會寫，自己的見解又不能寫。在那個年代，寫在日記本上的話都可以成為“反革命”罪證。最好的辦法就是什麼都不寫，



周培源家。周培源與三女兒如玲，1977年

既是自衛，也是抗議。擱筆罷寫，不發一文，已有 10 年之久。有時懷疑自己，還會不會寫文章？一旦臨到有話非講不可的時候，文章却寫得飛快，一天完成 6000 字。

晚上 11 點 45 分，文章剛寫完，忽聽得一隊汽車疾駛而來。我知道，有好戲了，連忙下樓，看個究竟。

那時，我住在北大朗潤園 10 公寓。那車隊直奔“梁效”的據點——北招待所，門口立即由持槍的士兵站崗。這一回，是不准裏面的人出來。

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以後，朗潤園的居民組織起來，每天晚上輪流值班巡邏。今晚的巡邏人員停止了脚步，和我一起站在湖邊的一棵樹下，又來了十幾個和我一樣睡不著覺的人。夜已深，悄無聲，我們這一群人瞪大了眼睛，在注視樓裏的動靜。先是看到大部分房間已熄燈，大概“梁效”們早就墮入夢鄉；隨後一個一個房間都亮了起來。裏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不知。守候到 10 月 11 日凌晨 1 時 45 分，只見解放軍押著一隊人馬從大門裏面走出來，爲首的是“梁效”的頭頭李家寬。他們手裏拿著毛巾、牙刷之類，一個個耷拉著腦袋，成了喪家之犬。昔日威風何處尋？我們這一群人看熱鬧的人，有人指指點點數人頭，有人向他們發出噓聲，有人鼓掌，夾道歡送。這一隊人馬，走出招待所，走出朗潤園，走入黑暗中……我們這一群人，成了“梁效”覆滅的見證人。還有“梁效”的自證，“梁效”成員范達人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我們就這樣灰溜溜地被押出了‘梁效’的駐地。……我們走出這座灰色大樓時，附近已有許多人在圍觀，有的人還在指指點點地議論著，頗爲高興。”⁴⁵

事後瞭解，這是根據中央的命令，由北京衛戍區對“梁效”進行查封。

“梁效”的據點被搗毀了！“梁效”式的大批判終結了！⁴⁶“梁

⁴⁵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2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⁴⁶ “梁效”發表的最後一個作品是《批判〈論總綱〉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卑劣手法》，見於“四人幫”被抓的次日，1976 年 10 月 7 日的《光明日報》。《論

效”背後的導演“四人幫”下臺了！！“梁效”和“四人幫”表演的舞臺文化大革命閉幕了！！！

在政治賭博中押寶的人，心裏也不踏實。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一夥叫嚷“要迎接更大的風浪”。1976年9月17日上午，遲群送交李家寬、宋柏年一封親筆信，要“梁效”突擊搞兩個材料：一是馬、恩、列、斯處於少數、形勢困難時期是如何堅持鬥爭的；一是毛主席處於少數、形勢困難是如何堅持鬥爭的。有人問：“搞這兩個材料幹什麼用？”李家寬也不知道幹什麼用，只說“按條子上說的辦”。第一個材料，17日當晚交稿；第二個材料，19日交稿。⁴⁷ 因而范達人說：“對於國內局勢的動蕩，已有一定的思想準備，但是，事變來得如此之快，卻是我始料未及的。”⁴⁸ “梁效”的成員葉朗曾私下對哲學系的同事講：“說不定一覺醒來，門口被坦克包圍……。”不幸而言中，不過無須坦克，幾輛吉普車足矣。上海“羅思鼎”的頭頭說：“我們所幹的事，現在說出去，現在殺頭，將來說出去，將來殺頭。”⁴⁹ 謝靜宜表示：“有人說，二十年以後，要把我們倆倒吊在天安門，我們不怕。”遲群接著說：“我是隨時準備犧牲的，……要有精神準備，倒掛在天安門上。”⁵⁰ 可見，他們知道自己做的事是見不得人、不容於法的。不過，“坦克包圍”“說出去殺頭”“倒掛在天安門上”等等未免言過其實，這叫作“賊人心虛”。“羅思鼎”的頭頭、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朱永嘉，坐了10年牢；“梁效”的頭頭李家寬、宋柏年，骨幹分子中的頑固分子范達人、楊克明，分別在北京衛戍區和北京看守所被關押了一年。這些人出來之後

總綱》是鄧小平授意寫作的。

⁴⁷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5頁，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⁴⁸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4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⁴⁹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增訂本），361頁，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⁵⁰ 《歷史的審判》（續集），56頁，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又都是一條好漢。遲群被判了 18 年徒刑，51 歲死於癌症。至於“殺頭”“倒掛”，未之聞也。

“梁效”的查封證實了傳說中“四人幫”被抓起來的消息。白天，朗潤園熱鬧起來了，“山陰道上應接不暇”，行人、車輛絡繹不絕。“梁效”的查封，人心大快，紛紛到北招待所探個究竟，親自驗證一下。一連數日，可以見到這樣滑稽的情形：有人騎自行車匆匆而來，行至北招待所，見到解放軍士兵把門，或是大叫一聲，或是拳頭沖天，來個急轉彎，飛快而去，向別人報告好消息去了。“批林批孔”“批鄧”的時候，北京市各單位都紛紛到北大來，向“梁效”朝聖取經；現在他們又來了，是為“梁效”送葬。

“梁效”的覆滅證明“四人幫”垮臺的消息確實可靠。人們用各種方式表示慶祝，放鞭炮、痛飲慶功酒等，還有一種慶祝方式是吃螃蟹。那一年，上市的螃蟹特別多。顧客們一定要買三隻公的、一隻母的。開始，售貨員困惑莫解：“你們怎麼啦？現在這個季節正是吃圓臍的時候呀！”後來得知其中奧秘，興高采烈地應道：“好嘞，三隻公的、一隻母的，來啦！”有人在街上提了一串螃蟹，指指點點地說：“看你還能橫行到幾時？老子吃了你！”這是北京人的政治幽默。

第十二章

“梁效”的後事

“梁效”被查封後，中共北京市委決定，分頭審查“梁效”。
“梁效”據點中的材料，交“洪廣思”審查，當即裝麻袋用卡車運走；“梁效”人員的審查，由北大黨委負責。

“穆仁智審查黃世仁”

“洪廣思”本是“梁效”的跟班。讓“洪廣思”審查“梁效”，輿論嘩然，眾說等於讓《白毛女》中的狗腿子穆仁智審查主子黃世仁。下場如何，可想而知。事實上，中共北京市委和“洪廣思”一直沒有公佈審查的結果。

“洪廣思”是何來歷？1973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成立了一個人數不多的寫作班子。1974年5月，姚文元向吳德打招呼後，寫作組擴充至29人。在1973年8月至1976年9月的3年中，寫作小組以洪廣思及燕楓、余凡、薛侖等化名，在《人民日報》《北京日報》《北京文藝》《紅旗》雜誌等報刊上發表了68篇文章，出版了兩本小冊子。文章的內容，緊跟“梁效”，影射周恩來、攻擊鄧小平。文章的數量，隨著“四人幫”陰謀活動的加劇而日益增多。1974年和1975年全年，各發表20篇；而1976年前9個月，就發表了23篇，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8篇之多，比每期發表的“梁效”文章僅有一篇之差。

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洪廣思”配合“梁效”的《孔丘其人》，編寫了《孔丘的反動一生》小冊子。對著“梁效”鸚鵡學舌：“孔丘 71 歲時，……他當時生病躺在床上，還掙扎著爬起來，搖搖晃晃去朝見魯君……。”將孔丘比附病中的周恩來。在《從宋江看投降派》（《人民文學》，1976 年第 2 期）中，說“宋江混入梁山後，千方百計架空以晁蓋為首的革命派，篡奪起義軍領導權”，販賣江青的所謂《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再一次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周恩來。

“洪廣思”在“批鄧”中大顯身手。1976 年 2 月，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追隨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吳德在會上講話，說：鄧小平“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猖狂地向無產階級發動全面進攻”“全面推行他的修正主義路線，妄圖復辟資本主義，改變黨和國家的顏色”。吳德還號召：“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把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批深批透。”。“洪廣思”前有“梁效”引路，後有吳德做靠山，膽大妄為，發表一篇“傑作”《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紅旗》雜誌，1976 年第 5 期），震驚全國。

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於 1977 年 2 月 7 日向市委的報告《關於寫作小組三年來發表文章的情況》中竟然說：“檢查結果，這些文章絕大部分是好的。”聲稱“洪廣思”的文章“沒有假借歷史攻擊中央領導同志”“沒有宣傳反經驗主義”“沒有撰文批判所謂三株大毒草”等“十個沒有”。中央宣傳口（當時“閻王殿”中宣部還沒有恢復）的負責人耿飈不止一次提到，不要再用“洪廣思”的名字了。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張鐵夫說：“洪廣思為什麼不能用？坐不改姓，行不更名！”“梁效”“羅思鼎”“唐曉文”統統歇業了，作為准“梁效”的“洪廣思”卻繼續行時，還發表了 20 多篇文章。那篇《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遭到廣大群眾的問責。“洪廣思”又以“仲之晨”的化名發表了一篇《花樣翻新的搗鬼術》（《北京日報》，1977 年 5 月 28 日），推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一文“完全是由反動文痞姚文元和他在《紅旗》雜誌的那個忠實追隨者一手炮製出籠，爾後強加給作者的”。廣大群眾不是好糊弄的，人們對“洪廣思”及背後的北京市

委，議論紛紛，強烈不滿。¹ 曾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劉導生，在回憶錄《從容憶往》中說，1978年12月，他調往北京市委工作，注意到“洪廣思”。“雖然文革已經結束兩年多了，全國的揭批查也搞了很久了，但在這裏一直沒有觸動過。”他指出，是“那個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捂蓋子。² 捂蓋子的“那個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就是吳德。

中共北京市委及其主要負責人吳德是“洪廣思”的保護傘。早在1977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工作會議上，與會者批評市委和“洪廣思”，時任市委書記的丁國鈺回應道：“這是逼我們檢討。去年謝靜宜那個臭娘們逼我們檢討，現在又有人逼我們檢討，我們就是不檢討；檢討這口子不能開，一開就堵不住，就沒法收拾了。要堅決頂住！”丁國鈺當過駐外大使，沒想到如此缺乏教養。市委工作會議上，群起而攻之。後來吳德承認：“國鈺同志講的話，是我的意思，責任主要在我。”³

“洪廣思”非但沒有受到清查，還去清查“梁效”，以致鬧出“穆仁智”清查“黃世仁”的大笑話。爾後，“洪廣思”的骨幹分子重新梳妝打扮，粉墨登場，又成了要人、紅人、名人。徐惟誠（余心言）先後任北京市委副書記、中宣部常務副部長；李文海後任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校長、中紀委委員、中國史學會會長；馮其庸後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職，獲文化部“中華藝文獎”終身成就獎和中國人民大學吳玉章終身成就獎；羅國杰後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中國倫理學會會長；石仲泉後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批鄧”的時候，“洪廣思”發表《鄧小平是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罪魁禍首》《打倒陰謀家、野心家、死不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調門特高，轟動一時。後來，

¹ 《關於洪廣思及其錯誤文章的初步清查情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材料之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5日。

² 《東城史志》，2010年第3期。

³ 《關於洪廣思及其錯誤文章的初步清查情況》，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材料之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5日。

石仲泉又發表《鄧小平立下的“大功、大言、大德”》《當代中國的鄧小平理論》等，自打嘴巴，絲毫不臉紅。在這些人公開的履歷中，均隱去了“洪廣思”這一段。⁴

1978年8月5日，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北京市委常委的成員，華國鋒指出：

“吳德同志在粉碎‘四人幫’後，在揭批‘四人幫’這一段確有錯誤……一個被動接著一個被動，很不應該，不好理解。比如對兩校的清查很被動。兩校是‘四人幫’的黑據點，手伸向全國。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認真抓，直到中央發了言才抓，很不應該。”“再有洪廣思寫作班子問題，也沒有及時抓緊清查。”⁵後來，吳德調離北京市，市委的領導班子做了調整。

兩個“凡是”壓制對“四人幫”和“梁效”的揭發批判

吳德不僅壓制對“洪廣思”的揭發批判，而且是全面捂蓋子的兩個“凡是”的炮製者之一。1976年10月，抓了“四人幫”才半個多月，華國鋒同宣傳部門的負責人談話時，做出四點指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凡是毛主席講過的、點過頭的，都不要批評。”11月18日，汪東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他的“凡是”就多了，“凡是毛主席決定的”“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看過的”“凡是毛主席畫了圈的”以至于“凡是毛主席說的、寫的，一個字也不能動”。11月30日，兼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吳德在四屆人大常委會上說：“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凡是毛主席肯定的，我們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他們用不同的語言重複同樣的方針。但吳德最先歸納為兩個“凡是”，既不是華國鋒的一個“凡是”，也不是汪東興的多個“凡是”。1977年2月7日，“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

⁴ 可查百度百科相關條目。

⁵ 《中央政治局接見北京市委常委時的重要指示精神傳達提綱》（絕密），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1日印。

綱》將兩個“凡是”規範化，昭告天下：“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兩個“凡是”，就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政變集團在“一舉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方針大計，企圖藉助毛澤東的亡靈穩住陣腳，鞏固權力。

“凡是”派本來就是和“四人幫”坐在同一條板凳上、走在同一條路線上，只因為“四人幫”帽子亂飛、棍子胡掄，對他們也有威脅。他們聯合起來，把“四人幫”解決了。華國鋒一再強調“四人幫”的要害是“篡黨奪權”，即妨礙了他們掌權，而不是禍國殃民的路線。所以他們剝奪了“四人幫”的大權之後，依然執行沒有“四人幫”的“四人幫”路線。1976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在首都體育館18000人大會上傳達1976年16號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時，他離開文件擅自發揮：“在粉碎‘四人幫’以前把矛頭指向‘四人幫’也是錯誤的，那是分裂黨中央。”11月30日，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作為副委員長的吳德又講了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反‘四人幫’是錯誤的，那時他們還是中央領導，那是分裂黨中央！”吳德就是1976年4月5日在天安門廣場發表廣播演說、亮出鎮壓信號的那個人。當時他是和“四人幫”團結在一起，反對“分裂黨中央”的；粉碎“四人幫”以後，他的政治立場依然沒有改變。所以，在揭發批判“四人幫”和“梁效”時，“凡是”派，尤其是北京市委，與人民群眾處於對抗狀態。

審查“梁效”的三個階段

“梁效”的成員被趕出朗潤園後，集中到未名湖畔的才齋⁶接受審查。“梁效”的成員享有不同的待遇。大部分人，常駐“梁效”據點上班的，現在住到才齋“上班”；周一良、魏建功及不久前才加入的林庚是“走讀”，住在家裏，按時到“梁效”的據點上班，現在還

⁶ 原燕京大學在未名湖畔修建的宿舍樓的命名，稱為書齋的“齋”，按才、德、均、備、體、健、全排列。

是“走讀”，改到才齋“上班”；顧問馮友蘭是不上班的，現在還是不“上班”，“交哲學系批判”。

北京大學揭批“四人幫”的運動，受到北京市委和吳德的捂蓋子方針的壓制，對“梁效”的審查尤其艱難曲折。

1976年10月6日，抓了“四人幫”，次日，華國鋒分批召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負責人“打招呼”。北京市委書記丁國鈺向北大黨委書記王連龍傳達了華國鋒“打招呼”的內容，說：“遲群、謝靜宜參與反黨陰謀活動，現在已經到他們應該去的地方去了。”還說：“黨是相信你的，你沒有參與他們的陰謀活動，你還要主持北大的運動。”丁叮囑王，暫時不要傳達、不要擴散。受到市委信任的王連龍，當天就向黨委副書記魏銀秋通風報信，商量對策；然後召開黨委常委會傳達，但不通知常委周培源參加，並對常委、“梁效”的頭頭李家寬說：“大批判組的事情，你要準備準備！”10月10日深夜，查封“梁效”時，李家寬的辦公室裏連一個筆記本都沒有。顯然，他已作好“準備”。

我在10月10日寫了一篇批判“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文章，題為《“四人幫”的反革命動員令》，但無處發表。10月14日，新華社公佈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我想將文章用大字報貼出去，哲學系有14人簽名聯署。王連龍獲知大字報的內容，立即發指示：“大字報不許貼，要服從紀律，不服從就給處分。”與此同時，黨委把《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的炮製者范達人、何芳川、陳先達及兩校“大批判組”的頭頭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召集在一起，讓他們“共同回憶回憶寫作經過”，實際上是統一口徑，以便欺上瞞下。後來，葉劍英在一次會議上說，“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篡黨奪權的動員令”，口氣與我的文章題目差不多。王連龍派人來找我，趕快將文章拿到《新北大》校刊上去發表。他們又要以此來搶先表態了。

1976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科教組組長蕭英來北大傳達了市委的《關於北大當前運動的意見》（共有六條，故簡稱《六條》），開宗明義第一條就說：“向廣大群衆講清楚，北大是偉大領

袖毛主席抓的點。幾年來，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綫指引下，北大的廣大幹部、宣傳隊員和師生員工貫徹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對全市學校的鬥、批、改，教育革命和上層建築領域的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蕭英講話時，已經被查封的“梁效”的頭頭李家寬還坐在主席臺上，向群衆示威，引起強烈不滿。傳達了《六條》，原北大黨委負責人立即發表聲明：“市委的意見是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鼓勵。”他們在《六條》的“親切關懷和鼓勵”下，以頑固的立場、瘋狂的勁頭、卑劣的手法對抗群衆，破壞揭批“四人幫”和“梁效”的運動。

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條》是兩個“凡是”的標本，打著“毛主席抓的點”的旗號，捂住北大的蓋子。在應該為“四人幫”嚴密控制的北大唱挽歌的時候，中共北京市委却唱起了贊歌。同樣的《六條》，換了“北大”二字，也給了清華。清華默默地消受了，北大則強烈反對，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推翻《六條》的鬥爭。

“梁效”們借用兩個“凡是”進行頑抗，范達人等聲稱“梁效就是毛主席領導的”。對“梁效”的審查經歷了三個階段。

群眾要求對審查“梁效”的人進行審查

第一階段是原黨委領導的，北京市委一再要黨委書記王連龍“挺起腰桿，領導運動”。他們本來就是和“梁效”一夥的，究竟是審查還是包庇？黨委書記王連龍安排黨委副書記郭忠林主管審查“梁效”的學習班。他們根本不採取措施，“梁效”的成員在未名湖畔優哉悠哉，逍遙自在，給了他們訂立攻守同盟的充分機會。李家寬還叫嚷：“要把兩校大批判組黨支部建設成為堅強的戰鬥堡壘。”向誰戰鬥？

周培源貼出大字報，題為《郭忠林應自動進學習班》。大字報揭露郭忠林自稱是“江青派”，以及其他種種劣跡；指出：他非但沒有資格領導審查“梁效”的學習班，他自己就應該進學習班。周培源的行動得到廣大師生的響應，許多大字報表示堅決支持。

郭忠林進了學習班。另一位黨委副書記馬石江成為梁效專案組的

負責人。但專案組中大多仍是原黨委賞識、依靠的對象，他們本人就是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在一次全校大會上，馬石江、吳岱峰介紹“梁效”專案進行情況。歷史系師生一連數次貼出大字報、大標語，要求將吳岱峰從專案組踢出去，回系“說清楚”⁷。哲學系要求參加梁效專案組的工宣隊隊員呂某回系“說清楚”與遲群的關係。黨委答復說，可以回去參加會議，不能回系，因為各系要揪的人有 13 個之多，都回去，專案組就散架了。可見參加專案組的都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後來哲學系通知呂某回去參加會議，黨委又說：不能每次會議都參加，一個星期只能參加一次，要不然，我們這裏走空了。群眾要求對審查“梁效”的人進行審查，黨委還百般保護。

在這個階段，“梁效”的成員有恃無恐，態度惡劣，百般狡辯。在全校的揭發批判大會上，宋柏年說：“江青講的批‘大儒’不是指周總理，而是指郭沫若。”范達人說：“《孔丘其人》影射的不是周恩來，而是李德生。”沒有人相信他們的說辭。

捂蓋子的方針和群眾的抗爭

經過群眾的揭發批判，與“四人幫”有牽連的原黨委書記王連龍，副書記魏銀秋、郭忠林，都進了學習班。黨委由另一副書記黃辛自主持工作，北京市委又先後派來聯絡組、工作隊。對“梁效”的審查進入第二階段。

由黃辛自主持的領導班子，與王連龍為首的領導班子不同，他們與“四人幫”沒有牽連。但他們忠實地執行北京市委的捂蓋子方針，強制貫徹體現兩個“凡是”的《六條》。

北京市委強力壓制反《六條》的北大群眾運動。市委書記吳德說，要派 1 萬名工人，開進北大，進行辯論。北大的群眾毫不示弱，有大字報責問：“是否還要帶上棍棒？”意思是，難道重演四五運動

⁷ “說清楚”是當時的政治術語，意為“與‘四人幫’有牽連的人和事”必須向群眾“說清楚”。

天安門廣場的場面？

另一方面，北京市委對審查對象、批判對象溫情脈脈。審查“梁效”的專案組，也直接受到北京市委的影響。1976年12月下旬，北京市委開會揭發批判謝靜宜。幾位負責人發言說：“你還年輕，我們想拉你”“希望你回頭”“希望你好好揭發‘四人幫’”等等。好言相勸，謝靜宜越發氣焰囂張，甚至當場譏笑他們的發言。馬石江參加了這次會議。回校後，他當天就向專案組傳達了“新精神”，並且在“梁效”成員和專案組人員聯合開會時講了話。他學著北京市委負責人的腔調，對“梁效”的成員說：“我請你們好好清理思想。”他的講話充滿了溫情。“梁效”的審查尚無結果，他卻宣佈解放“梁效”的9名成員。由於專案組部分成員的抵制和各系群眾的反對，不接受這9人回系，只好不了了之。

一方面是《六條》的壓制，另一方面是群眾的抗爭，北京大學揭批“四人幫”和“梁效”的運動呈現幾次起伏。到了1977年8月，運動已經停頓，學校陷於癱瘓，北大走進了死胡同。當時北大流行一個段子：“北大的特色是什麼？一個博雅塔，一個未名湖，還有一個新建的圖書館；加起來是一塔湖圖（一塌糊塗）”。

1977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幫”一週年之際，北大又一次掀起大字報高潮。哲學系、中文系、法律系、經濟系、歷史系、數學系、化學系、生物系、地球物理系、研究所、圖書館、制藥廠12個單位的“運動領導小組”組長（或總支書記）聯名，帶頭貼出大字報：《評中共北京市委的〈六條〉》。大字報指出：

圍繞著《六條》所展開的爭論，實質上就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要不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對於有些人來說，把王張江姚抓起來，他們是贊成的。因為“四人幫”太壞了，帽子亂飛，棍子胡掄，對他們也有威脅。但是，要清算王張江姚所代表的那條路線，他們就不高興、不積極、不贊成了。因為過去他們走斜了，臀部也有那條路線的印記。有的願意亮出來，擦一擦；有的不願意、也不願擦，遮遮蓋蓋，躲躲閃閃，老是被動。

北大運動的轉機必須從清算《六條》的錯誤開始。

值得注意的是，在《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之前 7 個多月，這篇大字報就運用真理標準的武器來反對兩個“凡是”了。

真理是主觀和客觀的一致，不是和什麼人的指示一致。無論什麼人的看法，不符合客觀實際就是謬誤。北京市委的《六條》不符合客觀實際，歸結到一點，就是經不起實踐的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不管權力多大、嗓門多高，都不可能強迫實踐通過錯誤的意見；犯了錯誤，不管態度多滑、手法多妙，也不可能逃脫實踐對錯誤的判決。

接著，各系都貼出長篇大字報，其中產生重大影響的有：

國際政治系部分教師：《運動要總結，市委要檢討，黨委要改組》《運動周年備忘錄》；

經濟系石世奇等 48 名教師：《蓋子終究是捂不住的》；

數學系部分教師：《市委負責同志要“辯論”什麼？》；

法律系教工：《是貫徹中央精神，還是另搞一套？》；

歷史系魏杞文等 50 多名教師：《北大一年》；

中文系部分教師：《為清理北大運動提 17 個問題》；

哲學系“運動領導小組”：《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必須認真清查》《中共北京市委緊跟清華、北大搞“點名批鄧”的內幕必須揭開》；等等。

按照 1957 年的標準，這些都是反對黨委、反對市委的“反黨”大字報，此前還有一些明目張膽的“反黨”大字報，如：哲學系郭羅基等 14 名教師貼出的大字報，題為《北京大學的現狀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致中共北京市委的公開信》，指出：北大不死不活的現狀，根子在於北京市委的《六條》（1976 年 11 月 30 日）；歷史系教師魏杞文等 22 人貼出的大字報《論北大運動的右傾》，指出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對北大問題的性質做了顛倒的估計，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害怕群衆的右傾頑症（1976 年 12 月 1 日）；哲學系郭羅基等 46 人貼出的大字報《北大要堅決整頓》，主張北大黨委要從組織上整頓

(1977年3月15日),“整頓”是鄧小平的口號,以此為題,兼有呼喚鄧小平出來工作之意;中文系漢語專業教師貼出的大字報《穩妥在何方?健康在何方?》,駁斥北京市委和北大黨委關於北大運動“穩妥”和“健康”的說法(1977年3月20日);中文系費振剛等22名黨員教師貼出的大字報《莫道浮雲能蔽日,定喚東風掃殘雲》,指出北大黨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1977年3月30日);歷史系魏杞文等40多名教師貼出的大字報,題為《不怕“四人幫”,就怕幫“四人”》,尖銳地批評了北大的領導推行了一條機會主義路線,實際是幫“四人”(1977年8月9日);署名“數學系教師”的大字報,題為《民心不可侮,民意不能違》,批評黨委負責人黃辛白辜負了民心和民意(1977年8月11日);中文系黨員教師費振剛等貼出的大字報,題為《是認真檢討,還是欺騙群衆?》,批評北京市委主要負責同志吳德在市委擴大會議上的檢討缺乏誠意,很不像樣(1977年9月26日)。

這些大字報的作者,在1957年必是極右分子無疑。時代不同了,結果也不同,恰似洛陽少年賈誼在《過秦論》中所說:“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20年後,北大的政治反對派為1957年的右派分子進行報復,開展了一場反對黨委、反對市委的民主運動,居然反成功了。

大字報是群眾手裏的唯一武器,而且是銳利武器。中國沒有新聞出版自由,人民缺乏公共輿論平臺,有話無處講,只能牆上見。因為沒有言論自由,才逼出大字報。那年頭,白天黑夜在五顏六色的大字報前昂首閱讀、低頭抄寫,又或議論紛紛乃至群情洶洶,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揭批“四人幫”和“梁效”,顯示了大字報的威力。可惜,這些言論鏗鏘、擲地有聲的大字報,空留題目,沒有收錄匯集成冊。後來人恐怕很難想像它的威力,怎麼會使那些手握大權,以“偉大、光榮、正確”自居的人們垂頭檢討。

鄧小平在1978年11月7日接見日本民社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針對西單民主牆是支持群眾貼大字報的,他說:“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人

民日報》，1978年11月28日。到了1980年，揭批“四人幫”、批評“凡是”派，都已成爲過去，他就擔心大字報針對自己了。鄧小平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提出，要取消“四大”——《憲法》第45條，規定“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1980年4月8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4次會議，通過《關於修改憲法第45條的議案》，取消了“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本來，“四大”寫入憲法是多餘的，只要保障公民的各項自由權就行了；取消“四大”，不過從憲法中刪去了多餘的詞句，並沒有改變公民權的實質。即使從憲法中取消了這些規定，也只是意味不受憲法保護，沒有禁止“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規定，但從此貼大字報卻被視爲違法，予以追究。這是違反法治原則的，法律沒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以做。現在好了，有了互聯網，紙質大字報退出歷史舞臺了，空中電子大字報隨便貼。“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出現了新事物“擋火牆”“網絡警察”，言論依然受管制。

當時在校的是工農兵學員，他們的任務是“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他們是“四人幫”請來的，上大學是爲了“管”教師、“改”教師，對於揭批“四人幫”的運動袖手旁觀。北大歷來是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北大沒有學生運動，只有教師運動。北大的教師們苦鬥了一年，迫使中共北京市委不得不承認錯誤，撤銷了《六條》，市委工作隊撤出北大，北大黨委也進行了改組，執行摺蓋子方針的負責人黃辛白調離北大。

從批判“梁效”入手打翻身仗

1977年11月10日，北大全校1萬多人在首都體育館召開了“深入揭批‘四人幫’動員大會”（一年以後又重新動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大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他說：

我受華主席、鄧副主席和黨中央的委托來參加今天的大會。

多年來，“四人幫”及其黨羽遲群、謝靜宜之流嚴密控制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設立反革命據點，結成資產階級幫派，指揮御用工具“兩校大批判組”，大造反革命輿論，插手許多部門和地方，遼海兩校一綫穿，勾結在一起，進行篡黨竊國的陰謀活動，搞得全國不得安寧。他們還瘋狂地打擊和迫害廣大革命師生員工，把教育革命糟蹋得不成樣子。

這一段話，正確說明了北大問題的性質，否定了北京市委的《六條》。他還針對北京市委的捂蓋子方針，強調：

必須放手發動群眾，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依靠群眾的大多數，而不能相反的來束縛群眾，壓制群眾的革命積極性。

他代表黨中央對北大群衆的革命精神做了高度的評價：

一年多來，你們不屈不撓地進行鬥爭，表現出要把揭批“四人幫”的鬥爭進行到底這樣一種頑強的革命精神，這是難能可貴的。

倪志福代表中共北京市委發言，他說：

市委對北大揭批“四人幫”的運動抓得不緊、領導不力，使北大的運動發展緩慢，群眾發動得不夠充分，革命大批判的聲勢不大，清查工作進展不快。

他對市委在北大捂蓋子的後果，說得比較輕描淡寫，但抓住了“主要原因”：

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一是當時我們市委對“四人幫”通過遲群、謝靜宜及王、魏、郭、李、宋一夥嚴密控制北大，搞資產階級幫派體系，進行反革命陰謀活動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二是我們市委在指導思想上有錯誤。……還在12月6日北大黨委匯報時肯定了《六條》。

倪志福承認，市委指導思想的錯誤體現在《六條》中。對一年中北大的群眾反對《六條》、批評市委被指責為“嚴重干擾”，市委屢屢“排除干擾”，倪志福代表市委終於改變了態度。

北大的同志們從關心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出發，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提出了不少批評和意見。這對於我們提高認識，改進工作，都是有好處的。今天，我在這裏代表市委向大家表示誠懇接受，我們希望同志們今後對市委的工作繼續提出批評和建議。

這次大會扭轉了局面，重新點燃了北大革命群衆的熱情之火。鄧小平副主席指示：“北大要以批判‘梁效’為突破口，打翻身仗。”大會以後，批“梁效”、揭幫派體系，聲勢浩大。審查“梁效”進入了第三階段。

原黨委幫派體系的“領導”和北京市委的《六條》，耽誤了一年多，1977年11月才真正進入審查“梁效”的階段。梁效專案組也加緊工作。

11月22日和29日，北大中文、歷史、哲學、經濟、法律5個系聯合舉行批判“梁效”的兩次大會。12月29日，在首都體育館召開全校批判“梁效”大會。黨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周培源等在會上發言。會上宣布：經黨中央批准，已將控制“梁效”的“四人幫”干將遲群、謝靜宜逮捕審查；經市委批准，將“梁效”骨幹分子范達人、楊克明交公安機關監護審查。

審查“梁效”的結果

梁效專案組審查了“四人幫”對“梁效”的指示和遲群、謝靜宜的講話，共43次；還審查了“梁效”成員的揭發交代4000餘份；對於“梁效”曾控制的輿論陣地人民日報社、《紅旗》雜誌社、光明日報社、北京日報社進行了調查；又去外地，到上海、遼寧、山西大寨、天津小靳莊等“梁效”串聯、活動的地方進行了調查。

專案組把“梁效”的活動概括為“三倒一捧”（倒周、倒鄧、倒華，捧江），形成四個專題，寫出四份審查報告：

- 一，“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陰謀活動；
- 二，“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陰謀活動；
- 三，“兩校大批判組”打擊、陷害敬愛的鄧副主席的陰謀活動；
- 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臺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

1978年4月4日，北大黨委常委討論“梁效”的專案審查工作，確定“梁效”的性質是敵我矛盾，但其成員應區別對待：骨幹分子13人，一般成員12人，14人未定。

1978年8月，梁效專案組發出《梁效罪證材料》，這是審查的最後結果。從《梁效罪證材料》的目錄大體可以看出“梁效”和“四人幫”的關係及“梁效”的全部活動；也可以明瞭專案組審查的視角：

第一部分 “四人幫”直接操縱的反革命別動隊

一、江青稱梁效是她的班子

- (一) 江青稱梁效為“班子”給姚文元的信件
- (二) 江青稱“班子”的部分信件
- (三) 梁效成員孫靜的揭發

二、“四人幫”直接策劃指揮梁效的活動

- (一) 親筆批示，下達旨意
- (二) 親自召見，面授機宜
- (三) 通過遲謝，轉達授意
- (四) 提供資料，炮製炮彈
- (五) 梁效計劃，親自審批

三、梁效完成江青交辦的特殊使命

- (一) 為江青抓所謂“高級特務”
- (二) 替江青“抓點”

四、梁效充當江青的侍從、侍讀

- (一) 隨江青出巡
- (二) 紿江青講課
- (三) 紿江青在書上劃紅綫標重點
- (四) 紿江青存書、印書

五、充當“四人幫”幫派體系的聯絡站

- (一) 梁效與“四人幫”在遼寧、上海的死黨親信的反革命串聯
- (二) 梁效與“四人幫”在中央各部門及地方親信的反革命串聯
- (三) 收集整理信件，為“四人幫”提供反黨炮彈

六、江青精心豢養梁效，梁效發誓效忠江青

- (一) 江青以名利拉攏腐蝕梁效成員
- (二) 江青給梁效送書和冬瓜、茄子、小米
- (三) 在毛主席病重期間 1976 年 8 月 26 日，江青竄到梁效，眉開眼笑與梁效的頭頭和顧問一一合影
- (四) 梁效發誓效忠江青

第二部分 “四人幫”篡黨奪權的急先鋒

一、瘋狂對抗毛主席對“四人幫”的嚴厲批評，肆意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把罪惡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

- (一) 對抗毛主席對“四人幫”“形而上學猖獗”的批評
- (二) 對抗毛主席對“四人幫”搞反經驗主義的批評
- (三) 對抗毛主席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
- (四) 蓄意歪曲毛主席對《水滸》的評論，大肆宣揚“宋江架空晁蓋”“屏晁拉盧”，誣蔑攻擊周總理和鄧副主席
- (五) 攻擊毛主席關於各方面工作“要整頓”的指示，把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誣蔑為“謠言”
- (六) 姚文元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卑鄙伎倆

二、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

- (一) 江青授意梁效“揪大儒”“批宰相”，不批林，假批孔，批周公
- (二) 江青向梁效成員進行“路線交底”
- (三) 梁效炮製的部分攻擊周總理的反黨黑文影印件

(四) 炮製惡毒影射攻擊周總理的大毒草《孔丘其人》

(五) 炮製惡毒影射攻擊周總理的大毒草《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

(六) 炮製惡毒影射攻擊周總理的大毒草《讀〈鹽鐵論〉》

(七) 四屆人大前後，炮製批“因循守舊”反黨黑文，為“四人幫”陰謀組閣大造反革命輿論

(八) 大反經驗主義，攻擊周總理和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九) 炮製《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二)惡毒影射攻擊周總理

(十) 周總理逝世後，梁效繼續瘋狂反對周總理

三、瘋狂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

(一) 對抗毛主席關於任命華國鋒同志為代總理的提議，遲群、謝靜宜向梁效頭目進行所謂“路線交底”

(二) 炮製《再論孔丘其人》等反黨黑文，惡毒影射攻擊華主席

(三) 炮製“三本小冊子”，掀起反對華主席的黑風惡浪

(四) 編印五個外電材料，攻擊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

(五) 毛主席逝世以後，梁效突擊編寫在困難時期如何堅持鬥爭的兩個材料，妄圖為“四人幫”垂死掙扎壯膽打氣

(六) 毛主席逝世以後，梁效為“四人幫”炮製篡黨奪權動員令

四、打擊、誣陷敬愛的鄧副主席

(一) “四人幫”向梁效提供各種材料，親自下達黑指示，直接指揮梁效瘋狂打擊、誣陷鄧副主席

(二) 私印大批中央領導同志講話，作為“批鄧”材料

(三) 炮製大量反黨黑文，打擊、誣陷鄧副主席

(四) 炮製《言論摘編》等黑材料，打擊、誣陷鄧副主席

(五) 梁效與于會冰合夥炮製打擊、誣陷鄧副主席黑材料《關於文藝問題的右傾翻案言論摘編》

(六) 收集、整理從中央到地方的大批領導同志的黑材料，妄圖搞亂全國，亂中奪權

五、為“四人幫”上臺、為江青當“女皇”大造反革命輿論

(一) 江青端出呂后、武則天向梁效授意

(二) 梁效竭力吹捧呂后、武則天

- (三) 梁效為江青搜集古代服裝、髮型資料
- (四) 梁效宣揚“法家領導集團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反動謬論
- (五) 梁效為江青搜集“蘇聯教育史上兩場大辯論”材料
- (六) 梁效帶頭給江青寫“效忠信”

第三部分 “四人幫”的反動思想體系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加工廠”和“推銷店”

一、鼓吹“四人幫”的反革命政治綱領篡改黨的基本路線

- (一) 鼓吹所謂階級關係新變化，把老幹部打成走資派，列為革命對象
- (二) 鼓吹“黨內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
- (三) 鼓吹資產階級法權是黨內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
- (四) 炮製整套所謂“走資派活動規律和特點”的謬論
- (五) 篡改馬克思主義哲學，宣揚“同一切決裂”，鼓吹“對著幹”
- (六) 篡改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鼓吹所謂的“全面專政”

二、借批所謂“唯生產力論”“洋奴買辦”反對“四個現代化”的宏偉藍圖

- (一) 篡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鼓吹“上層建築決定論”
- (二)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叫囂要改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 (三) 攻擊實現“四個現代化”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 (四) 誣蔑抓生產是搞“唯生產力論”
- (五) 攻擊對外貿易是搞“洋奴買辦”
- (六) 誣蔑建立崗位責任制建立合理的規章制度，按勞分配，抓生產是“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

三、宣揚“兩個估計”，鼓吹“黑線專政論”，反對黨的“雙百”方針

- (一) 全面否定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線
- (二) 宣揚“兩個估計”鼓吹“同十七年對著幹”
- (三) 大批所謂“知識私有”“智育第一”，把政治與業務、紅

與專、理論與實踐、專業隊伍與工農群眾對立起來

(四) 反對黨的“雙百”方針，大搞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⁸

“四人幫”的動員令竟是“梁效”擅自發出的

梁效專案組審查的一個重點就是《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這篇文章的來頭。審查的結果，與《光明日報》工作組的結論一致，即並非出於“四人幫”的授意，而是《光明日報》主動約稿，“梁效”獨自完成。被認為是“四人幫”的“篡黨奪權的動員令”，竟是“梁效”擅自發出的。毛逝世後，“四人幫”及其幹將，口出狂言，虛張聲勢，有識之士均以為他們將採取大動作；哪知這是一批不足以成事的空談家。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不動聲色，暗中籌劃，手到擒來，這才是一批來事的人。昌平有個坦克六師，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常去活動。葉劍英注意上了。吳忠有準備，他說，坦克六師旁邊北京衛戍區駐有一個坦克團，有情況，可起作用。後來事實表明，這個坦克六師毫無問題。為預防北大、清華的學生鬧事，“在附近部署了相當的兵力，如果有人往外沖，無論如何要把他們堵回去”。結果，平安無事。⁹

在審查中，“梁效”們以為沒有接受“四人幫”的授意可以減輕罪責，其實更足以證明，他們身陷“四人幫”的泥潭何其之深。由於受“四人幫”長期的訓練，“梁效”的政治嗅覺是格外靈敏的。毛主席逝世以後，他們認為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是“多寫文章，拼命幹”的時候了。因此，“梁效”主動擔起論證“四人幫”的“按既定方針辦”的“國策”的重任。沒有“四人幫”的授意就能表達“四人幫”的意圖，不是完全與“四人幫”連為一體了嗎？“四人幫”是大腦，“梁效”是喉舌。“四人幫”的意圖已經內化為“梁效”的意

⁸ 《梁效罪證材料》，1~6頁，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⁹ 朱元石：《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232~245頁，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圖。“梁效”為什麼能講出“四人幫”的肺腑之言？因為他們頭腦中有一張和“四人幫”同樣的“藍圖”。他們說：“現在藍圖已經繪好，問題是要堅持按既定方針辦。”什麼“藍圖”？就是江青當主席，王洪文當委員長，張春橋當總理。文章炮製者之一、尖刀班成員何芳川在接受審查中交代：“這篇黑文兇惡地叫嚷‘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就是站在‘四人幫’立場上，替‘四人幫’發出的一個警告，這個警告的矛頭，是指向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¹⁰

對人的處理

在審查過程中，“梁效”的成員被分成六類：

一，秉承遲、謝的旨意，直接操縱者3人：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

二，炮製反黨文章和黑材料的組織者、主要執筆者10人：范達人、鍾哲明、湯一介、葉朗、楊克明、徐琳、孫靜、梁英明、胡經之、孫慶升；

三，炮製反黨文章和黑材料的其他執筆者7人：何芳川、陳先達、李潤海、趙齊平、鍾成勛、孫中原、馬栩泉；

四，沒有參與炮製反黨文章，但參與陰謀活動者3人：盧振義、郁龍餘、常文寶；

五，炮製反黨文章和各種材料的參與者13人

六，充當顧問和侍從，深受江青賞識者4人：馮友蘭、魏建功、周一良、田餘慶。¹¹

¹⁰ 何芳川的交代材料，1977年1月11日。關於原“兩校大批判組”成員何芳川的初步審查情況，“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7年9月22日。

¹¹ 北京大學黨委：《關於“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草稿），1978年3月13日。

最後對人的處理：

李家寬、宋柏年、王世敏屬“三種人”（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開除黨籍；（遲至 1983 年 1 月，經北京大學黨委討論決定、北京市委批准，給予李家寬、宋柏年留黨察看兩年處分，給予王世敏嚴重警告處分。）

范達人、鍾哲明犯有嚴重錯誤，給予黨內警告處分；

葉朗、楊克明犯一般錯誤，記錄在案；

湯一介、胡經之等組長一級成員犯一般性錯誤；

一般成員不予追究。

在審查過程中，曾由北京衛戍區將首分子李家寬、宋柏年拘留審查，由北京市公安局將骨幹分子范達人、楊克明監護審查。4 個人被關了一年多，說是“審查”，實際上是坐班房。當時還是延續文革的那一套，不經司法程序，由黨委決定就可以抓人、關人。“梁效”中人頗多怨言。周一良說“全套作法與‘文革’毫無不同，我說是‘以四人幫之道，還治梁效其身’”。¹² “四人幫”之道——“全面專政”“鬥爭哲學”，不是你們所熱衷鼓吹、大力推廣的嗎？不過是自食其果。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梁效”的審查，確有諸多局限：對“梁效”的批判，用的還是“梁效”式的“大批判”語言；衡量政治正確的標準，依然是維護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四人幫”和“梁效”的問題只是“另搞一套”而已。審查的結果不能說是成功的，除了一兩個人有某種表態外，大多沒有真誠悔悟。

馮友蘭的“解脫”

馮友蘭沒有被列入“梁效”專案組的審查對象，而是“交哲學系

¹²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75 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批判”。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在哲學系當家。¹³

我是“大批判”的受害者，對“大批判”深惡痛絕，當然不會再以“大批判”來害人。群眾要求批判馮友蘭，我拖著不辦。反正不會有人說我“包庇梁效”。

倒是馮友蘭本人，又耐不住了，適時表態是他的習性。1977年4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發行。5月4日，馮友蘭就交了一份題為《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批判》的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心得。（《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未記此事。）哲學系教師王永江、陳啟偉寫了一篇《評“梁效”某顧問》，對照馮友蘭吹捧江青的《詠史》詩，批判《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批判》，發表於《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5月7日，黨委統戰部將馮友蘭的心得報送北京市委。市委負責人丁國鈺、黃作珍、賈汀、徐運北大喜過望，紛紛作了批語，對馮友蘭進行表揚：一是批了江青，二是學了毛選第五卷。北京市委又將馮友蘭的心得報送黨中央。黨中央沒有表示。

北京市委負責人的這種態度，激怒了群眾。7月9日，哲學系中

¹³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的1977—1978年部分提到“郭羅基”每冠以“哲學系黨總支書記”的頭銜，誤。我在哲學系當家，但並非黨總支書記。哲學系的黨總支、革委會緊跟“四人幫”，維護“梁效”，群眾認為他們沒有資格領導揭批“四人幫”和“梁效”的運動，全系師生員工遂自發地選舉成立一個“運動領導小組”，由5人組成（3個教師是我、王貴秀、李真，一個學生楊永祺，一個幹部任寧芬），我被推舉為組長。哲學系歷來是北大的帶頭羊，而後繼哲學系成立“運動領導小組”的還有經濟系、法律系、數學系、化學系、生物系、制藥廠，共7個單位。在這7個單位，“運動領導小組”部分地奪了黨總支的權。黨總支不領導運動，但仍負責日常工作。因為黨總支、革委會講話沒人聽，一些並非“運動”的重大工作群眾也要求“運動領導小組”來領導。例如漲工資。1978年漲工資規定的指標是40%，不講道理、不講條件，個個單位都是40%！每個單位，人人都認為自己是屬於40%，那就成了100%，不好辦！哲學系的群眾對黨總支、革委會信不過，就請“運動領導小組”出馬。我在動員會上宣佈：“我是屬於60%，大家不要提名我。”我表了這個態，說話就能服眾。漲工資在別的系打破了頭，哲學系卻順利結束。黨委給予表揚，黨委副書記高鐵在校幹部會上宣佈：哲學系的三駕馬車由“運動領導小組”牽頭。粉碎“四人幫”以前，我靠邊站已經將近一年；粉碎“四人幫”以後，人稱“哲學系臨時政府首腦”。

國哲學史教研室、歐洲哲學史教研室黨支部貼出大字報，題為《“梁效”的顧問馮友蘭的問題必須徹底查清楚》。大字報認為，馮友蘭是“梁效”的顧問，在“批林批孔”中追隨江青、吹捧江青，起過惡劣的作用，江青也曾給予特殊關照。他是屬於“同‘四人幫’有牽連的人”，應當清查。群眾輿論支持這份大字報。

哲學系“運動領導小組”接受群眾的意見，定於 7 月 20 日下午召開全系大會，由“梁效”顧問馮友蘭“說清楚”。這一天的早上，北大黨委電告，下午的會不要開，馮友蘭的問題要請示北京市委。¹⁴

過了幾天，北大黨委向哲學系傳達北京市委的指示：關於馮友蘭的問題，第一步先開一次小型的會，背靠背地提意見。哲學系“運動領導小組”問：“第二步怎麼辦？”回答說：“還沒有考慮。”這就是北京市委的領導！

8 月 3 日上午，哲學系召開了背靠背的對馮友蘭提意見的會，有 10 多人參加，我把大字報的作者和對馮友蘭意見大的人都找來，讓他們出出氣。會上的發言很激烈，反正馮友蘭不在場，事後也沒有轉達。我隨即請示，第二步怎麼辦？直到 1978 年下半年，我離開哲學系到校長辦公室工作，市委一直未有答復。

馮友蘭本人卻缺乏自知之明。

1977 年 10 月 3 日，馮夫人任載坤因肺癌不治而逝。馮夫人曾與鄰居魏建功夫人門前私議，說：“解放以來經過多少次運動，心想這回跟著毛主席可跟對了，不想更錯！”兩位老太不勝唏噓。

馮友蘭撰挽聯，曰：

憶昔相追隨，同榮辱，共安危，期願望齊眉，黃泉碧落君先去；
從今無牽掛，斬名羈，破利鎖，俯仰無愧怍，海闊天空我自飛。

夫人離世，馮友蘭頓覺“無牽掛”，決心“斬名羈，破利鎖”。

¹⁴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 751 頁記載：“7 月 20 日，上午在哲學系教師會上‘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誤。事前曾通知馮友蘭（不是上午，而是下午），事實上這個會沒有開成。

在西南聯大流行一個段子：金岳霖與馮友蘭路遇，金問：“芝生（馮友蘭字），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天地境界了。”於是相對哈哈大笑，擦身而過。“天地境界”是馮友蘭設計的遠離“功利境界”的人生“最高境界”。現在他才承認，此前實際上是處於名羈利鎖的束縛之中，深陷“功利境界”。所謂“天地境界”，不僅是虛幻的，而且是欺人的。到了耄耋之年，馮總算有一點覺悟。

1977年10月下旬，馮友蘭要到外地走走，散散心。他來找我，要求批准。

我說：“你不在梁效專案組的審查範圍之內，行動是自由的，不必批准。你的愛人去世不久，要出去散散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到外地走走要考慮時機。現在對‘梁效’的審查還沒有結束。至今，系裏沒有開過一次關於你的批判會……”

他連忙說：“是是是，是是是……”

“群眾對‘梁效’的憤慨，恐怕你是估計不足的。到了外地，群眾自發地批鬥，怎麼辦？我們鞭長莫及。文革中群眾自發批鬥的場面，你應該記得的。”

最後，他說：“那那那，我推遲、我推遲。”¹⁵

1979年2月27日下午，馮友蘭在哲學系“說清楚”與“四人幫”的關係，中國哲學史教研室的全體教師和其他教研室的代表20多人參加，我正出席理論務虛會，如在北大也是應該參加的。關於吹捧江青，他是這樣說的：

《詠史廿五首》，其中有“則天敢於做皇帝，亘古反儒女英雄。”我當時的想法是：我過去幾十年尊儒。現在應該清算這種思

¹⁵ 《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1977年10月17日記載：“上午鍾璞往北大黨委統戰部問先生可否往南方旅遊，平秉權說還要商量。下午，電話問商量結果，統戰部要鍾璞去面談，由平秉權、郭羅基、秦錫瑜出面，說先生不能去南方旅遊。”（756頁）我沒有參加過這樣的面談，而且我從未見過馮鍾璞，每次去馮家，恰好她都不在。我與馮友蘭本人有過一次面談。我也沒有請示過黨委，不知道他們說馮友蘭不能去南方旅遊的理由是什麼。我沒有說不能，而是曉以形勢利害，馮友蘭本人表示願意推遲。

想，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歌頌歷史上的法家，表揚歷史上的前進革新人物。從反儒這一點看，武則天做皇帝和儒家的每一個教條都是相反的，所以要突出這一點。當時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野心，不知道她要借吹捧武則天為自己製造輿論。

這就是“影射史學”的妙用了。當時以孔丘影射周恩來，以武則天比附江青，彼此心照不宣。遲群說：“你看像誰就是誰。”他們沒有闢謠，沒有澄清，沒有說“不是誰”。等到追究的時候，就說“不是誰”了。批孔丘，不是影射周恩來；捧武則天，不是比附江青。

“當時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野心”——你能證明我知道嗎？

馮友蘭把自己說成天真幼稚的人。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第一份檢討——《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批判》中說：“因為‘四人幫’都是打著紅旗，自命為理論權威，當時有些問題自己也搞不清楚，只好人云亦云。”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幫云亦云”。這一次在會上馮又有類似的說法：

《詠史》那一組詩……其中有些論斷並不是出於我的研究的結果，而是照著“四人幫”的偽史學所規定的調子推演出來的。這是一個搞學術的人的大忌。作為一個學術工作者，本應堅持真理，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根據他從研究工作中得來的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眾論紛紜中各方面的參考。如果不能如此，國家人民又何必需要這種工作者？我得了這一次教訓，要永遠引以為戒。

幾十年“從研究工作得來的結果”是尊孔，一下子投入“批孔”。只說“是照著‘四人幫’的偽史學所規定的調子推演出來的”，這個教訓夠用嗎？

1979年2月，粉碎“四人幫”近兩年半，梁效專案組的工作也已經結束，時代氣氛不同了。會議的參加者客客氣氣地提了一些希望，馮友蘭的問題就算了結。8月，馮友蘭在家人的陪同下到黃山等地散心去了。

“梁效”分子有一點悔悟嗎？

“梁效”分子在辯解中總是說：“‘梁效’成員均由黨組織選調而來，個人無任何選擇權。”¹⁶問題在於這個“黨組織”就是“四人幫”的幫派體系，代表“四人幫”來“選調”的。更重要的是，北大、清華的四五千名教師中為何“選調”出你們這二三十人來？還不是你們符合“四人幫”的“選調”標準嗎？“梁效”成立之前，從清華始發，延至北大，開展了一場“反擊右傾回潮運動”，運動歷時3個月，遲群也叫它“三個月運動”。“梁效”的成員就是從“三個月運動”的積極分子中“選調”出來的，其中一些人，如范達人、葉朗、鍾哲明等本來就是“大批判”高手，被“黨組織”相中，絕非偶然。“選調”之後，態度也不相同，並非“個人無任何選擇權”。有的人就因為被認為“表現不好”，被踢出了“梁效”；堅持到最後，都是死心塌地的了。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因年老體衰，“梁效”命他回系，他却還要自動去上班。參加四屆人大的“梁效”分子馮友蘭、湯一介、范達人、王世敏，彈冠相慶，賦詩抒懷。馮友蘭詩云：“尊儒風未息，批孔戰方酣”“願奮一支筆，奔走在馬前”。哲學系同事王永江、陳啟偉評說：

江青愛騎馬，故“馬”字用得極見匠心，非拍馬有術者不能出此也。就是說，他甘心情願地當江青的馬前卒，死心塌地為江青率命驅馳了。¹⁷

甘當馬前卒的並非馮友蘭一人，他們完全出於自願，怎麼能說“個人無任何選擇權”？湯一介進“梁效”時，與孫長江商量。孫給他出主意：你爭取做後勤，不要寫文章。凡事靠後，不要朝前；每天做了什麼，都記下來。結果，湯一介不但寫文章，還主動向江青獻

¹⁶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30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15年後，又老調重彈，沒有一點長進，見范達人：《“梁效”的成立與終結》，《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

¹⁷ 王永江、陳啟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

題。凡事不是靠後，而是朝前。由於種種表現受到江青的賞識，贈書給他，還賜他一個全國人大代表當當。湯一介的所作所為與孫長江所建議的相反，這難道不是自覺的選擇嗎？周一良風頭正健時，他的妹夫、30 年代參加共產黨的老幹部對他說，一時出名未必是好事，勸他急流勇退。可以有別的選擇而他不選擇。

如是被動“選調”入“梁效”，一旦事情明瞭，應當深切悔悟吧？

周一良為范達人的回憶錄作序，只有兩句話：“《‘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一書，敘事真實確切可信。我認為可出版，應出版，以示人真實歷史，以正視聽。”¹⁸ 重要的是最後四個字，自己不懺悔，却要用他們公布的“事實”，“以正”別人的“視聽”。馮友蘭先生還有所自責：“我當時也確有嘩眾取寵之心。有了這種思想，我之所以走了一段極左路線，也就是自己犯了錯誤，不能說全是上當受騙了。”¹⁹ 他說得比較含蓄，向誰“取寵”？如何“嘩眾”？馮先生不過是“識時務”而已，何嘗真心悔悟。每到關鍵時刻，他都發誓要“脫胎換骨”；1949 年以後，他已經“脫胎換骨”好幾次了。湯一介晚年，在記者採訪有關“梁效”的稿子上寫下一句補充：“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²⁰ 當年“批孔”的時候，把孔子罵得狗血淋頭；現在當上了中華孔子學會會長，還得了孔子文化獎，如果不“深刻反省”，講話有什麼公信力？過了 8 年，未見“深刻反省”的內容，他就撒手人寰了，但總算留下一個態度。魂斷香消四十年。有的“梁效”分子還在戀舊。范達人說：“在‘梁效’期間，我們寫了很多文章，一度很是風光。”²¹ 沒有看到一個“梁效”分子有過“深刻反省”，除了湯一介，其他人連個態度都沒有。

“梁效”分子要不要懺悔？范達人在接受採訪時是這樣回答這個

¹⁸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1 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年。

¹⁹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58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²⁰ 陳香：《湯一介和“梁效”》，《中華讀書報》，2006 年 2 月 8 日。

²¹ 范達人：《“梁效”的成立與終結》，《炎黃春秋》，2014 年第 6 期。

問題的：

鄭：您認為對“梁效”的成員來說，“梁效”的經歷不是一種罪過，不是要懺悔的？

范：對。應當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加以解釋。²²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梁效”的作為非但不是罪過，而且“很是風光”；反“梁效”倒是“一種罪過”。現在歷史條件變了，又當如何？范達人說了：

任何時候都會有這樣的人，為了宣傳某一個政策、方針，他需要人、組織人來宣傳政策，會有這樣的，以後也會有，所以這個現象不會消失的，不會完全消失。²³

范達人要喊“梁效”萬歲了。確實，中國的政治體制不變，“任何时候都會有這樣的人”。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就不需要也不可能產生“梁效”。可以說，范達人是把中國的政治體制看透了，而他的“梁效”立場可謂堅定不移矣。

馮友蘭在《三松堂自序》中自陳：“我在當時的思想，真是毫不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眾取寵之心，不是立其誠，而是立其偽。”

（189頁）“立其偽”，也是對“梁效”的全部言行的概括。馮友蘭沒有從“立其偽”說下去，嚴復代他說了：“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救亡決論》）“梁效”這一幫“立其偽”的寫手，背後被人斥為“無恥之徒”。有人從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一個惡毒的字眼，罵他們為“賣淫文人”。列寧說，那些出賣自己的靈魂、可以用自己的全部教養為社會上任何反動勢力服務的知識分子是“一種熟練的變相賣淫”（《紀念葛伊甸伯爵》，《列寧全集》，第13卷，36頁）。“梁效”的骨幹分子，就是從事這種“熟練的變相賣淫”。周一良曾

²² 范達人口述、鄭實採訪：《我在“梁效”的經歷》，2005年5月20日，《信睿》，2012年第3期。

²³ 凤凰衛視：《口述歷史：梁效往事》，鳳凰網 ifeng.com，2013.03.16。

收到署名“一個老朋友”的來信，信紙上只有用毛筆書寫的四個繁體大字：“無耻之尤”。魏建功也收到過同樣署名的信件。²⁴可見親朋故舊對“梁效”中人的憤恨。這個頭銜加在馮友蘭身上可能更為合適。他即使收到這樣的信件也不會吭聲，而周一良、魏建功敢於將“無耻之尤”亮出來，說明他們雖“無恥”還不是“之尤”。其實，文人“賣淫”比娼婦、妓女還要無恥。歐陽子倩改編的《桃花扇》，說的就是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賣淫”，為秦淮歌妓李香君所不齒的故事。娼婦、妓女為生計所迫而出賣肉體，也是受害者，有值得同情之處。“賣淫文人”為追逐利祿而出賣靈魂，是害人者，理應受千夫所指。共產黨內的大知識分子胡喬木就是一個可以用自己的文才為任何人服務的頭號“賣淫文人”，他可以為打倒鄧小平的毛澤東服務，又可以為批評毛澤東的鄧小平服務。

“梁效”這幫人，確實能夠適應多變的中國政治氣候，而不變的中國政治體制也確實需要這幫人。他們沉潛了一個時期，不少人又冒出來，重新成為紅人、要人、名人（見附一）。老的“梁效”式的人物與時俱進了，新的“梁效”式的人物又不斷產生。無恥的“賣淫文人”是不民主的政治體制的寄生贅疣。

把“梁效”作為研究對象

對於“梁效”，專案審查沒有解決問題；罵他們無恥，也不解決問題。那要怎麼樣？應當把他們當作研究的對象，引出必要的教訓，對“梁效”的成員和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群體都是有益的。

于光遠早就向胡耀邦建議，成立“‘三種人’研究所”（“三種人”是指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于光遠討厭“專案組”。“專案組”是整人的，而研究所是帶有思想性、學術性的機構。開列清單，研究文革中造反起家的風雲人物及烜赫一時的寫作班子，如“梁效”“羅思鼎”“洪

²⁴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79頁，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廣思”等等，研究的目的在於提升人的精神。²⁵ 于光遠、胡耀邦都已不在了，遂無問津者焉。研究所的名稱是不是叫“‘三種人’研究所”倒不一定，但作為一個專題，組織力量，開展研究，是完全必要而十分迫切的。“梁效”“四人幫”以至于文化大革命都應該開展專題研究。其後，沙葉新又舊事重提：

如今重提梁效，實在是因為梁效這樣一個不是幫閒而是幫兇的寫作班子太值得研究了，它們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也是中國自古未有的御用的“書生”群體。類似梁效這樣的政治怪物，北京還有初瀾，上海還有石一歌、丁學雷、羅思鼎等。可惜至今都無個案的剖析和群體的考究。其中的障礙之一是文革史學者對此項研究的意義遠遠認識不足，尚未認識到深入研究梁效、石一歌等等文革遺產，對中華文化品格的重建，對知識份子精魂的重塑，都是至關重要的。²⁶

沙葉新進一步提出了研究的方法，應作“個案的剖析和群體的考究”，目的不是整人，而是“中華文化品格的重建”和“知識分子精魂的重塑”。

周一良說：“事情放在較長一段流光中來考察，就能較為超然，就能較為公正，就能實事求是，就能通情達理得多。”確實，對“梁效”的研究要把它“放在較長一段流光中來考察”，不是如周一良所說的4個“就能”在歷史的長河中得到洗刷，而是更能看清楚對“中華文化品格”的戕害和對“知識分子精魂”的糟蹋。

“梁效”現象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它不僅是文化大革命現象，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現象。中國的知識份子中，為什麼容易出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無恥之徒？特別是具有五四傳統的北京大學，何以又出了一個反五四傳統的“梁效”？此類問號，宜長留人間，深思之，怵惕之。

²⁵ 于光遠《讀了余秋雨兩篇自白之後》，《深圳周刊》，2000年第24期。

²⁶ 沙葉新《“書生”及“梁效”評議》，《南方週末》，1999年1月29日；又見明鏡歷史網。

附一 “梁效”最後成員39人及顧問的名單

成員

李家寬 8341部隊文書科副科長，北大黨委常委、黨委辦公室主任，“梁效”黨支部書記。

宋柏年 北京大學政工組宣傳組副組長，“批林整風”辦公室副主任，“梁效”黨支部副書記。後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教授，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兼院長顧問。

王世敏（女）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哲學教員，“梁效”黨支部副書記，四屆人大代表，江青封的“女狀元”。

湯一介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講師，“梁效”黨支部委員，四屆人大代表。後為北大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儒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儒藏》編纂與研究”重大專項首席專家，《儒藏》總編纂，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書院院長，還是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又是國際道學聯合會 副主席，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獲北京大學哲學系教育終身成就獎、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獲孔子文化獎，他的一生，時而尊孔，時而“批孔”，又回到尊孔。

楊克明 北京大學哲學系辯證唯物主義教研室助教。是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起草人，文革初期與聶元梓一起列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梁效”黨支部委員。後為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改名楊適。人民出版社為他出了5卷《楊適文集》。

葉朗 北京大學哲學系美學教研室助教，入“梁效”前是哲學系大批判組“哲軍”的成員。後為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北京大學美學與藝術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哲學評議組組長，中華美學學會副會長，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八五”哲學學科規劃小組成員，1999年獲“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同時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

員，教育部高等學校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還是全國政協常委。

張世英 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史教研室副教授，在“梁效”期間“火線入黨”。後為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哲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外國哲學史學會顧問，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會會長。

陳先達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員。後回中國人民大學，為哲學院教授，任北京市哲學學會會長。著作和論文曾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一等獎，兩次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獲吳玉章獎金一等獎。

穆少安 北京大學哲學系留校工農兵學員。

周一良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梁效”黨支部委員，中共十大代表。

田餘慶 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講師。後為教授、博士生導師。

范達人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員。“梁效”黨支部委員，四屆人大代表。1989年出國，在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

何芳川 北京大學歷史系助教，在“梁效”期間“火線入黨”。後任歷史系主任、教授，北大副校長，北大黨委常委，還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學科專家組副組長，教育部歷史學科指導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亞太學會副會長等20多項職務。

魏建功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教授，原北大副校長。

林 庚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胡經之 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理論教研室教員。後為深圳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廣東省美學會會長。

孫 靜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員。

吳同寶（吳小如） 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員。

孫慶升 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史教研室教員。

趙齊平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員。

盧永麟 北京大學中文系留校工農兵學員。

張正釗 北京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教員。

洪兆龍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教員。

羅祥文 北京大學法律系國際法教員。

郁龍餘 北京大學東語系教員。

梁英明 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助教。後為北京大學亞非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南亞、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北京大學華僑華人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委員、中國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

鍾哲明 北京大學黨委宣傳部副部長。後為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津貼。歷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等。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教育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標準教材編寫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經典著作基本觀點研究”總課題組主要成員和兩個子課題組首席專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歷史理論經典著作導讀”編寫組主要成員等職。

陳熙中 北京大學留學生漢語教研室教員。

常文寶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龍協濤 北京大學政工組工作人員。

史國衡 清華大學圖書館館長。

馬栩泉 清華大學電子計算機系教員。

王朝文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國際共運史教員，“梁效”黨支部委員。

孫中原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教員。

楊根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員。

張德 清華大學教員。

鍾成勛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政治經濟學教員。

李潤海 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研室國際共運史教員。

盧振義 清華大學電影放映員，“梁效”黨支部委員。

顧 問

馮友蘭 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教授，任“梁效”顧問期間為四屆人大代表。

附二 “梁效”的著作一覽

“梁效”曾以北京大學學報編輯部、新北大校刊編輯部的名義出了四冊《文章選編》。

《文章選編》（一）

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林彪與孔孟之道》，《紅旗》雜誌，1974年第2期。
2.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林彪再三揮舞“克己復禮”黑旗居心何在？》，《人民日報》1974年1月29日。
3.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線的極右實質》，《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
4.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是尊孔反法的反動口號》，《北京日報》1974年2月26日。
5.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韜晦——野心家、陰謀家、兩面派林彪的座右銘》，《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北京日報》，1974年2月5日。
6. 梁效：《戳穿林彪自比周文王的狼子野心》，《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北京日報》，1974年2月8日。
7. 梁效：《林彪的“三不主義”的什麼貨色？》，《北京大學

- 學報》，1974年第1期；《北京日報》1974年2月15日。
- 8. 梁效：《林彪鼓吹的“小國師大國”是叛徒賣國賊哲學》，《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
 - 9. 梁效：《兩個獨夫民賊，一個尊孔腔調——從蔣幫的尊孔反共鼓譟看林彪尊孔反法的反動實質》，《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北京日報》，1974年3月20日。
 - 10.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林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對派》，《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2期；《北京日報》，1974年4月24日。
 - 11. 梁效、鄭力：《沿著毛主席的建軍路線勝利前進——學習〈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5期；《北京日報》，1974年11月1日。
 - 12.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孔丘其人》，《紅旗》雜誌，1974年第4期。
 - 13.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孔丘是怎樣利用教育進行反革命復辟活動的？》，《人民日報》1974年1月26日。
 - 14. 柏青：《駁孔丘反對人殉說》，《北京日報》，1974年6月24日。
 - 15. 柏青：《從〈鄉黨〉篇看孔老二》，《北京日報》，1974年5月17日；《教育革命通訊》，1974年第6期。
 - 16. 柏青：《剝掉孔老二“博學多識”的畫皮》，《光明日報》，1974年7月8日。
 - 17. 柏青：《“學而優則仕”析》，《光明日報》，1974年5月6日。
 - 18. 北京市順義縣天竺公社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婦女的徹底解放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項重要任務——批判〈改良女兒經〉》，《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5期；《人民日報》，1974年11月14日。
 - 19.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百多年來反孔和尊孔的

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3期；《人民日報》，1973年12月7日。

20.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孔老二的亡靈和新沙皇的迷夢——評蘇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人民日報》，1974年1月24日；《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1期。

《文章選編》（二）

1. 梁效：《農民戰爭的偉大歷史作用——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點體會》，《歷史研究》，1974年第1期。
2. 梁效：《研究儒法鬥爭的歷史經驗》，《紅旗》雜誌，1974年第10期。
3. 柏青：《堅持古為今用，研究儒法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北京日報》，1974年9月9日。
4.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法家代表人物介紹》，《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3期。介紹了管仲、鄧析、少正卯、李悝、吳起、慎到、申不害、商鞅、荀況、韓非、秦始皇嬴政、李斯、漢高祖劉邦、呂后、蕭何、曹參、張良、漢文帝劉恒、漢景帝劉啟、賈誼、晁錯、漢武帝劉徹、漢昭帝劉弗陵、漢宣帝劉詢、桑弘羊、王充，計26人。
5. 梁效：《古代偉大的無神論者——西門豹》，《教育革命通訊》，1974年第7期；《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
6. 梁效：《論商鞅》，《紅旗》雜誌，1974年第6期。
7.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秦始皇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北京大學學報》，1973年第3期；《北京日報》，1973年9月17日。
8.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略論秦始皇的暴力》，《人民日報》1974年1月21日。
9. 鞏政：《論秦始皇之法》，《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2期。

10.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趙高篡權與秦朝的滅亡》，《人民日報》，1974年9月8日。
11. 梁效：《論賈誼》，《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
12. 梁效：《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紅旗》雜誌，1974年第5期。
13.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論三國時期的法家路線》，《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光明日報》，1974年9月19日。
14. 梁效：《有作為的女政治家武則天》，《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教育革命通訊》，1974年第8期。
15. 周一良：《讀柳宗元〈封建論〉》，《北京日報》，1973年11月9日；經修改補充再發於《紅旗》雜誌，1974年第2期。
16.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論愛國主義者王安石——兼論歷史上儒法之間賣國與愛國兩條路線的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北京日報》，1974年8月17日。
17. 梁效：《論康熙維護國家統一和抗擊沙俄侵略的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6期。
18. 李群：《儒法鬥爭與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紅旗》雜誌，1974年第8期。
19. 秦水：《法家路線和鄭國渠》，《人民日報》，1974年7月29日。
20. 李群：《沈括和他的〈夢溪筆談〉》，《人民日報》，1974年7月21日。

《文章選編》（三）

1. 梁效：《一定要學懂學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人民日報》，1975年3月29日。

2. 梁效：《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專政》，《人民日報》，1975年2月10日。
3. 柏青：《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人民日報》，1975年3月3日。
4. 梁效：《必須逐步剷除滋生資產階級的土壤》，《北京日報》，1975年3月14日。
5. 景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日報》，1975年2月28日。
6. 梁效：《學理論，抓路線，反修防修》，《人民日報》，1975年8月6日。
7. 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工人理論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路線決定企業的領導權》，《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人民日報》，1975年7月25日。
8. 梁效、呂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辦法》，《北京日報》，1975年6月13日。
9. 梁效：《俯首甘爲孺子牛——學習魯迅偉大的共產主義精神》，《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10.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無產階級專政與叛徒林彪》，《紅旗》雜誌，1975年第5期。
1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評林彪所謂的“仁政”》，《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2期；《北京日報》，1975年4月30日。
12. 梁效：《資產階級法權和林彪修正主義路線》，《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13. 柏青：《林彪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反動的孔學》，《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14. 梁效：《等級制度與林彪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歷史研究》，1975年第3期。
15. 梁效：《林彪的“釣餌原理”究竟是哪路貨色？》，《教育

- 革命通訊》，1975年第5期。
16. 柏青：《評林彪的“給物主義”》，《光明日報》，1975年7月31日。
 17. 梁效：《林彪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思想根源》，《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18. 梁效：《評林彪的賣國哲學》，《紅旗》雜誌，1975年第8期。
 19. 梁效：《蘇修爭霸世界的經濟根源》，《紅旗》雜誌，1975年第10期。
 20. 郭平：《“盧布決定一切”意味著什麼？》，《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21. 柏青：《好一個“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盒”》，《北京日報》，19975年3月3日。
 22. 北京平谷縣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寫作組：《革命能改變一切——學習〈介紹一個合作社〉》，《人民日報》，1975年4月13日。
 23. 梁效：《批判因循守舊，堅持繼續革命》，《紅旗》雜誌，1975年第3期。
 24. 常戈：《談談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制度》，《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25. 蒲經：《正確認識和對待按勞分配》，《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26. 北京玉淵潭公社貧下中農理論組、北京大學經濟系教育革命實踐隊：《論小生產》，《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4期。
 27. 梁效：《論陳勝吳廣農民大起義的歷史功勳》，《歷史研究》，1975年第1期。
 28. 梁效：《革命的專政，還是儒家的“仁政”？——試論太平天國在政權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2期。

29. 安杰：《試論太平天國團結與分裂的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30. 梁效：《剖析孔丘的“仁”》，《人民日報》，1975年3月15日。
31. 梁效：《評孔老二吹捧的子產——兼論春秋末期儒法鬥爭的階級陣綫》，《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1期。
32. 柏青：《論王莽復辟的歷史教訓》，《北京日報》，1975年2月4日。
33. 駐天津部隊某部九連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培養革命接班人——批判〈神童詩〉》，《教育革命通訊》，1975年第3期；《人民日報》，1975年2月24日。

《文章選編》（四）

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紅旗》雜誌，1975年第12期。
2.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回擊科技界的右傾翻案風》，《紅旗》雜誌，1976年第2期。
3.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否定文藝革命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人民日報》，1976年3月6日。
4. 梁效：《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北京日報》，1976年2月12日。
5. 梁效、任明：《評“三項指示為綱”》，《人民日報》，1976年2月29日。
6.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翻案復辟的自供狀——評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授意炮製的一篇文章》，《人民日報》，1976年4月3日。
7. 梁效：《經濟建設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讀列寧〈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光明日

- 報》，1976年2月25日。
8. 梁效：《反修防修的偉大革命》，《人民日報》，1975年12月9日。
 9. 柏青：《論革命群眾運動的主流和支流》，《光明日報》，1976年1月6日。
 10. 秦懷文：《折中主義是修正主義的慣用手法》，《人民日報》，1976年2月8日。
 11. 高路：《深入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輪》，《光明日報》，1976年3月30日。
 12. 高路：《堅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鬥爭》，《光明日報》，1976年2月11日。
 13. 梁效：《發展新生事物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人民日報》，1976年2月22日。
 14. 梁效：《論當前教育戰線上的兩條路線鬥爭》，《人民日報》，1976年3月15日。
 15. 梁效：《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日報》，1976年1月15日。
 16. 梁效：《堅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北京日報》，1975年12月7日。
 17. 中國共產黨清華大學委員會：《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人民日報》，1975年12月26日。
 18. 高路：《“智育第一”就是資產階級政治第一》，《人民日報》，1976年1月19日。
 19. 柏青：《在批判“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背後》，《北京日報》，1975年12月16日。
 20. 梁效：《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不可戰勝的——評教育界的“今不如昔”論》，《光明日報》，1975年12月19日。

21. 梁效：《林彪一類鼓吹“知識私有”居心何在？》，《光明日報》，1976年3月11日。
22. 梁效：《半是榜文，半是輓歌——痛斥蘇修對我國教育戰線大辯論的誣蔑》，《人民日報》，1976年2月27日。

列入《文章選編》的，總計95篇。

未列入《文章選編》及《文章選編》出版後發表的著作

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儒家和儒家的反動思想》，《北京日報》，1973年9月4日。
2. 梁效：《試談歷史上關於秦始皇的兩派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2期。
3. 輩政：《韓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3期。
4. 丁文：《批陳伯達的“錄譯詩”》，《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3期。
5. 梁效：《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紅樓夢〉裏的賈政》，《人民日報》，1974年6月28日。
6. 柏青：《封建末世的歷史畫卷——談〈紅樓夢〉》，《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4期。
7. 梁效：《不間斷地批判資產階級——學習“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人民日報》，1974年10月6日。
8. 北京大學儒法鬥爭史編寫小組：《儒法鬥爭史概況》（初稿），《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5期。
9. 柏青：《〈改良女兒經〉的淵源》，《人民日報》，1974年11月17日。
10. 小斬莊大隊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農民反孔鬥爭史話》，《歷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1. 秦懷文：《進一步發揮黨在學校的領導作用》，《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6期。
12. 呂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北京大學學報》，1974年第6期。
13. 秦懷文：《大學教育要為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服務》，《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1期。
14. 梁效、聞軍：《論李商隱的〈無題〉詩》，《歷史研究》1975年第2期。
15. 北京機車車輛廠工人理論小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關鍵在於堅持馬克思主義路線的領導》，《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16. 柏青：《封建家族的興衰——談〈紅樓夢〉的主線》，《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3期。
17. 梁效：《魯迅評〈水滸〉評得好——讀〈流氓的變遷〉》，《光明日報》，1975年8月30日。
18.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一部宣揚投降主義的反面教材——評〈水滸〉》，《紅旗》1975年第9期。
19.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投降主義路線的讚歌——批判〈水滸〉對農民起義的歪曲》，《人民日報》，1975年9月5日。
20. 柏青：《評投降派宋江——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光明日報》，1975年9月17日。
21. 安杰：《宋江的所謂“悲慘結局”，《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5期。
22. 梁小章：《評盧俊義上梁山》，《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5期。
23. 梁效：《評〈水滸〉研究中的階級調和論》，《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5期。
24. 秦懷文：《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搞好教育革命》，《北京大

- 學學報》，1975年第5期。
25. 柏青：《評金聖嘆腰斬〈水滸〉》，《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5期。
 26. 梁效：《〈水滸〉和程朱理學》，《人民日報》，1975年10月12日。
 27. 柏青：《〈水滸〉為什麼這樣塑造宋江？》，《歷史研究》，1975年第5期。
 28. 梁效：《洋務運動與洋奴哲學》，《歷史研究》，1975年第5期。
 29. 梁效：《發動群眾，學習理論反修防修》，《人民日報》，1975年10月26日。
 30. 梁效：《開展對〈水滸〉的評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評投降派宋江》，《光明日報》，1975年11月6日。
 31. 柏青：《無產階級戰勝投降派的強大思想武器——學習〈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人民日報》，1975年12月13日。
 32. 柏青：《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讀〈商君書〉札記》，《歷史研究》，1975年第6期。
 33. 高路：《折中主義必須批判》，《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
 34. 祝小章：《是革命宣言，還是反動說教——評〈水滸〉中的一篇“言語”》，《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
 35. 柏青：《詩歌民族化群眾化的正確道路——論新詩必須在批判繼承古典詩歌和民歌的基礎上發展》，《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
 36. 柏青：《封建社會必然沒落——談〈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
 37. 柏青：《鯤鵬展翅——學習毛主席詞二首》，《人民日報》，1976年1月2日。

38. 柏青：《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徹底決裂——評彩色故事片〈決裂〉》，《人民日報》，1976年1月18日。
39. 高路：《“風”辯》，《光明日報》，1976年1月27日。
40. 梁效：《評林彪的投降主義》，《北京大學學報》，1975年第6期；《人民日報》，1976年1月28日。
41. 高路：《誰是“瞎子”“聾子”？》，《光明日報》，1976年1月28日。
42. 高路：《“仁”的妙用》，《光明日報》，1976年2月15日。
43. 萬山紅：《詭辯論的一個標本》，《光明日報》，1976年2月17日。
44. 柏青：《“我們應當造就大批新的戰士”——學習魯迅，正確對待青年》，《光明日報》，1976年2月19日。
45.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再論孔丘其人》，《人民日報》，1976年2月24日。
46. 梁效：《林彪與〈水滸傳〉》，《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1期。
47. 柏青：《〈紅樓夢〉與封建末世的思想鬥爭》，《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1期。
48. 高路：《宋江一上山就……》，《光明日報》，1976年2月28日。
49. 高路：《反修必須批孔》，《紅旗》雜誌，1976年第3期。
50. 梁效：《“克己復禮”再批判》，《光明日報》，1976年3月6日。
51. 高路：《“對著幹”與“接著幹”》，《光明日報》，1976年3月27日。
52. 梁效：《一條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路線》，《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2期。

53. 呂斌：《走資派最危險——紀念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發表十週年》，《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2期。
54. 柏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剖析〈水滸〉中宋江推行投降主義路線》，《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2期。
55. 高路：《“整頓”與“正名”》，《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2期。
56. 梁效：《鄧小平與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人民日報》，1976年4月28日。
57. 梁效：《用革命輿論粉碎反革命輿論》，《紅旗》雜誌，1976年第5期。
58. 梁效：《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對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的剖析》，《人民日報》，1976年5月18日。
59. 高路：《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紀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週年》，《光明日報》，1976年5月18日。
60. 高路：《文化大革命就是搞階級鬥爭》，《人民日報》，1976年5月25日。
61. 高路、常戈：《評鄧小平的買辦資產階級經濟思想》，《紅旗》雜誌，1976年第7期。
62. 梁效：《我們的黨在戰鬥中前進》，《人民日報》，1976年7月2日。
63. 高路：《從“尚方寶劍”談起》，《光明日報》，1976年7月23日。
64. 梁效：《在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中佔領和改造上層建築》，《人民日報》，1976年7月27日。
65.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不可抗拒——批判鄧小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鬼蜮伎倆》，《人民日報》，1976年8月13日。
66. 秦懷文：《論黨內走資派》，《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3期；《人民日報》，1976年8月27日。

67. 中共海淀區委理論組、高路：《共產黨人的思想決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階段》，《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4期。
68. 柏青：《封建末世的貴族叛逆者——談〈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北京大學學報》，1976年第4期。
69. 梁效：《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紅旗》雜誌，1976年第9期。
70. 柏青：《學習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把批鄧進行到底》，《光明日報》，1976年9月5日。
71. 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緊握革命大批判的武器繼續戰鬥》，《紅旗》雜誌，1976年第10期。
72. 梁效：《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光明日報》，1976年10月4日。
73. 梁效：《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黑標本——批判〈論總綱〉篡改馬克思主義的卑劣手法》，《光明日報》，1976年10月7日。

以上，總計 168 篇。“梁效”共發表文章 181 篇，尚缺 13 篇未找到。

第十三章

一場代理人的戰爭

馮友蘭與錢鍾書有一場文革官司，不過是在作為代理人的他們的家人之間進行的。

1998年8月，馮友蘭的女婿、馮鍾璞的丈夫蔡仲德（中央音樂學院教授），拿著事先寫好的字據，去錢家找到楊絳。當時錢、楊的獨生女錢瑗去世不久，而錢鍾書已病重住院（於當年12月20日去世）。蔡仲德趁人之危，讓錢在死前簽字，要麼否認他在美國講過馮友蘭的壞話，要麼承認講過、是誣陷。楊絳斬釘截鐵地說：“不可能”“馮友蘭是錢鍾書的恩師¹，不可能講他的壞話”。蔡仲德要她去問錢鍾書，她一身擋住，不讓他糾纏病中的錢鍾書，說：“沒必要。”²

蔡仲德精心設計的一個局，被聰明的楊絳一聲“不可能”三個字就輕鬆地化解了。因為，無論否認或承認，都會掉進他的陷阱，請你簽字。她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只說“不可能”；而且“不可能”是楊絳本人的斷語，“沒必要”征求錢鍾書的意見。

¹ 錢鍾書在《談交友》一文裏曾經提到大學時代五位敬愛的老師，他們是：溫源甯、張申府、葉公超、馮友蘭、吳宓。

² 據王友琴：《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開放》，2011年3月號；又見阿波羅新聞網，題為《文革四大不要臉之一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

錢鍾書在美國究竟說了什麼？

1979 年，中國第一次派出中國社會科學家代表團訪問美國，團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錢鍾書在胡喬木的邀請下“側身其列”。臨行前，由於健康原因，胡喬木未能成行，改由宦鄉任團長。4月 16 日至 5 月 16 日，代表團一行 10 人在美國展開活動。

訪美前，誤傳錢鍾書已去世，哥倫比亞大學的夏志清教授等人還寫了悼念文章。相見之下，無不驚喜。錢的機智和博學，受到美國知識界的贊賞，一時出現“錢鍾書熱”。斯坦福大學邀請錢鍾書做演講。錢表示，不願做正式的演講，可以參加非正式的座談，交換意見。5月 10 日，在亞洲語文系主任上田教授的主持下，有斯坦福和伯克利的教授、研究生 30 多人參加，座談了一個半小時。錢鍾書“一開口就語驚四座”。他說的是流利而優雅的牛津英語，間或插科法語、德語，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³

之後的 6 月 5 日，臺灣《聯合報》副刊發表《錢鍾書印象》一文，是該刊編輯丘彥明從臺北打越洋電話到美國舊金山，對座談會的參加者莊因教授的採訪。文中提到一個細節：

那天提問題的人很多，氣氛可說相當熱烈，錢鍾書也表現出很願意答話的樣子……座談會中也提到了哲學家馮友蘭，錢鍾書把馮友蘭罵了一大頓。他說，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一點知識分子的節操觀念。又說，馮友蘭最不應該的是出賣朋友，在座有人問馮友蘭究竟出賣了哪些朋友，錢鍾書却不願指出姓名。

莊先生似乎意猶未盡，又寫了一篇《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發表在 6 月 26 日的《聯合報》副刊上。⁴ 補充共有 6 條，與馮友蘭相關的是：

³ 見汪榮祖訪談，鳳凰網。

⁴ 收入《錢鍾書傳記資料》第一輯，臺北，天一出版社，1985。

馮友蘭捏造事實，坑人使妻小俱死。馮現在在北大人人嗤之以鼻，人緣掃地。錢氏用英文說：Feng's name is now stinking in Peking University，情緒頗為激動。

這兩段淺明的文字，當時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馮友蘭在海外的名聲也不佳，沒有人認為這些敘述有悖於他的形象。錢鍾書訪美歸來，出口轉內銷，人氣大增。早已完稿而束之高閣 3 年的《管錐篇》得以出版，小說《圍城》又再版，並拍成電視連續劇，最後錢鍾書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不料日後有關馮友蘭的言論卻引起無窮糾紛。

馮鍾璞挑起事端

事過將近 20 年，當事人馮友蘭、錢鍾書，一作古、一病重，馮友蘭之女馮鍾璞（宗璞）突然挑起事端。馮友蘭是錢鍾書 20 世紀 30 年代在清華大學的老師，宗璞又是楊絳 50 年代在清華大學的學生；宗璞是馮友蘭之女，楊絳是錢鍾書之妻。兩對師生與父女之情、夫妻之情的糾結演繹出一番筆戰，雙方各有一些人助陣，引來文壇眾人觀戰。

1998 年 7 月，宗璞在《文學自由談》（天津）發表《不得不說的話》。她說，1997 年春節稍後，有朋友拿來孔慶茂的《錢鍾書傳》一書，從中得知錢鍾書於 1979 年 5 月 10 日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謾罵她的父親（孔書沒有提到“馮友蘭”的名字，證據不足），而孔書的根據是莊因的文章。此後，她又見到牟曉朋、范旭侖所編的《記錢鍾書先生》，書中收錄了莊因的文章，但“沒有孔慶茂所寫‘致朋友迫害而死’字樣”。宗璞說：

……這樣白紙黑字的謾罵還是第一次見。我認為有必要立即與錢鍾書和楊絳先生聯繫，問清情況……我心情壓抑，隨即患病，此事遂一擱數月。後因想到必須乘當事人都在世時把事情說清楚，乃於去年 10 月向楊先生提出此事，並希望她婉轉向錢先生問明究竟。楊先生

拒絕去問，堅決否認錢先生曾說過上述的話，所舉理由有馮先生是錢先生的五大恩師之一，他決不會說等等。但楊先生至今沒有公開聲明錢先生未說過那些話。……鑑於上述情況，作為馮友蘭先生的女兒，我要在此鄭重聲明，“出賣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云云，毫無事實根據，也無旁證。……它純屬誣衊不實之詞，既損害了馮先生的名譽，也給馮先生的遺屬造成精神傷害。此等中傷，自顯其惡，日月昭昭，天人共鑒！

本著先君寬以待人的態度，我現在對此話的來源不予追究——這應該是錢、楊與莊因、孔慶茂之間的事。只希望……。

我的身體不好，來日無多。我更希望……。

1998年6月

宗璞所云，根據是兩本書。

1992年4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孔慶茂的《錢鍾書傳》（獲“華東地區優秀圖書一等獎”，又被評為“全國優秀暢銷書”），作者依據莊因的言論寫出自己的文字：

當座談會上有人提到中國某哲學家的赫赫大名時，錢鍾書說此人在文革中出賣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簡直沒有一點學人的骨氣，也沒有知識份子的節操觀念。錢鍾書情緒頗為激動，他說他不願提此人，他的正義感使在座的人十分敬佩。（第222頁）

1997年3月，孔慶茂又出版了《錢鍾書與楊絳》（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依然保留了上述文字，只增加了一個“被”字，“致朋友被迫害而死”（第298頁），改正了語病。1998年7月，孔慶茂又把《錢鍾書與楊絳》一書中的楊絳部分去掉，改為《錢鍾書》，交中國華僑出版社出版。孔某一而再、再而三地傳播“中國某哲學家”“出賣朋友，致朋友被迫害而死”。1995年11月，大連出版社出版了牟曉朋、范旭侖合編的《記錢鍾書先生》，收錄了莊因教授的兩次言論（208~210頁），沒有孔慶茂書中所說“致朋友被迫害而死”。且不說莊因的兩次言論是否符合錢鍾書發言的原意，孔慶茂依據莊因的《錢鍾書印象》中的“出賣朋友”一語，緊接著寫出“致朋友被迫害而

死”，完全是杜撰，顯然篡改了莊因，更不能歸之於錢鍾書。

楊絳立即回應宗璞的文章，發表《答宗璞〈不得不說的話〉》（文末標明作於8月8日），於9月5日刊登在上海的《新民晚報》和《文匯讀書週報》，並見《今晚報》1998年9月17日，以及《文學自由談》1998年9月號。文中寫道：

宗璞根據傳說錢鍾書的記載，曾一再來信、來電話，譴責錢鍾書訪問美國時誣衊、譖謗馮友蘭先生。我也曾一再向她舉出事實，說明這事不可能。最近我在《文學自由談》（1998年第4期）讀到她《不得不說的話》。她仍是不理會我舉的事實，強烈譴責錢鍾書，並怪我拒絕向錢鍾書問明究竟。她說自己“來日無多”，要在生前和我把事情說說清楚。我就遵照她的要求，公開說明錢鍾書不可能在美國誣衊、譖謗馮友蘭先生“出賣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話。

楊絳依然堅持“不可能”“沒必要”。不可能的原因列了3條：

第一，“根據宗璞1997年10月24日給我的信，所說的‘朋友’，指章廷謙⁵。她信上講了‘文化大革命’中馮先生和章廷謙的事。這件事，錢鍾書和我是在馮友蘭先生去世一週年後才聽到的。錢鍾書隨社會科學院訪問美國是在1979年4、5月間，當時對章廷謙事件還一無所知”。“稍有理智，都會明白這是絕不可能的”。

第二，1990年馮先生去世後一天，臺灣記者季季女士打來長途

⁵ 章廷謙（1901—1981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別名川島。1919年入北大哲學系；1922年畢業，留校任校長辦公室秘書。與魯迅為紹興同鄉，追隨魯迅，成為忘年交。1924年，參與魯迅和周作人創辦的《語絲》周刊，章任編輯。他寫的散文，文筆優美，但學術上的建樹不多，文革前為副教授。先生嗜酒，且只喝紹興黃酒，早上起來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喝酒。他有一個令人欣羨的頭銜：品嘗家。北京飯店的特色“譚家菜”，不時請他去品嘗。做中餐全憑大師傅的勺子一勾，不像西式菜譜，規定食材和作料多少盎司、多少克，做著做著就走樣了。為了保持“譚家菜”的品牌，需要靠品嘗家的味覺去校正。這個行當不是好幹的，要講出一套來讓大廚折服不容易，會吃的不一定會評。章廷謙的本領不知是怎樣練成的。

電話，問錢先生對馮友蘭的學問有何看法。錢答：“馮先生是我的恩師。但是我們對學問的看法不同。”

第三，近年來出現的“傳說錢鍾書的記載”的書籍，“一概未得錢鍾書許可；書籍的內容，也一概不由錢鍾書審定”，而“轉載錢鍾書大罵馮友蘭先生那段傳說的書”，是一部“經編者向錢鍾書公開致歉、保證銷毀封存的書”。該書的“編者說了不當話，正是他公開用實際行為，證明自己不可信。可是宗璞相信書上的白紙黑字”。

楊絳表示，她沒有必要去向錢鍾書核實，因為她自己“記得很清楚”。

楊絳強調，誰要是指控錢鍾書誣衊、譭謗過馮友蘭先生，就“必須提供確實、充分的證據”“這是法律”。“再說，錢鍾書沒做過的事是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不能證實。這是合乎邏輯的情理。……至於究竟誣衊之詞是何來源以及澄清事實真相，也能是錢鍾書和我的責任嗎？”

楊絳還勸宗璞保持自己的理性，不要太感情用事。

《聯合報》的兩次報道均未指明出賣的“朋友”是誰，而且強調“錢鍾書不願指出姓名”。楊絳接到宗璞 1997 年 10 月 24 日的信才知道：“所說的‘朋友’，指章廷謙。”宗璞未云所據。宗璞所據的兩本書，一本連馮友蘭的名字都沒提到；一本提到馮友蘭，但沒有提到章廷謙。蔡仲德去錢家後，還跑到章廷謙的長女章淹（北京氣象局退休工程師）家，要求她在指控錢鍾書造謠的字據上簽字，當場遭到拒絕。蔡仲德（想必還有馮鍾璞合謀）要錢鍾書和章淹簽字的字據，涉及章廷謙，你們是否先要簽一個字據，說明從何得知“錢鍾書造謠”馮友蘭出賣的朋友是指章廷謙？

宗璞針對楊絳的答辯又發表《再說幾句話》⁶，開篇寫道：

《不得不說的話》刊出後，楊絳先生公開表示錢鍾書先生沒有說

⁶ 上海《文匯讀書週報》，1998 年 11 月 14 日；天津《文學自由談》，1998 年 11 月號。

過那些誣衊、譏謗馮友蘭先生的話。對楊文中的某些說法，我有所保留。

宗璞把“不可能”理解成“不存在”了。她又牽扯出王友琴。“馮鍾璞給北大一位老領導打電話說，楊絳已經說了，錢鍾書沒有說過馮友蘭揭發章廷謙，王友琴不能再說章廷謙家人因此受害。”⁷ 馮鍾璞要求北大的“老領導”對王友琴禁言。王友琴雖為北大中文系的畢業生，但現在是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教師，北大的“老領導”管得著嗎？

宗璞的思維能力居然連“不可能”與“不存在”都不能區分，也許是為親者諱過於心切吧？宗璞對於楊絳的哪些說法有保留？沒有明說，因為她自以為得勝了：

《不得不說的話》中指出的兩本書，大連出版社出版的牟曉朋、范旭倫所編《記錢鍾書先生》一書已由編者宣佈封存銷毀；另一書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該社有信來，現附於後。我認為，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態度是積極的，有益於出版工作的健康發展。現已明確，刪去的文字中有一句誣衆的話不是引據，而是編造。

該罵不該罵？

《錢鍾書印象》和《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所轉述的錢鍾書言論，未經本人認可，不能當真。在旁觀者看來，有的話也不像是錢鍾書說的。所以，錢鍾書不能對《錢鍾書印象》和《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負責。

不管《錢鍾書印象》和《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是誰講的，既然已經流傳，有必要對它的內容進行辨析。宗璞只求錢鍾書予以否

⁷ 王友琴：《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開放》，2010年1月號；又見《為什麼人們批評馮友蘭和宗璞？》，《名星》，第2期。

認。即使錢鍾書否認了，也不能清除已經植入人們頭腦的那些說法。

傳說錢對馮友蘭“罵了一大頓”，罵了兩點，有該罵的，也有不該罵的。

一點，說“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一點知識分子的節操觀念”。這是該罵的。

說馮友蘭該罵，首先是因為他自己就罵了自己，罵得不像人樣。他在文革中無情地揭發自己，又對毛澤東、江青頂禮膜拜、奉承諂媚，確實是“沒有文人的骨氣”。

假如這話是錢鍾書說的，他是有資格罵的。江青曾派人送燙金的大紅請帖給錢鍾書，請他參加國宴。他一口拒絕，說：“我不去，我不去，我很忙。”來人想出一個緩和的修辭：“就說你身體不好，怎麼樣？”他卻不給情面：“不，我身體很好，就是忙，不去。”

在一次會議上，王洪文污衊一些學者是“毒草”，要及時拔除。人群中有騷動，卻沒人敢站出來。錢鍾書突然站了起來，當面駁斥王洪文。說完，又大聲補充：“我是錢鍾書，我為我說的話負責！”會議還沒結束，王洪文被錢鍾書氣得提前離場。錢鍾書為此受到衝擊。有關方面讓錢鍾書做檢查。錢回了一句話：“要檢查沒有，只有一身老骨頭！”錢鍾書是有骨氣的文人。

楊絳也是有骨氣的文人。1966年，文革一開始，錢鍾書和楊絳都被群眾揪出來，成了“牛鬼神蛇”。楊絳還被人剃了“陰陽頭”。她連夜趕做了個假髮套，第二天照常出門買菜。錢鍾書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被人貼了大字報，楊絳就在下邊一角貼了張小字報辨誣。身為“牛鬼蛇神”的楊絳，竟敢貼小字報申辯！她立刻被揪到千人大會上批鬥。當時一起被批鬥的還有宗璞、鄒荻帆、李健吾等，其他人都低著頭，只有楊絳在被追問為什麼要替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翻案時，她跺著腳，臉漲得通紅，據理力爭：“就是不符合事實！就是不符合事實！”這老婦人的金剛怒目，讓許多人刮目相看。⁸

另一點，說馮友蘭“出賣朋友，致朋友被迫害而死”“捏造事

⁸ 《104歲楊絳：百年罕見之奇女子》，又見葉廷芳：《楊絳的亲情守望》。

实，坑人使妻小俱死”。這是不該罵的。

馮友蘭在哲學系沒有揭發過別人，更談不上“捏造事實”“出賣朋友”。“出賣朋友，致朋友被迫害而死”，如果指的是章廷謙，與事實不符。章廷謙在 1969 年被迫害時沒有死，他是死於 1981 年，離被迫害已有 12 年。

“坑人使妻小俱死”也與事實不符。章廷謙之“小”（幼子）章式 1967 年 12 月於兩派鬥爭中在昌平自殺。章廷謙之“妻”孫斐君（魯迅的日記和通信中多次提到“斐君”）因受此刺激而中風。這些都是發生在 1969 年章廷謙受迫害之前，而孫斐君直到 1990 年才去世。

有人說，馮友蘭給很多人寫過材料：“迫於壓力，1968 年 6 月開始，馮友蘭奉命寫《關於章廷謙的問題》。這類被揭發問題的對象還有陶先勳、楊西孟、伍啟元、馮契等。同時，馮友蘭奉命寫《關於楊石先的材料》，被寫‘材料’的還有：鄭壽齋、陳岱孫、黃子通、鄭毅男、陳定民、錢端升、屠守鐸、顧頡剛、辛樹幟、馮景蘭、張仲魯、白壽彝、馮鍾遼、藍浦珍、黃匡一、胡毅、李長之、卜德、陳銓、梅祖彥、湯佩松、婁成後等等。”⁹ 其中，馮景蘭是馮友蘭之弟，馮鍾遼是馮友蘭之子，馮友蘭大概還不至於“揭發”親兄弟和親子女，更談不上“出賣”。這些人之所以被寫“材料”，是文革中盛行的“外調”。對於被寫材料的人來說，只要經歷複雜，不管有無問題，都要組織“外調”；對於寫材料的人來說，完全是出於被動，並非主動“揭發”。

馮友蘭寫章廷謙的材料，也是屬於“外調”，但軍宣隊把它當作“揭發”，還是“證據”。北大中文系教授嚴家炎¹⁰作為“案件的見證人”，撰文澄清。他認為，馮友蘭與章廷謙的記憶互有出入，並非蓄意陷害。

在宗璞與楊絳的代理人戰爭中，有人又開闢了一個戰場。北大中

⁹ 李洪岩、范旭侖：《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龍去脈》。

¹⁰ 嚴家炎（1933—），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文系畢業的後生余傑的一篇文章，在孔慶茂的杜撰基礎上又進一步杜撰。他說：

據說 80 年代有一樁公案：錢鍾書訪美時，大罵馮友蘭人格卑鄙，“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出賣川島先生。馮是昔日西南聯大國民黨支部的負責人，當受到紅衛兵質問的時候，馮為了轉移視線，供出川島乃是一名隱藏的“國民黨黨員”。最後，導致了川島被迫害致死。對於錢鍾書的揭露，宗璞哪會接受？乃前去興師問罪，楊絳趕忙幫助圓謊說：“馮先生是錢先生的老師呀，怎麼會呢！”我想，按錢鍾書的脾氣，他說那樣的話不足為怪，不過他說的確實也是事實。¹¹

這一段話，始於“據說”。據何人、何時、何地所說？沒有出處，那就是據余傑自己說。終則斬釘截鐵地斷定“確實也是事實”，又將據自己說的宣佈為“事實”。所謂“事實”，幾乎每句話都是杜撰。

第一，“據說 80 年代有一樁公案：錢鍾書訪美時……”。錢鍾書訪美是 1979 年，宗璞和楊絳發生爭辯成為公案是 90 年代，恰好都不是 80 年代。

第二，“錢鍾書訪美時，大罵馮友蘭人格卑鄙，‘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出賣川島先生”。

這句話是雙重杜撰。錢鍾書訪美時，沒有說馮友蘭“‘文革’中為了保全自己而出賣川島先生”，錢鍾書沒有說，而馮友蘭也沒有做。

第三，“馮是昔日西南聯大國民黨支部的負責人，當受到紅衛兵質問的時候，馮為了轉移視線，供出川島乃是一名隱藏的‘國民黨黨員’”。這一句話就有 4 個杜撰。首先，馮友蘭曾任西南聯大文學院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不是整個西南聯大的國民黨負責人（也沒有“西南聯大國民黨支部”）。其次，“當受到紅衛兵質問的時候……”一句，好像余傑在場似的。事實上，馮友蘭沒有受到這樣的質問，他是

¹¹ 余傑：《漫話錢鍾書？》，《粵海風》，2002 年第 5 期。

在所寫的書面材料中涉及章廷謙的。再次，“馮爲了轉移視線，供出川島……”一句。馮首先承認自己是西南聯大文學院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他記得章廷謙也是，如何能轉移視線？最後“供出川島乃是一名隱藏的‘國民黨黨員’”，章廷謙早就交代參加過國民黨，無須馮友蘭“供出”；抗日時期的國民黨黨員完全是公開的沒有“隱藏的”。

第四，“最後，導致了川島被迫害致死”。這是重複了孔慶茂的杜撰。不過孔慶茂沒有提到馮友蘭。章廷謙在文革中“被迫害”時沒有“致死”，他是死於文革之後 5 年的 1981 年。

第五，“……楊絳趕忙幫助圓謊”。楊絳認爲錢鍾書“不可能”那樣說，她不認爲是錢鍾書說謊，何來“圓謊”？

短短一段話，不足 200 字，竟有 9 個杜撰！宗璞提出異議。余傑的老師嚴家炎告訴他，你說的不是事實。余傑答應“在適當的時候更正”，但“適當的時候”遲遲不來，於是嚴家炎發表了《川島“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宗璞發表了《遲到的話》，¹² 予以澄清。嚴家炎查閱檔案，厘清了事件的來龍去脈。

1968 年 5 月 24 日和 6 月 13 日馮友蘭寫的材料中說：“1939 年底或 1940 年初，由聯大文學院各系國民黨員組成的國民黨區分部選舉執行委員，當選的有我和章廷謙。”可見，並非專爲“揭發”章廷謙，而是敘述歷史，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也有他自己。

1968 年 7 月 26 日，馮友蘭和章廷謙進行了共同回憶，當面對質。關於章廷謙是否爲區分部執行委員，各說各話，馮說是，章說不是。

1969 年 8 月 10 日，召開“寬嚴大會”前，命馮友蘭寫證明材料，他還是按照原來的說法寫。後來，在處理章廷謙的申訴的時候，馮友蘭承認記憶“可能有錯誤”。1974 年 11 月 18 日，馮在寫的材料中說：“我是專憑個人的記憶。一個人的記憶是可能有錯誤的，如果我的記憶同其他同時在西南聯大的人記憶不合，特別是同有記錄的文件不合，那可能是我的記憶錯了。”

¹² 均見《粵海風》，2003 年第 4 期。

在很長的時期裏，馮友蘭並沒有懷疑自己的記憶。北大哲學系保存著一份馮友蘭 1958 年 12 月 12 日填寫的履歷表，在“參加過什麼反動組織”欄內，他是這樣填寫的：“1939 年我在昆明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當時偽教育部長陳立夫要求各大學的行政負責人都加入國民黨，我於是時第二次加入國民黨，介紹人是蔣夢麟。我當過一個學期的區分部執行委員，本校國文系教授章廷謙可以證明。”他是把同為國民黨區分部執行委員的章廷謙作為自己的證人提出來的。因此，莊因的《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中說的“馮友蘭捏造事實……”，定性不當。余傑的文章中臆測馮友蘭的揭發動機是“為轉移目標嫁禍他人”等，更是毫無根據。

嚴家炎認為，馮友蘭將章廷謙說成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是“記憶上的差錯”。章廷謙本人怎麼說？他也認為“是馮友蘭記錯了”，¹³不是如別人所說的“馮友蘭捏造事實”“出賣朋友”。

宗璞駁斥了余傑，同時也表示沉痛：“馮友蘭將川島先生一般國民黨員的身份錯記為區分部委員，給荒謬的文革更添了荒謬，對不起川島先生。我現在代表馮友蘭向川島先生和他全家鄭重道歉。願川島先生的在天之靈能不再受到騷擾，得到安息。願那場將千萬人置於鼎鑊之中的荒誕歷史成為永遠不能返回的夢境。”不是要章廷謙的長女章淹簽什麼字據，而是向包括章淹在內的章廷謙全家表示“鄭重道歉”，這就對了！

宗璞對於“不該罵的”，與人論理，咬住不放；對於“該罵的”，卻始終迴避，不置一詞。子曰：“父為子隱，子（女）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莫非這就是“當代孔子”馮友蘭的家訓？

¹³ 王友琴採訪林叢以後寫道：“中文系林叢教授告訴筆者，在章廷謙被手銬銬走前的某一天，當時他們都集中在北大 19 樓‘搞運動’。那時還準許回家。有一天回家的路上，章廷謙告訴林叢說：我很苦惱，他們非說我是聯大（指抗戰時期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國民黨區分部委員。沒有啊，就是吃了頓飯，就算參加了國民黨了。是馮友蘭記錯了，以為我是委員。”（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 S》。）

迫害章廷謙的罪責在誰？

莊因的《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中說：“馮友蘭捏造事實，坑人使妻小俱死。”如果指的是章廷謙，他之所以受迫害及禍延家人，是馮友蘭“坑人”所致嗎？

章廷謙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是轟動北大全校的事件。

1969年8月15日，北京大學在東操場召開萬人大會，是為“清理階級隊伍”¹⁴的第三次落實政策大會，簡稱“寬嚴大會”，以體現“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這次大會上，宣佈對18名“坦白”者從寬處理，法律系副教授甘雨霖作為“抗拒”者，從嚴處理，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¹⁵從寬處理者的代表發言，現身說法，敘述思想鬥爭過程，感謝黨的挽救云云。然後大會主持人說：“再給在場的反革命分子三分鐘時間，想好了，上臺來坦白交待。”3分鐘過去了，沒有人上臺。主持人疾言厲色地點名中文系副教授章廷謙，命他當場坦白。會場氣氛十分緊張。章廷謙方寸不亂，講得很簡短。他說，他在西南聯大時參加過國民黨，但不是區分部委員。如坦白不實，願受五雷轟頂。後來，“五雷轟頂”在北大成了流行語。看來事先在小會上有過交鋒，軍宣隊要他承認是區分部委員，他不承認；到了萬人大會上還是堅不承認。大會主持人說：“章廷謙在西南聯大時，不但是國民黨員，還是區分部委員，證據確鑿，有檔案為憑（沒有說以揭發為憑）。本來是歷史反革命，由於態度惡劣，從嚴處置，現在給他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進行法辦。”說完，馬上給章廷謙戴上手銬，塞進早就停在那裏的吉普車，絕塵而去。最後，軍宣隊的負責人遲群講話，說：

¹⁴ 這是北大的第二次“清理階級隊伍”。第一次是1968年9月以後，由4587部隊（63軍）的軍宣隊領導的，被中央定性為“擴大化”。1969年3月，8341部隊（中央警衛團）軍宣隊進駐後，又重新“清理”一次。

¹⁵ 甘雨霖的冤案在粉碎“四人幫”後得以平反。1980年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甘擔任陳伯達的辯護律師。（見《歷史的審判》，2頁，解放日報編輯部編印，1981年1月。）

現在站在群眾中應該從嚴的對象，不是一個、兩個，十個、八個。但為了給予坦白從寬的機會，今天就拿出這樣一個典型，做個參考。如對你們有參考價值，回去就向工宣隊竹筒倒豆子，老實交待問題，免得走上絕路。¹⁶

這是軍宣隊導演的一幕活劇，層層進逼，扣人心弦，造成強大的震懾效應。會前，一再宣佈延期，說是應有問題的人要求，為了徹底交代，需要思考時間。進行心理戰，造成對會議的期待。會後，各系、各單位進行討論，擴大戰果。

在討論會上，有問題的人表示“我要交待”，沒問題的人表示熱烈擁護。我在哲學系的討論會上發言：“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說，‘反革命也要講究規格’。章廷謙這個‘反革命分子’是不夠規格的。不錯，1950年頒布的《反動黨團分子登記條例》規定，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以上、三青團區隊長以上是歷史反革命，但同時還規定，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抗日戰爭時期的國民黨除外，因為這兩段是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是共產黨的友黨，不是反動黨派。”我說完，眾皆駭然，沒有人接我的話茬。我要求向軍宣隊指揮部報告，也毫無反應。¹⁷

¹⁶ 《北京大學紀事》，下冊，682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¹⁷ 從嚴家炎的《川島“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粵海風》，2003年第4期）一文得知，提出異議的不是我一個。他說：“特別令人吃驚的是，軍宣隊將川島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一案，直接違反了中共中央政法小組十二人文件規定的政策界限。該文件雖然將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三青團區隊長以上人員定為‘歷史反革命’，但同時卻明確地規定應將大革命和抗日戰爭兩段國共合作時期除外。這是因為，在國共合作時期，許多共產黨員和革命者都曾在國民黨內或國民黨政府內任職，如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擔任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代理部長，抗戰時期周恩來、郭沫若等都在軍委政治部內任有官職。如果僅按所任國民黨方面職務的高低定位，勢必造成極大混亂。具體到川島身上，即使他真是國民黨區分部執行委員，也不該違背中共中央規定將他劃作‘歷史反革命分子’。筆者在落實政策大會的當天，曾以戴罪之身就此問題向系軍宣隊負責人表示困惑與質疑。而在最近向當年參加專案組的教師調查時，竟然得知：1969年8月宣佈川島為‘歷史反革命’之前，專案組內部的教師（如索振羽）曾與軍宣隊負責人孫XX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有的教師（如馬振方）還寫長信向軍宣隊負責人申述不該將川島定為‘歷史反革命’的理由。”

即使馮友蘭揭發了章廷謙，章廷謙之所以受迫害及禍延家人，責任完全是在軍宣隊，不在馮友蘭。抗日時期所有的國民黨員和區分部以上的黨官都是公開的，何需揭發？揭發和不揭發意義是一樣的。

軍宣隊的責任在於：第一，抗日時期的國民黨不是反動黨團，國民黨區分部委員不是歷史反革命。章廷謙在 1950 年也沒有作為反動黨團骨幹分子進行登記。以抗日時期的國民黨區分部委員身份定“歷史反革命分子”，就是製造冤假錯案。第二，章廷謙的“歷史反革命分子”是不合規格的，對歷史反革命分子“從嚴”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更是錯上加錯。第三，軍宣隊宣佈對章廷謙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進行羈押，僭越了司法機關的職權，完全是非法的。

由於章廷謙不服，多次提出申訴，中文系黨總支於 1975 年 11 月進行復查。所謂“檔案為憑”是根據北大保衛組所存的《西南聯大國民黨組織情況》。這一文件來歷不明，不是原始檔案，既不是西南聯大檔案，也不是敵偽檔案，而是根據某人的談話編寫的。馮友蘭和鄭華熾所寫的材料作為旁證。這些證據是互相衝突的。《西南聯大國民黨組織情況》記載，當選為西南聯大文學院區分部委員的是 4 人：姚從吾、賀麟、雷海宗、章廷謙。馮友蘭所寫的材料說當選為區分部委員的是章廷謙和他本人兩人。時間也不一致。馮友蘭說是 1939 年冬或 1940 年初；北大保衛組的文件說是 1943 年；鄭華熒說是 1944 年 1 月。軍宣隊不調查核實，蠻橫武斷，輕率定案。復查中查閱了敵偽檔案，西南聯大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名單上根本沒有章廷謙。當年在專案組內部爭論時，中文系軍宣隊的負責人說：“關於章廷謙是否反革命的問題，我們要他是就是，要他不是就不是。”為了製造“典型”，章廷謙這個“反革命”，軍宣隊“要他是就是”。

1976 年 1 月 15 日，北大黨委（還是由 8341 部隊副政委王連龍擔任書記、對章廷謙“從嚴”的原黨委）批准中文系的復查意見，撤銷對章廷謙“從嚴處理”的結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時黨委正領導“反擊右傾翻案風”，卻不得不對自己定的案“翻案”。但還是羞羞答答的，“定案”是正確的，“翻案”也是正確的。到了粉碎“四人幫”以後的 1977 年 11 月 28 日，北大新一屆黨委正式做出《關於為

章廷謙同志的平反決定》，才徹底推翻了這一冤假錯案。

製造冤假錯案的“清理階級隊伍”

1968 年，4587 部隊軍宣隊所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對所謂有問題的人戴帽子、關“牛棚”，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導致 40 多人自殺。1969 年，8341 部隊軍宣隊進行糾錯所搞的“清理階級隊伍”，同樣也製造了許多冤假錯案，不過採用了比較巧妙的辦法。召開“寬嚴大會”，多數從寬，少數從嚴；不但從嚴的有冤假錯案，從寬的大部分也是冤假錯案。從嚴，是抓典型、造聲勢，進行威嚇。當時有一個口號，叫做“問題不在大小，關鍵在於態度”。問題再小，只要態度不好，也可以從嚴；只要對軍宣隊指出的問題不承認、不服帖，就是態度不好。問題再大，只要態度好，承認了，就可以從寬。像中文系的林燾，說他要炸水塔（未名湖畔的博雅塔），如果他不承認，章廷謙就是前車之鑒；他承認了，得到了寬大處理。其實是沒有的事，“他感到內疚，軍宣隊利用章廷謙作犧牲品製造恐怖氣氛的手段在他身上奏效了”¹⁸。

軍宣隊還揚言：“清隊”清出了“美國戰略特務”。此人是我們哲學系邏輯教研室的講師吳允曾（1918—1987 年）。吳允曾在 1946 年擔任北平軍調部美方的翻譯；共方的翻譯是王光美。文革中，專案組斷定王光美是“美國特務”，用逼供信的手段要求一些人提供證言，為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承祚、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等被迫害致死。北大軍宣隊從王光美推論吳允曾，他是美方翻譯，更應該是“美國特務”。做了一番“分析”，越說越嚴重，從一般“特務”又說成“戰略特務”。他們還杜撰了一個“美國戰略情報局”，認定吳允曾就是屬於這個機構的。軍宣隊找他談話，說：“證據確鑿，就看你交待不交待。”經過“打態度”“講政策”的車輪戰，吳允曾承認了，說是填過表，參加了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特務組

¹⁸ 王友琴：《林燾先生和文革歷史》，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織。問他幹過什麼壞事？他說沒有。

1970年8月，第六次“寬嚴大會”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北大農場召開。會前，軍宣隊通知吳允曾：“你的案子定下來了。明天將在大會上宣佈對你的從寬處理，你要發言，表個態。”

吳允曾找到我，他說：“參加美國特務組織是沒有的事，會上一宣佈，反而是無中生有。怎麼辦？”

我問：“那麼你是怎麼交代的呢？”

他說：“我一講話，他們就‘打態度’；我不講話，他們就‘講政策’。沒完沒了，精神上的壓力很大，我想快快結束這痛苦的日子，就承認了吧。但我留了個心眼，我說的是參加FBI（聯邦調查局），實際上是不可能的。美國在國外活動的是CIA（中央情報局），FBI只對內、不對外。

我心裏想，看你們怎麼拿出證據來。哪知道，他們不拿證據，只憑口供定案。”中國人只知道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都是美國的“特務組織”，不知道它們的分工。我也是到了美國才搞清楚的。

軍宣隊說拿到了吳允曾參加美國特務組織的證據，完全是訛詐。我對吳允曾做個手勢，手心朝上再朝下，示意他翻供。我對他說：“這一回你要頂住，不要一打態度又縮回去。”他點點頭。他向軍宣隊推翻了自己的口供，說明在中國是不可能參加FBI的。軍宣隊很尷尬，拿不出證據，又不甘罷休，開了一個幾十人參加的“攻心會”，打態度。吳允曾頂住了，不管怎麼吼、怎麼轟，他都不承認。他的案子沒有上“寬嚴大會”，但也沒有說他不是“美國戰略特務”。

1987年，吳允曾在北京去世時，我在南京。他特意要北大的人“告訴郭羅基”。他是不是要我為他澄清，還他清白？

吳允曾出身名門，祖父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吳昌綬；本人一生坎坷，終身未婚。學術專攻數理邏輯，1979年從哲學系調到計算機科學技術系任教授。晚年，他在數理邏輯的應用和計算機科學技術的結合方面，頗有成就。他沒有出國留學的經歷，卻把他的學問講到國外。在瑞士、德國、丹麥、美國的十幾所大學和研究所講學，獲得好評。只是“美國戰略特務”之冤，我想是他的心頭之痛，沒齒難忘。

借此機會，我代他昭告世人，吳允曾不是“美國戰略特務”！



吳允曾（1918—1987）（資料圖片）

所以，許多得到寬大處理的人，是因為害怕“從嚴”，在壓力下迫於無奈才承認的。一旦承認，就是在自己的歷史上留下了污點，再在“寬嚴大會”上宣佈，又在群眾中造成污名。在軍宣隊看來，從此知識分子的尾巴就翹不起來了。北大軍宣隊上送一個《關於清理和改造階級敵人的情況報告》，說：“初步查清北大前身（舊北大、燕大）中統、軍統、國民黨、三青團等 51 個反動組織；在現有 4711 名教職員工中，清出叛徒 3 人，特務 55 人（其中潛伏特務 17 人），歷史反革命 21 人，現行反革命分子 9 人（內含學生 1 人），地、富、壞分子 14 人，共 102 人，大部分人已定案處理。”現在看來，其中絕大部分是冤假錯案。

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馮友蘭有沒有揭發章廷謙，卻是轉移了對軍宣隊的譴責。章廷謙受迫害，責任完全在軍宣隊，不是馮友蘭“坑人”。

從 1968 年到 1976 年，軍宣隊、工宣隊統治的 8 年，是北京大學校史上，也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第十四章

道術多變遷，平生不老實

馮友蘭之所以成為“梁效”顧問，除了政治上的迎合與投機，也因為他有學問。毛澤東明知他不是“採取老實態度”的人，但既然他的學問對“批林批孔”有用，還是要用他。

馮友蘭的學問是在哲學方面，他是哲學家，首先是哲學史家。馮友蘭是中國為數不多的自成體系的哲學家之一。按他自己的說法，先是“照著說”，然後是“接著說”。照著歷史上的哲學家去說，梳理了中國哲學史；接著說自己的哲學，提出了“新理學”原理。他一生的學術上的價值，主要是在中國哲學史方面。¹其他的哲學家，有的在中國哲學史方面做了系統研究，但沒有提出自己的哲學原理；有的提出了自己的哲學原理，但沒有以系統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為基礎。馮友蘭的自成體系，首先在於從哲學史到哲學原理，一以貫之；而在哲學史和哲學原理方面，又各有體系，成一家之言。中國現代的非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有三大家，熊十力、金岳霖、馮友蘭。金岳霖說：

¹ 馮友蘭自認：“我的學術活動有兩個方面，一是哲學，二是中國哲學史。我是以哲學為主，以中國哲學史為輔。”（《馮友蘭學術著作精華錄》自序，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這或許是他本人的願望。事實上，他在學術界擔任理事、副會長、會長、顧問職務的，都是中國哲學史方面的學術團體。他的哲學著作還停留在20世紀40年代。晚年馮自稱以馬克思主義治中國哲學史，但沒有馬克思主義原理的哲學著作。他自己也有不同的說法，他在與美籍華人學者周質平的問答中說，平生最重要的著作是《中國哲學史新編》，學術觀點應以此為準。（《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下冊，924頁，北京，中華書局，2014。）

“哲學是概念的遊戲。”只能說，金岳霖自己的哲學是“概念的遊戲”。熊十力的哲學也是“概念的遊戲”。馮友蘭的哲學雖然是“概念的遊戲”，但與熊十力、金岳霖不同，他的服務對象十分明確，所以同時又是觀照現實的；否則不會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的最佳學術著作一等獎。他的“貞元六書”中的《新事論》論述“中國到自由之路”，這條路，“在道德方面是繼往，在知識，技術，工業方面是開來”。²這是早已被李大釗等批評過的“道德上復舊，物質上開新”的與新思潮對抗的路。當時胡繩指出，馮友蘭的中國走向自由之路，“原來就是五十年前張之洞的道路！”³杜國庠也指出，新理學是一種“幫閒哲學”，“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壓迫者，而鬆懈其鬥志，直接地替壓迫者維持其腐敗殘酷的統治，間接地阻礙社會的革新”⁴。馮友蘭自己在 1959 年回顧過去的哲學時承認，在現實中是“站在破壞著、死亡著、舊的、反革命的東西的陣線上，反抗創造中的、生長著的、新的、革命的東西”⁵。不過，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也應當承認，馮友蘭在抗日時期的哲學著作和學術活動，具有愛國主義的精神。

哲學史研究的開創之功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演講錄》中說，中國沒有哲學。黑格爾不識中文，沒有讀過中國的典籍。他對中國文化的瞭解不過是從中國回到歐洲的傳教士的轉述，免不了一派域外人的偏見。事實上，中國非但有哲學，而且古代中國的哲學超越了古希臘的哲學。古希臘的哲學家，有的說世界是水，有的說世界是火，有的說世界是空氣，等等。他們都是用具體事物來說明世界的。赫拉克利特說“人不能兩次踏足

² 《三松堂全集》，第 4 卷，365 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³ 胡繩：《理性與自由》，138 頁，北京，三聯書店，1951。

⁴ 林柏（杜國庠）：《玄虛不是人生的道路——再評馮友蘭〈新原道〉》，《群眾周刊》，第 11 卷第 1 期。

⁵ 《四十年的回顧》，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於同一河流”，被後人解釋爲了不起的辯證法思想。但這裏並沒有辯證法的概念，只有“河流”“踏足”等具體概念。古代中國老子的“道”、孔子的“仁”都是用抽象概念來表達哲學思想的。老子的“道”相當於“絕對觀念”，而它的提出比黑格爾早了 2000 多年。按照西方流行的黑格爾的說法，中國連哲學都沒有，當然沒有哲學史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確實沒有哲學史這一門學問，但不等於沒有哲學的歷史發展。追尋中國哲學的綫索，建構哲學史的知識體系，馮友蘭具有開創之功。好比滿地珍珠，把它們穿起來，就是一種貢獻，不管用的是金線、銀線，還是絲線、棉線。用馮友蘭自己的話來說，他“要在形式上無系統之哲學中，找出其實質的系統”。⁶

第一個開講中國哲學史的，不是馮友蘭，而是胡適。胡適自稱“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⁷ 1917 年，胡適從美國回來，在北京大學開講中國哲學史。1919 年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轟動一時，僅兩個月就再版。胡適配合新文化運動的高潮，在書中運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宣揚了民主思想和科學精神。金岳霖說，作者好像是一個研究中國哲學的美國人。馮友蘭當時是北大中國哲學門三年級學生，選了胡適的兩門課。胡適僅比馮友蘭年長 4 歲，卻是師生之序。馮友蘭得胡適的啟蒙，自覺“面目一新、精神爲之一爽”，治學的興趣由舊學轉向新學，並進而思考中西文化、新舊文化的矛盾和衝突。

但在中國哲學史方面，學生超越了老師。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原擬出上中下三卷，1919 年 2 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止於先秦）之後便無下文。1931 年馮友蘭出版了《中國哲學史》上卷，1934 年《中國哲學史》上下兩卷出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體系是很奇怪的。他將中國哲學劃分爲“子學時代”和“經學時代”，自孔子至淮南王爲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爲爲經學時代。春秋戰

⁶ 《三松堂全集》，第 2 卷，14 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⁷ 胡適之前，謝無量（1884—1964 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中國哲學史》六卷，民國五年（1916 年）初版，民國十三年（1924 年）第六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出版以後，暴得大名，以致常人只知胡適，不知謝無量；而胡適本人竟也無視謝無量。

國時期是諸子蠭起、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自由，學術繁榮。在經學時代，儒家學說已定為一尊，儒家的典籍變成了“經”，束縛人們的思想，所有的見解只能通過注疏“經”的形式表達出來。“子學”和“經學”既不是劃分時代的標準，也不是劃分哲學的標準，這是不成體系的“體系”。他不過是藉助這個生造的框架將中國歷史上的哲學思想敘述一遍。時人評說，此書“注意的是思想脈絡源流與獨到的見解”。這個體系是以中學的“子學”“經學”概念為體，以西學的“哲學史”概念為用。

1946 年，馮友蘭應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邀請，講學一年。事後，將講稿出版，書名為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又從英文譯成法文、義大利文、南斯拉夫文、捷克文、日文、韓文等 12 種文字，中文版定名為《中國哲學簡史》。海外學界經兩部馮著中國哲學史而瞭解中國哲學。所以有人說，中國人因有嚴復而知西方學術，外國人因有馮友蘭而知中國哲學。

1953 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卜德教授將馮著的《中國哲學史》翻譯成英文，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馮友蘭對胡適極為推崇，認為《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書”“胡適的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⁸

胡適對馮友蘭在哲學史方面的成就，褒貶卻頗為不公。1943 年 12 月 12 日，胡適讀到了在貴州印行的由張其昀主編的《思想與時代》雜誌，他的評價是：“此中很少好文章。”而該刊的主要撰稿人中就有馮友蘭。胡適接著說：“張其昀與錢穆二君均為從未出國門的苦學者；馮友蘭雖曾出國門，而實無所見。”⁹ 胡適日記 1950 年 1 月 5 日載：“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國哲學簡史》），實在太糟了。”¹⁰ 又 1955 年 1 月 24 日載：“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為此重看馮書兩

⁸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72~184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⁹ 《胡適日記全編》，第 7 冊，539~540 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¹⁰ 《胡適日記全編》，第 16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好處。”¹¹ 胡適曾對錢穆說過：“天下蠢人無出芝生（馮友蘭字）之右者。”¹² 其實，馮友蘭不蠢，而是胡適不智。胡適說過：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適對魯迅、郭沫若、梁漱溟等政敵、論敵，尚能做到“惡而知其美”的持平態度，但他對馮友蘭的態度，則完全不同。胡適對馮友蘭的心結，幾乎是終生不解。號稱自由主義者的胡適，何以對後生如此不寬容？臺灣學者翟志成認為：“被後進超越的失落和被學生‘背叛’的怨恨，致令胡適一腔子的不甘心不情願再加上不服氣，鬱結成了一團憤憤不平之氣。”¹³

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給出高度評價的，不是哲學家，而是一位科學家。《中國科學技術史》的作者李約瑟寫道：“馮著是當今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將長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視。儘管本書的研究方法只是諸多方法之一種，採用的材料也大多為其他中國思想史家所經常採用，但在眾多的中國學者和西方漢學家中，馮著的確堪稱翹楚之作。”¹⁴

在哲學家中，對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還有一種惡評。牟宗三說：“很早我就說他這本哲學史是‘膿包哲學’。”¹⁵ “膿包”何以成為評價哲學的概念？這一說法，除了表示牟宗三對馮友蘭哲學的鄙視以外，沒有任何思想內容。

牟宗三在新儒家中的地位猶不如馮友蘭，其所著《中國哲學十九講》遠不如《中國哲學史》，世所公認。如果馮友蘭的哲學是“膿包哲學”，比起馮友蘭哲學等而下之的哲學何以名之？牟先生已經過世，本人不能回答了；如有贊同牟先生說法的門生，不妨一試。

¹¹ 《胡適日記全編》，第 17 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¹² 錢穆：《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138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¹³ 翟志成：《被弟子超越之後——胡適的馮友蘭情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5 期，219~257 頁，2004 年 9 月。

¹⁴ 李約瑟：《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引自《李約瑟文獻 50 年》，下冊，475 頁，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

¹⁵ 牟宗三：《評馮友蘭〈中國哲學史〉》。

一種豈有此理的理學

馮友蘭自述：“在 40 年代，我開始不滿足於做一個哲學史家，而要做一個哲學家。哲學史家講的是別人就某些哲學問題所想的；哲學家講的則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學問題所想的。”¹⁶

馮友蘭繼承了程朱理學，運用西方哲學的邏輯方法，著書立說，自名為“新理學”。他接受西方哲學是從柏拉圖開始的。自云：“懂得了柏拉圖以後，我對於朱熹的瞭解也深入了，再加上當時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所聽到的一些新實在論的議論，在我的思想中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看法，這些看法就是‘新理學’的基礎。”¹⁷ 以後，他在西方哲學中轉悠，還是為了深入瞭解和充分發揮中國的傳統理學。他一度喜歡上法國柏格森的生命哲學。他的導師是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又免不了受實用主義的影響。20 世紀 20、30 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頗為時髦，也吸引了馮友蘭的注意。最後轉到新實在論，成為他在西方哲學中選擇的主要取向。他在西方哲學中吸收的是方法，用來改善傳統理學。“新理學”去掉一些花絮和裝飾，實質上還是傳統理學。馮友蘭的“新理學”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哲學標本。他自稱是“舊瓶裝新酒”實際上是“新瓶裝舊酒”。他稱他的“新理學”“它是最新底，同時也是最舊底”。¹⁸ “瓶”是最新的，“酒”是最舊的。當然，“新理學”中也可以看到將傳統哲學現代化、將西方哲學中國化的努力。

張岱年認為，當代中國哲學界最有名望的是熊十力、金岳霖和馮友蘭，三家學說都代表了中西哲學的融合。在熊氏哲學體系裏，“中”層十分之九，“西”層十分之一，金先生的體系可以說是“西”層十分之九，“中”層十分之一。唯有馮友蘭先生的哲學體系是“中”“西”各半，是比較完整的意義上的中西結合。這是中國人慣用的評論方法，什麼三七開、四六開、對半開。中國式的思維，在

¹⁶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284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¹⁷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212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¹⁸ 《三松堂全集》，第 5 卷，333 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需要量化的地方，一片模糊；在不能量化的地方，卻是刻意盤算。在馮友蘭那裏，中學和西學，不是量的比例關係，而是將西學融入了中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援西學入儒”。

馮友蘭的“貞元六書”，第一書是《新理學》；《新理學》是馮友蘭哲學體系的總綱。每書的書名都冠以“新”字，唯恐人們以為它“舊”。他先是“照著說”，照著古人說，現在要“接著說”了，說自己的。照著古人說“理學”，接著說自己的“新理學”；新是新了，還是理學，不過是在“理學”的舊枝幹上發新芽，“新理學”乃舊根柢。

理學把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形而上的理世界，一個是形而下的器世界。馮友蘭只是換了名稱，他把理世界稱為“真際”，把器世界稱為“實際”，認為“真際”是“實際”的根本，“實際”中存在的東西是“真際”中理的例證。所謂實際，是指事實的存在者；所謂真際，是指不存在而有者。馮友蘭認為，宇宙之間除了實際的事物之外，還有許許多非實際的有者，亦即真而不實者，不存在而有者。他的論證方法是把“真”和“實”“存在”和“有”做了區分，所謂“真而不實者”（另一面是“實而不真者”），“不存在而有者”（另一面是“有而不存在者”），完全是概念遊戲，無法在實踐中證明的。

馮友蘭認為，實際是科學的對象，真際才是哲學的對象，所以哲學是“不切實際，不合實用”的。但“哲學能使人成為聖人，這是哲學的無用之用”“也可以稱為大用”。¹⁹

從程朱的理學到馮友蘭的“新理學”，在哲學基本問題上毫無新意。他們都是從共相和殊相、一般和特殊的關係中，把共相、一般抽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存在。共相寓於殊相之中，一般寓於特殊之中，應是“理在事中”。理學和“新理學”主張“理在事先”“理在事上”。從時間上說，理先於具體事物而存在；從本原性來說，理是具體事物的根本。馮友蘭說：“一切的理，本來即有，本來如此。因某

¹⁹ 《三松堂全集》，第5卷，159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種實際底事物之有，我們可知某理之有，但某種實際底事物之無，我們不能因此即說某理之無。反過來說，如無某理，我們可斷定必無某種實際底事物，但有某理，我們不能斷定即有某種實際的事物。”²⁰在他看來，理之有無不依賴於實際事物，實際事物之有無依賴於理。

常人都會問：未有此事，豈有此理？新舊理學認爲：“有！”“未有此事，先有此理”。這真是一種豈有此理的理學。

“新理學”的矛盾

馮友蘭說：“形而上學的理，有即有，無即無，不能是先有而後無，或先無而後有。例如飛機之理，如其有，則本來即有。所謂創造飛機者，不過發現其理而依照之以作一實際底飛機而已。”²¹馮友蘭認爲，在飛機出現之前，飛機之理即已存在於理世界中。未有飛機，飛機之理是從哪里來的？事實上只能先有製造飛機的動機，製造成功，有了飛機，才有飛機之理。試以汽車的製造爲例，更能說清楚。製造汽車之前，先是有了馬車，又有了發動機。人們在思維中將馬車和發動機結合，產生了製造汽車的動機；製造汽車的動機指導製造汽車的實踐。如果在實踐中失敗，造不出汽車來，根本不會有汽車之理；在實踐中成功，造出了汽車，才有汽車之理。從汽車博物館中可以看到人的思維的痕跡：最早的汽車就是馬車前面按個發動機。按馮友蘭的說法，未有汽車，先有汽車之理，汽車之理即已存在於理世界中。非也。未有汽車，只能先有馬車之理和發動機之理；馬車之理和發動機之理，來自現實的馬車和發動機。有了汽車，才有汽車之理，而汽車之理來自現實的汽車，並非早已存在於理世界中。

馮友蘭在 20 世紀 30 年代提出的問題“先有飛機還是先有飛機之理？”曾引起廣泛的討論。晚年他又說：“這個問題的提法是不對的。有飛機之理之‘有’是‘無存在而有’之‘有’，有飛機之

²⁰ 《新理學》，第 1 版，55 頁，1939。

²¹ 《新理學》，第 1 版，115 頁，1939。

‘有’是實際的‘有’。這兩個‘有’字意義不同，不能相提並論。”²² 他把理學的“有”的意義貫徹到底了，理學的荒謬性也徹底暴露了。原來，按照理學的觀點，“先有飛機之理，然後才有飛機”這句話是不能說的。所以，導致一個荒唐的結論：理學的基本命題“理在事先”是違反理學的；因為理的“有”和事的“有”意義是不同的，不可論先後。這是理學理論上的內在矛盾。

“理在事先”也可以說是“理在物先”“未有此物，先有此理”；也可以說是“理在人先”“未有此人，先有此理”。總而言之，“理在世先”“未有此世，先有此理”。這就是理學的世界觀。理學如何對待世界？曰：“存天理，滅人欲。”這是理學的方法論。理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又是矛盾的。按“未有此 X，先有此理”的公式，應該是“未有人欲，先有人欲之理”。故“滅人欲”，必先滅人欲之理，即滅天理。“存天理”也需存人欲之理，即存人欲。“存天理，滅人欲”這個命題，同時蘊含著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存天理，存人欲”或“滅人欲，滅天理”。究竟要存什麼、滅什麼？發出的飛鏢，繞回來，指向了自身。理論不能自洽，何以服人？

揭露一種錯誤的理論、學說，除了指出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還要把它放到實踐中去檢驗。馮友蘭的“新理學”，繼承了舊理學的內在矛盾，也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梁效”曾發表一篇大批判文章《孔丘其人》，這是經“顧問”馮友蘭“把關”的。

按馮友蘭的理論，“在無量的理中，有人之所以爲人之理”。²³ 孔丘之爲孔丘，有孔丘之所以爲人之理。而且根據新舊理學“理在事先”的說教，“未有此人，先有此理”。未有“孔丘其人”，先有“孔丘其人”之理。因此，批判“孔丘其人”就是批判先於“孔丘其人”之理。“批孔”違反了天理。馮友蘭的“批孔”的實踐，與“新理學”理論陷入的了不可克服的矛盾。這種矛盾在馮友蘭自己身上更爲尖銳。

²² 《中國現代哲學史》，202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²³ 《新原人》，第1版，174頁，1943。

按照“新理學”，未有“馮友蘭其人”，先有“馮友蘭其人”之理。馮友蘭的父母在哪里先找到“馮友蘭其人”之理，然後才製造出馮友蘭其人？馮友蘭的父母不一定信仰“新理學”，或許可以不回答。但是，馮友蘭之女馮鍾璞，也必定“理在人先”。馮友蘭在哪里先找到“馮鍾璞其人”之理，然後才製造出“馮鍾璞其人”？馮友蘭本人從來沒有回答，沒有以自己的理論來解釋自己的實踐。馮鍾璞哲學修養不足，恐怕不能回答；那就請贊同、頌揚馮友蘭“新理學”的人們代為回答。

馮友蘭把“新理學”寫進了《中國現代哲學史》，未蓋棺先論定，而且由自己給自己論定。

金岳霖說：“哲學是概念的遊戲。”馮友蘭說：“我們兩人的體系，顯然都是‘概念的遊戲’。”馮友蘭從理出發推導出四組概念。

“新理學”的哲學體系“是由四組概念組成的：第一組是理，第二組是氣，第三組是道體，第四組是大全。”²⁴ 這個體系就是從理推導出來的“概念的遊戲”所形成的煩瑣哲學。

馮友蘭自己也認為這一套煩瑣哲學在現實生活中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又說它的用處是提高人的境界，此乃無用之大用。這是中國唯心主義哲學的傳統，不是面向外部世界，而是“向內用力”。提高人的境界就可以為“聖人”，“聖人”就可以“為王”。煩瑣哲學自有它的服務對象。

馮友蘭自稱，“新理學”“它所講的，還是‘內聖外王之道’，而且是‘內聖外王之道’的最精純底要素。”²⁵

“內聖外王”是由抽象推理形成的虛假判斷。他說：“……專憑其是聖人，即能作王。而且嚴格地說，只有聖人最宜於作王。所謂王，指社會的最高首領。”²⁶ 這是販賣柏拉圖的主張。柏拉圖在他虛構的《理想國》中，是由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學王”擔任統治者的。

²⁴ 《中國現代哲學史》，233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²⁵ 《新原道》，第1版，123頁，1944。

²⁶ 《新原道》，第1版，123頁，1944。

他認為，具有最高智慧的人應當掌握最高權力，由“哲學王”為社會做決定才是合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推論，僅僅適用於“理想國”。柏拉圖的理論在他自己身上就不靈驗。柏拉圖可算是一代“哲學王”了，但在古希臘的民主政治中沒有人選他為統治者。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哲學王”擔任統治者，也從來沒有一個統治者是“哲學王”。在中國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外王”具有“內聖”的智慧和德行，也從來沒有一個“內聖”具有“外王”的權力和威風。具有智慧和德行的“內聖”與擁有權力和威風的“外王”，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產生的兩種不同的人才，而且不可得兼。智慧和德行並不能轉化為權力和威風；權力和威風也不是來自智慧和德行。馮友蘭曾說：“知識就是權力。”（《從周易研究談到一些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哲學研究》，1963年第3期。）這是從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套用出來的。“力量”和“權力”顯然意義不同。馮友蘭的斷語沒有一點論證，是武端、妄斷。劉邦本是市井無賴，無知無識，卻成了“威加海內”的漢朝高祖；朱元璋識字不多，也是無知無識，卻成了明朝的開國太祖。而像趙佶（宋徽宗）、李煜（李唐後主）這樣有知識的文人當了皇帝，往往是亡國之君。馮友蘭鼓吹“內聖外王之道”，無非是向統治者推銷他的哲學。他的本意顯示在下面一段話中：“哲學能使人成為聖人。”“如果聖人最宜於作王，而哲學所講底又是使人成為聖人之道，所以哲學所講的，就是所謂‘內聖外王之道’。新理學是最玄虛的哲學，但它所講的，還是‘內聖外王之道’。”²⁷

雖說“新理學是最玄虛的哲學”，但馮友蘭向“首領”講“內聖外王之道”還是很具體的。他說：“首領是有權者，權之表現為賞罰。法家謂賞罰為二柄。這是當首領底人驅使群倫底兩個工具，也可以說是一個工具的兩方面。作首領的人譬如一個趕西洋式馬車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車上，讓馬拉車走。他看那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見那馬走得快，晚上就多予它一點草料。他所作的事，只是如此。他用不著下車來幫馬拉車。”“一個趕馬車的人，固然不需下車代馬拉車，亦不可如此。但對於他的整個馬車，若不時時刻刻留意當心，他

²⁷ 《新原道》，第1版，123頁，1944。

的車或會翻入溝中。一個作首領的人，對於他所統帥的人群，亦是如此。”²⁸ 馮友蘭的“內聖外王之道”，就是高高在上，揮動鞭子，手執賞罰二柄，驅使群倫。新儒家馮友蘭借助法家的“賞罰二柄”完成了他的“內聖外王之道”，也是外儒內法。

20世紀80年代，馮友蘭經過反思，改變了看法。他認為，“理和事”是共相和殊相的關係問題。人的思維可以把具體事物中的共相加以抽象，但不可能在實驗室裏把共相的存在分離出來。“理和事，內涵和外延，本來就是合在一起的。只是人的思維對它們加以分析，才顯示出它們的分別和對立。這是一個關於認識的問題，並不是一個關於存在的問題。就存在來說，本來沒有誰先誰後、誰上誰下的問題。其所以有這些問題，就是因為把關於認識的問題與關於存在的問題混淆了。”²⁹ 這一段話，指出了一切客觀唯心主義的失足之處。因為馮友蘭的“新理學”把認識問題和存在問題混淆了，故他的哲學體系是沒有認識論的。他的結論性意見是：“‘新理學’雖不是臨摹柏拉圖和朱熹，卻也犯了他們的錯誤：那就是‘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現在我開始認識到，‘理在事中’是正確的。”³⁰ “新舊理學的‘理在事先’‘理在事上’的主張，是使他們成為客觀唯心主義的主要原因。”³¹ 這樣說來，馮友蘭拋棄了客觀唯心主義。但他在做人生總結的時候，又欣賞起他的“新理學”來了。

重寫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最後的成就是完成了《中國哲學史新編》，共7卷。《中國哲學史新編》比起《中國哲學史》，無論在體系上、內容上都前進了一大步。

²⁸ 《新世訓·應帝王》，第1版，189頁，1940。

²⁹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93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³⁰ 《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258頁。

³¹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191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1949 年，馮友蘭致書毛主席，即表達了重寫中國哲學史的願望。他說：“解放以後，提倡向蘇聯學習。我也向蘇聯的學術權威學習。看他們是怎樣研究西方哲學史的。學到的方法是，尋找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作為條條框框，生搬硬套。就這樣對付對付，總算是寫了一部分《中國哲學史新編》。”60 年代，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1 卷、第 2 卷。他接著說：“到了 70 年代初期，我又開始工作。這個時候，不學習蘇聯了。對於中國哲學史的有些問題，特別是人物評價問題，我就按照評法批儒的種種說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³²

1962 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1 卷出版的時候，他在題詞中說“此關脫胎換骨事，莫當尋常著述看。”馮友蘭“自以為不錯”了，自得地賦詩云：“千年留得青春在，長為遊人送好風。”後來，文化大革命使他認識到，原來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不是“好風”，而是“惡風”。經過文革，他自稱“階級立場、世界觀有所轉變”，已經“換得神仙骨”，又賦詩云：“若非換得神仙骨，怎別惡風與好風。”³³又一次脫胎換骨。文革之後，他再次蛻變，認識到所謂“神仙骨”是“嘩眾取寵”的媚骨。對於 60 年代出版的《中國哲學史新編》和 70 年代的修改不滿意了，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修改。至 1985 年 3 月，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修訂本 3 卷。

1985 年，馮友蘭決心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已經出版的兩個版本棄之不顧，從頭開始。這一回，馮友蘭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重寫《中國哲學史新編》的，而且頗有雄心，要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未來發展提供“營養”。1982 年 9 月 10 日，他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贈予儀式上發表演講，說：

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其一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為現代中國服務的包括各方面的廣泛的哲學體系，會需要中國古典哲學作為它的來

³²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自序》，《三松堂全集》，第 8 卷，1 頁。

³³ 馮友蘭：《文化大革命給了我深刻的教育》，《新北大》校刊，1976 年 5 月 25 日。

源之一嗎？我看，它會需要的。

我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有一項新的任務。它應當不僅是過去的歷史的敘述，而且是未來的哲學的營養。³⁴

而且，這一回馮友蘭意志堅定，不再趕時髦，不再奉命寫作。他說：

……我確是照我所見到的寫的。並且對朋友們說：“如果有人不以爲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爲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書達數百卷，沒有人能爲他出版；幾百年以後，終於出版了，此所謂“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筆垂”。³⁵

果然，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的前 6 卷，卻不再出版第 7 卷。而馮友蘭本人看重的正是第 7 卷：

《新編》計畫分 7 冊，我已經寫到第 4 冊，重點在第 7 冊，它是全書的中心和歸結點，講的是現代問題，即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前 6 冊實際上都是第 7 冊的準備和鋪墊。馬克思主義有三個來源，德國古典哲學是其中之一。中國特色的精神文明也應該把中國古典哲學作為來源之一，這是一定的。我的這部書，就希望能闡述這個問題。³⁶

收入《三松堂全集》的《新編》第 7 卷則刪掉了第 77 章《毛澤東和中國現代革命》。終於，不待幾百年，1991 年在臺北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7 卷；2004 年在中國大陸以單行本《中國現代哲學史》的名義出版了《中國哲學史新編》第 7 卷。馮友蘭的書稿中，“有人不以爲然”的是什麼？那就是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論。

³⁴ 馮友蘭：《馮友蘭自述》，287 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³⁵ 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自序，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³⁶ 薛湧：《耄耋之年撰新篇——訪馮友蘭》，《文匯讀書周刊》，1985 年 6 月 29 日。

馮友蘭這樣評論毛澤東：“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並且被認為是思想上的領導人。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有權威的人。在幾十年中，他兼有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君、師’的地位和職能。因此，他在中國現代革命中，立下了別人所不能立的功績，也犯下了別人所不能犯的錯誤。”

他把毛澤東思想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新民主主義及以前階段，二、社會主義階段，三、極左思想階段。他認為：“毛澤東思想發展的三個階段，其性質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階段是科學的，第二階段是空想的，第三階段是荒謬的。第二階段之所以說空想的，是因為革命的領導者認為，上層建築可以決定經濟基礎。這是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則直接違反的。”馮友蘭指出，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根據中國社會的性質，規定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取得政權以後，50年代過早地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實際上是兩步並作一步走，回到被他批判過的“畢其功於一役”。“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特別有‘駁左傾空談主義’一節，曾幾何時，毛澤東也走上‘左傾空談主義’的路了。”毛澤東由左傾而達於極左，表現為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所講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是‘空想’的共產主義，而且是反歷史的‘共產主義’。”³⁷馮友蘭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進行批評的。

馮友蘭開始重寫中國哲學史時已經85歲了，計畫中的全書有7卷之多。有人怕他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建議他直接從第4卷開始。但馮友蘭堅持重頭開始。生命的最後10年，他以老病之軀寫作不輟。後來幾乎耳聾眼瞎，仍在涂又光的協助下，繼續堅持。頑強的寫作意志激勵了他的生命力。數度出入醫院，苦苦掙扎，出死入生。他說，書寫完了，有病也不醫了。1990年6月15日，他寫完了第7卷；7月16日，他將最後的稿件交給了人民出版社。3個多月以後，他就離世了。1990年12月4日本是馮友蘭95歲華誕。北京大學哲學系已籌備了祝壽活動。

³⁷ 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157~162頁，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9月3日，馮友蘭往臺北發了一封唁電，弔唁錢穆去世。月底，馮因呼吸道感染，住進友誼醫院。11月初，病房裏還沒送暖氣，馮友蘭抗不住寒流，得了肺炎；到18日，馮友蘭已經不能張嘴吃飯；24日，情況似乎有所好轉，能吃東西了；兩天之後的26日病情加劇，開始吸氧，並於當天病危，晚上8點45分，馮友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一天，離馮友蘭的95歲壽辰還差7天。預先籌備的祝壽變成了葬禮。

給自己做總結

1990年3月馮友蘭就為自己預擬了95歲壽聯：“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去世以後刻於墓碑。



馮友蘭葬於北京萬安公墓，圖為墓碑的正反面，兩面碑文均為高爾泰所書

馮友蘭活了將近一個世紀。

馮友蘭的為人、為學，突出一個“變”字，應變，善變，多變。

青年時代，馮友蘭從理學出發，追隨柏拉圖、伯格森、杜威、維也納學派、新實在論。這是探索時期。探索的結果，有了一定之規。

“貞元六書”、哲學二史的行世，塑造了定型的哲學家馮友蘭。1949年後是一大變，批判“貞元六書”，批判中國哲學二史，實行自我否定。馮多次在國內外公開表示“新理學”是“舊哲學的回光返照”，是“反人民”的，是“要人一心一意擁護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和國民黨政權”“我過去的著作都是沒有價值的”。他所進行的是政治批判，沒有從哲學上清算“新理學”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政治氣氛一變，也可能變回去。

馮友蘭在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大變，從尊孔的新儒學變到“批孔反儒”。他說：“過去我的立場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立場。我的世界觀和所走的路線，都是復古主義的，其突出的表現，就是尊孔。過去我在哲學上的寫作和行動，都是同當時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來，為當時的復古主義的反動路線服務的。”“我是五四運動的人，可是我擁護孔家店。經過五四運動，封建式的擁護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資產階級的方式，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寫的那部《中國哲學史》以及抗戰時期所寫的宣揚儒家垃圾的那些書。這就同蔣介石的尊孔配合起來，為國民黨反動集團統治服務。解放以後，資產階級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義的方式，其具體表現，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寫的那半部《中國哲學史新編》。這就同劉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來，為他們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服務。”³⁸ 需要補充的是，尊孔的方式又不行了，他就採取“批孔”的方式，認為自己能參加“批孔”運動是一種“更大的幸福”。

最後，馮友蘭重新肯定“貞元六書”和中國哲學前二史，果然又變回去了。

馮友蘭的“三史”，前二史是以新實在論“釋今古”，後一史是以馬克思主義“釋今古”。究竟以何者為準？“六書”本是在 20 世紀 30 年代到 40 年代“紀貞元”，從 50 年代到 80 年代已經被自己所

³⁸ 馮友蘭：《“克己復禮”是復古主義路線的核心》，《新北大》校刊，1974 年 2 月 3 日。

否定，到了 90 年代，最後做總結的時候，怎麼又回到“紀貞元”了呢？

馮友蘭在《贈王浩詩》中解答自己的多變，說：“若驚道術多變遷，請向興亡事裏尋。”原來，他的道術變遷不是發自內心，而是在“興亡事裏”見機行事。他早年說過：“一個哲學家之哲學與其自己之人格或個性有大關係。”³⁹ 此時，他還沒有多大變遷，等他經歷了多變之後，他就回避“一個哲學家之哲學與其自己之人格”的關係了。

馮友蘭的問題還不在於多變，而是變得反復無常。

在“三史釋今古，六書紀貞元”的背後，隱藏著另一聯：“道術多變遷，平生不老實。”

高智商，低人格

馮友蘭是屬於高智商、低人格一類人，陷入頭腦和心靈、智慧和德行的矛盾和衝突。他的一生，學術上是巨人，政治上是小人。他的“應帝王”的學術趨向影響了他的政治態度，他的依附的政治態度又決定了他的學術流變。有人只是從學術上看問題，以為他是巨人；也有人只是從政治上看問題，以為他是小人。兩者都是不全面的。

馮友蘭平時的為人就有人格缺陷。抗戰之前，清華教授之間流行一句笑話：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意思是，岱孫（陳岱孫）怎麼說，事情就怎麼做；事情怎麼做，芝生（馮友蘭字芝生）就怎麼說。1949 年以後，人格缺陷放大了。

海內外學界對馮友蘭的應變、善變、多變，大多感到錯愕、惋惜和不齒。最早的批評者是張君勣。1950 年 8 月，他在香港《再生》雜誌上發表了《一封不寄信——責馮芝生》。看了馮友蘭發表的《學習

³⁹ 《三松堂全集》，第 2 卷，14 頁，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與錯誤》一文之後，張君勣“身發冷汗，真有所謂不知所云之感”。接著，張君勣評說：

足下讀書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即令被迫而死，亦不失為英魂，奈何將自己前說一朝推翻，而向人認罪，徒見足下之著書立說之一無自信，一無真知灼見，自信不真而欲以之信人，則足下昔日之所為，不免於欺世。

他將馮友蘭比為五代時的“常樂老”馮道。責問：足下竟不識人間尚有羞恥事乎？⁴⁰

同一時期，海外對梁漱溟的評論完全不同。1952年2月27日，胡適在報紙上讀到《梁漱溟不肯洗腦》的報導，十分感歎，忍不住在日記中寫道：

漱溟今天的行為也是“殉道者”（martyr）的精神，使我很佩服。“不能自不通處變”，不能“自昧其所知以從他人”，都是很可敬的。⁴¹

我出國後，常聽到美國的華人說，中國大陸有“四大無恥文人”。哪“四大”？其說不一。但無論哪個版本都有馮友蘭。我嘗試到google搜索，有沒有“四大無恥文人”，一搜，蹦出647,000條搜索結果，條條都有馮友蘭。google在中國是禁入的，我又進入中國的搜索引擎“百度”，“四大無恥文人”也有59,000條搜索結果，四種不同的版本都有馮友蘭。

也有為馮友蘭辯護的。陳來⁴²在《一介書生周一良——兼為馮友

⁴⁰ 張君勣：《一封不寄信——責馮芝生》，發表于《再生》1950年8月號，收入藍吉富《當代中國十位哲人及其文章》，66~70頁，臺北，正文出版社，1969。

⁴¹ 《胡適日記全編》，第8冊，219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⁴² 陳來（1952—），1978年入北京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師從張岱年、馮友蘭，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現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

蘭辯護》（《讀書》雜誌，1999年第6期）一文中說：

外間對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勢皆需身置此特殊時代特殊環境始可瞭解，豈可以常情而臆議之。需知，馮先生、周先生當時之參加大批判組，並不是先知其不對而參加之，而是信其正確而參加之。我們論及那時的事蹟，決不能脫離當時絕大多數人共有的“覺悟”水準。回想三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上的決定”，這些字在人們心中的分量，哪是今天三四十歲以下的青年所能想像。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發動的，以當時絕大多數人的思想來說，只有緊跟的心情，哪有懷疑的餘地。那個時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處，也多認為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遠矚，而儘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⁴³

陳來為馮友蘭辯護的根據是“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但在同樣的環境中，也有不同的表現。

西南師範學院教授吳宓⁴⁴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公開聲稱：“批林，我沒有意見；批孔，寧可殺頭，我也不批。”因此被打成“現行

⁴³ 陳來自云：“我的表現總是最能適合主流的價值系統的要求和期望。”（陳來：《我比同輩快半拍——回憶馮友蘭、張岱年先生的風範》，中國戰略與管理網）他為馮友蘭的辯護就是最能適合文革的“主流的價值系統的要求和期望”。陳來是後來入行的。如果當年他在哲學系，也可能是“梁效”的成員；如果今後再來一次文革，他必定是“梁效”的成員。他為馮友蘭、周一良辯護，也是為自己的人生哲學和政治態度辯護。

⁴⁴ 吳宓（1894—1978年），陝西涇陽人。早年留學美國，在哈佛大學取得比較文學碩士學位，與陳寅恪、湯用彤被中國人稱為“哈佛三傑”。1921年回國，歷任東南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四川大學、武漢大學等校教授。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先驅，在高等學校首開比較文學課程，並運用其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文學。50年代以後長期在西南師範學院任教，晚景不佳。吳宓著作不多，但在大學中開設過近30門課程，知識廣泛，博古通今。1922年與梅光迪、柳詒征等創辦《學衡》雜誌，任總編輯。歷11年，共出版79期，對於新文化運動取保守立場，與胡適長期爭論，人稱“學衡學派”。文革中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批判。身在“牛棚”，竟寫下“我罪實質，是認為中國文化極有價值，應當保存並發揚光大”。因反對“批孔”，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受迫害致殘。

反革命分子”。⁴⁵

吳宓的另一條反革命罪狀更為離奇。吳宓日記記載，有人貼他的大字報：“外語系汪興榮之揭發，多紙，章節區別，書寫工整，惟如宓恨吸紙煙人一條，彼插言‘毛主席亦吸煙者’，宓實未聞知，仍續宓前言云‘欲殺吸煙人之苦我者’，今乃指判為‘宓蓄意刺殺毛主席’，則太嚴重矣……”⁴⁶ 因為吳宓恨吸煙者，“毛主席亦吸煙者”，判他為“蓄意刺殺毛主席”。完全是荒謬的推理。

陳來所說，“身置此特殊時代特殊環境”“只有緊跟的心情，哪有懷疑的餘地”，至少對吳宓來說不適用。文革之初，教師“牛鬼蛇神”小組同仁勸告吳宓，“今茲自保、自救之術，首應與眾混同，不可在服飾言動之任何小節，與一般人有所別異”“更論思想、立場、態度，則宓必須誠心認識自己過去一切之錯誤……必如此，然後方能望‘走到毛主席思想路線上來’，而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得免於覆亡之災禍者也”。吳宓當晚在日記中記下此事後評說道：“按，諸君之勸告，亦是善意忠言。然若衣飾形貌之見於外者，宓尚可以改；其學術思想之在內心、精神者，宓實不願改，且不能改也。禍福死生，聽之而已矣！”⁴⁷

中山大學教授容庚⁴⁸也是在“特殊時代特殊環境”中的不妥協、不屈服者。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有人勸他認清形勢，批判孔子。容庚回答：“我寧可去跳珠江，也不批判孔子。”⁴⁹

在文革中抵制和反對“批孔”的，當不止吳宓、容庚二人。可見，以“特殊時代特殊環境”為馮友蘭辯護，不足為憑。但如梁漱溟、吳宓、容庚那樣旗幟鮮明地抵制和反對“批孔”的畢竟是少數，

⁴⁵ 吳學昭（吳宓之女）：《吳宓：批林我沒意見，批孔殺頭也不批》。

⁴⁶ 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第7冊，46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⁴⁷ 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續編》，第8冊，345頁。

⁴⁸ 容庚（1894—1983年），廣東東莞人。為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文物鑒定家，歷任燕京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教授。

⁴⁹ 徐百柯：《容庚：甯跳珠江，不批孔子》，中國青年報網站，2005年5月25日。

多數人也僅止於沉默、敷衍。馮友蘭則不同，他從尊孔的代表人物變為“批孔”的代表人物，是主動迎合，賣身投靠。

馮友蘭之女宗璞的辯護，反而成了揭露：

進“梁效”也是北大黨委來調動的，這是組織調動，能不去嗎？不僅我父親，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應該理解。一來沒法拒絕，二來那時候認為是黨的信任，是很光榮的。⁵⁰

馮友蘭賣身投靠在前，“組織調動”在後。“組織”選中馮友蘭是有原因的。“一來沒法拒絕”，馮友蘭有過拒絕的念頭嗎？這是虛設的假定。“二來那時候認為是黨的信任，是很光榮的”，這才揭露了問題的實質。馮友蘭賣身投靠就是為了取得“黨的信任”，經“組織調動”參加“梁效”就是坐實了“黨的信任”。這一切，都是追求“光榮”。

也有盲目同情的。周有光（1905—1917年）老先生說：

馮友蘭是很有學問的，研究中國哲學是很深入的。我不研究哲學，可是他的書我都看過，他的書水準很高。馮友蘭後來被“四人幫”搞進“梁效”寫作班子，是在壓力之下被迫的，不能怪他。古代羅馬法也講，在壓力之下做出的事情，被迫做的壞事，是沒有責任的。從這個原理出發，應當原諒他。⁵¹

說馮友蘭進“梁效”“是在壓力之下被迫的”，完全不符合事實。還是他的女兒宗璞說得對，馮友蘭進“梁效”是得到“黨的信任”“是很光榮的”。他在“批林批孔”中做的壞事，不能說“是沒有責任的”。

國內的辯護者往往從文革的主流價值系統出發，肯定“毛主席的指示”“組織上的決定”，因而只能“緊跟”；海外的某些論者從批

⁵⁰ 宗璞：《馮友蘭之女撰文洗冤：父親從未寫詩吹捧江青》（3），人民網-文史頻道，2011年01月13日。

⁵¹ 周有光、馬國川對談：《知識分子沒有被收買》，財經網，2017-01-14。

判“那個時代的極左政權”出發，也能找到爲馮友蘭辯護的理由。

有一位海外論者周質平說道：

今天我們論馮友蘭，與其把他的多變和善變歸咎到他的骨氣上，不如說那是一個不允許任何人有獨立人格的時代。

類似對馮友蘭的批評文章散見各處，其結論大抵不出無恥逢迎。我在此絲毫無意爲馮友蘭許多令人齒冷的作為作任何辯護，我只想指出一點：即在論人時過分的“氣節掛帥”，實際上也就是“政治掛帥”。⁵²

已經在爲馮友蘭辯護，卻說“絲毫無意爲馮友蘭……作任何辯護”。論者繼續在“氣節”問題上做文章：

過分在氣節上求全生活在那個苦難時代的知識份子，都不免是爲那個時代的極左政權在作開脫。

說顛倒了。像梁漱溟、吳宓、容庚那樣堅守氣節的知識分子，才是在反抗“那個時代的極左政權”，而像馮友蘭那樣的沒有氣節的知識分子，不但“爲那個時代的極左政權作開脫”，而且正是極左政權的支持者、維護者。周先生還說：

在這樣悲慘的情況下，若依舊以氣節求全知識份子，實無異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來義正辭嚴，骨子裏卻充滿著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殘酷！

同一作者在另一個地方還說，以氣節論人“這不正是‘以人廢言’的老規矩嗎”？

斷言以氣節論人是“因人廢言”，邏輯上不通。以氣節論言，才是因人廢言；以氣節論人，只能是因人廢人。周先生杜撰一個詞，認

⁵² 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二十一世紀》，2001年8月號。

爲以氣節論人就是“氣節掛帥”，也是邏輯上不通。人的質有多方面的規定性。以氣節論人，就是論人的一個方面的質的規定性，當然不是人的全部的質的規定性；以氣節論人，也不排斥從別的方面論人，例如對周作人。周質平先生又說以氣節論人是“殘酷”的。對於喪失氣節的人來說才是殘酷的，對於堅守氣節的人來說卻是豪邁的。“逼人做烈士”一說尤爲刺眼。以氣節論人是要求人活著做一個像樣的人，不是叫人去死，堅守氣節的人也並非都成爲烈士。成爲烈士，是出於自身的信念，沒有一個烈士是被逼所致。

季羨林評馮友蘭：“晚節善終，大節不虧。”⁵³ 因爲他自己晚年的大節虧了，所以看馮友蘭“大節不虧”。季羨林本是正直的人。文革中跳出來反對聶元梓，被關進“牛棚”。1989年，他坐三輪車，打橫幅“北大教授季羨林”，到天安門廣場慰問學生，表示支持。晚年經不起吹捧，被奉爲“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2006年被尊爲“感動中國”的十大人物之一。雖然本人表示要辭去三頂“桂冠”，實際上以此爲榮、以此爲喜。賦《泰山頌》，吹噓曰：“星換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風起水湧，處處新顏。”季羨林的《泰山頌》可與馮友蘭的表態詩相媲美，故在他看來，兩者皆“大節不虧”。

海外的主流是對馮友蘭持批評的態度，以余英時先生爲代表。他說：

我欣賞這種承當精神，是因爲即使在傳統時代，能承當的“士”都是少數中的少數。多數的“士”即使不完全走“曲學阿世”的路，大體上也是以“獨善其身”爲主流。但中國的價值世界（即“軸心突破”後的超越世界）主要是靠這些極少數的人支撐著的，有的甚至成爲“殉道者”。

我認爲，知識人的擔當意義——即“社會責任感”即使在最複雜

⁵³ 季羨林：《生命不息，睿思不止》，載《解讀馮友蘭·學人紀念卷》。

的現代社會中依然是必要的，甚至更為迫切。⁵⁴

馮友蘭富有知識，但他不是現代知識分子，因為他缺乏擔當，沒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責任感。如果只是對他的不幸報以同情與唏噓，不能解剖為人的迷失和時代的荒唐，別人不免重蹈馮友蘭的覆轍，重演不幸的歷史。

⁵⁴ 陳致：《余英時訪談錄》，80、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

參考文獻

馮友蘭本人的著作

1. 《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聯书店，1984年12月。
2. 《三松堂全集》，第一版，1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2000；第二版，15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3. 《三松堂全集》，第三版，19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4月始發。
4. 《中國哲學史新編》（上、中、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03。沒有第7冊。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初版《三松堂全集》也沒有第7冊，爾後收入《三松堂全集》第二版、第三版。
5.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冊，臺北，藍燈文化專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6. 《中國現代哲學史》（即《中國哲學史新編》第7冊），香港，中華書局，1992。
7. 《中國現代哲學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8. 《中國現代哲學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9. 《中國現代哲學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
10. 《馮友蘭自述》，《三松堂自序》之易名出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11. 《馮友蘭自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
12. 《自我揭發，自我批判》，1966年7月5日，打印稿。
13. 《在工作中學習，在工作中批判》，1977年5月4日，打印稿。
14. 《馮友蘭學術著作精華錄》，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88。

15. 李中華編：《馮友蘭學術文化隨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6。

馮友蘭親人、家人的有關著作

1.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三松堂全集》，第 15 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2.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年譜長編》，《三松堂全集》，第三版，年譜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
3. 馮鍾璞、蔡仲德編：《馮友蘭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
4. 蔡仲德：《從實現和失落自我到回歸自我——馮友蘭思想轉變的三個時期比較》，《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 年第 5 期。
5. 蔡仲德編：《馮友蘭研究》，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6. 宗璞、蔡仲德編：《解讀馮友蘭·親人回憶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7. 蔡仲德編：《我的學術之路：馮友蘭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0。
8. 蔡仲德：《馮友蘭先生評傳》，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
9. 宗璞：《我的父親馮友蘭》，《中華讀書報》，2007-11-14
10. 宗璞、劉暢：《一個真實的馮友蘭》，《天津政協》，2011。
11. 宗璞：《給古人少許公平》，馮友蘭研究所版權所有，
<http://www2.nynu.edu.cn/kxyj/fy1/0206.html>
12. 宗璞：《馮友蘭之女撰文洗冤：父親從未寫詩吹捧江青》，人民網-文史頻道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722740.html> 2011 年 01 月 13 日 10:31。
13. 馮鍾璞編：《走近馮友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14. 王克明（馮友蘭的表親）：《馮友蘭有“紫禁城之夢”嗎？》，《文匯讀書週報》，第 579 期，1996 年 8 月 3 日。
15. 王克明：《馮友蘭臨終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 年第 2 期。
16. 王克明：《有關馮友蘭的幾個史實》，《參閱文稿》，No. 2013-56，北京華研有限公司，香港桑尼研究公司，2013 年 11 月 27 日；余家溝：《有關馮友蘭的幾個史實》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221154193_8_1.html 2013-11-27、28. 內容相同。

馮友蘭傳記

1. 殷鼎《馮友蘭》，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2. 程偉禮：《信念的旅程——馮友蘭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 年 1 月。
3. 王中江、高秀昌編：《馮友蘭學記》，三聯書店，1995。
4. 李中華：《馮友蘭傳》，南昌，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
5. 《馮友蘭簡歷》《名人簡歷》，<http://www.gerenjianli.com/Mingren/02/n84sepn4bg53bb2.html>
6. 涼秋：《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HXUxAwAAQBAJ&pg=PT31&lpg=PT31&dq>
7. 《哲學大師——馮友蘭》，《天南地北晉城人》解說詞
http://www.jconline.cn/Contents/Channel_1732/2007/1009/16696/content_16696.htm
8. 《哲學大師——馮友蘭》，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722/01/6843215_301628982.shtml
9. 《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鳳凰網 http://edu.ifeng.com/huodong/special/bainianqinghua/content-2/detail_2011_04/15/5763

628_2.shtml

10. 《一代哲人馮友蘭》，唐人在綫網 <http://www.tangrenzaixian.com/trrw/ylzz/1543.htm>
11. 《中國著名哲學家和哲學史家馮友蘭》，http://www.ebaomonthly.com/window/reading/philch/philch_fong.htm
12. 民國文林：《細說民國大文人：那些思想大師們，二，馮友蘭》，藏書網 <http://www.99lib.net/book/4368/index.htm> 又見 <http://wx.cclawnet.com/xsmgdwr/13.htm>
13. 民國文林《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http://www.yi-see.com/read_113019_4002.html, 2009-07-13
14. 萬安倫：《馮友蘭一門書香》，<http://www.china.com.cn/chinese/feature/691582.htm>
15. 王仁宇：《青年馮友蘭人生兩次重大選擇》，<http://www.gkstk.com/article/wk-78500000727005.html>
16. 謝泳：《晚年馮友蘭》，<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12/lost/index.html>
17. 《馮友蘭》（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Ug_SWhlRYQ
18. 《馮友蘭重寫中國哲學史》（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McHdYGM5A>
19. 《馮友蘭重寫中國哲學史》（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Lk0PbojmxE>

馮友蘭評論

1. 張君勣：《一封不寄信——責馮芝生》，1950 年發表于香港《再生雜誌》，后收入藍吉富《當代中國十位哲人及其文章》，臺北，正文出版社，1969。
2. 王永江、陳啟偉：《評梁效某顧問》，《歷史研究》，1977 年

- 第4期：《人民日報》1977年9月2日摘要轉載。
3. 王永江、陳啟偉：《再評梁效某顧問》，《哲學研究》，1978年第3期。
 4. 傅偉勳：《馮友蘭的學思歷程與生命坎坷》，《當代》（臺灣），1987年第13-14期。
 5. 方克立、李錦全主編：《現代新儒家學案》（“馮友蘭”在第二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6. 程偉禮：《馮友蘭在“文革”中的悲劇》，《書摘》，1996年第1期。
 7. 方克立：《全面評價馮友蘭》，《哲學研究》1997年第12期。
 8. 蔡仲德：《關於馮友蘭思想歷程的幾個問題——答方克立先生》，《哲學研究》，1998年第10期。
 9. 陳來：《一介書生周一良》（內中為馮友蘭辯護），《讀書》雜誌，1999年第6期；又見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9002> 2005-11-21。
 10. 陳來：《我比同輩快半拍》（回憶馮友蘭、張岱年先生的風範），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9938> 2008-07-31。
 11. 周言：《馮友蘭晚節考》，《士林的沒落——革命時代的知識人》，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
 12. 馬長軍：《“馮友蘭紀念館”——尷尬的紀念》，《南方都市報》，2012年1月1日。
 13. 王開林：《為天地立心——馮友蘭的自我救贖》，《隨筆》，2012年第1期。
 14. 施京吾：《馮友蘭歷史浮沉的標本意義》，《隨筆》，2012年第1期。
 15. 施京吾：《人文之殤：哲學泰斗馮友蘭的“文革”文革遭遇》，<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5/0121/c372326-26423746-2.html> 2015年01月21日。來源《中國經營報》；又見 <http://dy.qq.com/article.htm?id=20151204A03B0S00>，2015-12-04 題

- 目改為《馮友蘭誕辰 120 周年：文革之殇》。
16. 史飛翔：《馮友蘭身後的是非紛爭》，<http://www.wmxa.cn/a/201201/11955.html> 2012-01-13
 17. 史飛翔：《余英時評馮友蘭猶在“功利境界”》，陽江新聞網，2013-01-06，<http://www.yjrb.com.cn/web/mywh/mingrentang/webinfo/2013/01/06/1357140937607432.htm>
 18. 史飛翔：《馮友蘭的“應帝王”情結》，《民主協商報》，2013 年 8 月 2 日。
 19. 馮鍾璞、陳來、單純、陳曉平、牟鍾鑑、陳戰國等：《走近馮友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20. 李慎之：《融貫中西，通釋古今——懷念馮友蘭》，<http://www.guoxue.com/master/fengyoulan/fy106.htm>。
 21. 資中筠：《實說馮友蘭先生》，《名星》，第 2 期，2013 年 3 月；又見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3032880054.html 2013-03-28；又見《現代大學週刊》，2015 年 12 月 13 日。
 22. 朱志榮：《新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研究》（二）馮友蘭，<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
 23. 陳徒手：《馮友蘭：哲學鬥爭的個人掙扎史》，《故國人民有所思》，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24. 陳徒手：《文革中的馮友蘭：唯心主義哲學反面權威》，http://www.shz100.com/portal_mobile-p_mobile_view.html?aid=3738&page=1 2013-11-26
 25. 劉繼興：《馮友蘭喪失氣節，以求自保》，http://businessmacroanalysis.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4954.html 2014-07-12
 26. 東西：《馮友蘭自認文人無行》，《開放》，2014 年 9 月號。

馮友蘭哲學思想研討

1. 烏恩溥：《新理學的邏輯基礎及其範疇體系》，《社會科學戰線》，1987年第1期。
2. 王鑒平：《馮友蘭與新實在論——新理學邏輯分析法述評》，《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2期。
3. 王鑒平：《馮友蘭哲學史方法論述評》，《華東師大學報》。1987年第3期。
4. 王鑒平：《馮友蘭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5. 單純：《論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地位》，《中州學刊》，1998年第1期。
6. 單純：《舊學新統——馮友蘭哲學思想通論》，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
7. 單純：《中國哲學的魅力——讀三聯書店版馮友蘭先生“貞元六書”》，中國儒學網，<http://www.confuchina.com/01%20zong%20lun/zhongguozhexue%20meili.htm>
8. 單純、曠昕主編：《解讀馮友蘭·學人紀念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9. 單純、曠昕主編：《解讀馮友蘭·海外回聲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10. 陳先初：《評馮友蘭的“新形上學”》，《中國哲學史研究》，1988年第3期。
11. 涂又光：《馮友蘭新理學通論》，《哲學研究》1988年第6期。
12. 涂又光：《新理學的“理”論與方法》，《中州學刊》，1989年第1期。
13. 田文軍：《馮友蘭的中西文化觀》，《孔子研究》，1989年第1期。
14. 田文軍：《馮友蘭新理學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

15. 田文軍：《馮友蘭與中國現代哲學》，《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0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
16. 張永義：《新理學和它的方法——讀〈新知言〉》，《中州月刊》，1990 年第 5 期。
17. 周質平：《胡適與馮友蘭》，《胡適叢論》，臺北，三民書局，1992。
18. 周質平：《馮友蘭的最後一擊——從〈中國哲學史新編〉說起》，《中央日報》，1994 年 6 月 25 日。
19. 周質平：《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二十一世紀》，2001 年 8 月號。
20. 周質平：《馮友蘭善變的根源》（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fBqCqt5NU>
21. 李約瑟：《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1992 年），《李約瑟文獻 50 年》，下冊。
22. 方克立：《馮友蘭與中國哲學現代化》，《中國文化研究》，1994 年夏之卷。
23. 陳曉平：《評馮友蘭的新統——兼論馮友蘭哲學的歸屬問題》，《中州月刊》，1995 年第 3 期。
24. 胡軍：《馮友蘭〈新理學〉方法論批判》，《中國哲學史》，1997 年第 1 期。
25. 周繼旨：《馮友蘭與“聖王合一”傳統》，《二十一世紀》，1996 年 4 月號。
26. 劉述先：《對於〈馮友蘭與“聖王合一”傳統〉的回應》，《二十一世紀》，1996 年 6 月號。
27. 牟鍾鑒：《馮友蘭晚年的自我反省與突破》，《馮友蘭研究》第一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7。
28. 宋志明、梅良勇：《馮友蘭學術思想評傳》，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1999。
29. 陳來：《從“貞元之際”到“舊邦新命”——寫在馮友蘭先生全

集出版之際》，學術批評網 www.acriticism.com, 2002 年 8 月 23 日。

30. 陳來：《儒家思想傳統與公共知識分子——兼論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性與專業性》，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2897>, 2007-01-18。
31. 陳來：《孔子與當代中國》，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6763>, 2007-11-28。
32. 陳來：《有情與無情——馮友蘭論情感》，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8134>, 2008-03-26。
33. 劉述先：《馮友蘭與“新儒學”》，《二十一世紀》，2001 年 10 月號。
34. 翟志成：《馮友蘭的抉擇及其轉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臺北），第 20 期，447~510 頁，2002 年 3 月。
35. 翟志成：《被弟子超越之後——胡適的馮友蘭情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5 期，第 219~257 頁，2004 年 9 月。
36. 翟志成：《馮友蘭學思生命前傳（1895-1949）》，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37. 翟志成：《論〈新世訓〉對中庸之道的新詮釋》，《新亞學報》（香港），第 25 卷，75~130 頁，2007 年 1 月。
38. 翟志成：《〈新世訓〉與道家哲學》。
39. 翟志成：《當代中國哲學第一人：五論馮友蘭》，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40. 翟志成：《馮友蘭學思歷程述要》，馮鍾璞編：《走近馮友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41. 翟志成：《胡適的馮友蘭情結》，《隨筆》（廣州），2015 年第 2 期。
42. 錢耕森：《“舊邦新命”：楊振寧與馮友蘭的共識》，《人民日報》海外版，2002 年 12 月 16 日。
43. 何柳、胡成勝：《從“理在事先”到“理在事中”——從〈中國

- 哲學史新編》對王夫之的全新評價看馮友蘭本體論的轉變》，
《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44. 劉樂園：《馮友蘭和他的〈中國現代哲學史〉》人民網，2006
年12月30日，<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5235982.html>
45. 蔡方鹿：《馮友蘭的新理學對程朱理學的發展》，黃玉順等主
編：《情與理：“情感儒學”與“新理學”研究——蒙培元先生
70壽辰學術研討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2月。
46. 胡軍編：《反思與境界——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10周年暨馮友
蘭學術國際研討會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47. 《馮友蘭論》（一）——讀《中國哲學史新編·總結》，<http://www.51wendang.com/doc/cc11224e5599e1dbe042cad>
48. 劉東超：《如何評價馮友蘭？》，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7525870100fxpp.html
49. [日]吾妻重二：《新理學的形成——馮友蘭和新實在論》，國際
儒學網 http://www.ica.org.cn/nlb/index_383_3369.html，
2013-08-01，《國際儒學研究》第二輯；又見 <http://www.iceaworld.org/rxlw/content.aspx?nodeid=254&page=ContentPage&contentid=2476>
50. 王仁宇：《“闡舊邦以輔新命”——馮友蘭20世紀中國學術思
想》，《光明日報》，2016年1月19日。

馮友蘭與梁漱溟

1. 散木：《梁漱溟回絕馮友蘭的90大壽宴請：只因後者“曾諂媚
江青”》，人民網—文史頻道，<http://history.people.com.cn/GB/198307/15747184.html>，2011年09月25日。
2. 梁漱溟，[美]艾恺：《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
(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3. 《人有底氣，才有骨氣！梁漱溟和馮友蘭的不同人生》，

<https://kknews.cc/history/a5bej.html>

4. 陳曉平：《梁漱溟與馮友蘭的最後一次見面及其他》，
<https://kknews.cc/history/gvbgxm.html>

馮友蘭與章廷謙

1. 严家炎：《川島“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粵海風》，2003年第4期。
2. 王友琴：《林焘先生与文革历史》（涉及章廷謙案），中國戰略與管理網 <http://www.cssm.org.cn/view.php?id=12892>, 2007-01-18。
3. 王友琴：《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開放》，2010年1月號；又見阿波羅新聞網 <http://www.aboluowang.com/2010/0207/158344.html>, 題為《文革四大不要臉之一馮友蘭誣陷北大教授章廷謙》。
4. 王友琴：《人們為什麼批評馮友蘭和宗璞？》，《名星》，第2期，2013年3月。
5. 王友琴：《關於北京大學1969年8月5日“寬嚴大會”的一個註解》（應是8月15日），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gsbh/2013/0402/80434.html>, 2013-04-02。
6. 王友琴：《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S》，http://www.huanghuagang.org/hhgMagazine/issue04/big5/4_2.html. 2016.3.13

馮友蘭與錢鍾書

1. 莊因口述，丘彥明記錄：《錢鍾書印象》，臺灣《聯合報》副刊，1979年6月5日。
2. 莊因：《關於〈錢鍾書印象〉的補充》，臺灣《聯合報》副刊，1979年6月26日，收入《錢鍾書傳記資料》第一輯，臺北，天

- 一出版社，1985。
3. 汪榮祖訪談，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wdzgx/detail_2012_05/21/14688634_4.shtml
 4. 孔慶茂：《錢鍾書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年4月。
 5. 牟曉朋、范旭侖編：《記錢鍾書先生》，大連，大連出版社，1995。
 6. 馮鍾璞（宗璞）：《不得不說的話》，《文學自由談》，1998年第4期。
 7. 楊絳：《答宗璞〈不得不說的話〉》（1998年8月8日），《新民晚報》，1898年9月5日；《文匯讀書週報》，1998年9月5日，《文學自由談》，1998年9月號。
 8. 宗璞：《再說幾句話》，《文匯讀書週報》，1998年11月14日；《文學自由談》，1998年11月號。
 9. 李廷華：《宗璞楊絳“公案”述說》，《今日名流》，1999年第1期。
 10. 李洪岩、范旭侖：《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龍去脈》，《暢銷書摘》，2000年第8期；《中文科技期刊數據庫》<http://www.cqvip.com/QK/80749X/200008/4298789.html>；又見<http://tieba.baidu.com/p/20763753>。
 11. 李洪岩、范旭侖：《爲錢鍾書辯》，北京，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12. 余傑：《漫話錢鍾書？》，《粵海風》，2002年第5期。
 13. 宗璞：《遲到的話》，《粵海風》，2003年第4期。
 14. 王若：《爲楊絳聲辯》，《中華讀書報》2003年6月18日。
 15. 穆正平：《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龍去脈》，光明網人物http://www.gmw.cn/content/2004-05/12/content_23120.htm, 2004-05-12。
 16. 《爲了錢鍾書，楊絳與馮友蘭之女打官司》，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8/03/12/4457317_1.shtml, 2008.03.12。

17. 黃薇：《楊絳真乃百年罕見的奇女子》，<http://www.clickwriting.com/article/14661919570/>，原載《文史參考》，2012。
18. 《楊絳因何與馮友蘭之女打筆仗》，日本新華僑報網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64529>，2013/05/08
19. 甘草：《錢鍾書和馮友蘭的恩怨糾葛》，讀報參考 <http://www.dubaocankao.com/html/news/shgc/2013/1021/4370.html>，2013-10-21；又見人民論壇 <http://history.rmlt.com.cn/2013/1118/183425.shtml>，2013-11-18；又見求是理論網 http://www.qstheory.cn/wz/wzxb/201311/t20131119_293061.htm，2013.11.19；又見新華每日電訊，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3-11/22/c_132909889.htm，2013年11月22日。
20. 《1979年錢鍾書大罵馮友蘭：沒有骨氣，出賣朋友》，騰訊文化 <http://cul.qq.com/a/20131118/011303.htm> 2013-11-18。
21. 徐林正：《關於〈爲楊絳申辯〉的申辯》，<http://art.people.com.cn/GB/14759/21864/1951347.html>
22. 徐林正：《宗璞、楊絳“筆墨官司”了結期間諸多疑問未釋》，http://www.66163.com/Fujian_w/news/fzwb/981214/6-1.htm
23. 徐林正：《宗璞的憤怒和余傑抄襲的指紋》，新語絲。http://www.xys.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wenshi/yujie_zongpu.txt
24. 周運：《錢鍾書與馮友蘭》，蘋果日報 2015年9月25日
25. 《104岁杨绛：百年罕见之奇女子》，<http://www.17wh.com/gjt/20151030/581946.html>，2015-10-30；又見 <http://www.muwuya.com/62442.html>，2015年10月30日。
26. 《杨绛的亲情守望》，<http://xiaogushi.8bodog.org/diy/jishigushi/201206021727.html>，2015-12-07

“梁效”

1. 《滅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幫”偽造“臨終囑咐”的大

- 陰謀》《人民日報》編輯部，《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7日。
2. 陳石之：《評“四人幫”的代言人梁效》，《歷史研究》，1977年第4期。
 3. 《歷史的審判》，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4. 《歷史的審判》（續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86。
 5. 周一良：《畢竟是書生》，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6. 沙葉新：《“書生”及“梁效”評議》，《南方週末》，1999年1月29日。
 7. 范達人：《“文革”御筆沉浮錄——“梁效”往事》，香港，明報出版社，1999。
 8. 范達人口述，鄭實整理（2005年5月20日）：《我在“梁效”的經歷》，《信睿》，2012年第3期，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1204/14/6808665_252055298.shtml 2012-12-04。
 9. 范達人、舒雲：《范達人在“梁效”的經歷》，《信睿》，2012年第3期。
 10. 范達人：《幾篇重點文章的寫作經過》，《炎黃春秋》，2014年第3期。
 11. 范達人：《“梁效”的成立與終結》，《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
 12. 王忠人、江燕：《梁效的〈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並非“四人幫”授意之作》，《炎黃春秋》，2003年第2期
 13. 戰毅軍：《參加中央工作組追查“梁效”文章》，<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896>
 14. 周啟博：《我的父親周一良怎樣進入“梁效”寫作班子》，博訊，2004年5月05日，http://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4/05/200405050912.shtml。
 15. 丁東：《四人幫御用文人“梁效”成員最終結局》，<http://history.m4.cn/2013-01/1199253.shtml>, 2013-01-23（本文摘自《東楚晚報》2010年8月22日第19版，原題為《1975年鄧小平曾

組織“寫作班子”抗衡江青》)。

16. 袁偉時：《湯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和我的私信風波》，<http://m.kdnet.net/share-11969750.html>, 2013年6月3日發表在《騰訊·大家》。
17. 王奕：《從梁效看知識分子的性格缺陷》，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0&articleId=32045, 2011-12-14。
18. 宋柏年：《懷念周一良先生》，《蘋果日報》2013年9月1日。
19. 朔风寒：《梁效和它的成员们》，<https://www.ishuo.cn/doc/vldsqqf.html>, 2015-07-26。
20. 湯一介：《我與“梁效”》，湯一介《我們三代人》節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6，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0dda160102w86v.html
21. 《湯一介的懺悔錄》（文革中參加“梁效”，我不能原諒自己），鳳凰網主筆張弘據湯一介《我們三代人》一書編改。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E4NTkxMA
22. 蔡慎坤：《梁效陰魂為何依然在大地遊蕩？》，阿波羅新聞網 <http://www.aboluowang.com/2016/0904/797887.html>, 2016.09.04

文件和資料

1.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一），王張江姚專案組，1976年12月，中發〔1976〕24號。
2.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二），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3月，中發〔1977〕10號。
3.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罪證》（材料之三），王張江姚專案組，1977年9月，中發〔1977〕37號。
4.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材料之二《關於洪廣思及其錯誤文章的初步清查情況》，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5日印。

5. 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擴大會議材料之五《關於〈北京日報〉最先使用“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資派”的提法攻擊、誣陷鄧副主席的問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1978年9月25日印。
6. 《憤怒聲討“四人幫”插手北京大學，利用“兩校大批判組”進行篡黨奪權的反革命罪行》，劉洪儒同志代表北大宣傳隊在北京市科教系統大會上的發言，《大字報選編》，第1期，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6年10月26日。
7. 《“四人幫”的御用工具“梁效”反對周總理大事記》，《大字報選編》第2期，北大歷史系，1976年11月8日。
8.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一《8月26日江青到清華、北大的情況》，1976年11月3日。
9.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三《遲群在我校總支書記會上的講話（1976年5月8日）摘錄》，1976年11月3日。
10.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四《遲群在清華大學的五次講話》，1976年11月8日。
11.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五《江青在清華大學分校的言論摘錄》，1976年11月8日。
12.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六《江青反黨黑話摘編》，1976年11月12日。
13.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七《張春橋三十年代作品索引》，1976年11月3日。
14.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八《張鐵生在北大的講話（1976年1月28日）》，1976年11月16日。
15.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十《遲群在北大、清華的四次講話》，1976年12月3日。
16. 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材料之十一《關於江青破壞土改的罪行調查（中共湖北省委調查組，1976年11月27日）》，1977年1月12日。
17. 《8、9、10三個月“四人幫”及遲、謝在北大搞反黨陰謀活動的部分罪行》，北大運動辦公室，1976年12月28日。

18. 《8、9、10三個月“四人幫”及遲、謝在北大搞反黨陰謀活動的部分罪行》（續），北大運動辦公室，1976年12月30日。
19. 《揭發江青利用歷史篡黨奪權的陰謀——江青論史黑話批註》，北京大學歷史系，1976年12月29日。
20.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一——在毛主席病重期間和逝世以後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活動》，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15日。
21.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之二——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爲“四人幫”篡黨奪權大整黑材料，大造反革命輿論的罪行》，北京大學原“兩校大批判組”學習班領導小組，1977年3月30日。
22. 《原“兩校大批判組”罪行材料》（初編），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25日。
23. 《關於原“兩校大批判組”成員何芳川的初步審查情況》，“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7年9月22日。
24. 《“兩校大批判組”清查工作簡況》，《北京大學簡報》，第194期，北京大學黨委辦公室，1977年12月30日。
25. 《關於“兩校大批判組”炮製的反黨黑文〈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與孔孟之道〉的審查報告》，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6號，1978年1月6日。
26. 《關於“兩校大批判組”成員田餘慶炮製的反黨黑文〈曹袁鬥爭和世家大族〉的審查情況》，中共北京大學委員會報告，黨發[1978]26號，1978年3月10日。
27. 《關於“梁效”編寫蘇聯兩次教育大辯論的材料清查報告》，“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8年3月21日。
28. 《關於“梁效”印發〈共產黨波蘭向右轉〉等五個外電材料的清查報告》，“梁效”專案組清查報告，1978年3月21日。
29. 《關於“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草稿），北京大學黨委，1978年3月13日。
30. 《對原“兩校大批判組”清查情況的報告》，中共北京大學委員

會，黨發[1978]82號，1978年5月15日。附：一，《“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敬愛的周總理的陰謀活動》；二，《“兩校大批判組”瘋狂反對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陰謀活動》；三，《“兩校大批判組”打擊誣陷敬愛的鄧副主席的陰謀活動》；四，《“兩校大批判組”無恥吹捧“四人幫”、為江青上台當女皇大造輿論的陰謀活動》。

31. 《關於北大與遼寧、上海的串聯活動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年7月。
32. 《關於王連龍、魏銀秋、夥同遲群、謝靜宜策劃給江青寫“效忠信”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年8月。
33. 《梁效罪證材料》，北京大學梁效專案組，1978年8月。
34. 《關於毛家灣“工作小組”有關問題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年10月。
35.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一》，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36.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二》，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37.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三》，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38. 《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李家寬罪行材料之四》，北京大學運動辦公室，1977年3月。
39. 《關於王、魏、郭追隨“四人幫”批林批孔另搞一套反對敬愛的周總理問題的清查報告》，北京大學清查辦公室，1978年8月。
40. 《王連龍罪行綜合材料》，王連龍專案組，1978年10月。
41. 《魏銀秋罪行綜合材料》，魏銀秋專案組，1978年10月。
42. 《郭忠林罪行綜合材料》，郭忠林專案組，1978年10月。
43. 《對王連龍、魏銀秋、郭忠林罪行的審查結論和處理意見》，王、魏、郭專案組，1978年10月。

歷史背景

1. 陳東林、杜蒲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三卷（下）《內亂與抗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72—1976年），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2. 鄭謙、張化：《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第三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4. 《毛澤東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張迪杰主編：《毛澤東全集》，第51、52卷，香港，潤東出版社，2013。
6. [美]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7.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8.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9. [美]羅斯·特里爾：《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10. 胡鞍鋼：《毛澤東與文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11. [美]麥克法夸爾、[瑞典]沈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
12.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香港，書作坊出版，2010。
13. 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4.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15. 《回首文革》：（上下），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16.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冊，北京，中

- 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11。
17. 唐大宋：《文革密件》，香港，明鏡出版社，2016。

備查

1.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增訂本），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2. 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編：《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萃（哲學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3.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4. 王學珍等主編：《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5. 北京大學檔案館校史館編：《北京大學圖史——1989—2008》，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6. 趙敦華等主編：《北京大學哲學系史稿（2012—2012）》北京，北京大學印刷廠印。
7. 韓水法主編：《北京大學哲學學科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8. 李四龍編：《有哲學門以來——北京大學哲學系 1912—2012》，生活·讀書·新知三聯书店，2012。

作者小傳

生當國難臨頭——1931 年“九一八”事變之次年，一生的記憶以戰爭、流血、離亂為始。

長於魚米之鄉——東林黨人的發祥地、民族資本的大本營、太湖之濱的無錫城，乃資本主義文明與傳統文化交匯之地。

早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從事地下工作；晚年又反對中國共產黨，備受打擊迫害。

1949 年以後，為黨政幹部，當過科長、秘書、團委書記、黨委書記。因追求思想自由，告別官場，報考大學，重新選擇學者之路。

小學沒有畢業就上中學；中學沒有畢業就上大學；大學沒有畢業就當教師。

1955 年考上北京大學。

1957 年，在反右運動中，作為學生（中共）黨支部書記，不願將一些有才華的同學打成右派分子，被指責為右傾。

1958 年，提前兩年留校任教。當學生學的是歷史，當教師教的是哲學。

平生沒有任何學位；自己沒有學位，還要指導別人讀學位。

60 年代，由忠誠的共產黨員轉變為黨內的異議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批評共產黨，被黨組織稱為“反對三面紅旗的代表人物”。

歷次運動打而不倒、批而不臭。

文革中兩次被打成“反革命”，下放農場勞動。在“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靠邊站”將近一年。粉碎“四人幫”以後，被北大哲學系師生推舉為“領導小組”組長，取代黨的領導，人稱“哲學系

臨時政府首腦”。

1977 年，被選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大會上作長篇發言，批評北京市領導人吳德，開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歷史上批評領導人、投反對票之先例。

70 年代投入思想解放運動，發表文章。1979 年，參加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是為思想解放運動之高潮。

鼓吹言論自由，反而被剝奪言論自由。

在“反自由化”運動中中箭落馬，遭中宣部批判。

1982 年，戴上“資產階級自由化冒尖人物”的帽子，被鄧小平趕出北京，發配南京。在南京大學受軟禁 10 年。

為追求民主而加入共產黨，在共產黨內卻飽受不民主之苦。

因懷抱理想而被吸納入黨，又因堅持理想而被清除出黨。從黨內的異議分子變為黨外的反對派。

1989 年，參加民主運動。“六四”槍聲一響，教授資格和博士生導師資格全都被取消。與此同時，收到紐約科學院的通知，被增選為院士；並收到中國人權（總部在紐約）的通知，被增選為理事。

因被剝奪講課的權利、出國的權利，向法院起訴國家教委和南京大學黨委非法剝奪公民權，官司從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打到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最後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控告國家機關和共產黨黨委的第一個案例。法庭上雖未取勝，事實上爭得了出國的權利。

1992 年，應紐約科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赴紐約，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在盛行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搞自由化，在自由化的美國又講馬克思主義。在哥倫比亞大學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

1995 年任哈佛大學法學院資深研究員，又從史學、哲學進入法學。名曰資深研究員，實際上研究工作既欠資也不深。

為中國而研究，研究成果又進不了中國。

在中國是異議人士；在海外的異議人士中，又成了異議人士。

矛盾一生，碌碌無爲。

16 歲的時候被國民黨政府列入追捕的黑名單，60 歲的時候又被共產黨政府列入放逐的黑名單。

中國政府始而不准出國，出國後又不准回國，流亡美國至今已 27 年。

馮友蘭是“梁效”的顧問。

“梁效”是兩校大批判組的譚名，兩校即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是古今中外從未出現過的特殊的寫作班子，曾經獨霸文壇，呼風喚雨，控制思想，左右輿論。“梁效”的成員是一夥“四人幫”的御用文人。敘述“梁效”的興亡，首先是為了明真相、存史實；同時也是為了探究產生“梁效”的條件，以及如何消除這些條件，防止再生“梁效”。

ISBN 978-195113538-6

9 781951 135386